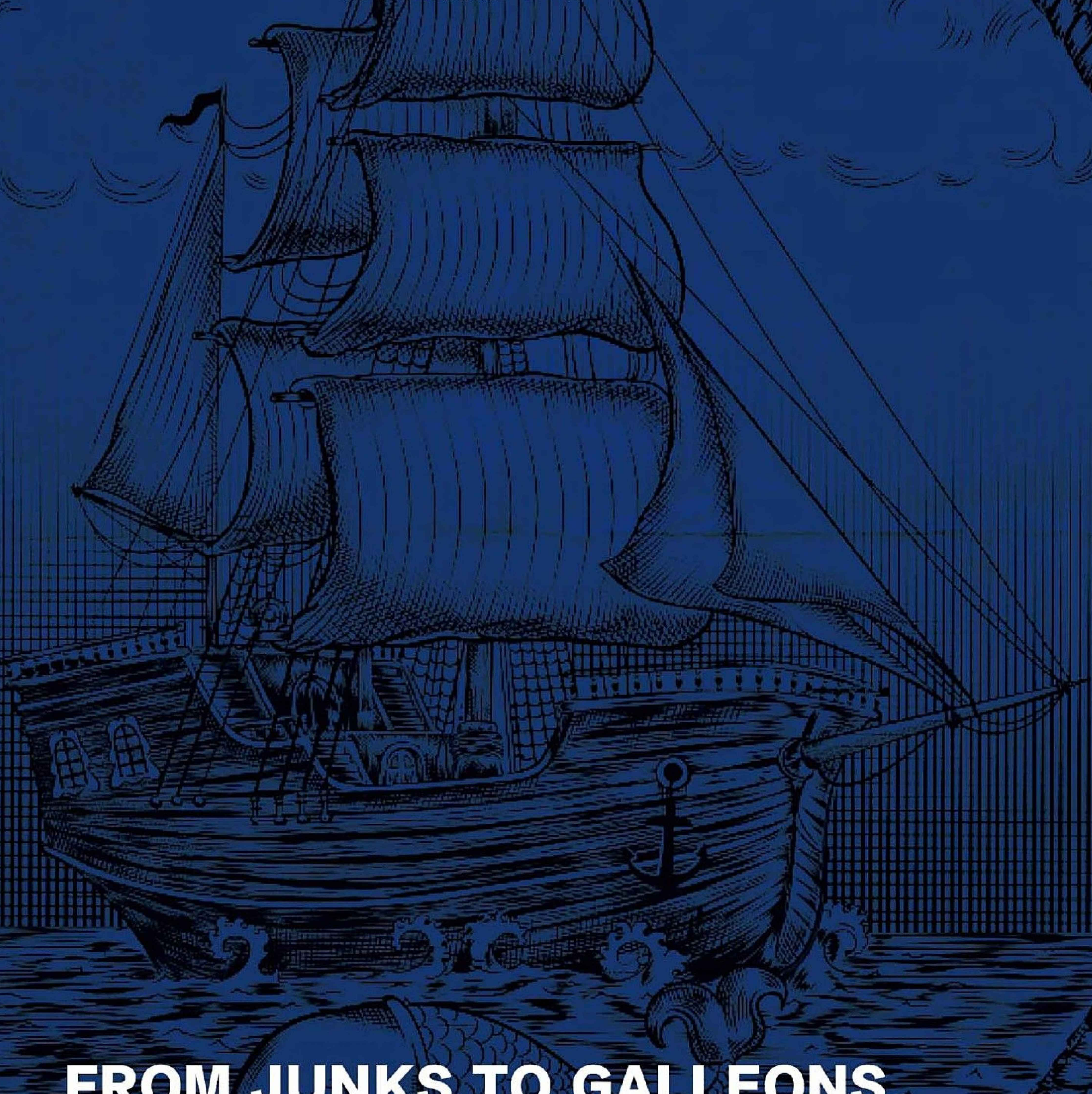
如是文化
YH0012

南海文明圖譜

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

新華社國際部 ◎ 著



FROM JUNKS TO GALLEONS

Discovering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南海文明圖譜：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

嚴文斌　主编

新華社國際部　著

發 行 人：蔡佩玲
出 版 者：如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302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8號5樓之7
聯絡電話：(02) 23511607
聯絡電話：(02) 23511549
電子郵件：service@eculture.com.tw
出版年月：2019.9 初版
定　　價：新臺幣400元

ISBN：978-957-878-498-7 (EPUB)

◆展售處（銷售服務）： HyRead 電子書服務平台
地　　址：302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8號5樓之6
服務電話：(02) 23956966轉2555
網　　址：https://ebook.hyread.com.tw/
電子郵件：service@hyread.com.tw

◆電子書設計製作：

設計製作：如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100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51號5樓
電　　話：(02) 23511607
電子郵件：service@eculture.com.tw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不限
檔案格式：EPUB
檔案內容：文字
使用載具：不限

◆版權聲明：

本書版權為新華出版社合法授權；如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等相關單位（以下簡稱「如是文化」）獲轉授權中文繁體版之出版、發行及相關著作權利（含紙本書及電子版）。非經「如是文化」同意或授權，不得將本書部份、全部內容複印或轉製、或數位型態之轉載複製，以及任何未經「如是文化」同意之利用模式，違反者將依法究責。

編委會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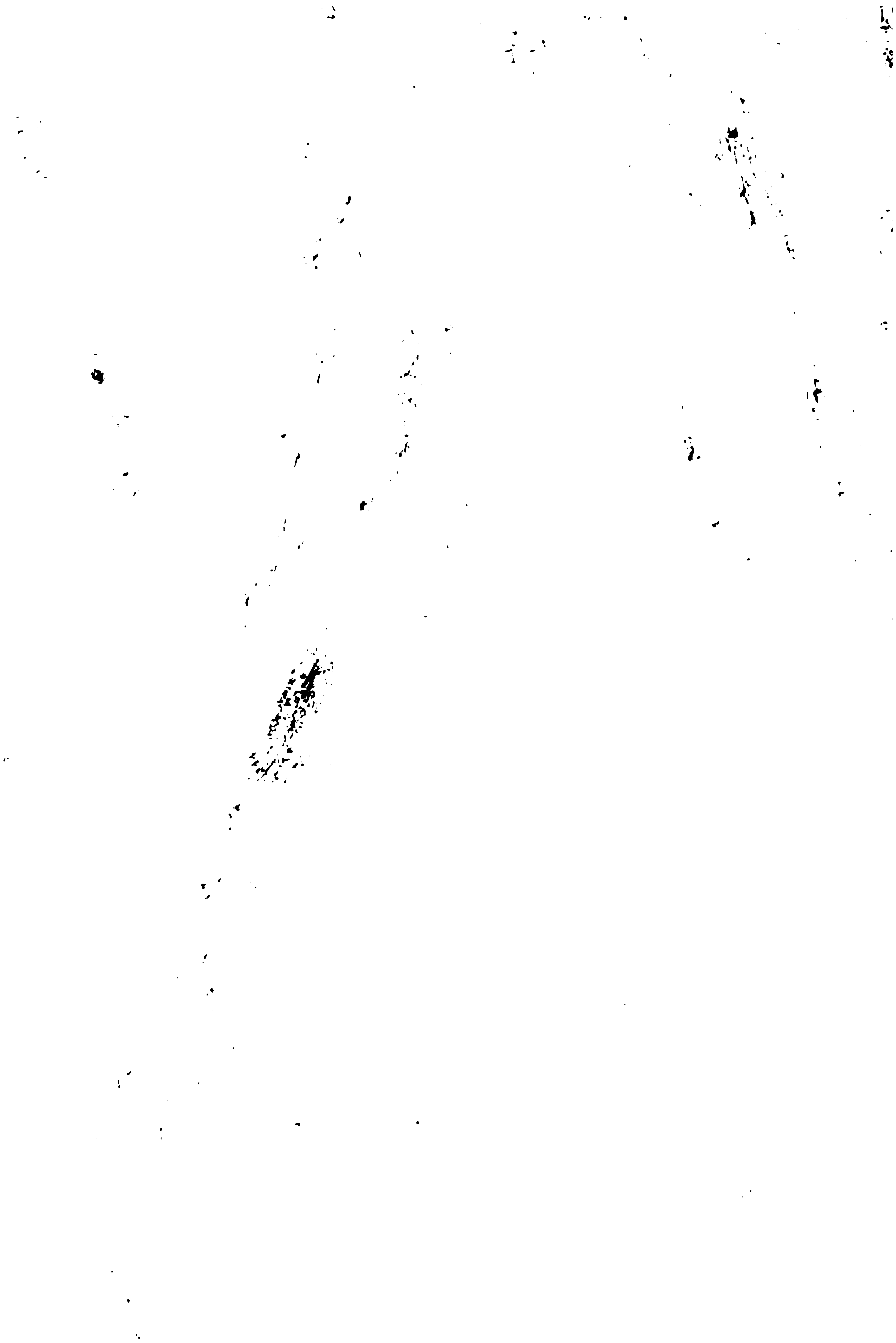
主 編：嚴文斌

副主編：謝榮 馮武勇

執行主編：凌朔

責任編輯：江文軍

編 委：李拯宇 凌德權 張云飛 葛晨



今日吳哥／黃碧盈攝

序一

最近幾年，一提到「南海」，就是「問題」，所謂「南海問題」，不絕於耳。南海是否有「問題」？南海是否真的「成問題」？事實上，通過復原南海文明的基因圖譜可以發現，中國古人在開發、探索南海的幾千年歷史進程中，南海周邊各民族的先人們相安無事，各國人民在南海上一同清剿海盜、一同抵禦西方殖民者入侵，並通過相互合作，共同繁榮共同發展。南海從來不是一片「有問題」的海洋。

2016年10月，習近平與來訪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會談後發布的聯合聲明中提到，「雙方重視兩國人員往來，注意到2017年是菲律賓蘇祿蘇丹訪華600週年，願舉辦相關紀念活動」。無獨有偶，聯合聲明發表時，新華社國際部地區報導中心記者撰寫的一篇報導正在我案頭，題為「呂宋蘇祿，南海貿易盛衰的親歷者」。這篇文章濃墨重彩地還原了600年前那次中菲「元首外交」：

1417年，明朝永樂年間，菲律賓古蘇祿國的東王、西王和峒王，率300多名家眷、群臣訪問中國，受到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東王回國途經山東德州時染病身亡，被就地厚葬。他的部分家眷留下守陵。至今，東王的後裔仍然在德州一帶過著平凡的生活。

從這篇文章和其他後續研究中，我們感受到，在南海幾千年文明史中，在中國與東南亞幾千年友好交流史中，蘇祿蘇丹訪華只是眾多故事中一個小小的片段。但今天，很少有人在挖掘這些故事、講述這些歷史、傳承這些記憶——無論是在東南亞、東亞，遑論在西方。

觸讀更多相關文章，我和我的同事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所謂「南海問題」其實是西方國家設置的一個偽命題。通過這個被設置出來的議題，域外勢力把南海周邊幾個歷來是中國傳統友好的合作夥伴國引入了「聲索國」的死胡同，把一片和平、合作、友好的南海水域污染成「問題的泉源」。這使得近些年來，但凡提到「南海」，輿論場總被「主權爭端」、「填海造島」、「航行自由」等辭彙主導，如影隨形，如蛆附骨。這是一種典型的西方式話語陷阱。只要「南海」持續被這些熱詞包圍、擠壓和捆綁，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就有可能長期陷於外部勢力設置的「南海困境」中。跳出「南海困境」，需要揭開這些話語符咒。

真正的南海，應當有另一種語境。構成這一語境的涓涓滴滴，在有關南海的大量史料典籍中自然流淌著。這些史料的時間跨度可達千年以上，這些史料的來源地包括中國、東南亞、印度、阿拉伯、歐洲等。我們所需要做的，是把這些散落在發黃書頁中的歷史故事發掘出來，釐清這些故事背後的歷史邏輯，從而還原一度被湮沒的南海文明基因圖譜，重新認識南海文明的發展動力和現實意義。

當義大利歷史學家貝內代托．克羅齊喊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時，他從認識論角度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搭起了往來的通道。但自十六世紀以來，當西方殖民者挾堅船炮利大規模進入南海地區後，南海文明基因的譜系傳承如同被公牛闖入的瓷器店，除了碎片，還是碎片。

歷經西方殖民者和近代化歷史大潮衝擊後的東南亞，由此出現了歷史淵源複雜、文化宗教多元、政治體制各異、發展程度有別等特點，很多國家至今仍受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軍事、技術、思想等方面的深刻影響。現在，東南亞國家之間、東南亞與周邊大陸之間的文化認同差異，地緣接近與心理疏遠的悖論，經濟融合與情感隔閡的反差，均與南海文明歷史與「當代史」的通道被阻隔有關。

在與東南亞國家學者和政要的交流中，我們屢次有這樣的微妙感受：一方面，我們互有本能的親近感和強烈的交流需求；另一方面，我們卻在搜索枯腸，尋找共同熟悉的「談資」——就像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在一起可以很輕鬆地談論《三國演義》及其歷史背景，我們與東南亞人民的「談資」呢？

所幸，通過尋蹤、溯源、梳理、復原南海文明的基因圖譜，我們找到了大量故事：我們能在《扶南，南海文明早期大通道》中看到「一個女人開創的扶南史」，重溫「南海上的兩洋三國外交」；在《渤泥，南海南緣的南大門》中，瞭解「南海、渤泥與青花瓷」的淵源，看到南海歷史上的政治智慧；在《交趾與占城，南海上的絲路驛站》中，與「交趾籍的紫禁城設計師」對話，發現占城稻米與「馬爾薩斯陷阱」的關係……

當然，這些故事，不僅僅是談資。因為我們試圖復原的是一個文明的歷史基因圖譜——這個文明是內生的，有自身進化的能量動力和邏輯鏈；這個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它與東北亞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歐洲文明的碰撞和交融讓世界文明更瑰麗多彩。

正如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提到的那樣，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造和發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構成了波瀾壯闊的文明圖譜，書寫了激蕩人心的文明華章」。多彩的南海文明，正是人類文明圖譜的重要組成，也是南海周邊各國各族人民的集體記憶的底色。

歷史上的各個時期，東南亞地區湧現過非常多元的「亞文明」——扶南文明、蒲甘文明、渤泥文明、爪哇文明、麻六甲文明、暹羅灣文明、蘇祿文明等等。它們最終都在西方人所謂的「先進」文明中被輕忽、被改造、被抹去，消失殆盡。

好在，不同於文明實體本身，文明的歷史記載或會暫時消失，但不會滅絕。由此，我相信，對南海文明歷史基因圖譜的探尋和復原，某種意義上也是東南亞與中國、東南亞國家之間文明融匯的尋根之旅。

在這一平臺上，如今膚色各異、語言不同的約二十億民眾可以讓許多共同的歷史記憶復蘇。發現和定義南海文明、還原南海文明基因圖譜，其意義在於告訴世人，南海不僅「本無事」，南海周邊各國不僅「相安無事」，而且，自古以來，南海文明在骨子裡就蘊含著和平、和諧、合作、共贏的核心理念。這個概念的復原，可以賦予「周邊命運共同體」以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可以讓人們以「四海一家」的輕鬆心境，在一個全新的語境裡平等、自由地談笑南海。

有深厚積澱的南海文明，此刻，需要喚醒。在國際的輿論場上，用歷史事實，澄清謬誤，明辨是非，也是新聞工作者的責任與擔當。

2017年7月25日

嚴文斌，新華社國際新聞編輯部主任、高級編輯

序二　一部頗有創意的新作

在嚴文斌先生主持下，新華社國際部幾位多年在亞太地區從事新聞事業的記者們組成團隊，在百忙工作之餘，辛勤筆耕，撰寫了《南海文明圖譜：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一書，現已完稿付梓，我們有幸得閱書稿，獲益良多，甚有啟發，現付諸成文，談點讀書體會，供學界和讀者教正與參考。

《南海文明圖譜：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一書是一部頗有創意的新作。作者們既有廣闊的國際視野，又能立足於南海區域發展的現實，敏銳地抓住各方關注的南海文明問題，從歷史學的維度，追本溯源進行考察，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與強烈的現實感。

首先，本書作者所提出的「南海文明」概念，是很值得探究的課題。「南海」一詞作為一個區域概念，在古代中國史籍中由來已久。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東南亞古代史》有較為詳細的論述：西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先秦古籍或以「南海」為南方各族居地泛稱，或有實際海域所指。秦置南海郡，海疆實臨南海。周朝《詩經》中有首《漢江》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於疆於理，至於南海。」此時的南海專指中國南方的郡縣或海疆。

漢代以降，西元初，南海才擴大用以指中國南海及周圍海域，並包括中南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又名南洋群島）。《後漢書》對南海又有「漲海」之稱。至《梁書》，「南海」一名的使用逐漸增多。隋唐時期更甚，如唐高僧義淨所撰的著作，即冠名以《南海寄歸內法傳》。[1] 降至明代，鄭和出使南海諸國七次，航行所曆均在渤泥（今汶萊）以西。明人張燮撰《東西洋考》，是以渤泥為界，將南方海域分為東西兩洋，渤泥以東稱東洋，渤泥以西稱為西洋。十六至十七世紀明代中葉至清初以來，東南亞地區又有東洋與東南洋之稱。近世西方人的「東漸」，最初以印度為目標，其向東方的航行是為了尋找通往印度的航路，故他們的命名離不開印度。[2]

由此可見，古代南海從廣義說來，乃是中國海上對外交通的必經區域，其範圍包括今東南亞及由此而西到印度洋沿岸廣大地區。東南亞史地學者陳佳榮、謝方和陳峻嶺等先生編撰的《古代南海地名匯釋》指出，南海地名不僅涵蓋了東南亞，還包含了東南亞相關的一些區域。[3] 由於這一區域是兩大洋（太平洋與印度洋）和兩大洲（亞洲與大洋洲）的交通大道及交會處，有的學者稱之為「亞澳地中海文化」區域。[4]

《南海文明圖譜：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一書，借鑑和結合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研究地中海的成名作《地中海與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和英國史學界大衛．阿布拉菲亞著作《大海洋——地中海人類歷史》的理論和書寫方式，試圖勾勒出南海文明的歷史畫面。

作者們嘗試運用中國史料，參考日本、美國等學者的論述，在本書的第一部分，首先回顧了歷史上中國在南海區域的活動，勾勒出南海文明的基因圖譜；進而分別探討了屬於南海文明中東南亞區域早期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人員往來。其中包括暹羅灣、扶南、驃國、蒲甘、渤泥、交趾、占城、爪哇、麻六甲、呂宋、蘇祿等古國或地區與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互動。最後論述了南海文明與歷史上琉球、日本、印度以及中東和歐洲等國家和區域的文明互動。

本書立論明確，圖文並茂，歸納概括頗有特色，資訊量可觀，作者們的努力值得讚賞。主要的觀點有以下幾方面：一是，中國人在締造南海商業文明雛形的同時，還將先進技術、文化和理念推廣到南海周邊國家；二是，在南海區域幾千年的古代文明演變過程中，除了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的深刻影響外，南海周邊區域和國家也萌生了不少本土文明，這些本土文明同樣對南海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貢獻；三是，歐洲本是南海文明的受益者，但自近代以後卻依賴遠洋航行能力和槍炮，最終成為南海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最大毀壞者。歐洲殖民者破壞了南海文明的多數固定規範，改變了相當一部分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重繪了東南亞權力版圖，導致一些興盛百年的區域文明就此終結。因為西方殖民者，南海文明出現了一個延續幾百年的大斷層。直至今天，西方殖民留下的種種話語體系和統治心理陰影仍普遍存在於東南亞地區。

本書是一部集體研究工程，作者們秉承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從國際傳播學的宏觀視角，對南海區域文明內涵、特質與貢獻，做出頗為全面系統的闡述，這是很有益的學術型的傳播學研究，可以讓國內廣大讀者以較快的速度，瞭解南海歷史文化演變的歷程。同時，也有利於國外讀者看到有別於西方的論述和觀點，這無疑將有利於相互之間的進一步交流與溝通。

從歷史學的視閾考察，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言，本書並不是一本南海歷史的學術著述，但無疑會對學界進一步深挖和拓展南海文明這一概念有所啟迪。嚴文斌先生也說，這本書的最主要意圖，就是在南海問題上提起新的話題，特別是歷史話題、合作話題，便於我們今後與東南亞國家進一步交流。這正是本書的重要貢獻所在。我們祝願凌朔先生等作者組成的團隊在新聞傳播和南海歷史文化研究領域做出更大的奉獻。

以此共勉，是為序。

2017年7月20日

梁志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志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前言

這本書不是在「編造」一種區域文明，而是在發現原有的文明、復原存在而被人忽略的文明。

長期以來，東南亞國家主要依靠西方學派的種種著述來復原自己的歷史，被動地在西方話語體系中尋找自己的文明。雖然西方學者也承認，關於14世紀以前東南亞歷史的憑據主要來自中國史籍和文獻，

但西方人在談到14世紀以前的東南亞史時，習慣於用「朝貢體系」對一個延續幾千年的區域文明關係進行簡單描述和籠統概括。更關鍵的是，西方的大量研究忽略了南海在區域文明形成、演進、傳承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幾乎沒有人把南海文明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那麼，南海文明到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一種碎片式的存在還是一種有內在聯繫、有內在特質的存在？這種特質又是什麼？為什麼西方話語主導的研究會忽略了這種特質的存在？

研究南海文明，時常會讓人聯想到地中海文明，甚至對二者進行類比。南海和地中海有很多類似之處，也有很多差異化的表現。但顯然，它們在文明構成的基本要素方面，具有極為相似的特質：它們都以一個遼闊水域為中心；它們都有大量分散在水域周邊的民族和國家；它們在長期的時間隧道中一直在通過中心水域進行交往和溝通；它們在交往溝通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互動的特質並且把這種特質又回饋到周邊民族和國家中去，甚至影響了周邊民族和國家的發展軌跡；這種特質一直以某種形式的思維在傳承和延續。

讓人興奮的是，在論證南海文明的存在時，無論從研究海洋區域文明的哪一種理論或哪一種模型入手，都能清晰地看見南海文明的脈絡。

以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年鑑學派認為地中海文明是地理影響下的文化延續和傳承。在他看來，地中海地區的地理要素是決定周邊社會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因素，山川、平原、海洋、氣候等環境因素構成「靜止的歷史」，這種靜止的歷史改變著人的活動，決定了文明的形成。布羅代爾認為地形、洋流等物理和自然要素決定了海洋周邊人類活動、食物種類、航行方式、貿易形式等。因此，布羅代爾不用貫通古今的歷史作為研究範圍，而只選取某一時段內的地中海地區歷史特徵作為分析對象，成就了其經典之作《地中海與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如果用布羅代爾的這種理論為模型，套用在南海的某一個歷史時期上，一種在空間影響下的文化延續、變革、演進和傳承的脈絡可以被清晰地復原出來。

另一種截然相反的研究模型由英國史學家大衛．阿布拉菲亞在《大海洋——地中海人類歷史》中提出。他試圖擺脫布羅代爾的立場，強調人類角色在海洋史中的位置。阿布拉菲亞在突出人類力量的同時，基本上忽略了自然因素對文明產生的作用。他尤其關注穿越海洋的人，認為人類因素是海洋和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他認為諸如人口遷徙、技術進步等人類活動以及人類活動的結果都讓社會發展不再完全束縛於自然地理特徵。如果用阿布拉菲亞的這種理論為模型，套用在南海歷史上的人類活動，一種在時間推演下的文化延續、變革、演進和傳承的脈絡同樣清晰可見。

這本書結合兩種模型，用結合時間與空間的混合方式，圍繞南海周邊人類活動的特徵，對南海文明進行梳理和分析。以時間軸為主線，南海文明可以清晰地分作早期探索階段的文明、日臻成熟定型的文明、蒙受殖民撕裂的文明三大階段；以地理結構為主線，南海文明則可以按人類技術發展、交往活動的不同階段，推演出以扶南為中心的大陸文明、以馬來半島為中心的半島文明和以麻六甲為中心的海島文明三個重要歷史時期。

更有意思的是，在歷史上，以中國技術為主要推動力的探索行為，經歷了一個在南海上「畫弧成圈」的過程。「西弧」是，從中國南方的廣東一帶出海，經北部灣，到越南沿岸，到泰國灣，再到馬來半島，抵達麻六甲海峽。「東弧」是，從中國福建一帶出海，經臺灣島，到菲律賓群島，再到加里曼丹島，抵達麻六甲海峽。跨度一千多年的東西兩條弧線，形成歷史上東西兩大貿易帶，最終構成北方以中國為起點、南方以麻六甲為終點的一個閉合貿易圈。貿易圈帶動兩弧沿線的港口、都市、社會、人文、宗教的大發展，並向各個方向的縱深地帶輻射，形成以南海為中心的區域文明。

如果從構成文明的物質內容、精神內容、思維方式、地域空間、社會面貌、經濟聯繫、技術水準來評判，南海區域內涵豐富。另外，判斷區域文明的另一個標準是，必須要存在一種明顯有別於其他文明板塊的自身特徵或品質。在這一方面，通過對南海文明與域外文明交往歷程的研究，可剝離出南海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獨有基因。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過南海文明的啟蒙肇始、「兩弧」形成、系統海航、成熟繁榮來還原南海文明的發展，通過南海文明的物質交換、技術分享、精神交流來還原南海文明的特質，通過南海文明遭受的殖民排擠、經濟掠奪和文化清洗來還原南海文明為何被歷史湮沒的真相。第二部分通過扶南文明、麻六甲文明、爪哇文明、暹羅灣文明等南海文明不同歷史時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幾大內生的局域文明來闡述南海文明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第三部分通過南海文明與域外文明的交往來見證南海文明的獨特性、獨有性和獨立性。

今天我們所說的「東南亞」這個地理概念，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蒙巴頓將軍設立的戰區名稱，其歷史還沒有超過百年。但從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古人就管東南亞那片區域叫作南洋，或者南海，可見古人的海洋思維與海洋智慧。復原南海文明圈的基因圖譜，意義也正在此。

目錄

版權頁
序一
序二 一部頗有創意的新作
前言

第一部分 南海文明基因圖譜
- 引子
- 01 南海文明的早期基因
  - 文明之沉浮：始於扁舟，毀於戰船
  - 文明之啟蒙：冒險探索，雛形初現
- 02 南海文明的「兩弧」序列
  - 文明之定型：千帆競渡，系統海航
  - 文明之昌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03 南海文明的遺傳特質
  - 文明之引擎：中國分享，技術傳播
  - 文明之品質：物質交換，精神交流
- 04 南海文明的複製演進
  - 文明之胸懷：兼收並蓄，吐故納新
  - 文明之根本：文明反哺，共建共贏
- 05 南海文明的干預突變
  - 文明之劫難：殖民排擠，文化清洗
  - 文明之規則：恪守平等，抵制掠奪
- 06 南海文明的基質再生
  - 文明之保障：中國管轄，共同維護
  - 文明之本質：自由和平，合作繁榮

第二部分 南海文明的內生文明
- 引子
- 01 暹羅灣，不止是南海文明一隅
  - 兩航線推演歷史三階段
  - 古人眼中的金鄰大灣
  - 連接兩洋的戰略要衝
  - 狼牙修，古籍中的古國
  - 「暹羅」是個外來詞
- 02 扶南，南海文明早期大通道
  - 一個女人開創的扶南史
  - 南海上的兩洋三國外交
  - 兼具早期南海文明興盛多要素
  - 大航海時代跌宕起伏的真臘
  - 用8500字復原的文明
- 03 驃國和蒲甘，南海邊的陸海通衢
  - 羅馬雜耍進洛陽
  - 南海古代匯市的縮影
  - 緬語專業的緣起
  - 互為影響的佛教文化
- 04 渤泥，南海南緣的南大門
  - 南海最南的島嶼中心
  - 一塊墓碑與南海人口大流動
  - 南海、渤泥與青花瓷
  - 遠隔南海的外交風雲
  - 南海上的「元首外交」
- 05 交趾與占城，南海上的絲路驛站
  - 交趾籍紫禁城設計師
  - 占城稻米與「馬爾薩斯陷阱」
  - 多元文化交融的國際化大都會
  - 穿越時空的跨海尋蹤
- 06 爪哇，南海桃花源
  - 倉廩殷實與印度匠心
  - 鄭和捎去「中國風」
  - 爪哇「名片」胡椒和糖
  - 爪哇的軍火出口
  - 華人反殖民之役
- 07 麻六甲，南海的寶瓶口
  - 天賜之峽與歷史必然
  - 靠海峽發家的室利佛逝
  -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 南海地緣政治中的外交
- 08 呂宋與蘇祿，南海貿易盛衰的親歷者
  - 致富經裡的「貓里務」
  - 客死山東的蘇祿東王
  - 美洲土產跨洋進南海
  - 蘇祿、呂宋的覆滅

第三部分 南海文明與世界文明
- 引子
- 01 南海上的《一千零一夜》
  - 中國是個「島」
  - 南海上的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
  - 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多元傳播
- 02 南海上的印度梵音

跨越千年的南海古航道
黃金、香料和奇珍異貨
梵音的魅力
03 南海上的東瀛浪人
東亞貿易圈的「局外人」時代
南蠻貿易和朱印船貿易
商人、傭兵、天主教徒
日本人在東南亞的口碑
04 南海造就的萬國津梁
早期的「公派技術移民」
特許經營造就「天時」
轉口貿易依仗「地利」
南海文明開創「人和」
05 南海上的文明碰撞
一手是帳冊一手是刀劍
為了掠奪的規則之戰
殖民湮滅「南海文明」

尾聲
跋：《南海文明圖譜》讀後絮語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
作者簡介

第一部分　南海文明基因圖譜

引子

1626年，在今天菲律賓巴丹半島的埃爾莫薩地區，一位名叫弗雷．路易士．穆羅的天主教神甫把中國商船的到來納入每天的祈禱內容。

埃爾莫薩與馬尼拉近在咫尺，但弗雷．路易士並不指望馬尼拉能運送足夠物資緩解當地遭遇的嚴重糧荒。當六艘滿載穀米的中國商船按每年約定的時令從南海駛入馬尼拉灣埃爾莫薩港時，這位神甫大呼「這是上帝的恩賜」。

這是一段很少被提及的歷史片段，隱藏在19世紀美國學者艾馬．布雷爾和詹姆斯．羅伯特森合著的《菲島史料》（又譯《1493—1898年的菲律賓群島》）第32卷中。只可惜，這段被描述為「上帝恩賜」的故事，在中國古籍中已無法考證，或許因為，在那個由中國先人主導的大航海時代裡，這六艘中國商船太過渺小，太過尋常，雖然六船穀米事實上拯救了大批饑民，緩解了饑荒。

今天，國際上一些人否定歷史、混淆視聽。但是，在菲律賓史學研究中頗具地位的《菲島史料》卻記載著這樣一些片段和評述：

1605年，18艘中國大船運載華人5500人抵達菲律賓，推動了當地的生產與技術。遙望海的那一邊，中國那個偉大的王國，非凡廣大，那裡的人們，有著極為敏捷的智慧，有著無與倫比的文明和政府。他們甚至在高麗、暹羅、高棉、交趾支那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權威，他們把自己的體系、品格與精神教義傳播到足夠遙遠的地域。

今天，一些人把「航行自由」和「軍事化」掛在嘴邊。但縱覽南海區域風雲，從文明初現，到文化交融，到航海繁榮，到共同發展，中國人不僅是南海地理的探索者、遠洋航行的先驅者、先進技術的傳播者，自由航行的維護者，而且，中國長期扮演著地區局勢的穩定器、區域貿易的推動器、先進技術的傳播器。反倒是，16世紀開始，實力和觀念膨脹的西方人打著「貿易自由」旗號在東南亞開啟大殖民時代，窮兵黷武、干涉佔有、壓榨攫取、文化清洗……幾百年滌蕩，使受傷的南海文明出現繼承與傳承的嚴重斷層與致命傷疤，一些文明消失，一些文明殘缺，一些文明走形。就這樣，南海文明，被刻意湮沒與淡忘。

這樣的故事，這樣的史料，還有很多。故事裡的主角，不僅有中國的古人，還有高棉人、暹羅人、呂宋人、爪哇人……他們足以開啟關於南海文明亙古以來的巨幅卷軸，足以復原一個曾經繁榮輝煌的南海文明，足以還原那幅被殖民主義與干涉主義刻意抹殺的基因圖譜。

01 南海文明的早期基因

文明之沉浮：始於扁舟，毀於戰船

中國先人們啟航南海的那第一葉扁舟，今天已無從考據了。但可確認的是，官也罷，商也罷，民也罷，官船也好，商船也好，漁船也好，正是那些從中國諸港出發的一次次冒險，編織起覆蓋南海的交流網，讓南海周邊各種文明，跨地域地相遇、相識、相交。近兩千年來，南海上日復一日地上演著自由航行、通商貿易、技術交流、文化聚合、觀念交織的故事，各種形態的文化、傳統、觀念、方法，通過南海這片和平水域，交融、進化、催生出一種屬於自己的文明。

這一圍繞著南海發生的文明，從肇始，到嬗變，到成型，到傳承，始終沒有離開中國的關注，也四處留存著中國的身影。它的成型，離不開中國歷朝歷代官方與民間的推動、培育、捍衛與維護，或有心，或無意。這些點滴，逐漸讓散落的文明合力創造出一個以南海為圓心、以南海為平臺、以南海為網路的區域文明——南海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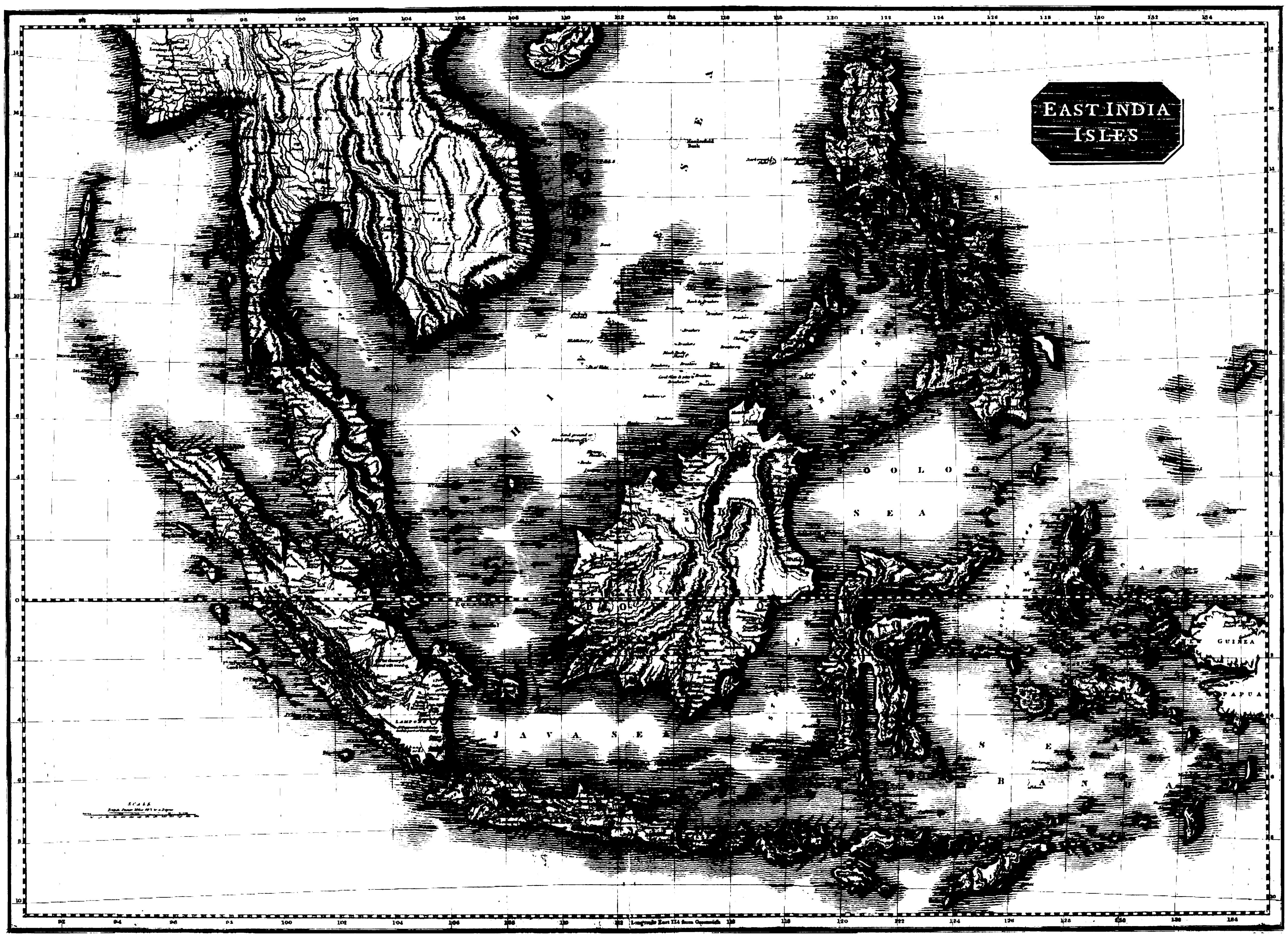
直至16世紀，當亞歐大陸那一端的地中海文明發展到擴張和掠奪野心橫溢時，西方人撞入這片從未發生過大規模侵略戰爭的文明海域，爾後，載有火器的西方戰船長驅直入。隨後300多年間，一些人打著探險、傳教與開化的名義，打著航行自由、自由貿易的幌子，在南海周邊，掠奪資源，清洗思想，塗抹文明。他們打破了中國和南海諸國千餘年來靠海上交流確立的價值觀念、信仰取向、貿易規則和人文融合，從頭至尾地改造著這片被他們稱作是「東印度群島」的土地。正是這一擠壓本土文化的殖民階段，極大程度地扼壓了南海古文明的有序傳承，讓南海文明驟然進入一個斷層期，一些古文明甚至就此消失。

今天的東南亞，在談及遠古時代的文明時，總有一種找不到歸屬的尷尬：很多古文明已經消失，很多古文明僅僅是部分傳承，還有一些古文明不倫不類地被西化和殖民化後改頭換面地形成了今天的東南亞局部文明，今天的東南亞因此而呈現一種多元文化的現象。這種多元並不是天然的斑斕，而是一種殖民使然的非自然差異。

直至今日，一些西方人仍在暢談他們當年靠殖民手段給南海周邊國家帶來的所謂「進步」，甚至仍打著「自由」的旗號在這片海域炫耀先進的戰船與戰機。但歷史需要復原的真實情況是，在沒有西方戰船火炮的年代裡，中國人與南海周邊的智慧民族們，靠上千年的付出，推動的是和平的文明，繁榮的文明、先進的文明、自由的文明、平等的文明。

南海文明的進步，在西方人到來之前，始終在穩健地向前推進。真正的進步，從來不需要以武力干涉為代價。

包括東南亞這個稱呼，不過是二戰時期才有的軍事地理概念。在文明初生、繁榮、繁衍的上千年歷程中，這裡被中國人稱呼為南海、南洋。南海文明，真實存在過，至今也仍然存在，它從不曾湮沒，不曾虛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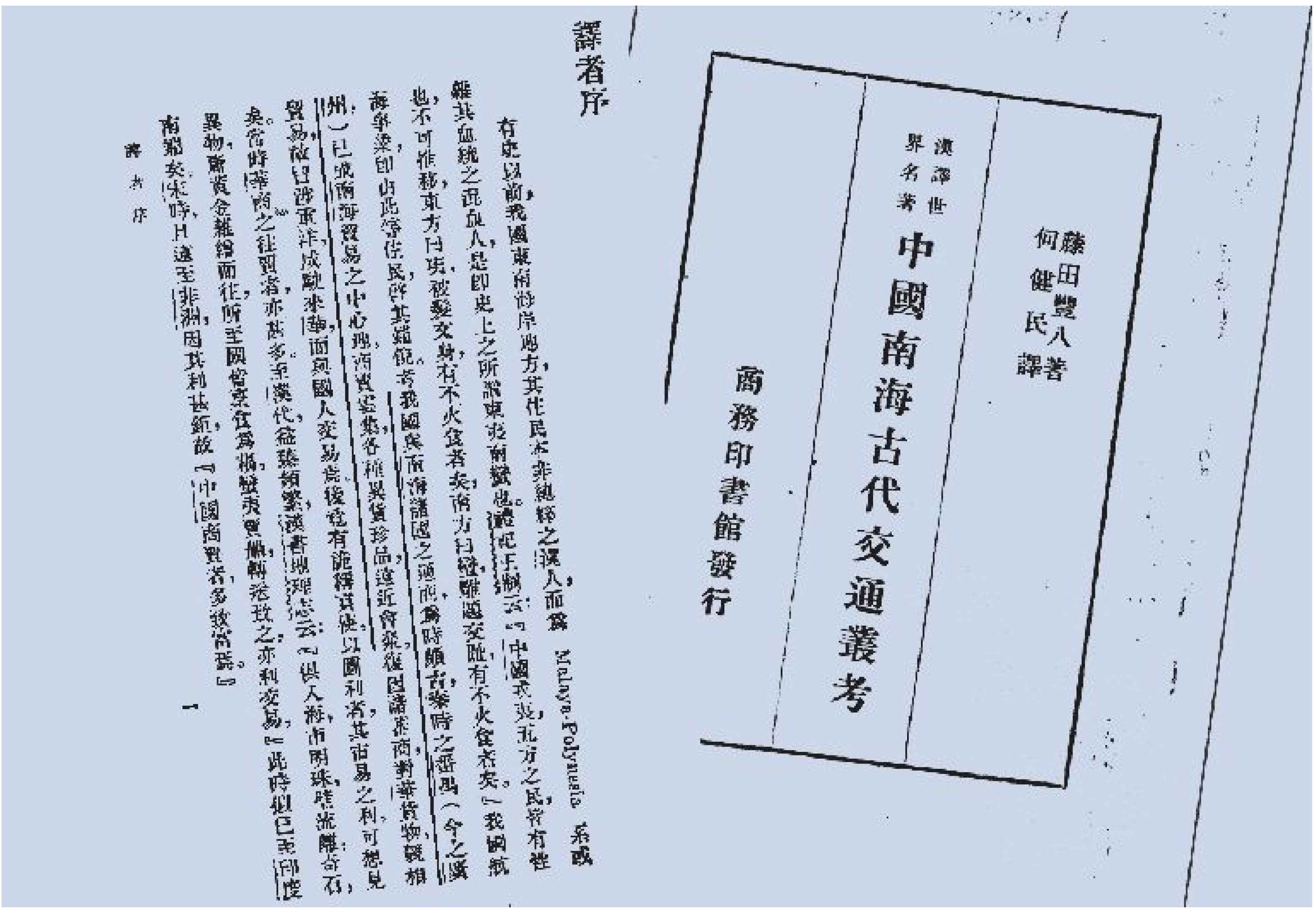
蘇格蘭人約翰．平克頓（John Pinkerton）1818年繪製的「東印度群島」地圖。

文明之啟蒙：冒險探索，雛形初現

早在舊石器時代，中國的古人們就留下了海上航行的蛛絲馬跡。夏、商、周時期則有了明晰的海上活動記錄。由於時代久遠，這些記錄已無法清晰還原成航線和活動軌跡。但可歸納的是，在秦朝以前，中國人在南海上的探索已經積澱到一定規模，乃至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不久即在南疆設立南海郡，打通至今天越南沿海的諸多航線，記錄下大量南海資料與島嶼資訊。雖然那時的南海郡與今天的南海並無直接管轄關係，但秦始皇時期的一系列「作為」，成為南海文明史上開疆拓土式的節點性事件。

毋庸爭辯的是，全世界最早、最全面記錄下南海周邊古文明的史料全部來自中國。再明確一些，在14世紀以前，有關南海的歷史文獻均為中文史籍。今天的東南亞學者考證，許多南海古國雖然有自己的文字，但由於地理和物產因素，它們大多採用印度傳入的「貝葉記事」法，而貝葉不易保存，不易複製，不易傳世，很大程度上造成那段古代史的大面積殘缺。另外，很多南海古國並沒有史官記載的傳統，只有涉及宗教的內容，才被以文字形式部分流傳下來。因此，後來的西方及日本研究者們，大多依賴或參考中國古籍來窺探、瞭解南海周邊古文明，這才有了今天關於屈都乾、扶南、狼牙修、干陀利、盤盤、丹丹、赤土、婆皇、頓遜、毘騫、婆利、哥羅、羯荼、訶陵、爪哇、室利佛逝、羅越、墮羅缽底、墮婆登、多摩長等南海古國的認知碎片。

這些名稱都是一千年前存在過的國名，它們中有些短暫輝煌，有些則統治一方數百年；有些與中國有藩屬關係，有些與中華文明有著密切的交流；有些是由中國人的群體移民而成，有些則在政治、科技、生活、宗教等某個或某幾個領域深受中國使者的影響。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南海周邊文明早期交往的過程中，中國人不僅探索出航線，還與其他民族分享這些航線，教它們如何利用南海之便，規避海上風險。



譯者序

有史以前，我國東南海岸地方，其住民本非純粹之漢人，而為 Malayo-Polynesia 系或雜其血統之混血人，是即史上之所謂東夷南蠻也。禮記王制云：『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我國航海事業，即由此等住民啟其端倪。考我國與南海諸國之通商，為時頗古，秦時之番禺（今之廣州）已成南海貿易之中心地，商賈雲集，各種異貨珍品，遠近會聚，復因諸蕃商對華貨物，競相貿易，彼且涉重洋，成群來華，而與國人交易，此後遂有能[illegible]其便，以圖利者，其貿易之利，可想見矣。當時蕃商之往還者亦甚多，至漢代，益臻頻繁。漢書地理志云：『與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此時似已至印度南部，至宋時，且遠至非洲，因其利甚鉅，故『中國商賈者多致富焉。』

譯者序 1

漢譯世界名著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藤田豐八著

何健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何建民先生給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所作的序。

清朝末年，日本南海史、西域史學家藤田豐八在其《東西方交涉史》上卷《南海篇》（即《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中詳細記述和考證了古代中國與南海諸國的交通線路和往來史實。何建民先生後來在翻譯這部著作時特別加入了一段對秦代時廣州貿易盛景的描述。

中國與南海諸國之通商，為時頗古，秦時之番禺（今廣州）已成南海貿易之中心地，商賈雲集，各種異貨珍品，遠近匯聚。

他考證到，在當時的廣州，不僅有中國商人遠涉南海周邊古國，更有這些國家的商人，競相「遠涉重洋，成簇來華」，與國人交易。

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吉普魯在其《亞洲的地中海》一書中也指出，在東南亞被殖民以前的漫長歲月裡，南海的海上貿易呈現三大特點：貿易由中國遠洋船隻開展、官員和船員都是中國人、中國貿易體系指導南海貿易規則。換句話說，中國主導著東南亞被殖民前的南海商業文明。即便在西方殖民東南亞後一直到18世紀末的近兩百年間，中國人在南海推行的貿易規則成功抵擋住歐洲人介入這一貿易體系的企圖，壓縮了歐洲人在南海周邊的掠奪和暴利空間。

至此，中國人首先發現和利用南海，已是不容爭論的事實。基於這個事實，史料還告訴我們，中國人是最早在南海上定期、大範圍、成規模活動的族群。不僅如此，中國人在締造南海商業文明雛形的同時，還將先進技術、先進文化、先進理念推廣與傳授給南海周邊國家。

早期的南海文明，肇始於樸素探索，進而演化成規模化商業的雛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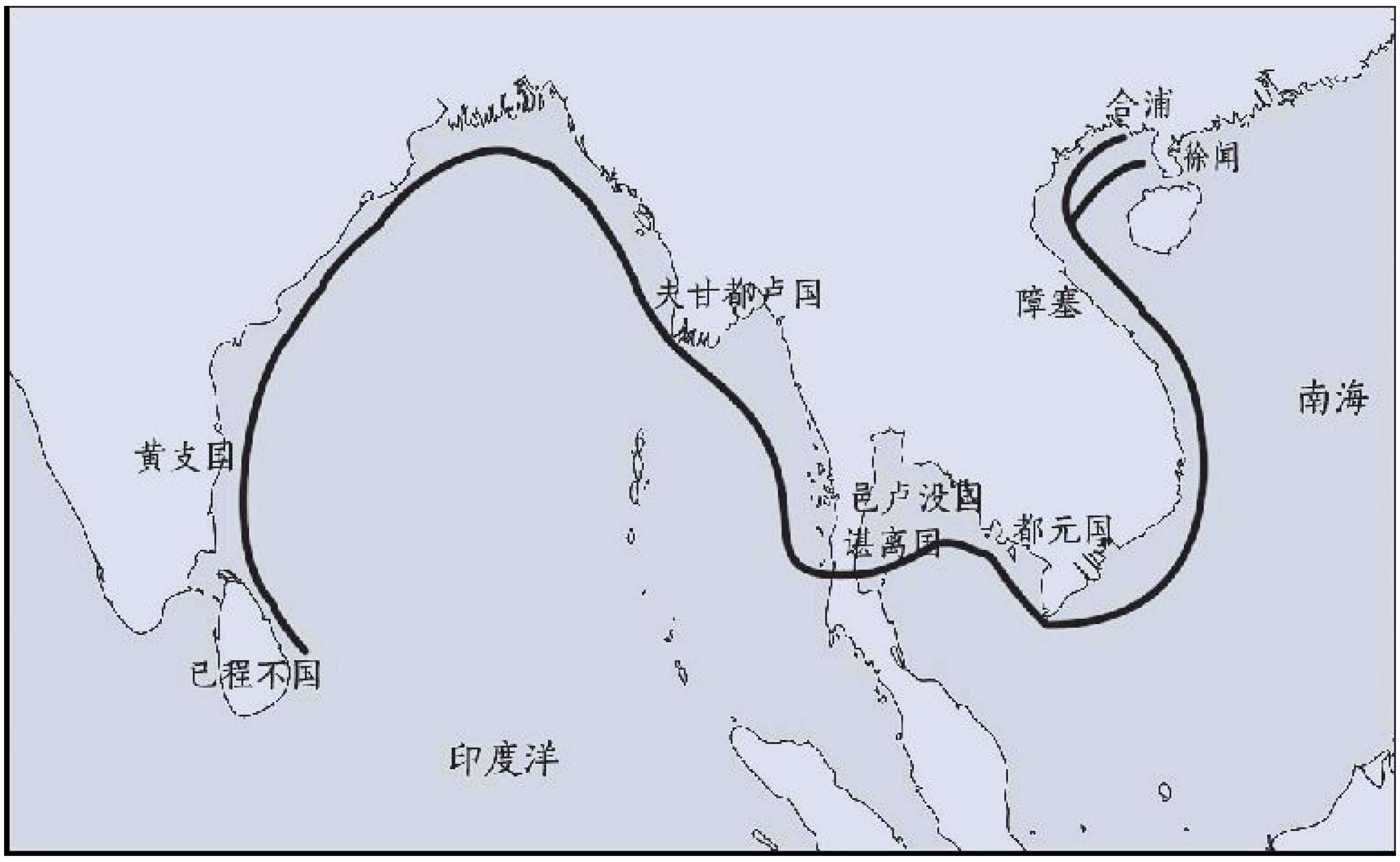
02 南海文明的「兩弧」序列

文明之定型：千帆競渡，系統海航

秦代以前，受制於交通條件，南海古文明間的跨海交流充滿艱辛與冒險。到了漢代，漢武帝建立起相對完備的海上力量，此時，北起渤海、南至越南的海上交通線已通行無阻，南海交通已具規模，漢人開始初涉印度洋。漢代對南海的探索和發現，由此更加系統性和專業化。那時，就已經出現了比較完備的南海航行「攻略」。

《漢書．地理志》記錄了這樣一段從中國大陸南端向南旅行的海陸日誌：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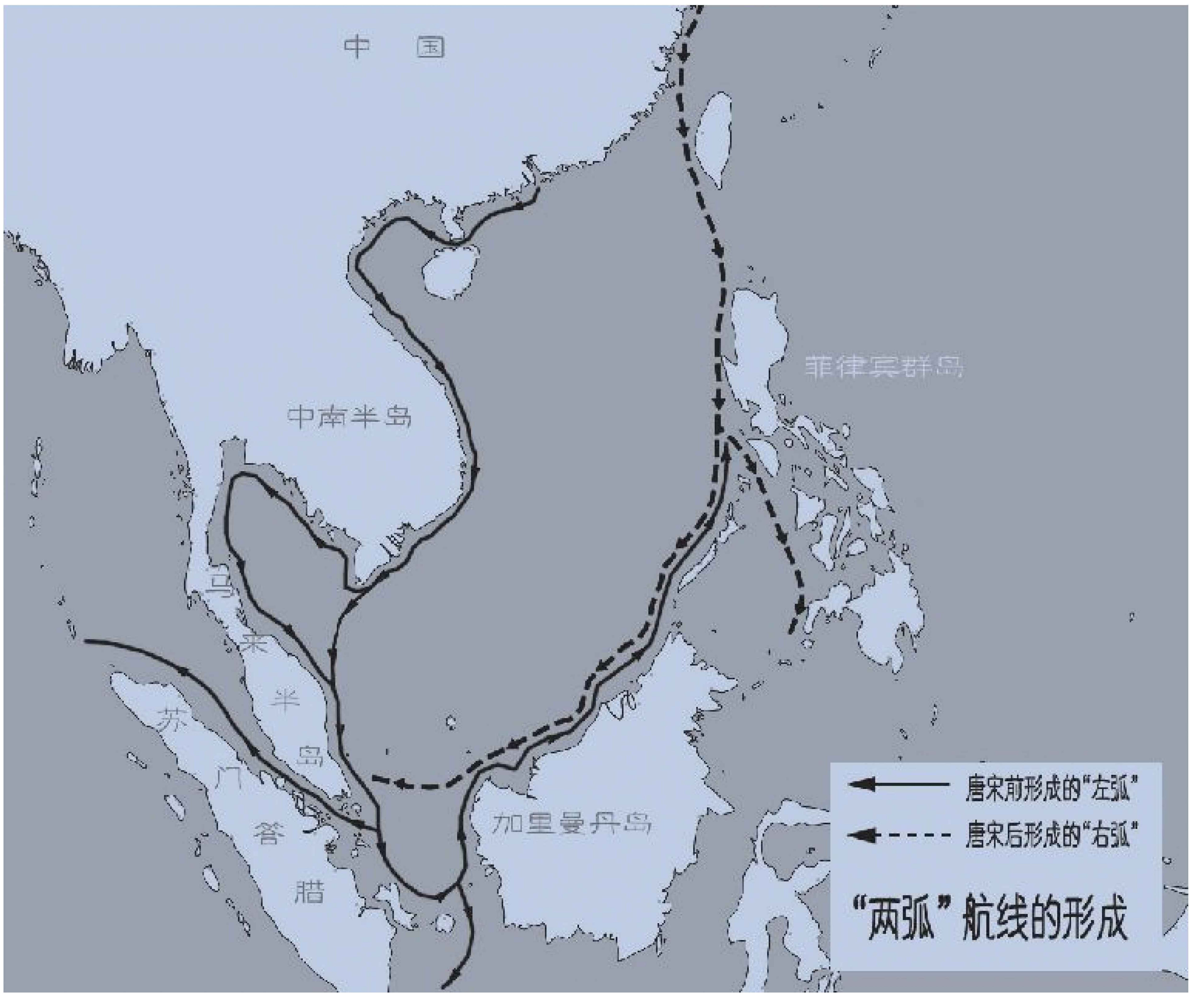


依照《漢書．地理志》繪製的漢代西行海路圖。部分古國的方位爭議較多。

通過這類日誌中記錄的方位、航程計時等資訊，南海上逐漸出現越來越頻繁的航行。南北朝時期，南海海上交通盛況空前，中國人與南海諸國的交往也逐步深入。《梁書．海南諸國傳》中記述了林邑國（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國（今柬埔寨及附近地區）、盤盤國（今泰國南部索叻他尼灣沿岸）、丹丹國（今馬來半島）、干陁利國（今馬來半島吉打）、狼牙修國（今泰國南部北大年一帶）、婆利國（今峇里島）、中天竺國（今恆河流域）、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等幾十個國家。到了隋朝，607至610年間，隋煬帝派常駿、王君政等人由南海出使赤土國（今馬來半島南部），途中造訪焦石山（今越南占婆島附近）、陵伽缽拔多洲（今越南的燕子岬）、真臘（今柬埔寨及越南一帶）、狼牙修、盤盤等地，其經歷見聞、風土人情、奇聞逸事都記錄在《隋書》中。關於這段歷史，不僅有文獻指引，更有實物為證。在西沙群島北礁發現的南朝青釉六系罐等瓷器已經說明，至少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的瓷器已經作為一種貿易品遠銷東南亞，西沙群島那時已成為南海上的中轉站。

在唐朝以前，中國與南海周邊諸國已經建立了成熟的航線，出現成規模的移民和通商。雖然南海諸國之間的戰爭不斷，頻繁分裂與兼併，新邦舊國領土交錯的情形普遍，但文明交會的種子早已在那些土地上生根孕育，為後來唐宋元明時期的南海文明大交融奠定了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們打開航海圖，可以發現很多穿越大洋中心地帶的拋物線形航線，但在古代，幾乎所有固定的航線都是貼著海岸線形成的。一方面，受限於古代航海技術能力以及對洋流的有限認知，靠近海岸線航行會消除更多的風險因素，另一方面，船員可以獲得更便捷的補給和應急救援。因此，在南海早期航線發展中，最先固定下來的航行就是《漢書．地理志》中描述的那一段，即從廣東出發，經北部灣，到越南沿岸，再到泰國灣，再到馬來半島，最終抵達麻六甲海峽。即便是這一條航線，也不是在某一個時期突然形成的，它是隨著時間推移、在幾百年時間中逐漸探索形成的。目前的證據表明，在唐朝之前，這條航線基本成型，形成了南海上「西弧」航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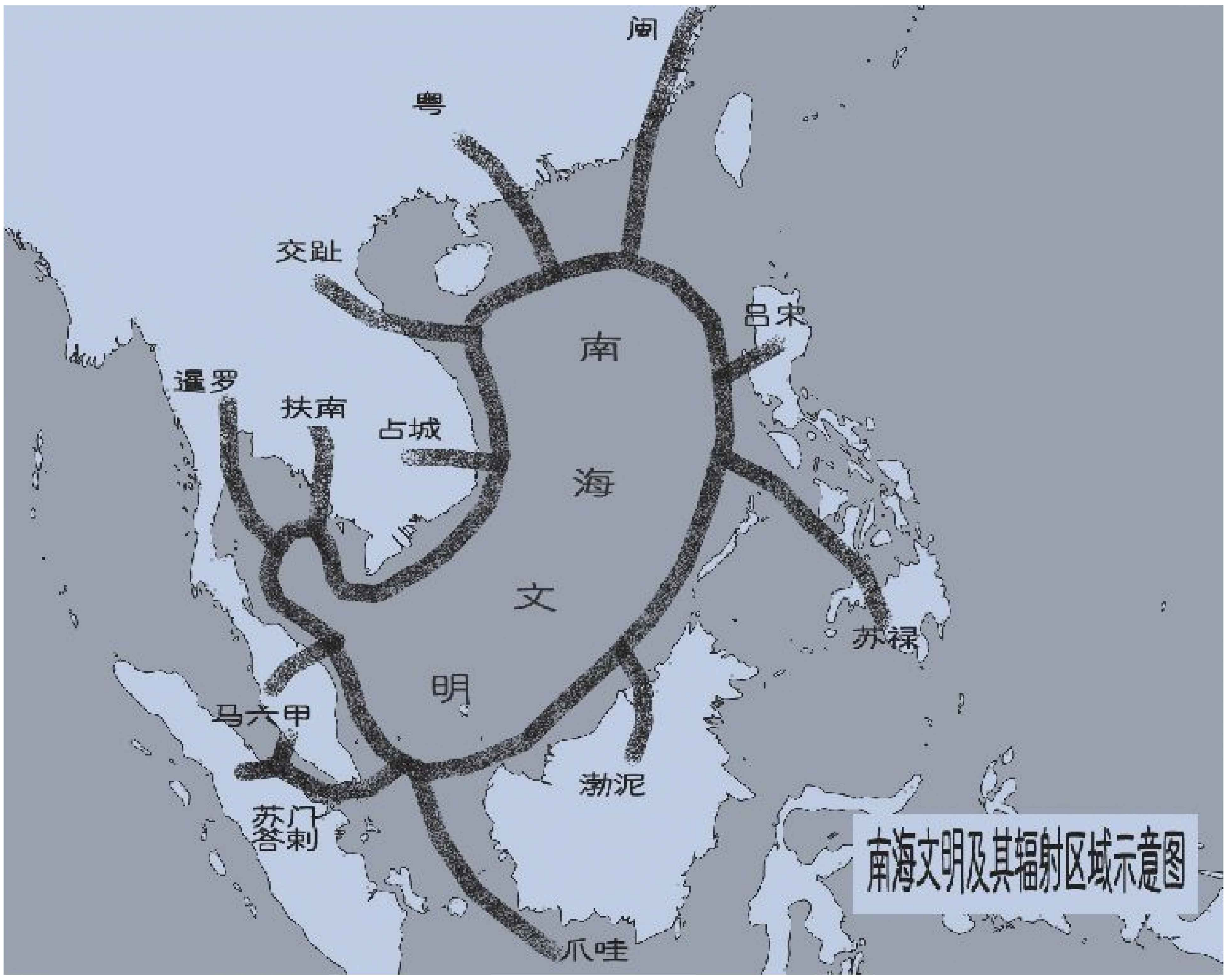
「兩弧」航線的形成示意圖。

到了唐末宋初，航海技術出現了一個質的飛躍，逆風行船技術得到普及。到了宋代，「東弧」航線逐漸出現。一些中國商人開始從福建一帶出海，經臺灣島，到菲律賓群島，再到加里曼丹島，抵達麻六甲海峽。這一條航線的固定化，對於南海商路來說，意義重大。在宋之前，中國人前往呂宋、蘇祿一般是走「西弧」航線，要先從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前往麻六甲海峽，然後向東經過整個加里曼丹島再向北抵達蘇祿或呂宋，實際上是繞了一個大圈。「東弧」航線出現後，不僅大大節約了海上行程，而且還使東西兩條航線在麻六甲和加里曼丹島一帶會合，形成一個閉合的環狀航線。在宋代後期，就有商人嘗試著從中國南方出發，沿著閉合環狀航線航行，一路走，一路貿易，把原先點對點的貿易形式擴展為循環貿易形式，大大增加了整個貿易圈的商品流動性和多樣性。至此，南海文明開始隨貿易圈進入大發展階段。

文明之昌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明代大劇作家、文學家湯顯祖在謫貶徐聞期間，在番禺（今廣州）和香山番（今澳門）耳聞目見了不少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故事，創作了一批描寫商賈、遠航的詩句，如「占城（越南中部）十日過交欄（印尼的格蘭島），十二帆飛看溜還。握粟定留三佛國（南海古國三佛齊），採香長傍九州山（馬來半島霹靂河口）。」又如記述番禺人別妻離家遠航經商的詩句：「檳榔船上問郎行，笑指貞蒲（真臘，今柬埔寨）十日程。不用他鄉起離思，總無鶯燕杜鵑聲。」

自唐以來，南海航線逐漸固定，直接促進了跨洋商業發展。與此同時，文化交流也隨商業路線往來傳導，使南海周邊諸港成為各種文化交織的商業都市。整個宋元時期，當時的中國人不僅泛舟「環中國海」經商或經營其他生業，而且開始定居當地，進而形成了海上商業網絡，出現了東西洋諸國均使用中國銅錢的局面。南宋時，南海上已是「百舸爭流、萬國衣冠」。



南海文明及其輻射區域示意圖。

到16世紀初，葡萄牙侵略者侵佔麻六甲海峽時，就發現海峽內停泊有大量大型中國船隻。1525年前後，西班牙派遣的探險家加西亞．羅薩途經菲律賓時，發現中國的大型商船每年到菲律賓貿易已成慣例。《菲島史料》和日本學者小葉田淳《明代漳泉人的海外通商發展》中都記錄了中國商船在菲律賓貿易的盛況以及中國商船對菲律賓經濟的重要性。1600年，荷蘭第一個環行世界的航海家范魯特經過印尼加里曼丹時，發現荷蘭紡織品在那裡成為滯銷貨，原因是中國船隻運送到那裡的中國紡織品長期受到青睞。

明朝時，中國商品在南海周邊非常流行。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瓷器、紡織品等商品品質上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在南海的海面上，中國的船隻是唯一的定時航運工具和國際貿易載體。英國17世紀著名旅行家湯瑪斯．赫伯特爵士在其《非洲亞洲旅行記》中記錄到，15、16世紀之間，中國商船運載的貨物不僅受到爪哇、萬丹（今爪哇西部）本國人的追捧，也受到在那裡的荷蘭、英國等外國商人的歡迎。那時，萬丹只有一些穀米、胡椒和木棉可以出口，而這些商品完全依賴中國船隻來收購。每年1月間，當蘇門答臘、加里曼丹、麻六甲等地匯聚大批中國商船時，那裡就像過節一樣熱鬧。

雖然商業通常是以營利為目的，但從實際效果上說，商業反映了民生的需求，同樣也推動了民生的進步。《菲島史料》記載，16世紀，中國商船在菲律賓不僅交易高附加值的絲綢等商品，更有糧食等生活必需，甚至還有當地居民生產所需的牛馬等牲畜。不同地域的不同需求，剛好構成了跨洋貿易的特點，同時也為南海周邊改善民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質支撐。1680年至1703年的23年間，到達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的中國船隻達1200艘，除大多數來自寧波、廈門、廣州的船隻外，還有一些來自日本、暹羅的從事多國貿易的中國船。18世紀末，西班牙人在馬尼拉進行的人口普查顯示，馬尼拉人口達4.2萬，其中華人1.5萬。

特殊的經濟領域和地理空間配置，往往會聚合產生巨大的社會推動力；由點及面式的港口經濟，往往會推動形成一片以海洋為中心的區域文明。如14世紀以熱那亞、威尼斯、巴賽隆納為支點形成的地中海文明，以及以盧貝克、漢堡、里加為支點的波羅的海文明。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吉普魯認為，古代南海周邊也有非常類似的經濟結構與地理配置，因此可以被稱作是「亞洲的地中海」。特別是在18世紀，得益於阿拉伯、印度、葡萄牙和中國貿易網路的交會，南海成為歐亞貿易的焦點。

03 南海文明的遺傳特質

文明之引擎：中國分享，技術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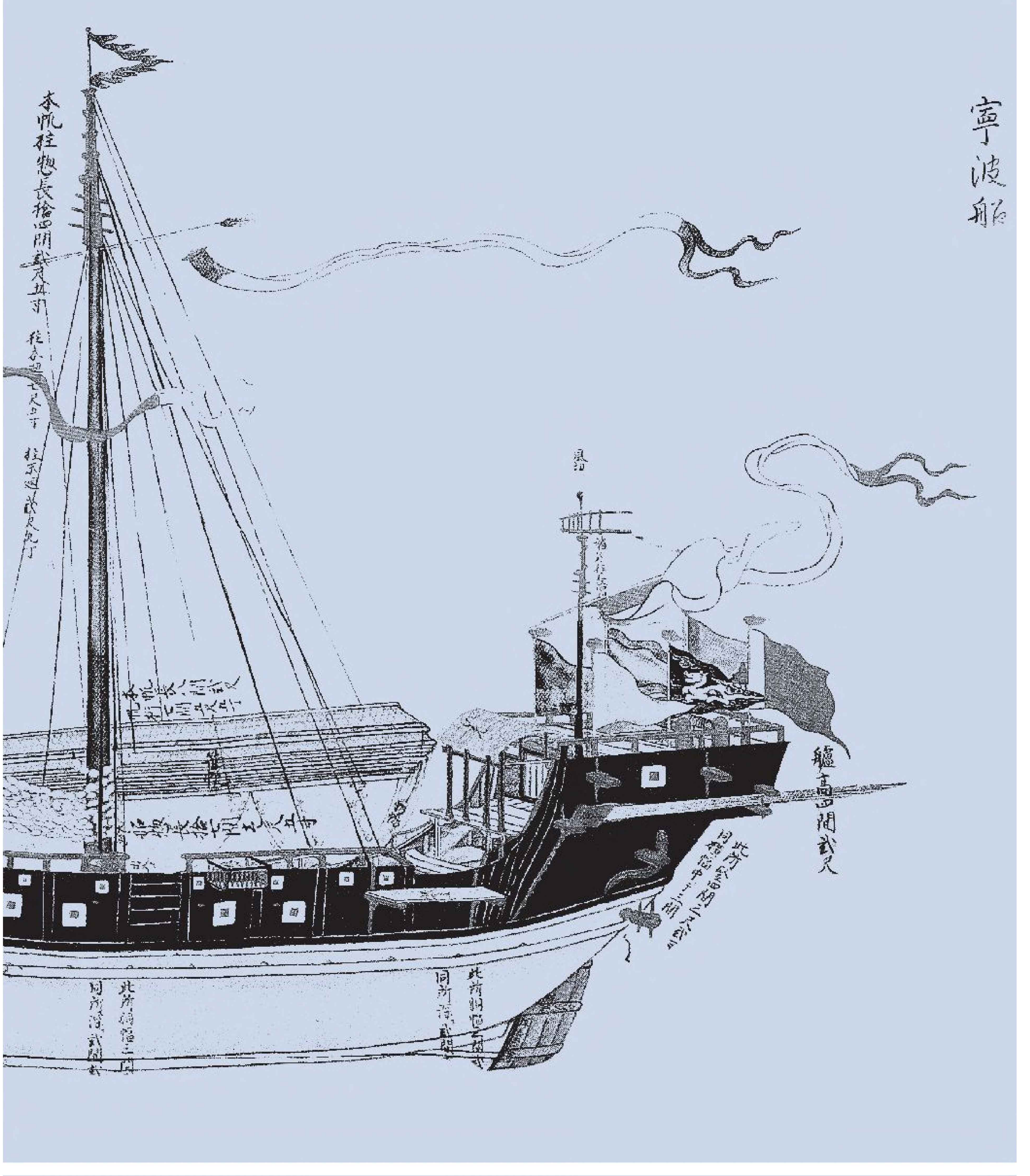
美國科技史學家羅伯特．坦普爾在1986年出版的《中國：發明與發現》中說：「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船尾舵、指南針、多重桅杆等改進航海和導航的技術，歐洲絕不會有導致地理大發現的航行，哥倫布也不可能遠航到美洲，歐洲人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國」。事實上，在全球造船史中，「中國帆船」享有很高的地位。由最初閩南語的chun，到馬來語的jong，再到英文的junk，法文的jonque，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junco，荷蘭文的jonk，德文的dschunke，義大利文的giunca，中國製造了被西方稱作「戎克」的中國式大帆船，大可載重萬餘擔，小可載重數千擔。在19世紀富爾頓發明汽船之前，「戎克」在全世界海域都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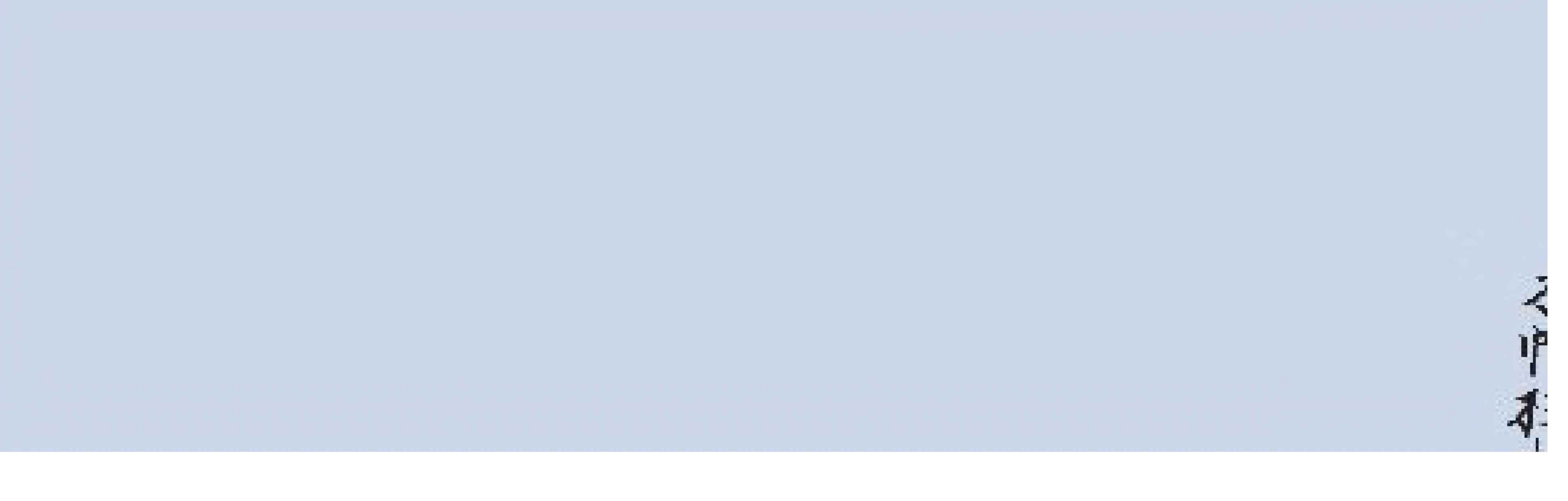
也正是這些「戎克」，開闢了南海這片自由航行的海域，承載了南海自由貿易的品質。漢代以來，南海航行之所以迅速呈系統化、規模化發展，與中國造船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漢書》中記載，漢武帝時的遠洋船隻「有樓船，有戈船」。《太平御覽》記述，武帝時期有一種遠洋用的「豫章大舡」，船上造有宮室。東漢人劉熙所著《釋名》一書更是詳細地把漢代大船按船上所建樓層高度和規模分類命名。英國著名航海民族學家詹姆斯．霍內爾在1920年發表的《印度船舶考》中考證，中國帆船早在西元5世紀前就揚帆印度洋遠達紅海，而中國帆船在南海上馳騁的年代則更要早上幾百年。《馬可．波羅遊記》、英國亨利．裕爾編纂的《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聞見錄》等西方著作也記錄到，到11、12世紀，中國帆船已發展成為巨型海舶，可搭載乘客千人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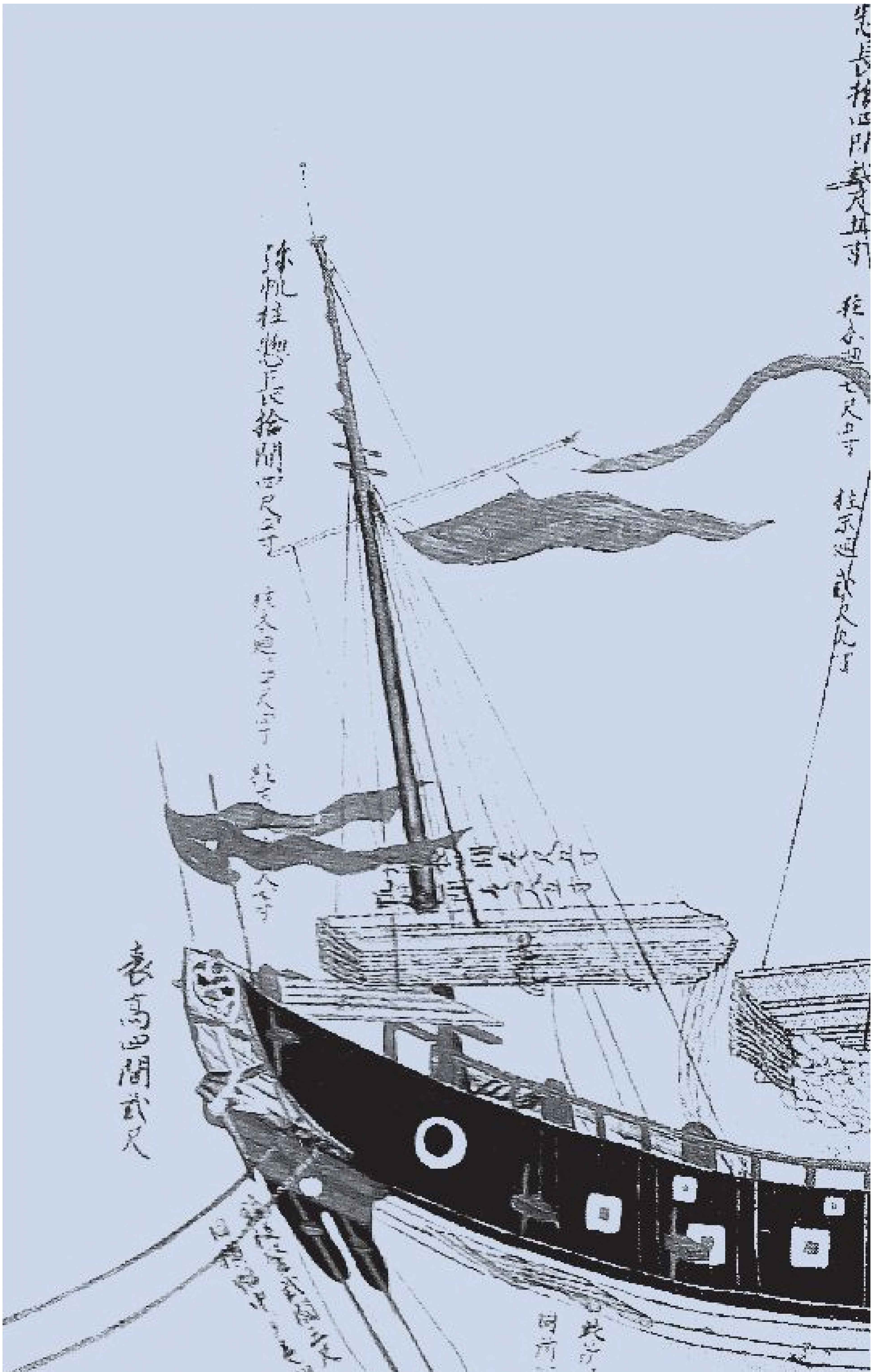
《菲島史料》記錄了1605年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對中國帆船的一段評價，當時這位總督為了遠征而仿造了大批中國帆船作為戰船。他說：「中國帆船在船槳和船帆上的設計都很好，在現有槳帆船隻中，沒有什麼船能有中國帆船的載重。」實際上，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陳侃出使琉球所乘官船的載重量已經達到千噸，這一紀錄一直保持到1850年葡萄牙人造出1500噸以上載重量的船隻。

就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而言，中國古人從來不吝於分享。在南海周邊，中國人主動把先進造船、航海技術傳授給當地人，使整個南海周邊的通航水準不斷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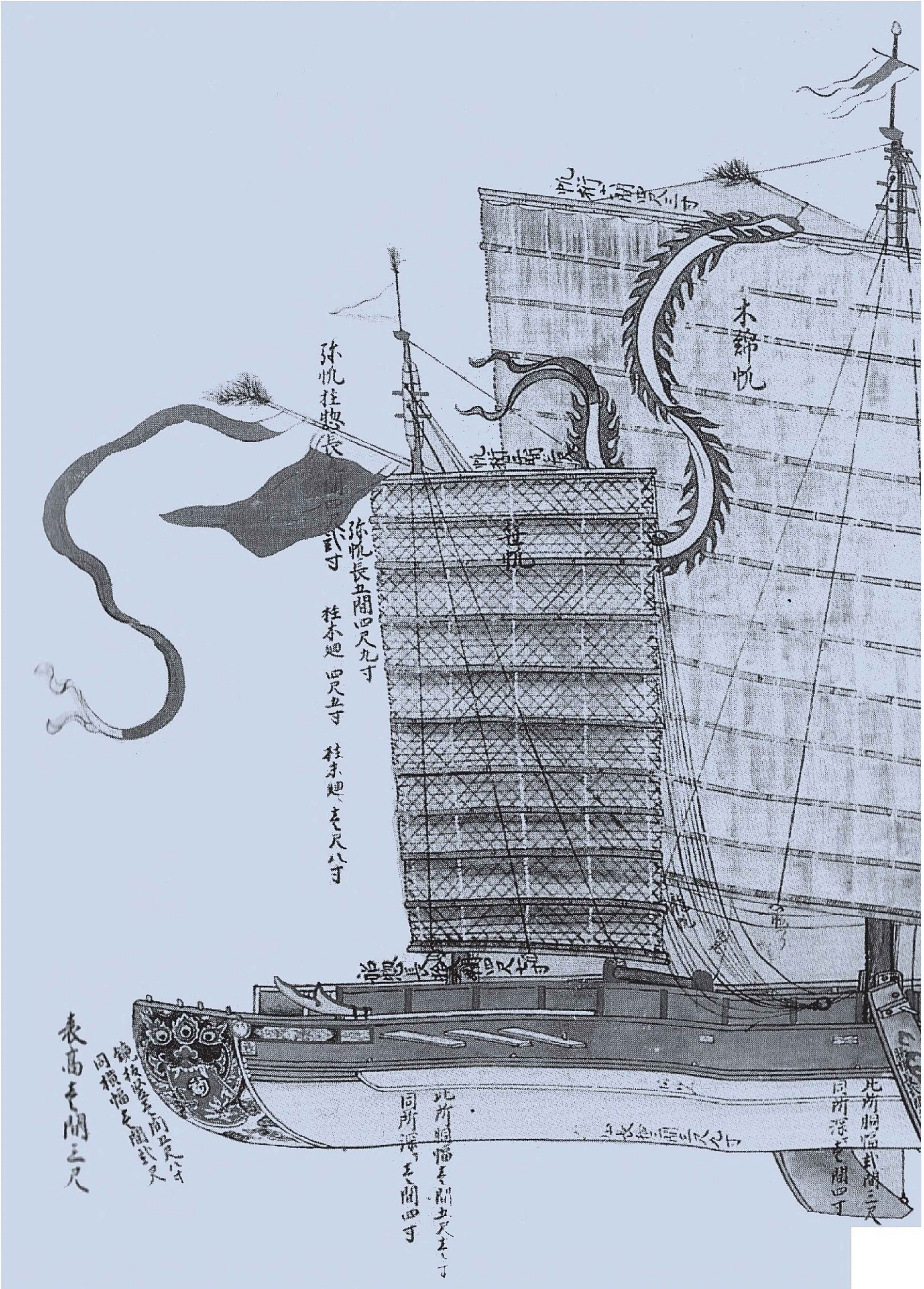
據《17世紀暹羅外交檔案》，定居暹羅並從事航海工作的華人為推動暹羅及周邊的航運技術進步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7世紀，暹羅國王的公務船無論在國內行駛還是遠赴海外，都由中國人駕駛。1679年時，暹羅的遠航船隻基本上全部由華人集資建造，使用的也完全是中國技術。到了18世紀，暹羅建成了南海周邊最大的造船中心。《清實錄》記載，1724年暹羅遣使來華，「其來船梢目九十六名，本係漢人」。曾隨東印度公司在暹羅等地貿易的英國人約翰．克勞福德在其《印度半島史》中說，在暹羅政府看來，與中國僑民往來不會產生任何政治危險，所以暹羅政府極其歡迎華僑用他們精良的造船技術和駕駛方法來幫助暹羅的造船業和航運業，華僑與暹人甚至形成了合而不分的情況。後來，在暹羅的歐洲人也要求暹羅政府批准他們享有華人同等待遇，荷蘭侵略者甚至在1664年和1688年兩次武力威脅暹羅訂立不平等條約，企圖禁止華僑涉足暹羅航務，但後來這一禁令因暹羅民眾的強烈反抗並未真正實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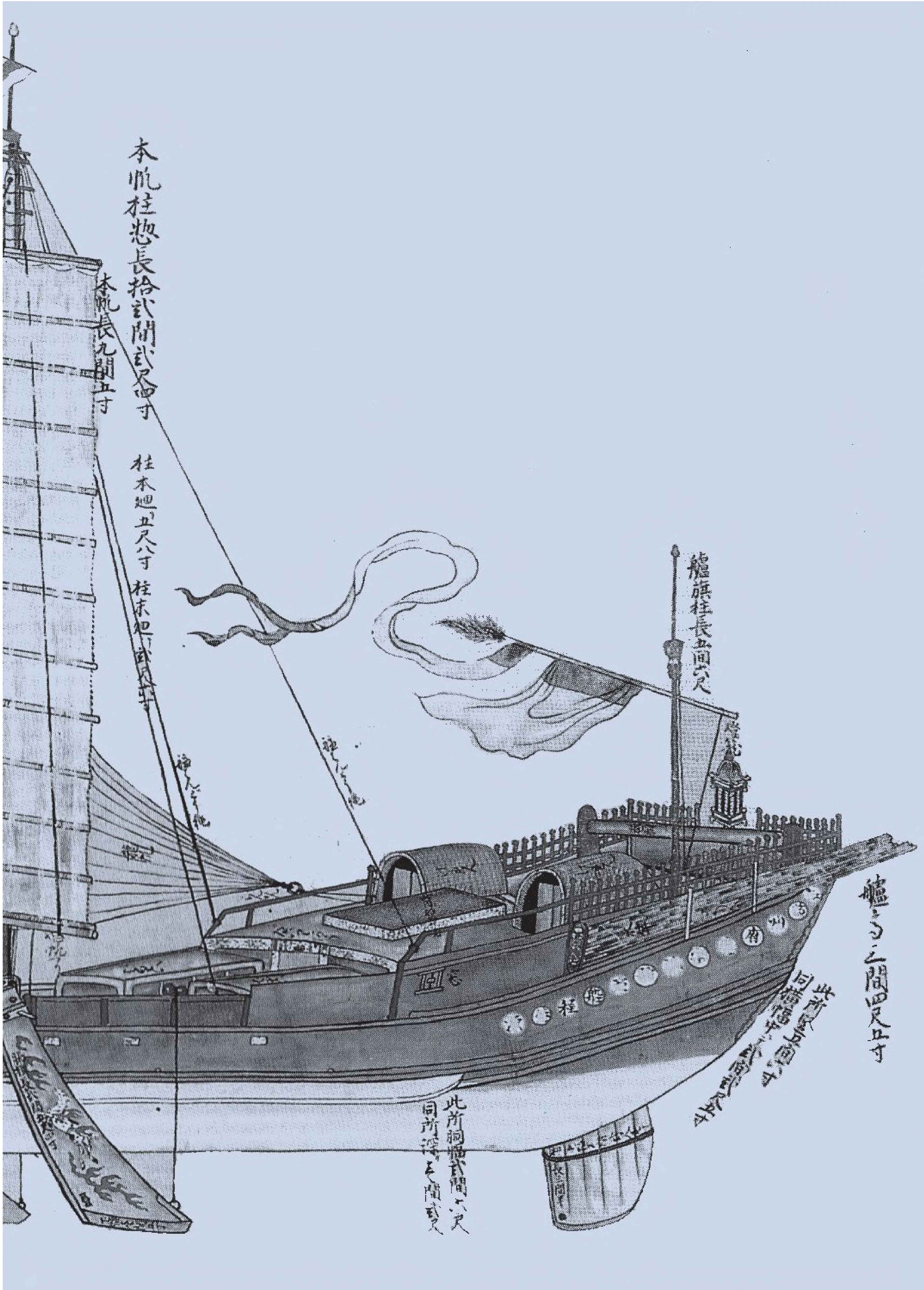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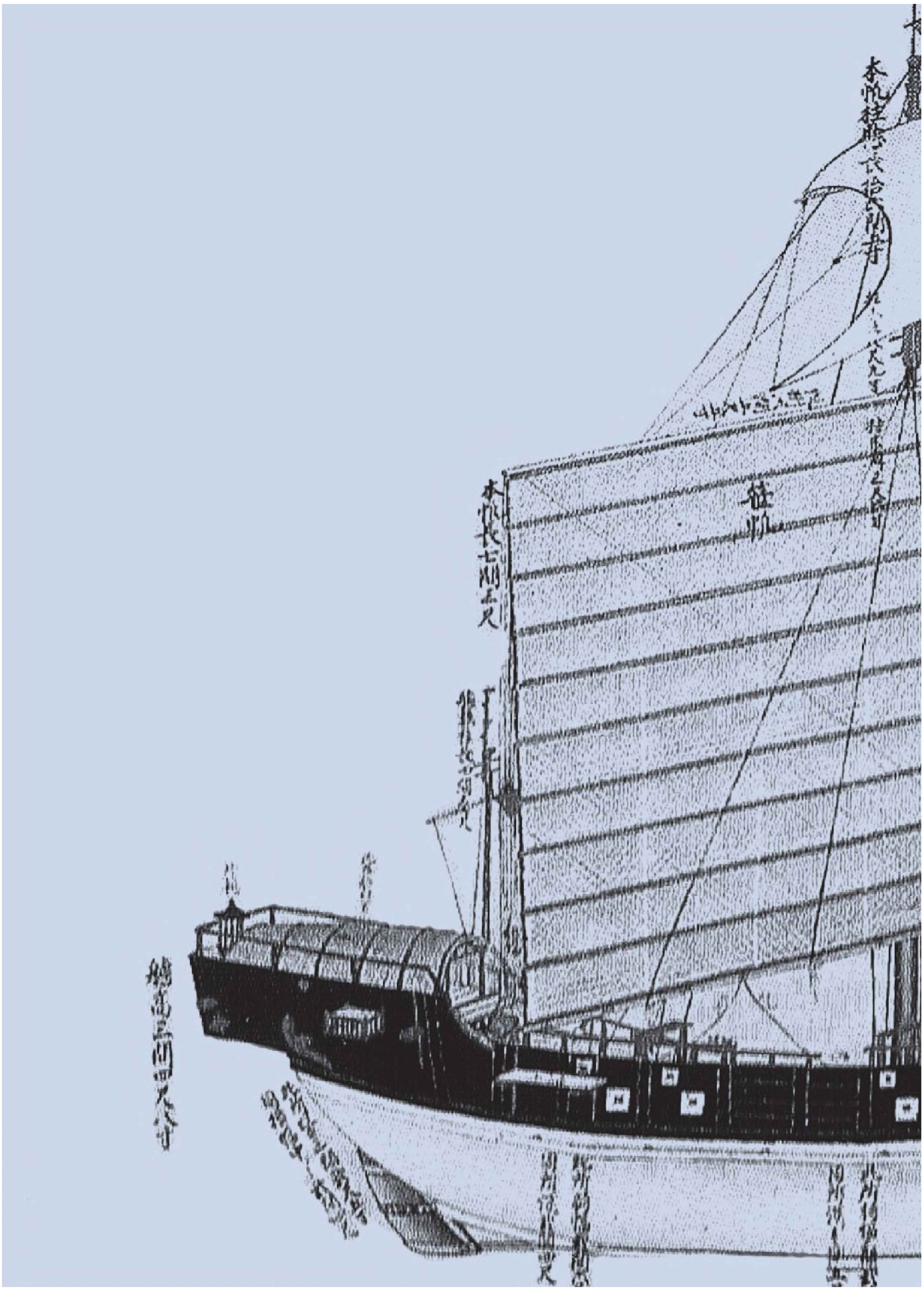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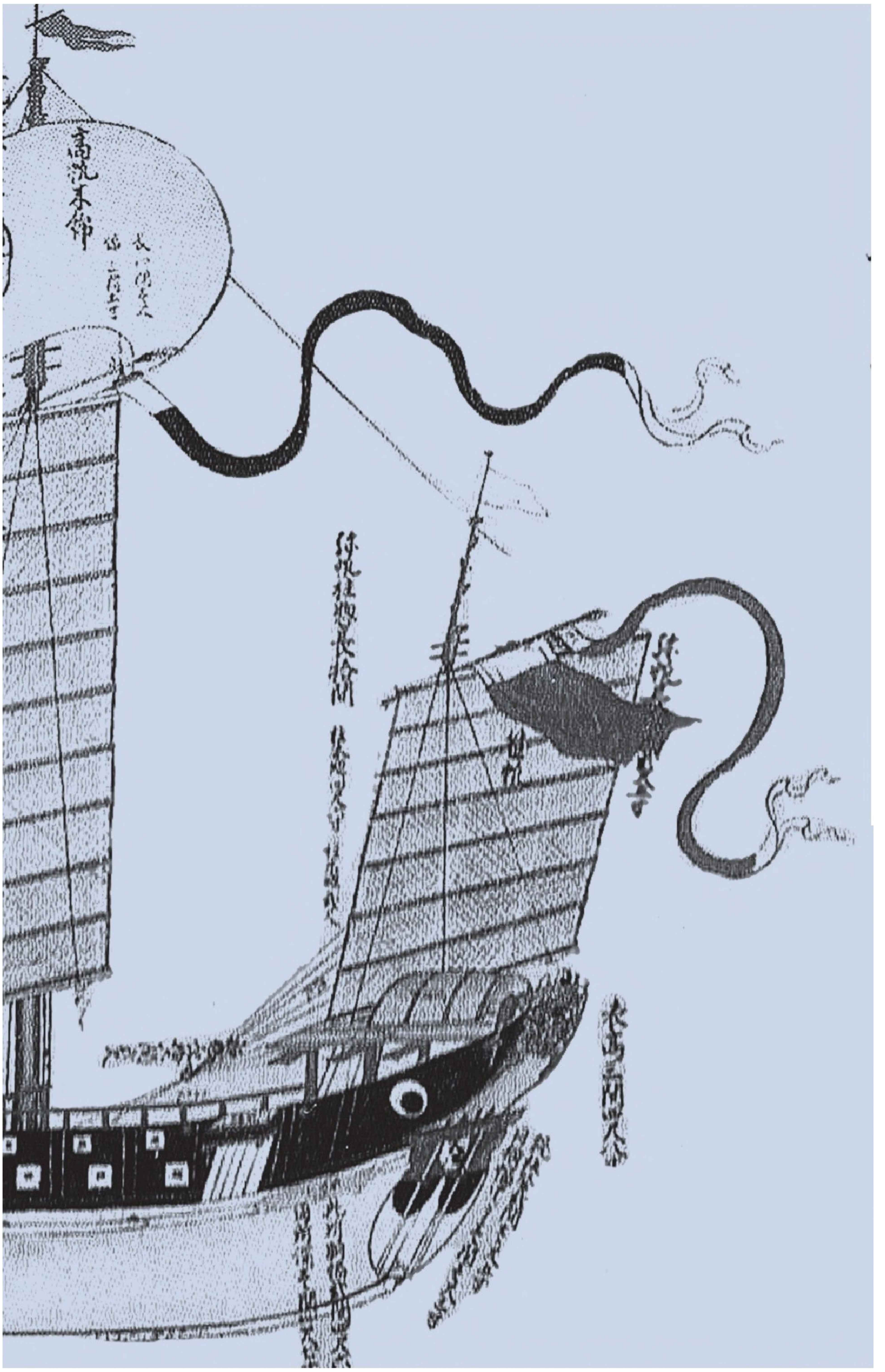
日本18世紀繪畫作品中描繪的中國「寧波船」。作品現藏於松浦史料博物館。





日本18世紀繪畫作品中描繪的中國「南京船」。作品現藏於松浦史料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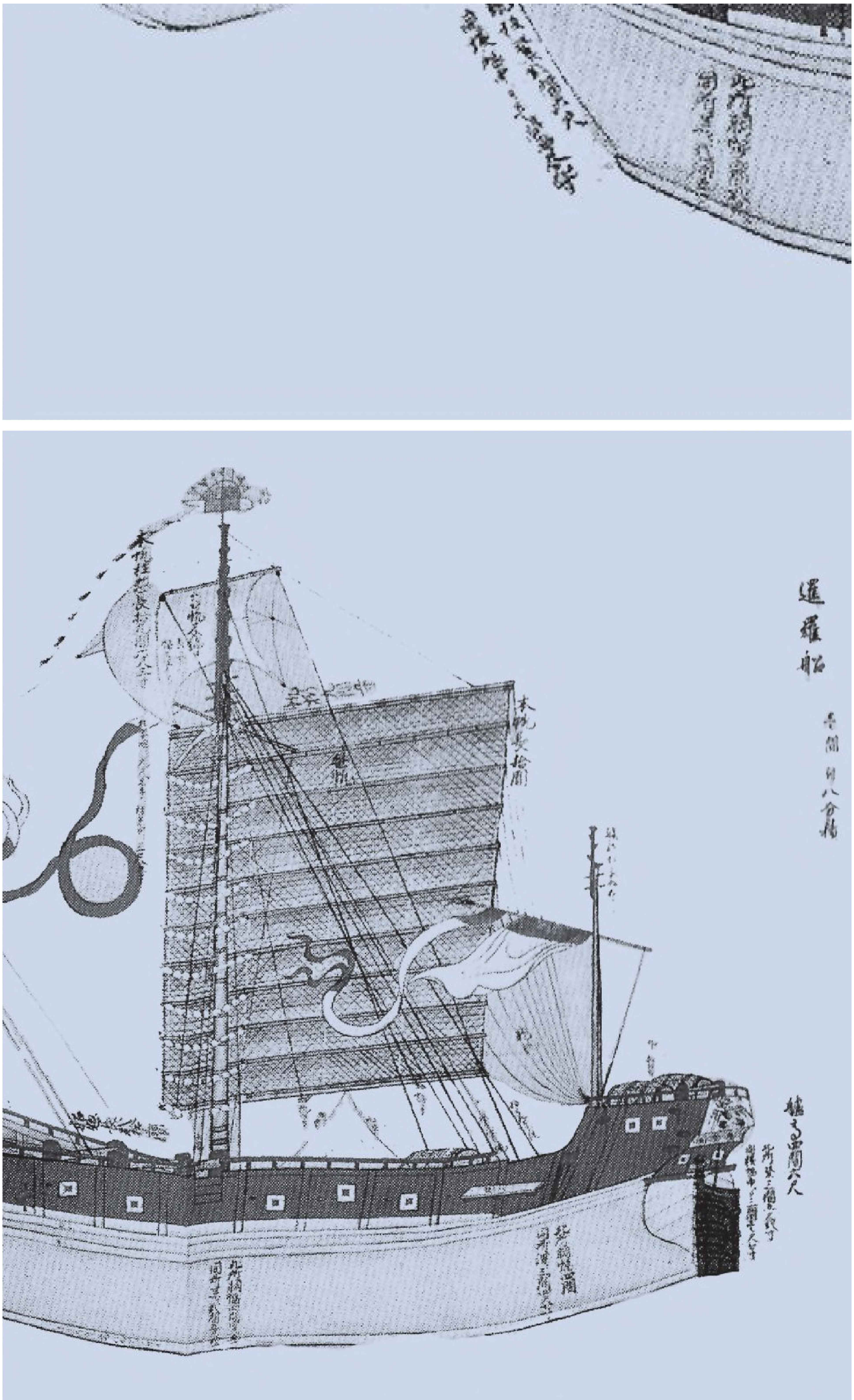
日本18世紀繪畫作品中描繪的中國「廣東船」。作品現藏於松浦史料博物館。

文明之品質：物質交換，精神交流

貿易本身，在物質交換的本質之餘，往往還輻射到價值觀、思想體系、技術和文化等各個層面的交融與學習。中華民族在推動南海自由航行的千餘年歷史中，不僅把南海周邊的經濟貿易融匯一體，直接推動了各經濟個體的歷史發展，更重要的是，它把各方的先進文化編織在一起，形成了繁衍至今的南海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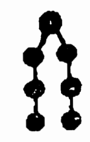
17世紀馬來著作《馬來紀年》記載，15世紀初，鄭和船隊到達麻六甲後，給當地人帶去了先進的建築和耕作方法，當地人開始逐漸從原先的在海上架木為屋遷到陸地居住，並開始從海耕向農耕轉型。史書記載，中國在與南海諸國交往過程中，不僅傳授開荒墾殖、興修水利等當時堪稱先進的技術，還把許多農作物引入這些國家，幫助豐富當地生產生活。例如，赴緬華人帶去了芹菜、韭菜、油菜、蠶豆等作物，乃至於緬甸人後來在這些果蔬的名稱前加上「德佑」，意指從中國而來。柬埔寨也在一些蔬果名稱前加上「秦」，說明它們來自中國。





日本18世紀繪畫作品中復原的「暹羅船」。作品現藏於松浦史料博物館。

在越南陳朝時，元朝派遣禮部尚書帖住和禮部郎中智熙善出使越南，授予天干地支陰陽合曆的曆法書《授時曆》。此後，《明實錄》記載，中國也將《大統曆》先後賜予占城、爪哇、三佛齊（即室利佛逝）、真臘、暹羅，使這些國家「知正朔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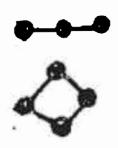
名涼傘星，出巳上。



名水平星，在南斗東。出巳丙入丁未。



名燈籠星，出丙巳入丁未。



名織女星，在天河東下乃梭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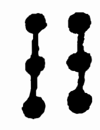
名牛郎星，在天河西下乃犂頭星。



名北斗，中星居處不動。出癸丑入壬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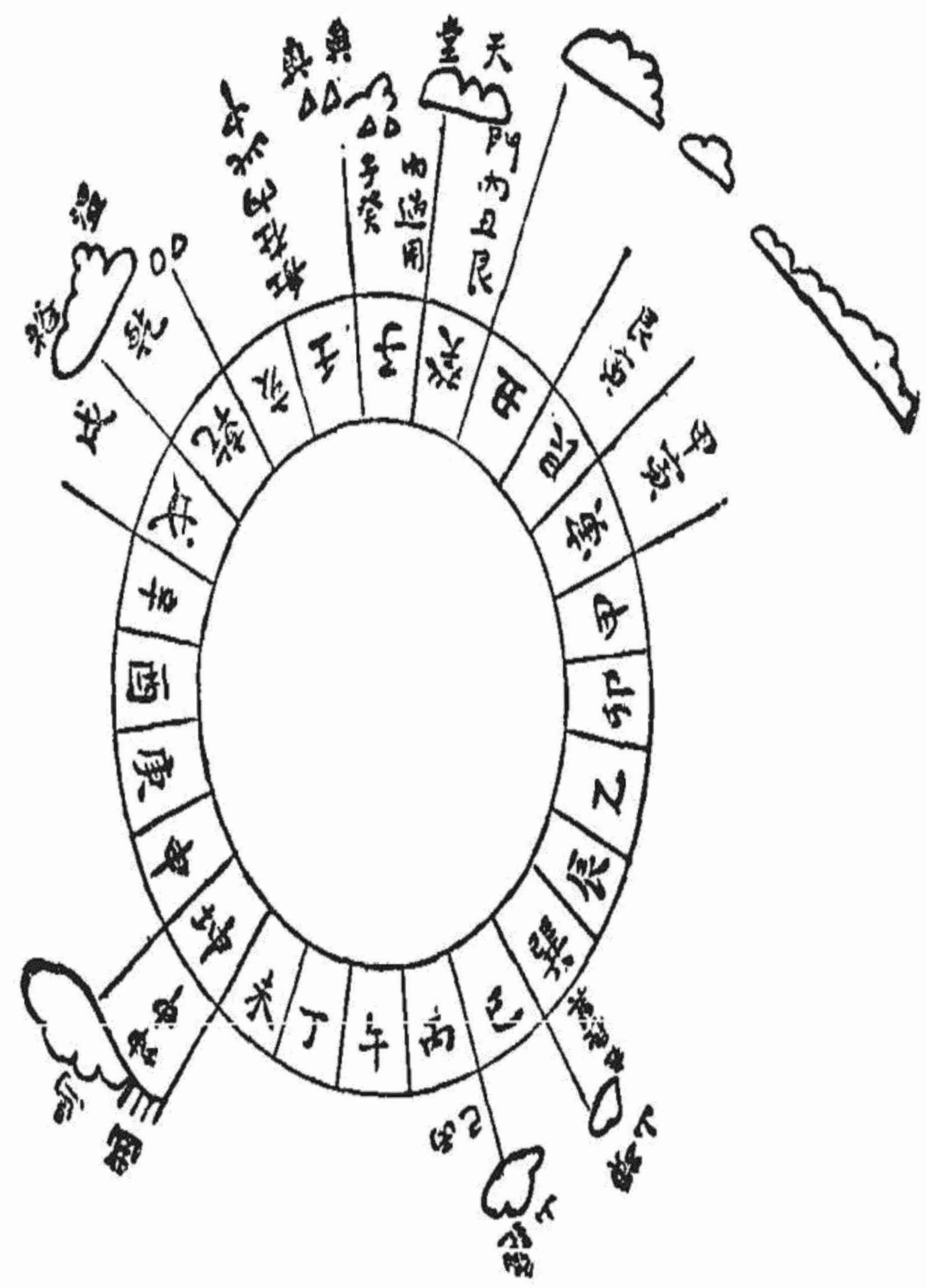
名華蓋，與北辰相近居北。出癸入壬。



名小北斗。



名南斗，出巽己中。



對座圖





《更路簿》中常見的標識與解釋。

印尼的造紙術也是從中國間接傳入的。早在唐朝時，中國高僧義淨在室利佛逝抄寫經書時當地還無紙張，義淨便致函國內友人，囑託寄送墨紙。直到12世紀，爪哇仍「無紙筆，用茭樟葉，以尖刀割之」。16世紀初，中國生產的紙張開始在印尼市場上售賣。17世紀80年代，華人在雅加達正式開辦造紙廠。

傳播至南海周邊的其他科學技術還包括珠算、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中醫藥等。

不只是技術分享，更有經驗交流。漢代以來，中國的先人們一次又一次的南海探索繪製出一套完整的航海路線圖，有時令變化之分，有島嶼位置標注，為南海周邊諸國間的各種往來提供了關鍵參考。在此基礎上，中國船隻的頻繁出海以及大批人員的海外定居把這些經驗傳播至沿海各地，這才使「手握羅盤，仰望星象，撒爐灰測海流，懸重鐵量水深」等方法在南海周邊傳播開來。

這其中，不得不提及中國民間航海秘笈《更路簿》，古稱《海道針經》。《更路簿》是記錄中國海南漁民在南海水域航行的航向和航程工具書，是中國漁民在南海諸島航海實踐的經驗總結並世代傳抄的航行指南類抄本。目前已收集到的《更路簿》至少有十多個版本，各版本各有所長，相互補充。如，王國昌抄本《更路簿》、《順風得利》記錄有西沙群島航行路線42條、南沙群島路線220條以及顯示一年中潮汐水流情況的十二月流水錶。蘇德柳抄本《更路簿》則更加詳細地介紹了通往東南亞各國的古代航道，除第一篇和第二篇講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外，第三篇講廣東、越南沿岸，第四篇講廣東至新加坡，第五篇講昆侖洋上下各港，第六篇講新加坡附近，第七篇講印尼，第八篇講越南至馬來半島，可謂東南亞航道針經「大全」。

04 南海文明的複製演進

文明之胸懷：兼收並蓄，吐故納新

在談到中國古代的宗教文化交流時，往往會提及西行的玄奘法師。但殊不知，在玄奘前後，有大批僧侶名士也曾前往印度等地交流，而取道南海是他們共同的選擇。即便是玄奘法師本人，若非是與在取經途中結識並結拜的高昌王有過返途再會的約定，也會接受印度戒日王的建議——經南海海路返回大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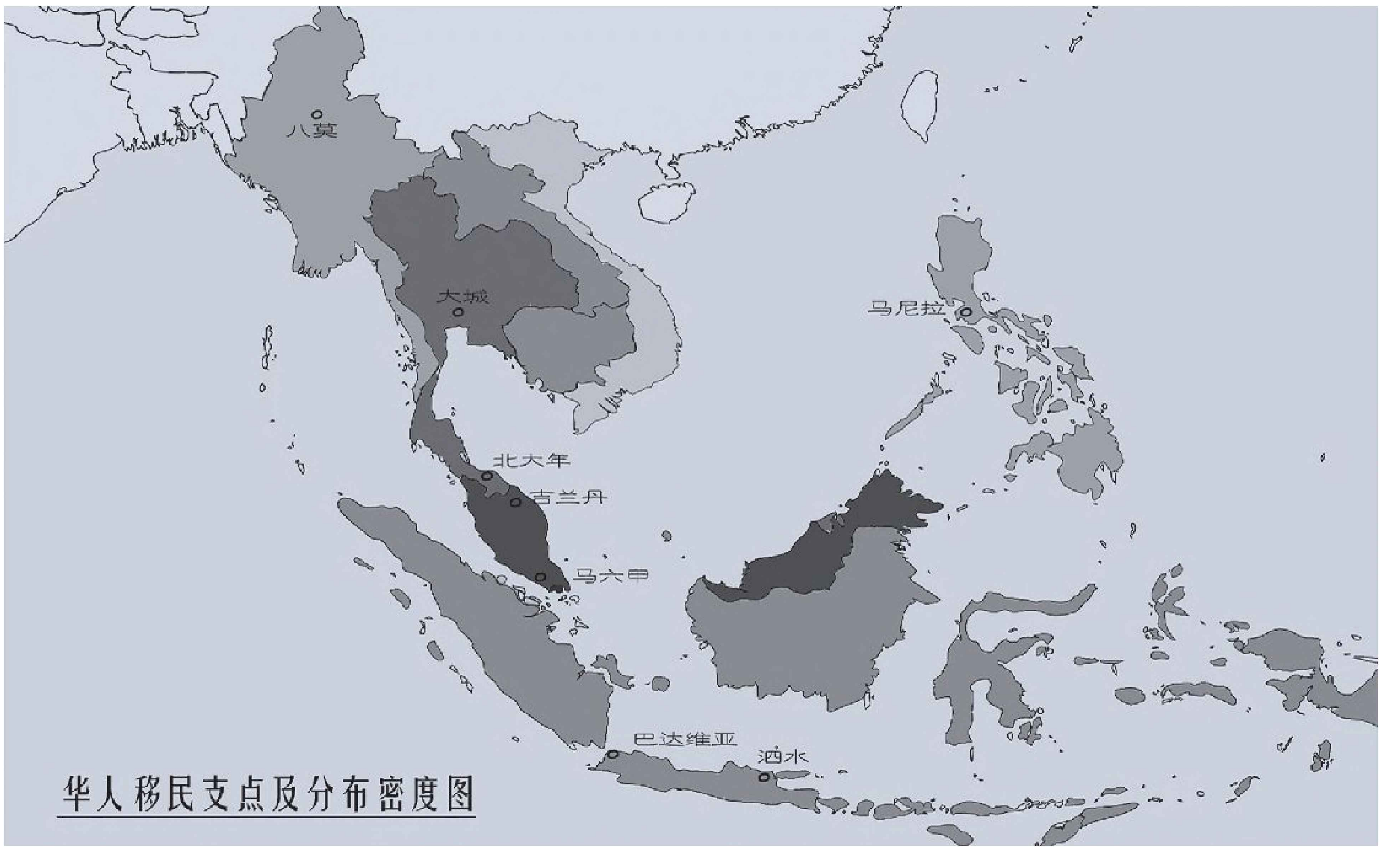
玄奘返回後20多年，高僧義淨踏上了西行求法路。他從廣州乘船去天竺，在玄奘曾研習大乘佛教的那爛陀寺鑽研佛學10年，返途中在室利佛逝、末羅瑜（今蘇門答臘）搜羅並抄寫佛經又10年。義淨先後周遊了30餘國，歷時25年，共帶回梵文經書400部，歸國後除翻譯佛經外，還撰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錄下南海周邊國家的社會、文化和宗教狀況。現有文獻統計，與義淨同一時期經海路前往印度的僧侶有60多位，有些後來長期居住南洋，成為早期華僑。這些僧人在研佛求法的同時，還極大帶動了南海文明中的哲學、文學、醫藥、繪畫、雕塑、建築等領域的跨國、跨民族交流與發展。

在南海廣闊的海面上，在一條條自由航行的商船上，佛教、猶太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儒學、道教等各類宗教和思潮沿海上絲綢之路碰撞交會；中國的養蠶、製瓷、紡織、火藥等各種技術在南海周邊廣泛流傳；玉米、番薯、煙草、花生等番邦物種在南海周邊自由傳播；中國古典文學在南海周邊遍地生根，甚至與很多本土文學結合形成新的文化力量。特別是，在各種文化交會碰撞的過程中，許多中國移民加速了新的區域文明的形成，如馬尼拉、巴城、泗水、萬丹、北大年、麻六甲、吉蘭丹、大城、八莫等地，這些華人聚居地在後來數百年間始終發揮著文明交會支點的作用。

不局限於宗教交流，中國文化還深深植入南海古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才選拔中。近些年的研究認為，柬埔寨古代雖然受印度文化影響較深，但無論在扶南、真臘、吳哥還是柬埔寨王國時期，其王權神授的觀念不能不說是受到中國的影響。另外，古代東南亞雖然受印度文化影響很深，但印度的種姓制度卻沒有盛行，原因之一是中國移民傳入的姓氏傳統被當地接受。

中國移民在東南亞很多地區受到重視和青睞。例如，明清時期，暹羅與中國之間的使節往來和通商貿易尤為頻繁，暹羅大量任用中國人為官吏，有些入境的商人甚至被好意「扣留」聘做官員。

《明史．暹羅傳》記載，「汀州人謝文彬以販鹽入海，漂入其國，仕至岳坤，猶天朝學士也。」西方人也證實，暹羅重用華人，在公務、翻譯、外交、財政等各領域均有不少華人任職。清代《海國見聞錄》寫到，暹羅「尊敬中國，用漢人為官屬。理國政，掌財賦」。



歷史上華人向東南亞移民的支點城市及分布密度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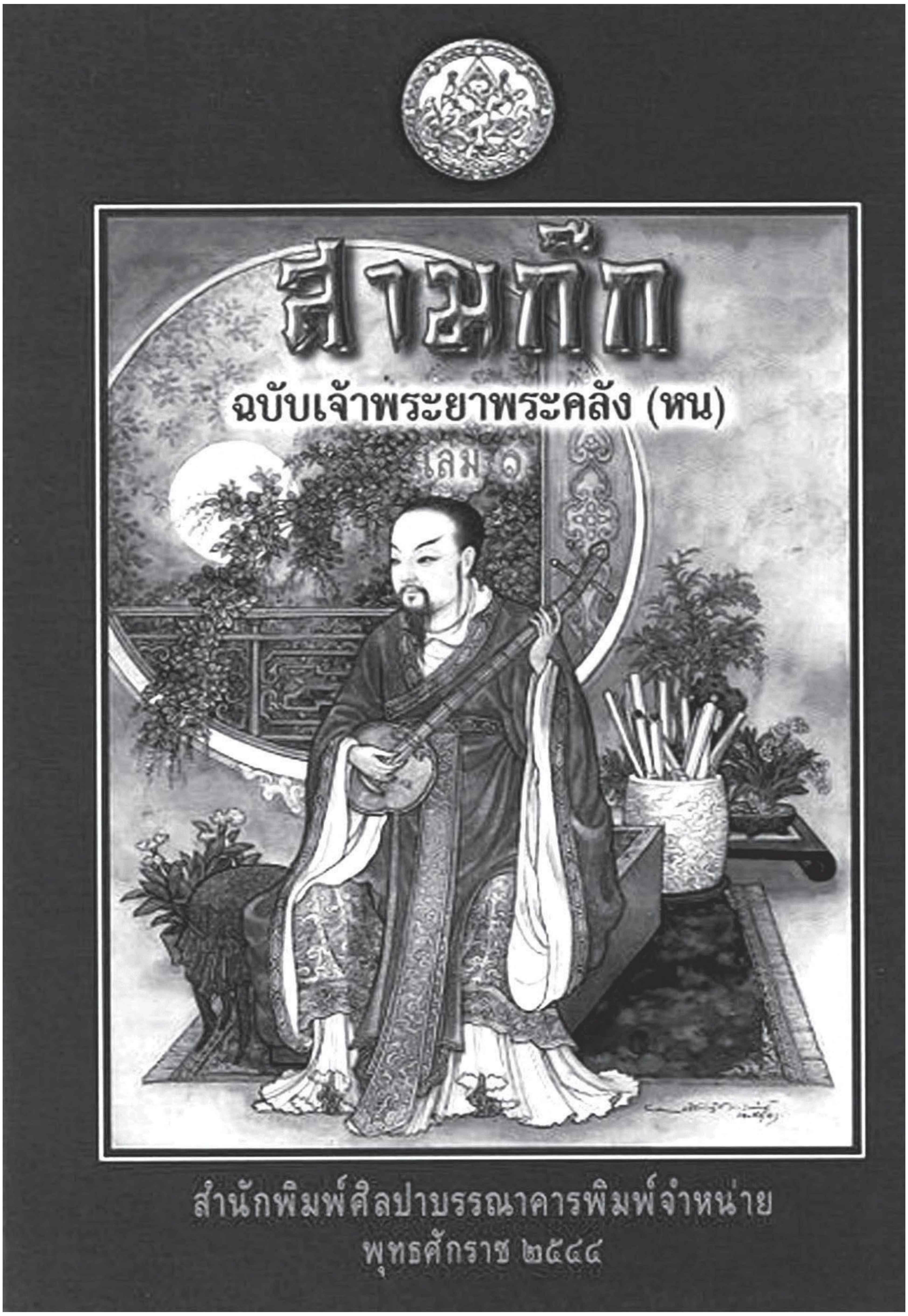
直至今天，在南海文明中，中華文明的蹤影隨處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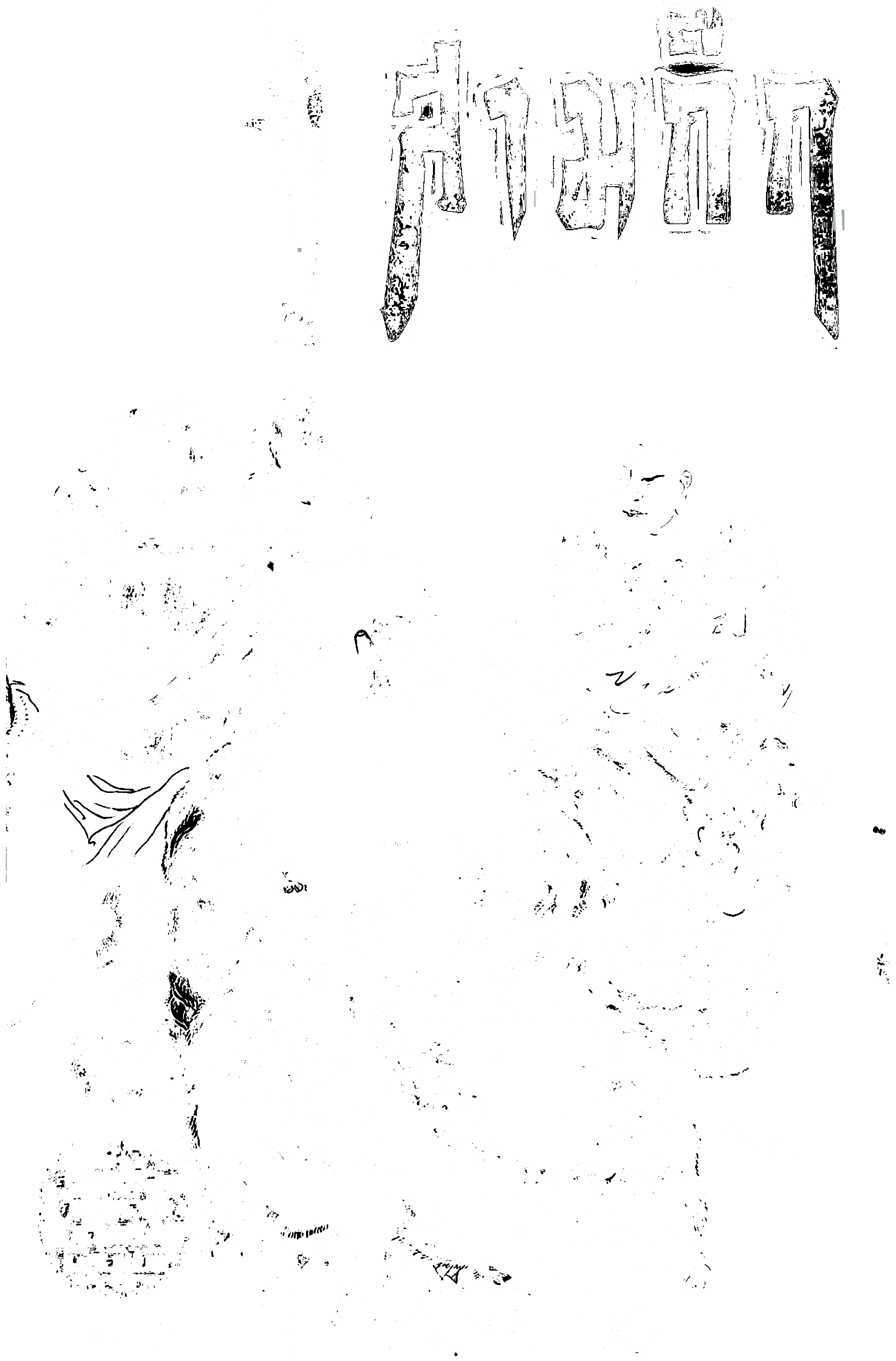
在越南東山，泰國清邁、清萊，緬甸撣邦都曾出土過與中國青銅器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青銅文化。印尼蘇門答臘的帕塞馬、加里曼丹、西爪哇也曾出土過漢代陶器和雕像。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梯田文化以及墓葬文化也與當時中國的華南地區有著充盈的證據聯繫。泰國中北部宋卡洛古窯口出土的精美瓷器則有明顯的元代瓷器特徵。

在民俗方面，泰國至今仍興盛不衰的九皇齋節則完全是由明末清初一批懷念舊朝的中國移民所設，起初是為了紀念明朝的九代君王，後來則成了一種在本土不見蹤影卻在異國盛行開來的社會節日，流傳至今。

在文學、史學、音樂、戲劇等方面，中國對整個南海文明的影響也從未中斷。《三國演義》在暹羅被意譯成泰文名著《三國》，開創了泰國文學史上的散文式小說先河。《白蛇傳》則被柬埔寨改寫成四音步詩體的文學作品，家喻戶曉。由於很多南海周邊國家都有通曉漢語、研習漢學的人才，自古以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文化交往就十分密切。明洪武四年（1371年），暹羅政府就向中國派出第一批由官員組成的留學生，在北京的國子監學習漢學。《明實錄》記載，明廷的禮部當時專門裝印有《列女傳》萬冊，用以當作贈送其他國家的國禮。

另外，南海文明在形成的過程中，還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民眾生活的很多細節。例如，雖然今天馬來西亞、泰國、老撾、緬甸的國家制度、政治架構、宗教信仰都不盡相同，但這幾個國家都有一種相似的服飾，即類似筒裙的下裳，在馬來西亞叫「紗籠」，泰國叫「帕同」，老撾叫「帕辛」，緬甸稱「隆基」。但很少有人知道，這種非常類同的服飾，卻與南海交通以及中華文明密切相關。三國時吳國孫權派朱應和康泰出使扶南國（今柬埔寨一帶），兩人在那裡居住20年，不僅帶去中國的先進文化，更用許多中國方式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風貌。在扶南期間，他們看見當地人織布技術落後，男人裸俗普遍，就幫助他們改進織布技術，織出大面積的布後圍住下身形成簡單的圍服。這一傳統後來在扶南又向外傳播，成為周邊民族至今還保留的習俗。康泰回國後撰寫《扶南傳》，除記錄往返見聞外，還描述了途經南海諸島的情況。


สามก๊ก
ฉบับเจ้าพระยาพระคลัง (หน)
เล่ม ๑
สำนักพิมพ์ศิลปาบรรณาคารพิมพ์จำหน่าย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๕๔๔



《三國演義》在泰國文學史上曾出現多種不同的「再演義」版本。

歷朝歷代的中國使者，不僅給南海周邊國家帶來積極推動作用，也把很多先進文化引入中國。同時，密切的海上往來也使這些國家的官方和民間使者帶著自己最先進的文化技術和物產資源進入中國，開啟一段美好的外交大時代。

以扶南為例，在朱應和康泰出使後的東晉及宋齊梁陳時期，扶南遣使中國20餘次。梁武帝還在南京雞鳴寺後建扶南館譯經道場。在扶南以南、今天泰國北大年一帶，狼牙修國也積極與中國交往，515至568年間，狼牙修國經南海來使4次。在這些交往過程中，大量物產和技術在中國生根發芽，至今仍在生產生活中普遍存在。

明朝萬曆年間，中國從菲律賓引入豐富的農作物品種，其中對中國農業生產影響最大的當屬番薯。《閩書》記載：「番薯，萬曆中，閩人得之國外……呂宋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蓋中以來。」而宋代南方種植的水稻則來自越南一帶。《事物紀原》記載，南方水稻「始自占城國傳其種，遂植南方也」。明廷還派人到一些國家尋求果木樹種，如越南的檳榔、荔枝、波羅蜜、龍眼；暹羅的胡椒、蜜橘；緬甸的椰子、緬茄、老緬瓜等。

除農作物，中國的一些工藝技術也傳自南海諸國。如交趾（今越南）的甘蔗種植和蔗糖生產，在漢代就傳入中原。明朝時，越南人在建築方面有很高造詣。明朝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營建都城北京，任命交趾（今越南）宦臣阮安負責總體設計，項目包括「北京城市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阮安還參與了紫禁城的設計。

明代中國彩瓷工藝走向巔峰與鄭和下西洋從南海諸國帶回的多彩顏料密切相關。從蘇門答臘和檳榔嶼帶回的蘇麻離青和蘇渤泥青，以及汶萊、蘇門答臘的紫啡、胭脂石等，都是彩瓷工藝的基礎原料。

南海諸國的各種物產，還大大推動了中醫藥的發展。交趾的薏仁米，麻六甲、彭亨、柔佛的犀角、玳瑁、乳香、片腦、沉香、降香，暹羅的蘇木、大楓子、胡椒、檳榔，柬埔寨的白豆蔻等。這些外來藥材，擴大了中醫藥的取材範圍，早在唐朝以前就被詳細記述在《新修本草》、《本草拾遺》等古代醫書中。

藝術方面，南海諸國的音樂、舞蹈、雜技、魔術等藝術形式也隨廣泛溝通而傳播。唐朝時，位於今緬甸的驃國曾獻樂長安，引起轟動。白居易在詩中有這樣的具體描述：「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一作千）擊文身踴。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

（《全唐詩》第七冊卷四二六，白居易三）。《後漢書》則記載，西元120年，撣國王雍由調向東漢宮廷獻「幻人」，算是早期的魔術師，他們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為了能與南海諸國更加通暢地交往溝通，明朝還設立了類似外語學院的培訓機構。明永樂五年（1407年），朝廷設「四夷館」，隸屬翰林院，館內按語種分作「緬甸館」「暹羅館」等，選國子監生習譯事，聘外國教師授課。史料詳細記載，1577年，朝廷從暹羅請回4位教師握文源、握文帖、握文鐵和握悶辣，招收學員12人。


係賜衣服佇移時對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
色可怜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
驃國樂 貞元十七年來獻之
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難陀
來獻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纊不塞為爾
聽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
宿搖花鬘抖擻龍蛇動曲終王子啓聖人臣父願為
唐外臣左右歡呼何翕習皆尊德廣之所及須臾百
辟出閤門俯伏拜表賀至尊伏見驃人獻新樂請書
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遠
太平由實非由聲觀身理國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
體體生疾苦心憯悽民得和平君愷悌貞元之民若
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
君亦聖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縛戎人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
詔徙東南吳與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
行身被金瘡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飡飢渴費
杯盤夜臥腥臊汙牀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

白居易的《驃國樂》。

在宗教方面，南海諸國與中國的交往尤為密切。南北朝時期，扶南高僧僧伽婆羅、曼陀羅和須菩提三人到中國傳經、講佛、譯著，為中國早期佛教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雲南地區曾經盛行的密宗，也是由緬甸僧人沿伊洛瓦底江北傳進入大理地區，進而對南詔文化產生重大影響。另外，南海地區不少富豪，甚至君主，資助中國佛寺建設。如宋朝時，三佛齊國富商地華伽羅曾出資修復焚毀的廣州天慶寺，越南南方阮氏割據勢力的統治者阮福凋曾出資「五千金」幫助修建廣州長壽寺大殿。

05 南海文明的干預突變

文明之劫難：殖民排擠，文化清洗

人類各文明的發展進程，從來不是簡單直線的。很多文明，經歷曲折和倒退，甚至歸於中斷與湮沒。南海文明也如是。在它發展到如日中天時，歐洲殖民者的入侵，刨掘了文明的根基，撼動了傳承的脈絡，殖民的不僅是肉體，更是千年延續的靈魂。

從15世紀開始，歐洲人頻繁「探索」亞洲。但他們對原住民的歷史和文化不感興趣，唯有香料和白銀讓他們癡迷。到了16世紀，南海的富庶物產和高度文明剛好滿足了歐洲擴張的心態，歐洲人在南海周邊大殖民的序幕由此拉開。

葡萄牙人16世紀開始在亞洲培育自己的殖民支點。他們通過楔子戰術，植入一些支點城市，包括中國澳門、麻六甲等，以此迅速形成完整的貿易線路，累積原始資本，並據此逐步控制亞歐海上貿易線路所需的戰略、軍事和商業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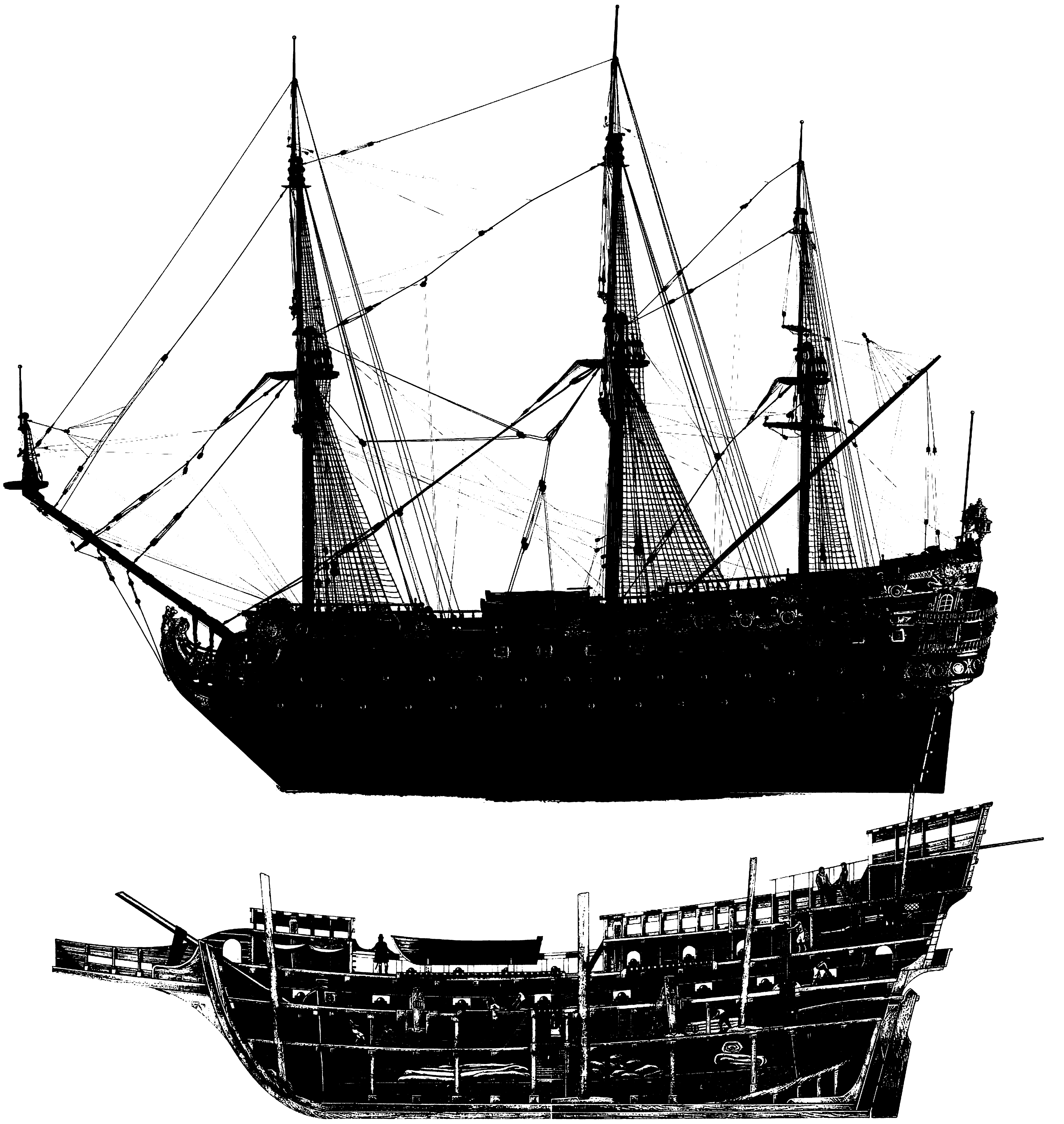
但在歐洲人抵達南海區域時，他們發現到處都是中國人的產業、中國人的規則、中國人的觀念。於是，伴隨殖民與統治，一場「去中國化」的運動開始。

歐洲人在東南亞的「去中國化」，絕不是簡單地把中國人趕出貿易領域。他們需要利用中國化的貿易體繫，需要藉助中國人建立起來的成熟航道，需要靠分散在東南亞各地的支點與中國本土的貿易港口建立聯繫，最大程度地攫取利益，最快速度地累積資本。

以菲律賓為例，1571年，西班牙人打敗了蘇萊曼國王，奪取了呂宋島，他們試圖把曾經中國化的他加祿人小鎮馬尼拉發展成一個西班牙化的城市。為了攫取原始資本，西班牙人開始利用中國商船建立起來的成熟航道，開展「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他們擠壓中國商人的傳統貿易業務，排擠自1402年就在呂宋島建立起的中國貿易站，自己經營起大帆船貿易。他們在廈門大批收購中國商品，經日本向東，穿越太平洋，直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而後由南太平洋返回馬尼拉，整個航行需歷時一年。直到17世紀末，廈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這條航線一直是西班牙在太平洋的貿易脊柱。雖然在商業上仍需依賴中國商品，但殖民者卻殘酷對待當地華人。

西班牙殖民者出臺管制華僑的種種嚴苛條款，如限制自由、集體搬遷、禁止在馬尼拉過夜等。1603年、1639年、1662年、1686年、1762年和1820年，西班牙殖民者先後6次大規模屠殺在菲華僑。

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荷蘭殖民者自18世紀初留意到華僑的影響力巨大，開始限制華僑入境，實施身分證明制度，把沒有獲得身分的華僑全部解押出境，流放錫蘭（今斯里蘭卡）做苦工。



「馬尼拉大帆船」模型及內部結構圖。

英荷東印度公司進駐東南亞諸地後，中國商人的跨海貿易更加受到打壓，份額也越來越小，已經定居東南亞各地的華僑則受到各種壓制甚至殘酷對待。婆羅洲（今加里曼丹）、爪哇等地華僑都曾在大殖民時期深受迫害。

19世紀前，歐洲殖民者在南海周邊大殖民過程中雖然嚴重打壓華人在當地的影響力，但總體來說，其聚斂財富的方式還是依賴了南海業已形成數百年的貿易航線和貿易結構。由於南海自身貿易系統的完善和內部商品的豐富，致使南海周邊基本不依賴於從歐洲進口物資，而歐洲對亞洲絲綢、香料、奢侈品的迷戀方興未艾，這導致了一個客觀的現實，那就是歐洲人在南海的貿易活動無法使用自己的貨幣，必須沿用中國主導的白銀體系。諸如「馬尼拉大帆船」這類貿易航線，其最終結果是把大量白銀輸入中國。這使得歐洲人在東南亞經營上百年，最終卻因為南海貿易中固有的「中國特質」而使中國商人成為貿易的受益者，使中國成為最大的「銀錠吸入泵」。

英國人對此看得很清楚。為了破壞這台「泵」的吸金功能，為了讓對歐洲只有貿易順差的中國不僅賣東西，也從西方人手中買東西，英國人想到了鴉片。1840年鴉片戰爭的開始，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深刻改變了整個南海貿易環境與貿易方式：整個南海文明，在貿易結構、政治影響、文化交流和人文往來等各個層面，進入一個上千年來不曾有過的新時期，中國人逐漸在當地社會中淡出。

殖民者在南海周邊不僅打壓中國元素的存在，也大力推進對本土文化的清除。即便是東南亞唯一一個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暹羅（今泰國），也是以割讓大片土地和島嶼給英法作為代價。從西方傳教士19世紀初踏進暹羅之初，他們就對當地人灌輸「如果不接受基督教國家的庇護，暹羅人註定永遠落後」的觀點。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觀念轉折、社會轉折的「找不到方向」的特殊時期，《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演義類書籍開始在暹羅流行，同是「亂世」、同是「求生」的歷史背景，讓暹羅人試圖從中尋找慰藉、靈感與方向。

直到一戰、二戰後，東南亞各國先後獨立。但是，此時的東南亞，已經被幾百年的殖民史所改變。緬甸、老撾的政治制度、泰國的社會觀念、越南的歷史文化、印尼的宗教信仰等，都在殖民時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也直接造成今天東南亞文化所呈現大差異、多元化的局面。

西方人雖然撤出，但幾百年殖民統治和觀念清洗，已讓南海大時代的歷史變得遙遠。幾百年的文明斷層，讓古代南海文明消失在戰爭的煙塵與抗爭的面孔中。

文明之規則：恪守平等，抵制掠奪

南海上千年的和平，根植於南海周邊地區普世的平等。中國與南海周邊諸國的交往，向來恪守規則、遵循規律。正因如此，中國商船的活動在南海周邊極大程度地限制了英國、荷蘭等西方國家在亞洲各地的掠奪行為。17世紀德國探險家約翰．阿爾伯特．孟德斯在《東印度遊記航程總匯》一書中記載到，印尼與中國商船的通商由來已久，商品交換以中國商船提供的鉛錢為媒介，這種獨立於貨幣的往來方式使得印尼本地的商人們並不完全依賴本國貨幣，這種傳統使得西方商人企圖通過操縱貨幣匯率來最大化財富掠奪的做法失效。英國《米德頓船長航行日誌》中也有類似描述。

《有關17世紀暹羅外交檔案》也記載了那一時期中國商船對泰國進出口貿易的重要性，其中特別提及中國商船是西方商人在暹羅掠奪財富的平衡器。

中國商船對平等貿易的原則堅守，刺激了17世紀很多在東南亞掠奪財富的西方集團開始在南海上劫掠中國商船。《菲島史料》記載，當時所有的英國與荷蘭航海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曾搶劫過中國商船。荷蘭航海家范魯特搶劫過一艘開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英國的米奇本爵士1605年搶劫過一艘運送絲織品的中國船。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後的最初20年裡，公司董事會曾三番五次地指示直接用武力劫掠中國船隻。

17世紀，儘管西方人的介入使南海航行不再像以往那樣自由與安全，但中國的商船依舊定期出海遠航南海諸國，有時甚至承擔起在幾個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的責任。特別是，中國商船的口碑上乘，公正、公平、文明、有序是南海諸國史料文獻中對中國商船的評價。1634年，中國商船在暹羅的貿易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但當時暹羅的船隻因技術原因無法遠洋到中國來直接貿易，因此有暹羅人用船裝載了穀米和木材前往爪哇專門等候中國商船，交換的專案包括「三千至四千件陶器、兩千支金線、六百口大鐵鍋、兩千條毛氈、一百擔細瓷器、一百擔生鐵和二十斤絲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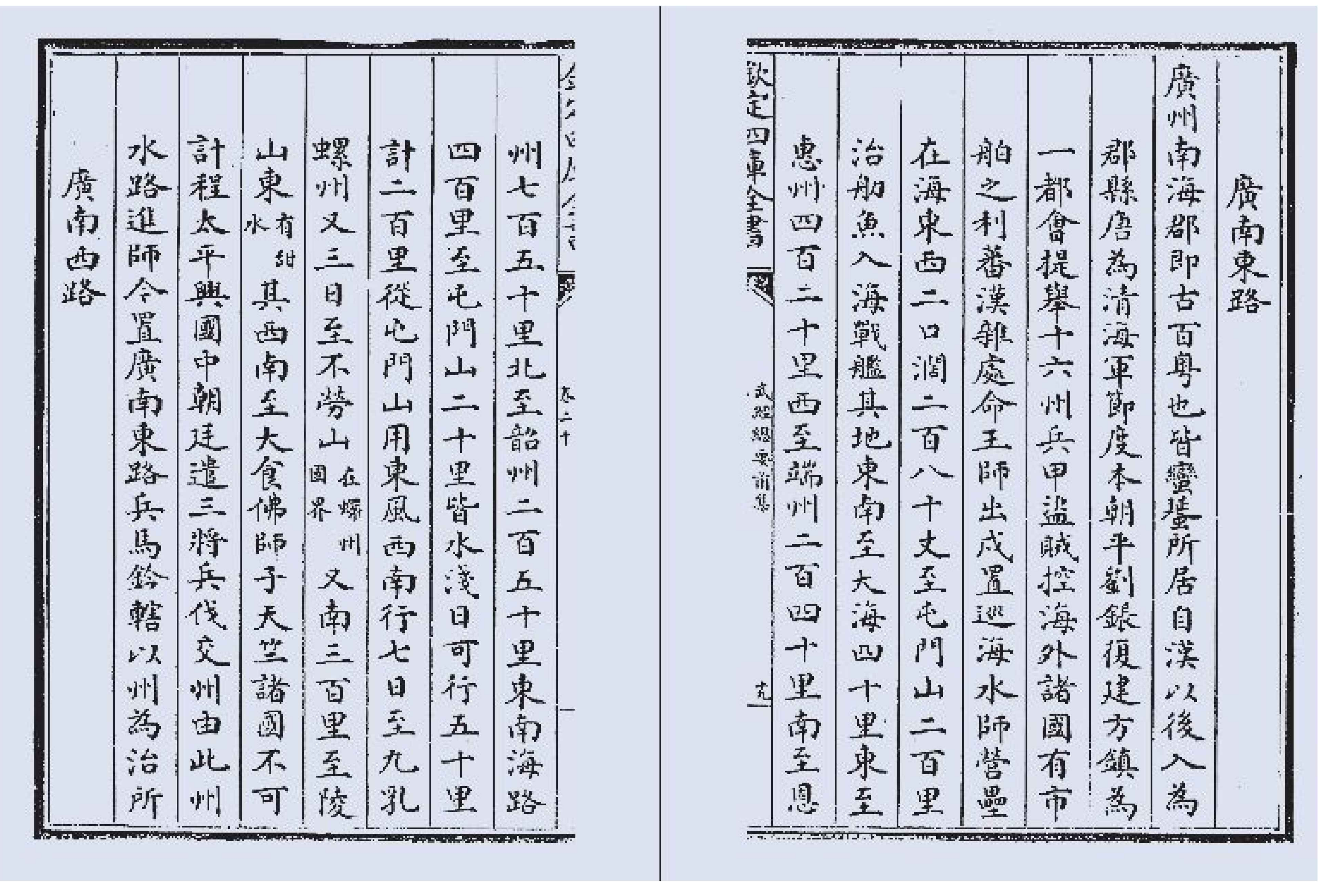
表現中國商船與暹羅貿易的泰國現代歌舞劇。

平等貿易、信守期約、抵制掠奪，不僅是中國商人在南海留下的口碑，更是南海地區長期保持和平、平穩發展的法寶。

06 南海文明的基質再生

文明之保障：中國管轄，共同維護

自唐代以來，中國歷朝對南海有著明確和到位的管轄制度。南宋《諸蕃志》記載，唐朝把南海劃歸振州管轄；《瓊管志》則表明，南宋時「千里長沙（西沙）、萬里石塘（南沙）」歸「瓊管」；明代《元史．地理志》及清代魏源的《增廣海國圖志》都有明確證據顯示元代版圖包括南海諸島；明清兩代，南海諸島隸屬於廣東省瓊州府。不止管轄，自漢代以來，中國歷朝對南海都有專門負責巡海安保的部門。漢代，南海安全由水師負責巡視；南朝時，則由「舟師」負責；北宋則派水師定期巡海。北宋仁宗親自作序的《武經總要》清楚記載了水師巡海西沙群島的史實：「命王師出戍……至烏潴、獨潴、七洲三洋（西沙群島）。」元朝對南海進行了官方緯度測量。明朝朱元璋對海南漁民航行自由尤為重視，他在《御制文集．勞海南衛指揮敕》中說，南海「海之曠，吾與共之。設有揚帆浮遊，奚知善惡者耶」。朱元璋於洪武二年（1369年）在海南設立海南衛所「專掌巡海」，「督所管軍船常於所部海面巡視，有警輒行申報」。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前集
廣南東路
廣州南海郡即古百粵也皆蠻蜑所居自漢以後入為
郡縣唐為清海軍節度本朝平劉鋹復建方鎮為
一都會提舉十六州兵甲盜賊控海外諸國有市
舶之利蕃漢雜處命王師出戍置巡海水師營壘
在海東西二口闊二百八十丈至屯門山二百里
治船魚入海戰艦其地東南至大海四十里東至
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
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東南海路
四百里至屯門山二十里皆水淺日可行五十里
計二百里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
螺州又三日至不勞山在螺州國界又南三百里至陵
山東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師子天竺諸國不可
計程太平興國中朝廷遣三將兵伐交州由此州
水路進師今置廣南東路兵馬鈐轄以州為治所
廣南西路

《武經總要》中關於宋代水師巡視南海的描述。

此後，明代對南海航行安全的官方保障不斷完善。明朝戴熺等人編的《瓊州府志》記載，到隆慶元年（1567年）時，海南多地均設有官兵水寨維護南海安全，其中，僅白沙水寨就有「兵船六十只，官兵一千八百二十名」，一旦有海盜等警情發生，白沙水寨官兵會聯合「海北白鴿寨會兵巡剿」。《泉州府志》記載，清代乾隆時期，廣東副將吳升「自瓊崖，曆銅鼓，經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視，地方寧謐」。

歷朝對南海的巡視並非「走過場」。明洪武年間，有海盜陳祖義盤踞麻六甲十幾年，坐擁戰船近百艘，集結海盜上萬人，劫掠過往船隻上萬艘，騷擾周邊城鎮幾十座。明太祖懸賞50萬兩白銀捉拿他。後來，陳祖義逃到了三佛齊自立為王。明永樂五年（1407年），鄭和海上出兵剿賊，施巧計，發突襲，當場殺死海盜5000多人，活捉陳祖義並將其押回朝廷，斬首示眾。1409年，鄭和經南海造訪麻六甲王國，說服麻六甲與明朝廷合作打擊海盜。這種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合作一直持續到1511年麻六甲被葡萄牙殖民者佔領，歷時100多年。

中國不僅重視南海海上安全，有時甚至對南海周邊國家的政治穩定予以扶持。明永樂六年（1408年），渤泥（今汶萊）王麻那惹加那赴華訪問，不幸病逝。隨行太子遐旺繼位，因擔心國中生變，特請求明朝廷護送他返回渤泥，並留在渤泥助其鎮守一年，以保局勢穩定。明成祖一一應允，派張謙、周航護送遐旺返回並留鎮一年，同時以王禮將麻那惹加那王厚葬在南京安德門外向花村烏龜山。

另外，為保航行自由與安全，歷朝對通過南海來訪的高級外交使團、商團採取海上接來送往的方式，有時甚至一直接送到外使的國門口。

文明之本質：自由和平，合作繁榮

歷史往往會選擇性記憶：和平年代輕描淡寫，硝煙戰火濃墨重筆。誠然，戰火常催歷史轉折，但穩定卻是文明前進、社會發展、商業繁榮的主要推動力。如南海文明，在它至少一千多年的和平階段，或激昂慷慨或潛移默化地，推動著區域內社會、國家、人民的進步。

自從中國具有冒險精神的遠洋航船第一次開通了兩國間的航路以來……中國的航船不僅帶來了貨物，隨之而來的還有許多商人、工人、手工業者……從這個古老的國家發出它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對於亞洲的許多文明，曾有過美好的作用。直到現在，我們許多的島嶼上還保留著這些中國文化的精華。

這是1955年時任印尼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關於中國與南海周邊文明的公開表述。

南海，成型於第四紀冰期的結束，海水上升，分隔開曾經連成一片的東南亞大陸，中央窪地成了今天的南海，其地理歷史不過萬年。南海文明，成型於中華文明最和平與純粹的願望，用葉葉扁舟承載出去，抵達在那個年代無法遠航的其他文明，相識相知爾後交會交融。

南海文明，始於對文明的共同期待、共同分享、共同進步，始於對發展的美好嚮往和對團結的真實理解，它是最本真發展的人類文明。

南海，自古以來就是自由航行之海，是自由貿易之海，是自由交流之海，是促進發展、催生繁榮之海。中國，是南海文明最重要的締造者和推動者，也是最堅定的守護者與捍衛者。

中國與南海周邊先人們共同締造的文明，不能遺忘；南海文明因外來殖民掠奪而被扼殺的歷史，不能遺忘；南海文明維繫幾千年的和平、先進、繁榮的本真，不能遺忘。「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這是中國人的智慧，也是南海文明得以延續的智慧。

那是一個令人心潮澎湃的大時代。

第二部分 南海文明的內生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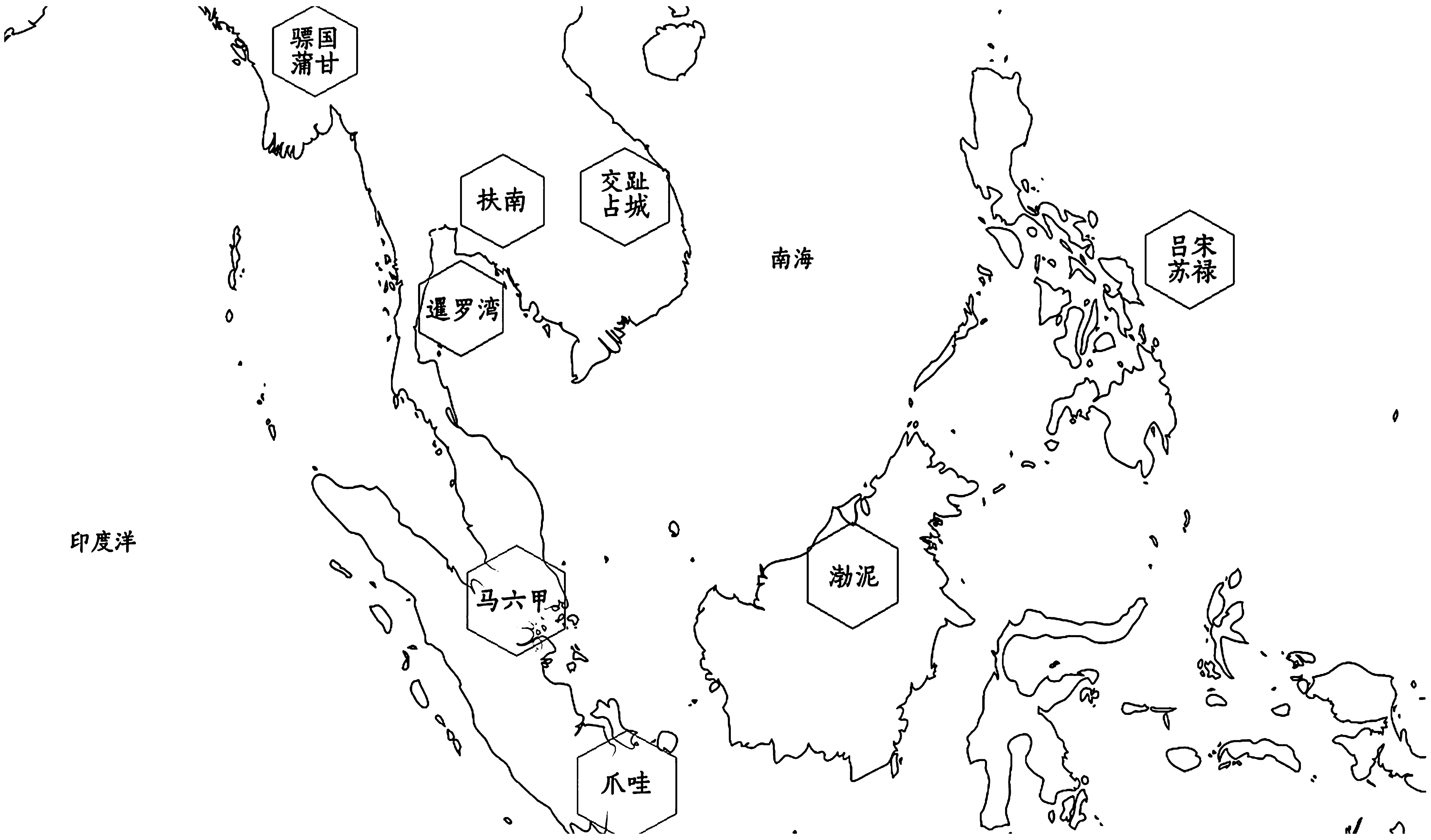
引子

在南海區域跨度幾千年的古代文明中，湧現過上百個大大小小的古國。這些古國之間，除了有政治方面的臣服關係和版圖上的你爭我奪外，更有經濟的相互作用、技術的相互借鑑、文化的相互滲透、宗教的相互影響。各種作用力的結合，導致這些古國在生滅興替的同時，延續譜寫著南海文明。這一過程中，不管國名如何變更、疆界如何調整，作為一個整體的南海文明卻始終沒有停止發展的腳步。

在還原南海文明過程中，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對南海區域的影響不言而喻，兩大古文明與南海文明的發展過程有著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關係。前者在商業、貿易、技術、風俗、理念、禮教等方面深刻牽引著南海諸國的文明演進，後者則更多在宗教、階層、種姓、文字、制度等領域向南海文明輸送新的啟發。

但不容忽視的是，在這兩大古文明影響下的南海周邊區域也在萌生著不少內生的本土文明。有些本土文明充分利用地利之便將其他文明的精髓兼收並蓄，造就了特定時期的區域繁榮；有些文明隨著技術發展和航線變更潮起雲湧，取代其他文明開闢新的文明支點；有些文明則見證和親歷了南海商業文明的興衰歷程，淪為西方大殖民的受害者。

從南海文明中擇選出扶南、驃國與蒲甘、渤泥、暹羅灣、交趾與占城、爪哇、麻六甲、呂宋與蘇祿這八個本土文明，是因為它們在南海文明的某個特定時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南海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們中有些文明是南海商業文明的重要代表，有些是南海文明從半島文明過渡到海島文明的直接證據，有些則是南海文明中宗教的中轉傳播站，有些還是南海文明中國際外交的高手。同時，這些文明也均傍海而居，充分說明海洋在這些文明衍生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不同時期南海周邊曾經湧現過的本土文明示意圖。

雖然說，很多南海周邊古國與今天的東南亞國家並沒有完整的繼承關係，但基本上，這八個文明都得到了部分傳承與延續，對於今天復原南海文明的基因圖譜，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01 暹羅灣，不止是南海文明一隅

南海文明的發展從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南海文明的發展也不是四處開花的，有一個先後的次序。

暹羅灣，也就是隋唐時期中國人所說的金鄰大灣，或今天所指的泰國灣，也許就是各國文明最初融合、集結、碰撞與演化的地方。南海文明在肇始之時曾把暹羅灣作為落腳第一站，造就出這片區域文明的第一個階段——海灣文明。

兩航線推演歷史三階段

「笑癡兒航海，空尋蓬島，漁郎失路，漫**說**桃源。」古人航海的艱辛、冒險與未知，可想而知。尤其在大航海時代前技術不發達的年代，南海**絕**不是搖櫓棹舟、吟詩彈曲的場所。

即便如此，古人對南海的洞悉，要遠超今人的想像。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對南海地區各種物**產**的明確記述，古書中準確的記錄，使我們對那時候的南海往來交通**產**生了無限遐想的空間。戰國時的《荀子》記載：「南海……有羽翮（翠鳥的羽毛）、齒（象牙）、革（特指犀牛皮）、曾青（天然硫酸銅）、丹干（朱砂）焉。」西漢《淮南子．人間訓》則提到，秦始皇時期曾在南越尋找犀角、象牙、翡翠、珠璣。

到了漢代，中國對南海地區的探索有了明確的文字記述。《漢書．地理志》中那段最著名的海陸日誌就是例證：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關於唐代南海航路最詳細的記載則是《新唐書》中宰相賈耽描述的「廣州通海夷道」：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筲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訶陵國……葛葛僧抵國……個羅國……哥谷羅國……勝鄧洲……婆露國……婆國伽藍洲……師子國，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

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師古曰稟給也耦媲也給其食而侶媲之相隨行也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宋祁曰逢越本作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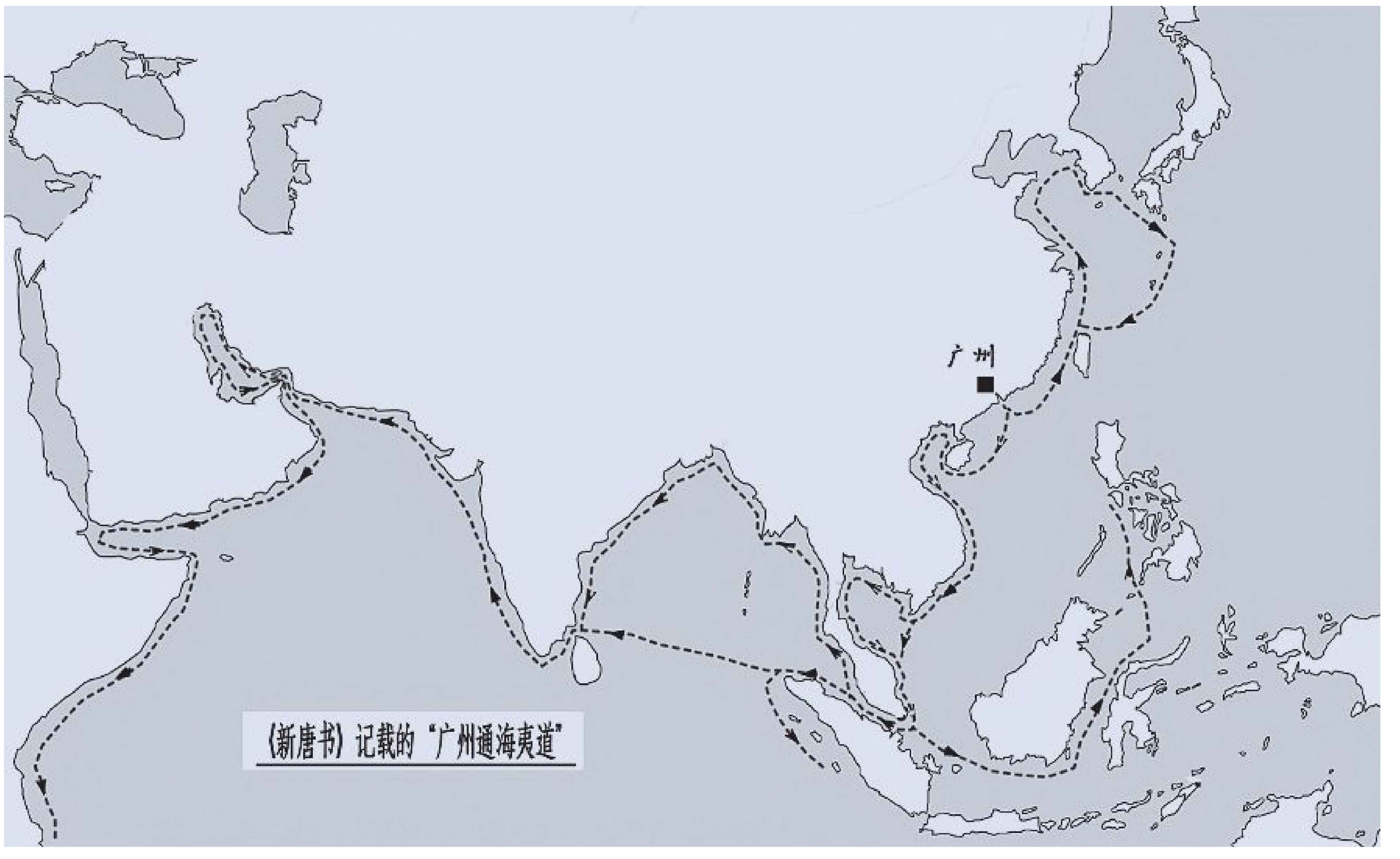
前漢書

五十一

音子木反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師古曰諶音士林反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師古曰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也夫音扶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

《漢書．地理志》中對西行海路的描述。

漢唐時期記錄的南海航線，大多是沿著南海西側航行：從今天的廣州一帶出發，經海南進北部灣，沿今天的越南海岸，繞入或途經暹羅灣，抵達馬來半島，再由馬來半島到達麻六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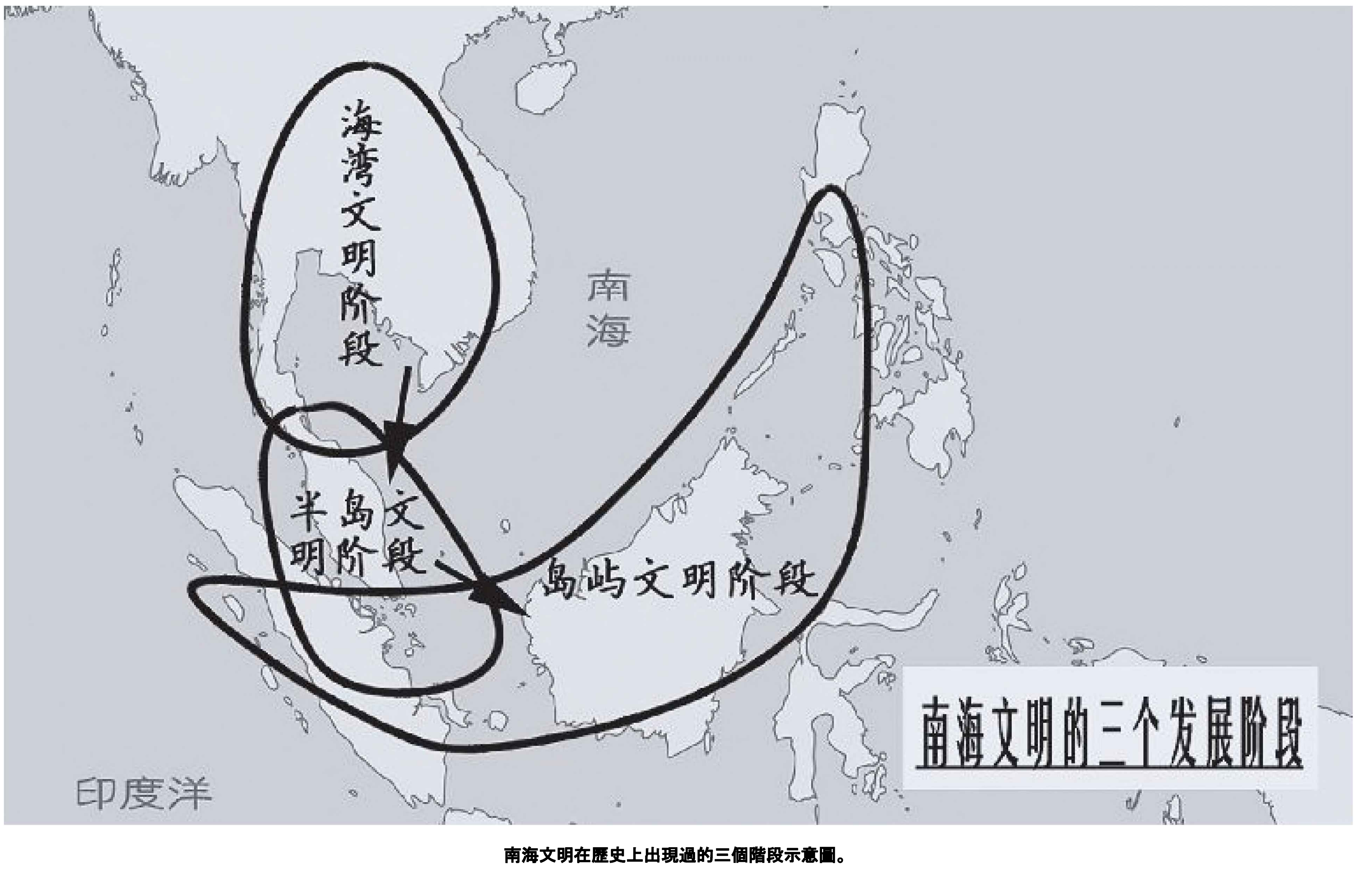


《新唐書》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示意圖。

宋代之後，海路日誌越來越細緻，途經各地的地名也越來越明確，航線越來越固定。這與唐宋時期造船技術的大發展密不可分。隨著逆風行舟的帆船技術大範圍推廣，各類大載量的船舶紛紛下水，使得初始時以探險、遊歷、出訪為目的的遠洋航行轉向遠洋貿易，此後，很多個人的探險遊歷大多是搭乘遠洋商船出海的。

宋代之後有記錄的南海航線，越來越多地沿著南海東側航行。從今天的泉州或海南一帶出發，經臺灣島和菲律賓群島，抵達加里曼丹島北沿，再進入麻六甲一帶。

以宋代為分水嶺，兩條航線形成古代南海航線的東西兩線。



南海文明在歷史上出現過的三個階段示意圖。

這兩條航線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都比較貼近陸地，產生這種情況可能有兩層原因：一是古代航海技術相對落後，靠近陸地遠洋航行比較安全且容易得到物資補給；二是靠近陸地有利於商業航行時發現新的市場和商品。相比之下，西線比東線的航行難度較小。宋朝時的航海技術大發展，造就了南海航線的東移。

文明從來都是循著人類探索的軌跡不斷被發現的，在發現過程中和發現之後，文明又產生了新的交會、交融，產生新的文明。就南海文明而言，這種發現文明、改造文明、創新文明的過程非常明顯。古代中國人在南海上的活動軌跡，由北至南，從西向東，空間跨度涉及整個東南亞，時間跨度兩千年，在無形中依次推動形成了南海文明中分別以三個地域為中心的三個階段：以西線中段為中心的海灣（暹羅灣）文明階段、以西線南段為中心的半島（馬來半島）文明階段、以東線中段和南段為中心的島嶼（菲律賓群島、加里曼丹島、爪哇島、蘇門答臘島等）文明階段。

暹羅灣的平靜，讓沿西線航行的古人在經歷驚濤駭浪之後得到喘息與補給，因此，那裡也是古人最早花費大量時間探索的地方。在中國早期古籍中，對暹羅灣區域的古國、古民族、古文明的記述，絢爛而詳盡。

古人眼中的金鄰大灣

在很多明清地圖中，暹羅灣專指今天的曼谷灣，它的東邊是泰國的羅勇府，西邊是泰國的佛丕府。但後來，暹羅灣的概念被擴大至與南海主體相毗鄰的整個大海灣，涉及的國家就包括泰國、柬埔寨、越南和馬來西亞這四個國家了。在古代，那時的大暹羅灣則涉及更多的古國。很多古國今天已不復存在，很多民族甚至都已經被同化，很多名稱幾度變更已經無從考證了。但幸好這裡是南海文明最原始的一個發展中心，中國的古人把對那些海灣古國的經歷、見聞、印象記錄在古籍中，讓今天的我們還能對近兩千年前的那些海上明珠有所領略，有些文字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中對那些古國的記憶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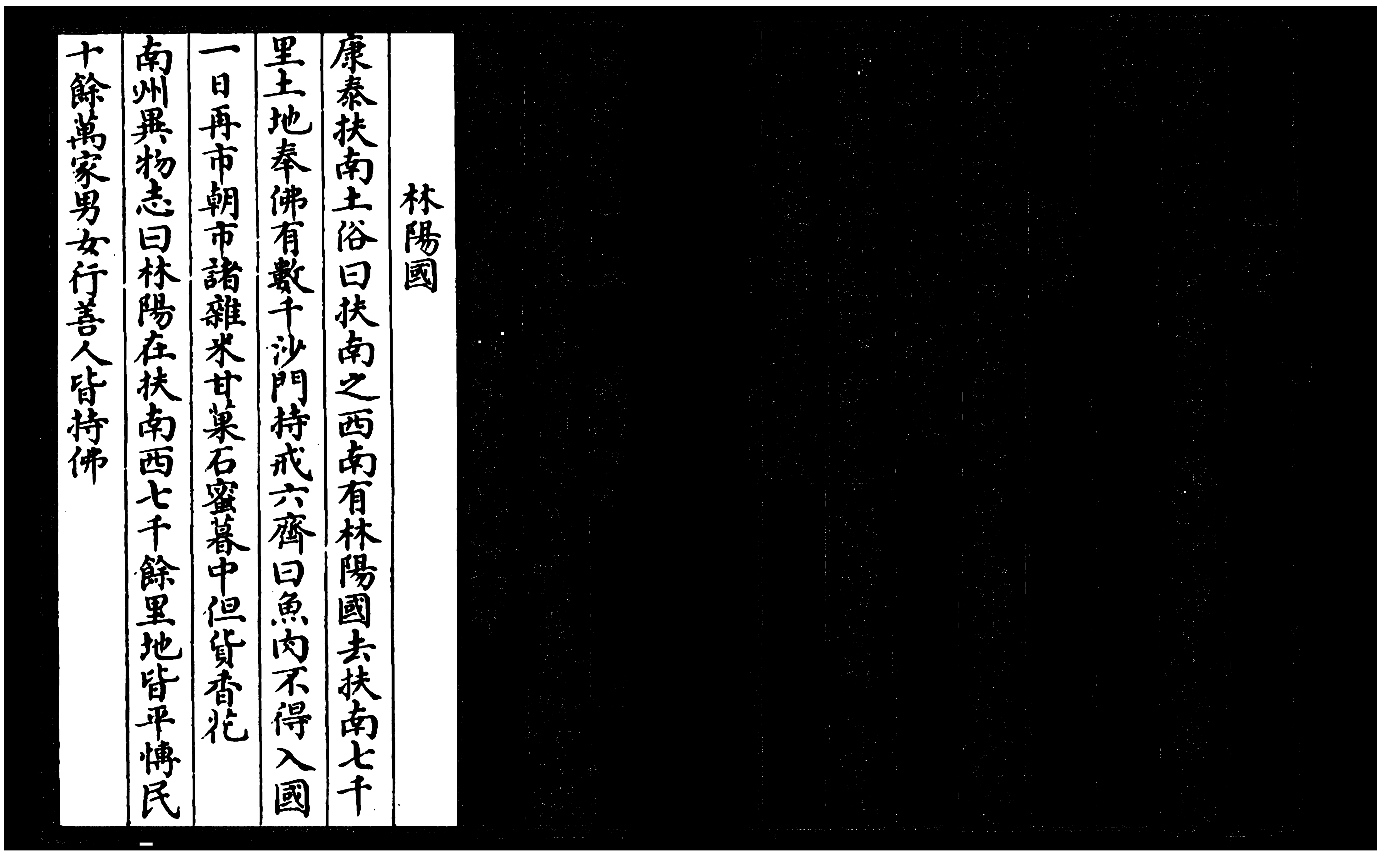
金鄰國，一個很少被提及的國名，位於今天泰國湄南河下游一帶。這個國名最早見於三國時期朱應的《扶南異物記》。《扶南異物記》本是一本記載扶南國的志書，但由於當時的金鄰國附屬於扶南，因此也被記錄在這本書中。「金鄰，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餘里。地出銀，人民多好獵大象，生得乘騎，死則取其牙齒。」意思是，金鄰國距扶南兩千多里，有銀礦，那裡的人們喜好捕獵大象。捕得的大象用來當作腳力，大象死後則取下象牙。不要小看這段簡單的文字，它是目前全世界最早記錄泰國湄南河下游一帶古國民眾生存狀態的文獻。泰國有文字的歷史不過七百多年，而這幾十個漢字，卻還原出大約兩千年前古代泰人的生存狀態，而且其中部分生活片段在今天泰國的某些地區還非常原始地延續下來。如今的泰國，還有一些以象為生的人每年都會去熱帶叢林中獵捕野象，用以防止人工飼養象群過度近親繁殖。一些人仍在使用大象作為腳力，一些人仍在大象死後取下象牙。

西晉文學家左思在《三都賦》中也提到金鄰國是大象之國，其首領多齒黑。後來，南朝時的《扶南記》也記錄了金鄰國的一些情況，並在北魏時期的《水經注》中被引用。到了隋朝，就有「金鄰大灣」一詞，這就是暹羅灣、泰國灣的最早名稱。

歷史最有意思的是，只要你去尋找，今天在你身邊的事物，總能在歷史中找到回音。例如，當前往泰國旅遊時，當你的飛機落地在曼谷的素萬那普國際機場，你恐怕無法把這座機場與中國古人在南海上的探險相聯繫。但殊不知，素萬那普，就是我們古人所指的金鄰國。西元前240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遣蘇那和烏多羅兩位高僧到今天的泰國湄南河下游一帶傳播佛教，兩位高僧給那裡起了個名字，叫「素萬那普」，意思是「鋪滿黃金的土地」。

同在三國時期，與朱應一同前往南海地區的康泰記錄了金鄰國以西的一個鄰國，叫作林陽國（也作林楊國），也就是現在泰國的西南一隅和緬甸東南的一部分地區。這個國家和金鄰國一道，一直被記錄到宋代，而且，在中國人的記錄中，林陽人會做跨國貿易，經常到扶南、印度做買賣。宋代後，林陽國與金鄰國便很少出現在中國古籍中。事實上，南宋末年的泰族人開始南征北戰，兼併了不少邦國，於1238年成立了素可泰王國，金鄰國和林陽國消逝在戰爭的硝煙中。

中國人在南海的探索不僅僅單個地記錄下這些國家的情況，還涉及國與國的交往以及宗教的傳播。例如，康泰在《扶南土俗》中記載，林陽國全國信佛，有數千沙門。每到持戒吃齋的日子，肉類不得進入這個國家，早市上交易的是米、乾果、冰糖，晚市上只交易禮佛香花。宋代《太平御覽．林陽國》說：「林陽國皆為平原，有十多萬戶人家，男女都行仁善，皆侍佛。」這些文字為泰國研究自身的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論述，它不僅描繪了當年泰國人信佛的盛況，更表明3世紀前後在泰國土地上流行的佛教並非今天泰國流行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而是大乘佛教，因為文字明確記載林陽國人到了齋日不食肉。


林陽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
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齋日魚肉不得入國
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菓石蜜暮中但貨香花
南州異物志曰林陽在扶南西七千餘里地皆平博民
十餘萬家男女行善人皆侍佛

《太平御覽》對林陽國的記述。

連接兩洋的戰略要衝

在早期暹羅灣文明中，位於暹羅灣南側的幾個古國也被頻繁記錄在中國史籍中。例如，狼牙修、赤土、盤盤等。這些國家，均位於馬來半島狹長地帶。連接兩洋的特殊地理方位使之成為南海文明與印度文明碰撞交會的前沿，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都曾在那裡盛行。

在提到馬來半島上的古國前，我們還是要回到《漢書．地理志》中那段從中國南方前往印度的著名水陸日誌，來尋找其中一個關鍵的地方。在那段記述中，漢朝的探險家們從中國南方出發，穿過北部灣，進入暹羅灣，然後從暹羅灣某地登陸，「步行可十餘日」，就從暹羅灣穿越到了印度洋，然後繼續乘船前往今天的緬甸和印度。問題是，那個「步行可十餘日」的地方是哪裡呢？

答案較為明確，那個地方就是今天的克拉地峽。

過去幾十年，受全球地緣政治、能源爭奪、軍事部署、戰略需求等因素，美國、日本、中國都曾傳出希望在泰國南部的克拉地峽開鑿運河的消息。克拉地峽最窄處大約50公里，最寬處也不到200公里，一旦開通運河，可形成聯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戰略水道，不僅可使東北亞進口中東原油的航程大幅縮短，大大削弱麻六甲海峽的經濟價值，還可以提振中南半島經濟，甚至改寫東南亞地區乃至亞洲地區的軍事戰略布局。

這一現代人關注的焦點，其實早在近兩千年前，就已經進入古人的視線。

古人們雖然沒有想過在克拉地峽開鑿運河的事，但他們很清楚，徒步穿越克拉地峽可以大幅減少從中國前往印度的航行時間，因此，那裡也成為中國古人頻繁造訪的地方。

根據中國古籍記載，中國人早在1世紀就曾經到達克拉地峽並充分認識到這一地區的重要性。學界各種考證認為，諶離國或夫甘都盧國很有可能就是今天泰國克拉地峽所在的位置。只可惜，這兩個國名在全球古籍中僅此一處出現，再無其他文獻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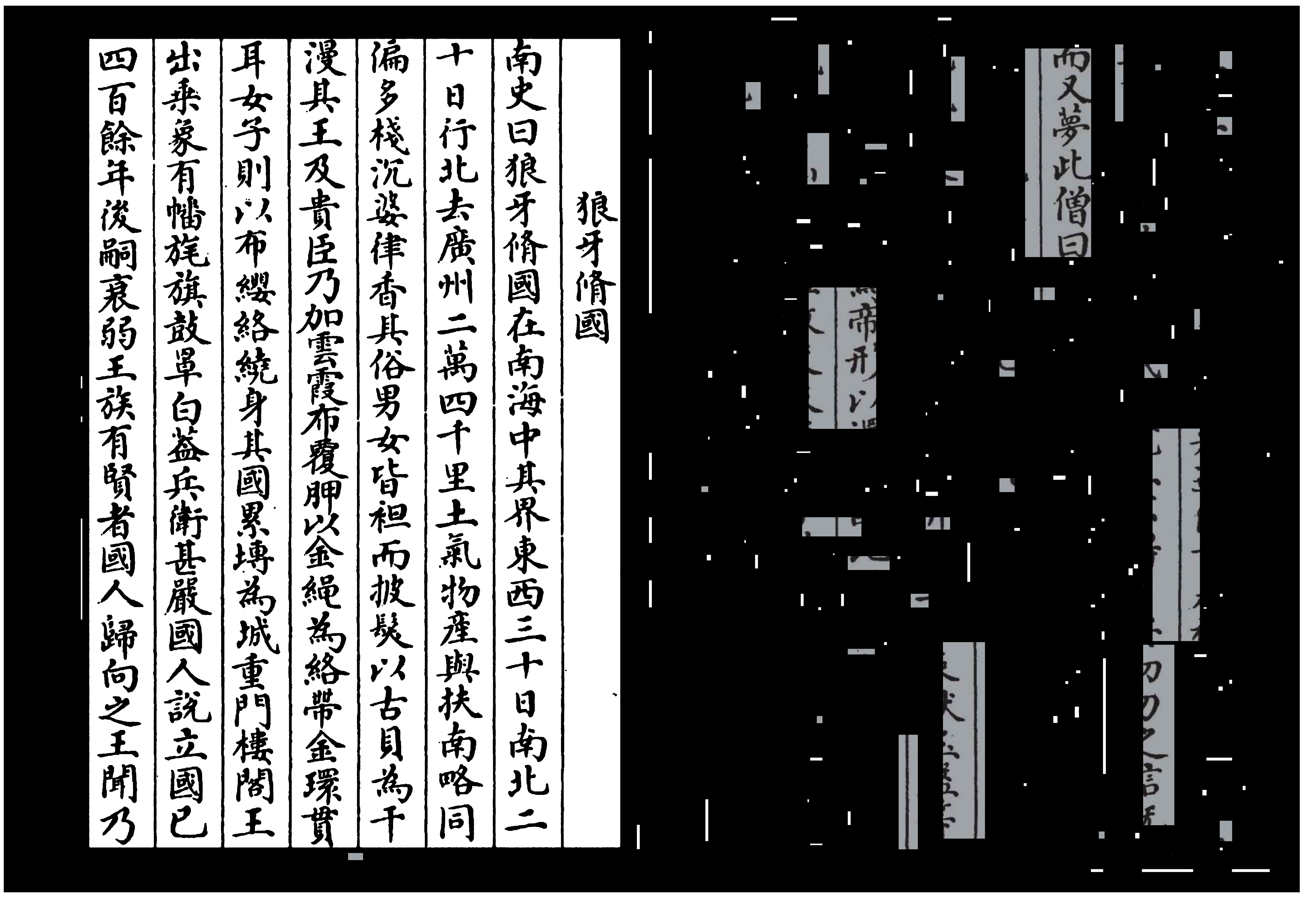
對於1世紀前後有關克拉地峽附近地區的歷史，絕大多數都依賴中文文獻，最重要的原因是，馬來半島上的克拉地峽是當時中國人從南海穿越到印度洋的必經之地，中國最瞭解克拉地峽附近區域的各個城邦。其中，出現在中文文獻中最多的一個古國就是狼牙修。

狼牙修，古籍中的古國

日本南海、西域史學家藤田豐八曾用一篇《狼牙修國考》作為他《中國古代南海交通叢考》一書的開篇之作。這篇著名的南海史地考證文章又以《梁書》中的一段關於狼牙修國的專條作為開篇：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為干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

狼牙修國建立於1世紀末至2世紀，位於克拉地峽南部、今泰國北大年一帶至馬來西亞的吉打州，鼎盛時期其疆土覆蓋克拉地峽。從《漢書》的記載看，漢代以前的中國人極有可能頻繁造訪狼牙修。它與中國官方的往來始於梁代，是自梁代到明代中國典籍中記載得最多的南海古國，也是中文譯名最多的南海古國。《太平寰宇記》、《文獻通考》稱其為「狼牙」；《南史》、《通典》、《舊唐書》、《新唐書》稱其為「狼牙修」；《隋書．赤土傳》寫作「狼牙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寫作「郎迦戍」；《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寫作「迦摩浪迦」；《諸蕃志》稱之為「凌牙斯加」；《島夷志略》、《星槎勝覽》稱其為「龍牙犀角」等。



狼牙脩國

南史曰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産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其俗男女皆袒而披髮以古貝為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以布纓絡繞身其國累塼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已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

《太平御覽》對狼牙修國的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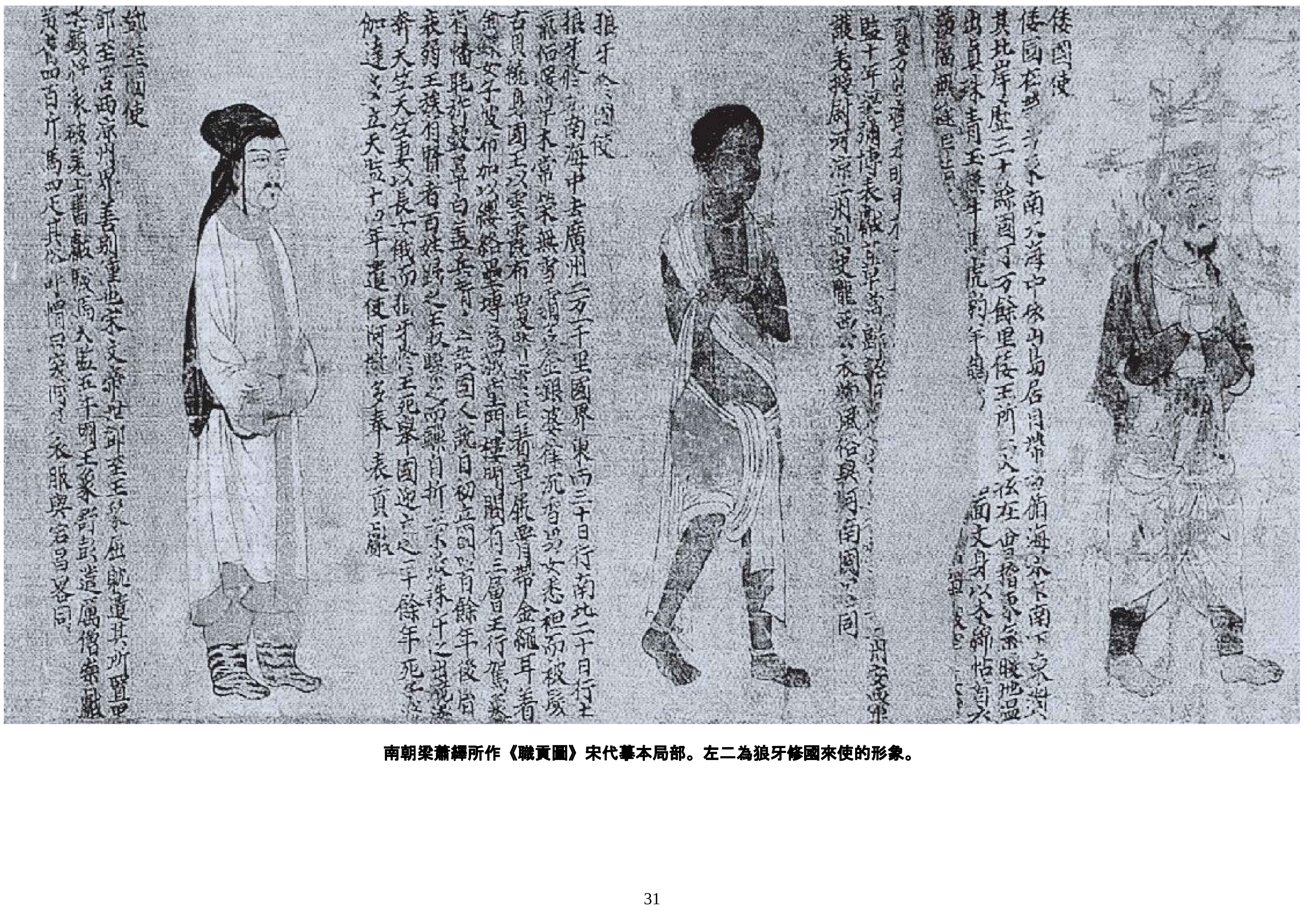
古人如此關注狼牙修，要從515年狼牙修國國王婆加達多遣使拜訪梁武帝說起。《梁書》中關於狼牙修國的大段介紹，估計是從到訪使臣嘴裡得知的。從那段介紹我們可以得知，狼牙修國很大，歷史也很悠久，百姓富足，城池堅固，王室威嚴，很講排場，信仰佛教。狼牙修國王是狼牙修國賢人的後代，母親是天竺國王的長女。狼牙修國王敬重梁武帝，稱梁武帝「眉間白毫照耀四方」。在那次訪問之後，狼牙修國又於523年、531年、568年多次遣使來梁。南朝梁代的蕭繹曾繪畫了一幅《職貢圖》，那是中國繪畫史上第一部以外國使臣為題材的工筆人物卷軸畫。原作中的外國使臣不少於25國，現存於中國國家博物館中的宋代臨摹本僅包括12國使臣畫像，其中就有一幅是狼牙修國的使臣。

佛教大約在4世紀前後傳入狼牙修國，使得狼牙修成為當時南海上一個著名的佛教聖地。唐玄奘西行求法雖然沒有途經南海，但依然把狼牙修國記錄到他的《大唐西域記》中。唐代另一高僧義淨從南海前往印度求法，在那段歷時20多年的取經途中，義淨很有可能在狼牙修國居住過一段時期。義淨還在他撰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記錄了另外三位法師造訪居住狼牙修國的情況。

可見從梁到唐，狼牙修國始終是暹羅灣區域最重要的佛教盛行地區，也看得出當時的狼牙修國對中國僧人十分禮遇。但到了宋代，中國的多部古籍提到了佛教在狼牙修國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開始臣服於位於麻六甲一帶的三佛齊。宋代《諸蕃志》對此有明確記載。到了元朝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中，狼牙修已經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

狼牙修的宗教轉型，符合時代發展變化的特徵，因為從宋代開始，南海文明中的海灣文明開始向半島文明過渡了。15世紀狼牙修國被北大年國取代了，狼牙修徹底成為一個歷史上的國家名稱。

在漢代至隋唐年間的早期南海文明中，湧現在暹羅灣周邊的文明還有很多，如盤盤、赤土、墮羅缽底國等。這些國家存在的時間先後長短不一，但大多與中國建立有定期往來的友好聯繫。《梁書》和《新唐書》記載了盤盤國多次遣使梁朝和唐朝的事情；《隋書》和《通典》則生動記述了赤土國同隋朝的關係。隋朝還曾派主事常駿訪問赤土。7世紀，位於今天泰國中部的墮羅缽底國也從南海遣使中國，向中國展示了它的高度發達與文明。當然，在那個時期，暹羅灣周邊還有一個集政治文明、宗教文明為一身的地區「首座」——扶南國。



南朝梁蕭繹所作《職貢圖》宋代摹本局部。左二為狼牙修國來使的形象。

「暹羅」是個外來詞

從金鄰大灣，到暹羅灣，幾百年的跨度。

很多人知道，暹羅就是泰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泰民族悠久的歷史中，「暹羅」從來不是泰民族自己使用的國家名稱。泰國人認「暹」不認「羅」，甚至連用「暹」作為正式的國名，都是不太樂意的。1856年與英國簽條約時，因為有太多外國人用「暹羅」來稱呼它，泰國政府這才勉強在正式公文使用暹羅一詞。那麼，「暹羅」這一稱呼是從何而來的呢？又是誰把這個稱呼傳播開的呢？

暹，英文Siam，源自梵文的Syam和Sayam。這個詞在梵文中有好幾個意思，一是金色或黃金，二是土地肥沃。這兩個意思都還算不錯。但它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皮膚黝黑。「暹」這個詞，實際上是個舶來語，一開始是非泰族人對泰族的稱呼。

在現代泰國的版圖上，歷史上曾經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國家存在過，但不管哪朝哪代，泰族人都稱自己是泰人。「泰」的意思，是「自由」。

中國史書中最早提到「暹羅」這個詞是在元代。當時，有位叫作周達觀的溫州地理學者，跟隨元朝使節從南海去了真臘，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後來寫了本很有名氣的書，叫作《真臘風土記》。這本書第一次提到，在真臘的西邊有個地方，叫做暹羅，走路要半個月才到。周達觀多次提及，暹羅人總是和真臘打仗，侵犯真臘的土地。還有，暹羅人會種桑養蠶，然後做出絲綢自己穿，暹羅婦女會縫補。真臘人的衣服磨損了，就請暹羅婦女幫他們縫補。

問題是，此前中國並沒有任何史書提到過暹羅。明代不少歷史學家推斷，周達觀本人也並不很確定是不是有暹羅這個國家，但他在真臘時，常聽真臘人說到暹人。他據方位推斷，真臘以西方向在歷史上有個國家叫作羅斛國，因此他乾脆就把「暹人」與「羅斛國」疊加起來，創造了「暹羅」這個詞。但實際上，在周達觀那個年代，他所指的方向，有兩個國，北方是以暹人為主的素可泰王國，南方是以現在泰國華富里府為都城的羅斛國，兩國都是由早期泰族建立。

在那個年代，即便是中國人，也無法完全及時掌握周邊國家分分合合的政治版圖。所以在周達觀之後，不管泰國經歷王朝更迭還是政權更迭，中國人開始用「暹羅」或者「暹羅斛」來稱呼泰國，到了15世紀，中國開始單用「暹羅」來代指泰國，並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極度繁榮的南海文明，讓「暹羅」這個名稱廣泛流傳。自元代以來，日本、朝鮮、越南、琉球也開始隨中國採用「暹羅」的名稱。特別是，在明清兩代南海貿易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外國商人在與中國商人的交往過程中得知了「暹羅」的存在，儘管客觀的事實是，在元明清三代，泰國經歷了素可泰王國、阿瑜陀耶王國、吞武里王國和曼谷王國四個朝代的變遷，羅斛國早已不復存在。

自1238年素可泰王國建立以來，泰國人一直是以都城的名稱來命名王國的名稱。素可泰王國的都城是素可泰、阿瑜陀耶王國的都城是阿瑜陀耶、吞武里王朝的都城是吞武里，曼谷王朝的都城是曼谷。所以，泰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是沒有一個延續的國名的。到了19世紀中期，英國人逼迫曼谷王朝簽訂不平等條約，泰方起初還堅持使用曼谷王朝的名稱，但英國人說，外國人只知道暹羅而不知什麼曼谷王朝，迫於壓力，泰國官方才第一次使用「暹羅」作為正式名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泰國政府才廢除了「暹羅」這一稱呼，正式確定「泰國」為國家名稱。

關於廢除「暹羅」這一國名的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因為暹羅會讓人誤以為暹羅是一個民族，也有人說是因為暹羅本身就是個舶來語，但也有老一輩泰國人給出另一個答案：二戰時，原本投靠日本的暹羅在關鍵時刻搖身從軸心國加入了同盟國，與美國站到了一邊，所以當時在英文中出現了一個新詞，叫作「暹羅人講話（Siamese Talk）」，專指「說話不靠譜、立場來回搖擺」。這樣一個詞，如果繼續用作國家的名稱豈不貽笑千年。算了，改用「泰國」罷了。

各種說法，孰真孰假早已難考。但「暹羅」這個詞出現在歷史中並且「以訛傳訛」地廣泛流傳乃至最終成為普遍認知，也算是南海文明中一個插曲式的文化現象。

02 扶南，南海文明早期大通道

大約兩千年前，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這兩大古文明在南海地區就發生了有明確記錄的碰撞和交會。碰撞的地點，就位於今天的柬埔寨一帶，間或延伸至今天的老撾、泰國、越南、馬來半島一帶。這種文明碰撞在當地引起激烈的社會變革，帶動政治文明的發生和進步，並催生出當時毋庸置疑的東南亞第一大國——扶南。

扶南在政治上是中南半島當之無愧的海上強國，雖然曾在禮節上稱臣中華，但在它治下，也有不少南海古國向它歲貢；在經濟上，扶南與中印均有規模可觀的官方與民間貿易；在文化上，扶南深刻影響著周邊各國並直接對後世的中南半島文明產生不可忽略的「定調」作用；在技術上，扶南航海技術的先進不僅造就了它的遠洋貿易與港口樞紐，還使其威名遠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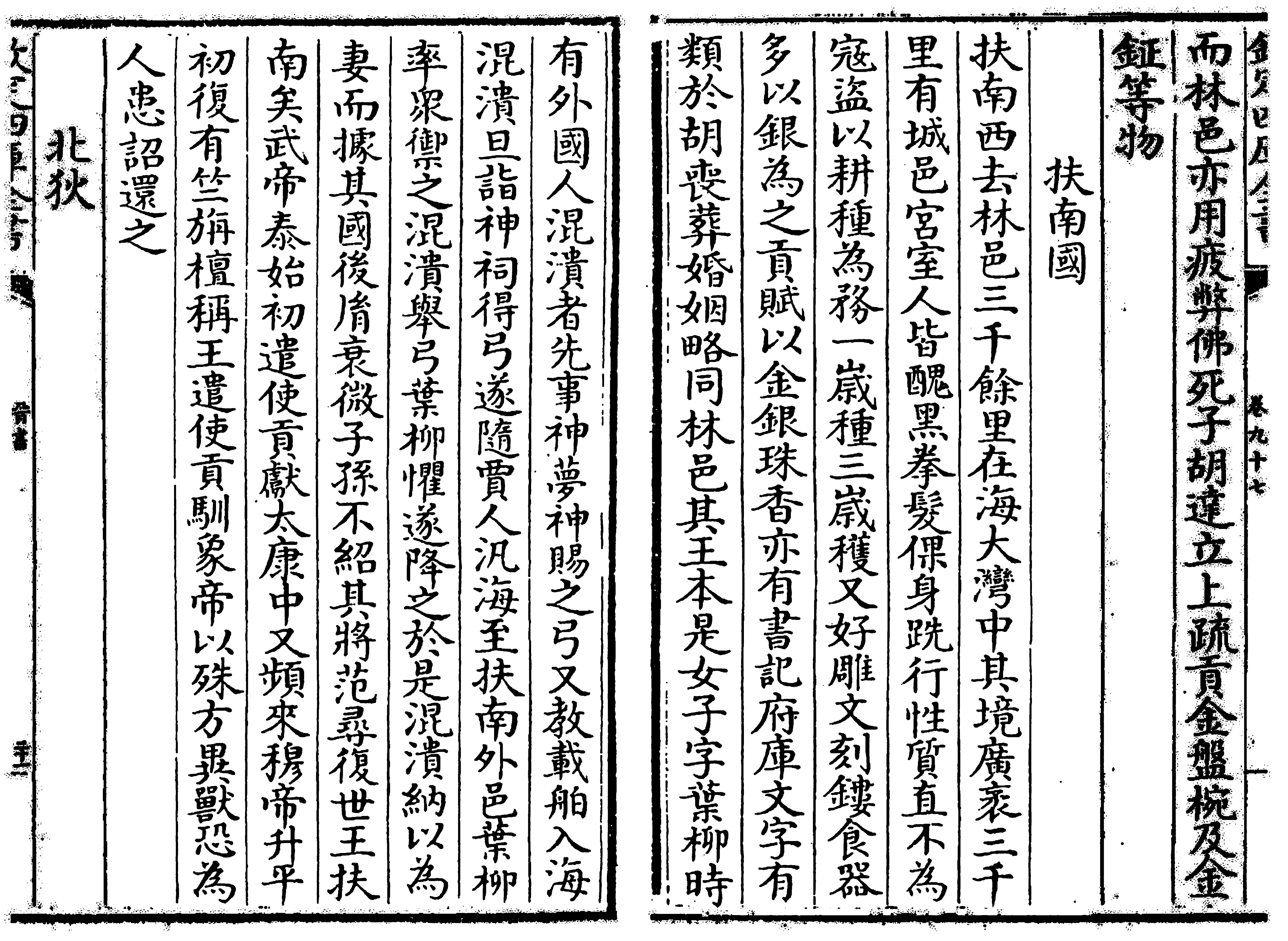
扶南之強，讓不少學者認為，3世紀前的東南亞歷史，就是扶南史。但如果要探究扶南緣何稱霸一方，重要原因恐怕是地利之便：它挾太平洋與印度洋而居的地理特徵使之成為早期南海文明的大通道，文明的率先輸入與率先本地化使之成為在各個領域都先人一步的先行者。事實證明，伴隨航海技術的高速發展與普及以及地緣政治中心的時代變遷，在隋唐時期，扶南開始走向衰落，它原先扮演的通道作用淡出歷史舞臺，被交通更為便捷的麻六甲等其他通道所取代。

一個女人開創的扶南史

中國古籍對扶南的記錄，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和三國時期。但關於早期扶南史以及扶南建國史的詳細記錄，見於《晉書》、《宋書》、《南齊書》和《梁書》。四部書共同描述了扶南國的興起、王權、民風、貿易以及與中國的交往。其中，《梁書》用九大段的篇幅詳細還原了扶南的風貌。

《晉書》、《南齊書》和《梁書》都用一個名叫柳葉（《晉書》作「葉柳」）的女人作為「扶南」的開篇。

西元1世紀前後，湄公河下游地區有很多部落，部落間征戰不斷，民不聊生。此時，有一位年輕貌美、體格健壯、睿智聰慧的女子出現了，她名叫柳葉。柳葉擅於協調人際關係，在各部族中贏得聲譽，並集合各部組成了一個統一城邦，名曰扶南。就在柳葉掌權之際，在扶南之南，一個叫混填（古籍中亦作混潰、混滇、混慎等）的徼國（即外國）男子，奉神鬼之術。有一天，混填做夢，夢見自己得到一把神賜的弓箭，然後他帶著弓箭乘著商船出海遠行。混填夢醒後隨即前往廟裡祈禱，後來在一棵神樹下真的找到一把弓，於是，他便按夢的指示乘船出海，到了扶南附近。柳葉得知有人乘船而來，便坐船出海準備生擒混填，混填張弓射箭，射穿了柳葉所乘船隻的船體，箭頭險些刺到柳葉的侍從。柳葉心生恐懼便投降了混填。混填見柳葉不穿衣服，便教她穿衣遮體。後來，他納柳葉為妻，助柳葉治國，逐漸成為扶南的真正掌權者。


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
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
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為
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
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
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
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
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
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
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
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
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
人患詔還之
北狄

《晉書》對扶南國的記述。

柳葉的故事廣為流傳，雖有神話色彩，但卻透露出很多可信的資訊：大約兩千年前的中南半島上，還盛行著母系氏族部落。部落間尚未形成統一的城邦概念。在扶南建國前，那一帶的海上航行已經初具規模，已經有了海航的跨國貿易。那時的人們篤信鬼神，已經有了神廟。弓箭是當時代表技術的戰爭武器。那時的很多部落不穿衣服，製作服裝是外來技術。那時的一些部落開始吸納其他文明，對其他地區來的人並無反感。那時已經有了不同部落、不同種族間的通婚。

但這段文字中最大的懸疑，就是混填這個「徼國」人到底來自何方。遺憾的是，在後世的文字中並無明確記載。經學者考證，推斷出三個方向的可能性，一是印度，二是受印度深刻影響的爪哇，三是中國。不管是哪裡，扶南文明從緣起開始，就通過航海方式容納吸收了外來文明。

混填死後，後代中一位叫作混盤況的國王把扶南做強做大。在混盤況少年的時候，有一次他聽說山林中有大象，便親往林中生擒大象，隨後將它馴化成坐騎。這段經歷讓他在少年時就英名遠揚，周邊諸國對他十分佩服。後來，他在周邊一些城邦中製造謠言，使各地部落之間生疑，不能形成合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分兵幾路，舉兵攻打，擴大了自己的地盤。

從今天的角度看，扶南從一千多年前就懂得資訊傳播的作用，通過某種資訊傳播方式，把其君主能在山林中生擒馴服大象的消息遠播四方，先形成一個讓人佩服的總體印象，而後使用離間計，降服了四方部落。史書記載，混盤況一直活到90多歲，然後把王位傳給了兒子盤盤，並且讓大將范蔓輔政。怎奈盤盤繼位三年後就死了，眾人擁護范蔓為王，混氏王朝覆滅，范氏王朝開啟。按《梁書》的記載，范蔓有勇有謀，進一步南征北伐，使周邊部落盡數降服於他，此後他自封扶南大王，開始攻打其他國家，一路打陸戰，一路打海戰，其勢力範圍迅速擴張，開闢了扶南國最鼎盛的時期。那是3世紀初的事情，正值中國的漢末三國時代。

南海上的兩洋三國外交

范氏王朝時期的扶南，勢力範圍達到中南半島大部分地區及馬來半島中部，實現了貫通兩洋的戰略通道地位。此時的范氏王朝，開始了東西兩側的兩洋航海外交，向西接近印度，向東接近中國，並成為中印兩大文明交會的重要驛站。

大約於225年至243年在位的范氏王朝三世王范旃，是范蔓的外甥，也是扶南王國最著名的外交高手。《水經注》援引康泰的《扶南傳》記載到，范旃在位時，有一位曾經去過天竺的嘾楊國（即林陽國）人輾轉到了扶南。他向范旃介紹說，天竺「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其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范旃聽了之後非常感慨，隨即派遣自己的親信蘇物從扶南乘船，沿著海岸線，行舟七千里，途經數十個國家，到了天竺。天竺當時的國王非常驚訝有人遠道而來，便令人領著蘇物巡視天竺，還賞賜寶馬、物資，派遣兩名印度使者送蘇物返回扶南。蘇物此行前後歷時4年。

就在遣使印度的同時，范旃也派人到中國來「獻樂」。

在古代南海文明中，獻樂是常見的一種外交方式。例如，最著名的「獻樂」故事是唐朝時驃國獻樂於長安。而中國的一些音樂也通過南海廣泛傳播到南海周邊各地，甚至到達印度、阿拉伯地區，最著名的是唐朝那首宮廷「交響曲」《秦王破陣樂》。樂曲，在當時，堪稱強國的一張國家名片。

《三國志．吳志》記載，243年農曆十二月，扶南國獻樂於吳。當時的吳主孫權隨即派遣朱應、康泰兩名官員回訪扶南。朱應、康泰在經由南海前往扶南過程中見聞上百個國家。回國後，朱應寫了《扶南異物志》，康泰寫了《吳時外國傳》。雖然兩部書都已佚失，但其中很多內容被轉錄在《南齊書》、《梁書》、《太平御覽》、《水經注》等書中，成為後世研究扶南的重要文獻。

范旃的東西外交，促成了印度和中國的使者訪問扶南。但可惜的是，兩國使者到達扶南時，范旃已被范蔓的長子范長所殺，范長又被范旃的大將范尋所殺，范尋成為范氏王朝的五世王。范尋基本延續了范旃的外交理念，與印度和中國交好，彼此間往來不斷，同時也習得不少中國和印度的文化風俗和宗教禮儀。而且，吳國的朱應、康泰在扶南與印度使者進行了深入交流，記錄下不少天竺等國的寶貴文字，成為漢晉時期瞭解古代印度的重要資料。

就這樣，印度、扶南、中國這三個當時在南海周邊的重要強國被聯繫在了一起。



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在扶南交會示意圖。

范尋之後的扶南，在中國古籍中出現了斷層，原因是晉王朝陷入長期動亂。中國史書再一次出現范氏王朝的詳細記錄，已是北宋時的《冊府元龜》。文中記載道，「升平元年（357年）春正月，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即扶南王天竺人旃檀向晉穆帝進獻馴化的大象。此時，已到范氏王朝最後一世王。從旃檀這一名字以及他的天竺身分可見，范氏族人已經丟失王權，王權已被印度人掌控。旃檀之後，扶南進入最後一個王朝，即極具印度色彩的跋摩王朝，又稱憍陳如王朝，從4世紀延續至6世紀中葉。

在跋摩王朝，扶南的國家制度、社會制度以印度制度為摹本被深刻改造，印度教和佛教大范圍興起。在吸收大量印度文化之後，扶南成為印度文化在南海西側大陸的重要傳播站。例如佛教，在南北朝時期從扶南傳入中國南方。扶南，當時是整個南海區域的佛教傳播中心。

在南朝蕭梁時期，首都建康的「扶南館」就是專門為扶南高僧翻譯佛經而設立的場所，曾有僧伽婆羅和曼陀羅等扶南高僧把《阿毗曇論》、《大育王經》、《解脫道論》、《般若經》等佛教經書翻譯成漢語。梁末陳初年間，也有扶南僧人須菩提在揚州翻譯了《大乘寶雲經》。同一時期，南朝也有一些僧人受官方指派前往扶南取經。

兼具早期南海文明興盛多要素

在南海地區早期發展過程中，曾出現多個繁榮中心，這些中心一般具備幾個特點：一是在地理方位上具有優勢，二是在航海技術方面具有領先地位，三是文化交流層面包容開放。扶南的強大，就是這三個特點的集中表現。

3世紀之後，扶南基本控制了連接東西方的早期貿易航線，建立起兩洋貿易通道。扶南的實際控制範圍，不僅囊括洞里薩湖和湄公河三角洲，而且控制了泰國灣、馬來半島狹長地帶，某些時期甚至控制麻六甲海峽。中印間的海上往來，不管是橫穿克拉地峽還是繞行麻六甲，都在扶南的壟斷之下。

漢代時，扶南與中國的通商主要依賴海洋。東漢的南海港口位於今天越南順化附近的盧容浦，而扶南的東部港口位於今天越南南部西岸的哥俄厄，兩港通商發達且成熟。扶南西部大港位於今天馬來西亞丹那沙林，當時叫作頓遜。中國古籍記載，頓遜港「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貨寶物無所不有」。另外，哥俄厄等港口還與羅馬帝國有貿易，那裡曾出土了不少2世紀羅馬帝國時期使用的金銀幣和錫器。在哥俄厄和頓遜東西兩大港口間，形成陸地貿易大通道，帶動了扶南的經濟發展。

另外，扶南占盡湄公河流域的沃土，據中國史書記載，那裡一年可種三季稻，「一歲種，三歲獲」。扶南還盛產金、銀、銅、錫等礦石，加上它發達的冶金技術，使當時的扶南「食器多以銀為之」。扶南的技術水準在當時的東南亞也是首屈一指的，特別是造船技術。朱應在《扶南異物志》中說，扶南人心靈手巧，與周邊國家不同。康泰在《吳時外國傳》中說，扶南人伐木造船，長可以達到12尋（大約30米），寬6尺（大約2米），部分結構用鐵加固，可搭載百人，非常堅固。

扶南的富庶，僅從中國古籍中的兩個故事即可見一斑。

一是《南齊書．扶南傳》中記，484年，扶南送給齊武帝的大批禮物中，黃金有2800斤。

二是《太平御覽．梁四公子記》中記載，劉宋文帝時扶南國商人從西天竺國帶來一面直徑一尺五寸、重四十斤的碧頗黎（玻璃）鏡。宋文帝問其價，商人稱值錢百萬貫。文帝讓官吏們算了下，結果是，即使把皇家內庫裡的錢全部拿出來也不夠付帳。

從3世紀至7世紀，扶南遣使中國30多次，幾乎每一次都把扶南國富民強的印象留在了漢文典籍中。

大航海時代跌宕起伏的真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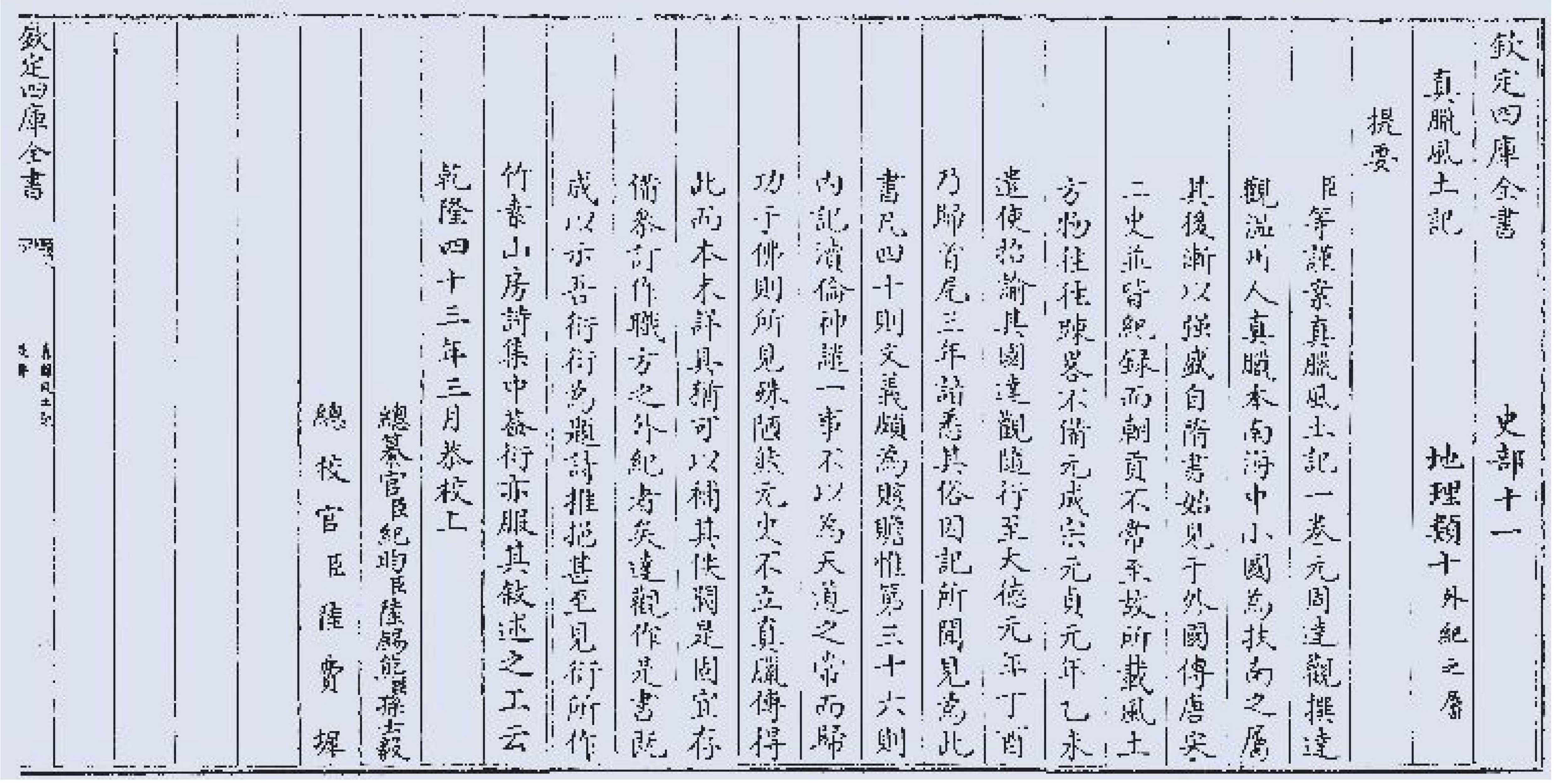
扶南在7世紀被曾是其屬國的真臘所滅。扶南滅亡後，唐朝在天寶元年（742年）改籠州（今廣西扶綏、崇左一帶）為扶南郡，按《舊唐書》的說法，是為了「遙取其名，非正扶南國也」。這也說明，繁榮的扶南在當時中國王朝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扶南衰敗的原因，一方面是在跋摩王朝後期，新的航海技術推動了麻六甲海峽、巽他海峽等地的昌隆，使扶南的大通道角色淡出歷史；另一方面是源自其內部的政治鬥爭和王位爭奪導致其控制力越來越弱。在扶南北方的真臘，6世紀中後期逐漸興起，擺脫了扶南的控制，並在7世紀徹底消滅扶南，成為中南半島上又一個霸主。

7世紀真臘吞併扶南後，不斷發生王宮權力爭奪，直到7世紀中葉，政局才相對穩定。但到了8世紀初，真臘南北分裂，南方成為水真臘，即今天柬埔寨大部分地區，北方成為陸真臘，即今天的老撾中部和南部。8世紀末，水、陸真臘被當時爪哇地區的室利佛逝所控制，成為其屬國。9世紀初，水、陸真臘擺脫室利佛逝的統治重新獲得獨立，並於802年建立了以吳哥為國都的吳哥王朝。此後，真臘從闍耶跋摩二世王到闍耶跋摩七世王，經過將近400年的發展，成為中南半島上的一個大帝國，又稱高棉帝國。高棉帝國極盛時期的版圖包括現今整個柬埔寨，以及泰國、老撾、緬甸及越南的部分地區。1430年，素可泰王國攻打吳哥，圍城7個月，第二年最終破城，吳哥王族逃入叢林深處，王朝覆滅。1434年，真臘復國，但因吳哥過於靠近素可泰控制地區，被迫遷都金邊，吳哥文明從此沒落。此後，中國人正式稱它為「柬埔寨」，史書中的「扶南」、「究不事」、「吉蔑」、「澉浦只」、「甘孛智」、「真臘」……皆成往事。

真臘由弱轉強、由興轉衰的過程，與南海文明的大背景不無關聯、雖然真臘在滅扶南後，延續了扶南的行政制度、自然信仰、文字語言等，但真臘與扶南所處的南海大歷史時期已經截然不同。7世紀的南海周邊已經進入一個航海技術普及、社會布局相對固定的時期，各國自然資源類似，發展相對平衡，往來頻繁密切，超級大國再難出現，弱肉強食現象明顯。因此，真臘國存在的幾百年，分分合合、戰爭不斷，整個王朝猶如坐霄霄飛車一般，跌宕起伏。

東埔寨歷代王朝，與中國的吳、晉、南朝、隋、唐、宋、元、明諸王朝，都保持著友好關係。因此，扶南、真臘等柬埔寨的古國名，頻繁出現在《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隋書》、《南史》、《新唐書》、《宋史》等正史中。除此之外，康泰的《吳時外國傳》、《扶南土俗傳》、朱應的《扶南異物志》以及劉宋時的《扶南記》等，均算是描寫扶南的專著，但幾乎都已失傳，僅散見於其他史料。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真臘風土記　地理類十外紀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真臘風土記一卷元周達觀撰達
觀溫州人真臘本南海中小國為扶南之屬
其後漸以強盛自隋書始見于外國傳唐宋
二史並皆紀録而朝貢不常至故所載風土
方物往往疎畧不備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
遣使招諭其國達觀隨行至大德元年丁酉
乃歸首尾三年諳悉其俗因記所聞見為此
書凡四十則文義頗為賅贍惟第三十六則
內記濁倫神誕一事不以為天道之常而歸
功于佛則所見殊陋然元史不立真臘傳得
此而本末詳具猶可以補其佚闕是固宜存
備叅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達觀作是書既
成以示吾衍衍為題詩推挹甚至見衍所作
竹素山房詩集中蓋衍亦服其敘述之工云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紀曉嵐等人在四庫全書中為《真臘風土記》撰寫的提要。

但有一本描寫古代柬埔寨的書，完整保存至今，即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全書8500字，幾乎完整地復原了真臘後期吳哥王朝的真實風貌，不僅成為包括柬埔寨在內的後世各國研究真臘的珍貴實錄，而且也直接成為後人重新發現吳哥文明的引子。

19世紀法國入侵中南半島後，真實描寫13世紀真臘及周邊國家風物民俗的《真臘風土記》成為西方人眼中的寶物。1819年法國人把《真臘風土記》譯成法文，隨後又有諸多箋注和補注本出現。

後來，從這些譯本、補注本中找到「靈感」的一些歐洲所謂探險家、旅行家和傳教士鑽入柬埔寨叢林，尋找吳哥文明。1861年，尋找熱帶動物標本的法國生物學家亨利．穆奥在叢林中邂逅了吳哥宏偉驚人的古廟遺跡，揭開了吳哥窟的面紗。他評價吳哥文明「遠勝古希臘、古羅馬遺留給我們的一切」，「走出吳哥，猶如從燦爛的文明墮入蠻荒」。

那個盛極一時的吳哥王朝，在戰爭中湮滅。當它重新站在世人面前時，唯有《真臘風土記》才能透過它滄桑的面容講述它前世的繁華。

1279年，忽必烈滅南宋，統一中國。為向南方諸國昭示力量，元世祖派人前往干不昔國，即柬埔寨。1295年，元成宗再次遣使真臘，地理學家周達觀成為使團成員之一。按他自己的記述，1295年農曆六月得到詔令後，他於次年農曆三月二十四日從溫州啟航，經福州、泉州、廣州、瓊州諸港，過西沙群島，到湄公河口後沿湄公河而上，中途遇到逆風，直到農曆七月才進入真臘屬境，然後渡過洞里薩湖，這才抵達真臘首都吳哥。周達觀在吳哥逗留大約一年時間，對真臘尤其是吳哥城的自然環境、資源物產、政治制度、經濟狀況、宮廷建築、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進行了全面考察。1297年農曆六月，周達觀返回浙江，撰寫了共計四十一章的《真臘風土記》。

今天再讀《真臘風土記》，從不同角度，可挖掘出不同的有價值資訊。例如，它對吳哥城郭建築的描寫，成為古代建築史研究的重要素材，也是今人比對吳哥窟遺跡進行模擬復原的重要「圖紙」。它對社會信仰、民俗民風的描述，是研究整個中南半島在那個時期宗教風貌及信徒生態的第一手資料。如果從南海文明的許多元素來看，《真臘風土記》更是準確還原了那個大航海時代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

周達觀在書的「總敘」一篇中總結了當時南海航行的障礙和難點。他說，在海上航行，最難的事情是尋找港口。他在前往真臘途中，曾沿海岸線尋找船隻可以進入的港口，途經幾十個港口都是淺灘，大型舟船無法進入。即便是經驗豐富的老船員，在南海上航行時也需要仔細辨認各個港口，因為它們的模樣都差不多：白色的蘆葦，黃色的沙灘以及岸邊的古藤老樹。

周達觀在書中詳細介紹了真臘乃至周邊古國的豐富物產、時令氣候和奇特資源。他還用比較的方法，橫向比較了中國與真臘的種植技術、種植方法和施肥情況。他寫到，真臘盛產水稻，一年能收三至四季稻，因為那裡一年四季都炎熱，沒有霜雪天。那裡只有兩個季節，半年下雨，半年乾旱。從四月到九月，每天都下雨，而且都是午後下。當地人依據水位高低判斷何時播種水稻。有一種特殊的水稻，可以種在淹沒水稻的深水裡。真臘人也有十二生肖，與中國相同。另外，真臘的茄樹可存活多年不枯萎；木棉花樹高可過屋；鱷魚像船那麼大；有地方的蝦重達一斤以上。

周達觀詳細描述了中南半島許多民族的生活風俗習慣，還原了那個時期南海文明在中南半島的共同特點與差異性。他記錄到，真臘有很多牛，但當地人不用牛耕地，而用牛拉車。真臘人不論土地是否膏腴都不上糞，他們認為這樣的種植方法不乾淨。中國人到真臘，都不敢說農耕上糞的事，怕他們笑話。當地每兩三家共掘一糞坑，等到長滿草就填平，再選地方另掘糞坑。當地人上廁所不用手紙，而是到水池洗淨糞門。洗時只用左手洗，因為右手是用來盛飯的。真臘人見中國人如廁都用紙擦屁股，他們認為這是很滑稽的事情，還不讓他們登門。真臘有些婦女是站著小解的。真臘人的主食是大米。吃飯時，當地人用中國瓦盤或銅盤盛飯，用錫器或石器盛水放在一邊，用手抓飯後，蘸水洗淨黏在手指上的飯米粒。這一習俗，直至今日在柬埔寨、老撾一帶還很普遍。書中還一一敘述了釀酒、製鹽、織布、造船等生產活動的詳細情況，有些傳統技術一直到今天還在同一地區使用。另外，書中還細緻描述了真臘節日送水節的場景。送水節至今都是柬埔寨最重要的節日。周達觀在「服飾」一篇中詳細記載了真臘人、占城人、暹羅人穿衣服的習慣以及不同產地布匹的品質。在真臘，只有國主能穿純花的布，王公大臣可以穿花色不太密的布，當官的人只能穿有花邊的布。剛從中國來的人雖然穿花布，國王也不怪罪，因為不知者不罪。

《真臘風土記》對真臘的社會政治情況、建築藝術、曆時制度、訴訟程序、語言辭彙等一一詳細介紹，還花費相當筆墨記載了真臘與當時南海諸國的交往情況。其中，真臘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尤為詳盡。事實上，從南宋起就有不少中國人前往真臘，他們中大多數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帶迫於生計的百姓，他們駕船南遷，經南海到達真臘後登陸。周達觀在「流寓」篇中給出了這些中國人樂於遷居真臘的原因：在真臘謀生，不需要儲備太多的衣服，這裡的糧食非常豐足，價格相當便宜，媳婦容易找，買地蓋房更是用不了幾個錢，生活用具也很簡單，更重要的是在真臘做買賣利潤非常豐厚。所以有很多中國人都跑到真臘來。

談到做生意，周達觀在「貿易」篇中寫道，真臘人做生意的一般都是婦女。所以中國人到了真臘，總是先找一個女子作幫手，因為她們會打點生意。每天都有集市，從卯時開始午時結束，沒有鋪面，只用席子鋪在地上，貨物擺在席上，每人的席位都是固定的。聽說有稅官收稅，小買賣的稅金就是稻米，或者是一些中國貨，有點規模的生意就用布匹充稅。大買賣的稅就直接以金銀繳納。過去真臘人十分淳樸，見到中國人都很敬畏，稱中國人有佛心，一見中國人就伏地膜拜。後來也出現欺騙中國人的現象，主要是到真臘做生意的中國人越來越多的緣故。

周達觀不僅記錄了真臘的特產，還記錄下當地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他寫道，中國人的金銀器被當地人視為最珍貴的東西，五顏六色的絲織品也很受歡迎。其他暢銷的中國商品包括：真州的錫鑞、溫州的漆盤、泉州的青瓷，還有水銀、銀朱、紙劄、硫黃、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硃、桐油、篦箕、木梳和針。真臘人還很想得到菽麥，可惜當地水土不適宜種植……



吳哥文明用「隱於野」的方式躲過了東南亞大殖民時期。黃碧盈攝

對古人而言，不消親往，只需讀一遍《真臘風土記》，就如同置身那片異域文明中。

周達觀訪問時的那個真臘，正值鼎盛。周達觀離開130多年後，吳哥城陷落在與暹羅人的戰爭中，從此遠離人類文明與硝煙，藏身於青藤綠樹之間，亦幻亦真四百餘年。吳哥文明，與暹羅灣文明、滿剌加文明、室利佛逝文明、蘇門答臘文明一樣，同為南海文明一個特定時期的重要代表。但是，吳哥文明戲劇性地以戰爭收篇，並選擇了「隱於野」的結局，在把一個時代的文明封存在歷史角落裡的同時，也幸運地躲開了16世紀以來西方大殖民給東南亞造成的諸般苦難。更大的福報是，南海大文明造就了繁榮的人文交往，造就《真臘風土記》這樣的歷史寫真。它讓吳哥文明的臺詞，變得那樣真切與真實。

殖民者是不具備那樣的功力的。無論亨利．穆奧如何窮盡辭藻地讚美吳哥，那只是掠奪者企圖吞噬南海文明前一貫的涎水。

03 驃國和蒲甘，南海邊的陸海通衢

驃國與蒲甘，位於中南半島西部，存在於不同時期，是今日緬甸輝煌的過去。關於兩國歷史的本國文字雖然不多，但在大量的中國史料中，驃國與蒲甘時代的緬甸人務農重穀，貿易興盛，歲無饑寒之憂。

驃國與蒲甘之所以被描繪成樂土，與兩條跨地區的交通要道密不可分：一條是旱路「蜀—身毒道」，從四川成都經雲南大理、保山、德宏進入緬甸再通往印度；另一條是海路，由中國南方出海，經南海進入暹羅灣，橫穿馬來半島狹長地帶，進入印度洋。

兩條交通線路相輔相成，成為連接中國、南海諸國、印度乃至羅馬帝國的古代人文、貿易交流大通道。

陸海雙通道之交會

驃國這一稱謂最早出現在中國秦漢史籍中，當時驃國雖稱國，實質上卻是百餘個鬆散部落的統稱，中國史書大多「分而志之」，有剽、僄、縹、漂越等不同的譯法。秦漢時代，驃國境域就已出現不少中國商人。

時人對於驃國的印象記載於描繪漢代異域風土的《史記．大宛列傳》中。有部落「名曰滇越」，在今中緬邊境南側，部落居民騎乘大象，多有四川「倒騰買賣」的商人，「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漢代時,這些商人的商品不僅在驃國域內各部落間流通，有些還流向中亞和印度地區，如蜀錦和竹杖。

《史記．西南夷列傳》寫到，西漢著名外交家張騫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境內的西域古國）時，見到四川商品，便上前詢問是從何處購得，回答道：「從東南身毒國（今印度境內），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今中國西昌地區）可二千里有身毒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史記．大宛列傳》也記述道：「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遠。」

通過這些記述，可以看到早在西元紀年之前，中、緬、印三國之間就已經形成暢通的陸路通道。幾乎是同一時期，聯通這些地區的海路交通也出現了。



蜀－身毒道示意圖。

《漢書．地理志》記載，從雷州半島（今廣東徐聞、廣西合浦）航海到印度的黃支國（今康契普拉姆）要經過都元國、邑盧沒國、諶離國和夫甘都盧國。其中諶離國和夫甘都盧國，一般考證都認為在今緬甸南部沿海一帶。

在陸路跋涉、海陸航行的商人行囊中，裝了些什麼奇珍異寶呢？史料記載，比較受歡迎的商品包括琥珀、玉石和海貝，不過堪稱最馳名遠銷的，恐怕是中國的「拳頭產品」——蜀錦。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張騫在大夏「見蜀布」，直接證明了當時四川的產品，已經被翻山越嶺運至阿富汗。史學家認為，中國絲綢最晚在西元前4世紀已經傳至印度，比張騫這段記載還要早幾百年。

一些史學家認為，在中國的三國爭雄時期，蜀國諸葛亮屢次征伐曹魏，軍資頗巨，為換取外匯以充軍用，措施之一就是發動蜀人廣植桑樹，以蜀錦為出口產品。諸葛亮曾說，「今國困民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

一些蜀錦通過孫吳的海船「出口」，銷往南海各國。也通過「南蠻」孟獲治下的永昌郡，進入驃國轉銷。最終到達歐洲的這些絲綢，價格不菲，被歐洲人視為珍品。

蜀錦的這兩條銷路，正是後來史學界所稱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的一部分。憑藉兩條商路的滋潤與哺育，昔日「南蠻」出沒的永昌郡成為中國西南通往海上的重鎮。到了唐朝，《舊唐書》寫道：「漢置永昌郡，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缺。」

羅馬雜耍進洛陽

有一段關於撣國（今緬甸東北部）的記載，一直被歷史愛好者津津樂道，因為這個故事把漢朝與羅馬這兩個當時世界兩大帝國聯繫在了一起。

漢朝時，中國稱今天的緬甸為撣國，到了唐朝，稱之為驃國。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記載，西元120年，撣國國王雍由調派使臣前往漢都洛陽朝賀，用本地的物產犀牛、大象和珍寶換取漢朝回贈的金銀。

雍由調帶來的節目驚奇，讓史官多留筆墨。節目除了歌舞以外，還有「幻人」表演，相當於今天的魔術和雜技。

這些魔術師施展神通，「能變化吐火，自支（肢）解，易牛馬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魔術師作自我介紹時，說來自「大秦」。有歷史學家考證，中國古籍中所載的「大秦」是對羅馬帝國的統稱，不過當時羅馬帝國版圖很大，包括西亞和北非。雍由調在位時期的大秦，可能是指羅馬帝國統治之下的埃及亞歷山大及附近地區。《後漢書．西域傳》曾寫道，大秦國又名「犁鞬」，可能是亞歷山大的譯音。

從北非跨越西亞到達南亞，再輾轉進入中原的洛陽，這次異國演出是如何實現的呢？大多數中國史學家認為，羅馬藝人是航海而來。按中國史書的記載，在西漢時期，已經有溝通東方和西方的成熟海路交通。撣國是古代兩條重要航線即大秦航線與南海航線的連結點。

從東方往西方去，很多航海者從中國東南沿海一帶進入南海沿岸航行，經番禺、雷州半島、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大部分及附近地區），直至馬來半島或蘇門答臘島，經過緬南沿海群落，走向印度洋。

從西方往東方來，印度、阿拉伯和埃及的船舶當時已經活躍於印度洋上。埃及商船從紅海南下，跨越曼德海峽，沿阿拉伯海岸向東航行，到達印度。西元1世紀左右，不少航海者已經發現了印度洋季風的規律。埃及商船出曼德海峽後，利用每年4月至10月的西南季風，直駛印度南部海岸，再借11月至次年3月的東北季風由印度返航。



漢朝與大秦（羅馬帝國）的水陸通道示意圖。

以南亞的緬甸為中間站，撣國引薦魔術師的旅行線路東段和西段便更加清晰。

三國《魏略》則更加明確地描述了這段由西方前往東方的路線。

大秦國，既從海北陸路，又循南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沿伊洛瓦底江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意思是，羅馬帝國經陸路可到達西域，然後沿伊洛瓦底江最終到達益州永昌郡，所以永昌那裡新奇的對象很多。如果從海上，則可以航行到南海，與交趾等南海諸國接觸。

希臘航海者的《愛利脫利亞海周遊記》也寫道：「過克利斯國抵支那國（中國）後，海乃止。」英國人後來考證，克利斯國在今天緬甸的勃固地區。

南海古代匯市的縮影

唐代後期至宋代，緬甸建立起蒲甘王朝。同驃國一樣，蒲甘王朝同樣受到南海和西南陸路兩條商路的滋養，商業繁榮。

由於經商、生活容易，大量南海商人前往定居。史料中有種說法，「販其地者十去九不還」。蒲甘的外來移民中，不少是中國人。按史料描述，蒲甘經商容易，是因為有互利的貿易規則，度量衡、貨幣等通用性強，換算方便。

元代航海家汪大淵所著《島夷志略》記載，緬甸南部的沿海城市針路（今馬來半島北部西岸的丹老）、淡邈（一說為今緬甸東南岸的土瓦）、八都馬（今緬甸馬達班）、烏爹（今緬甸勃固）等地，有很多中國海船。中國人以絲綢、瓷器、樂器、金銀、銅鐵去換取緬甸當地的象牙、胡椒、稻米。記載說，八都馬所產象牙「重者百餘斤，輕者七八十斤」，為中國商人所喜愛，是回國製成牙雕的珍貴原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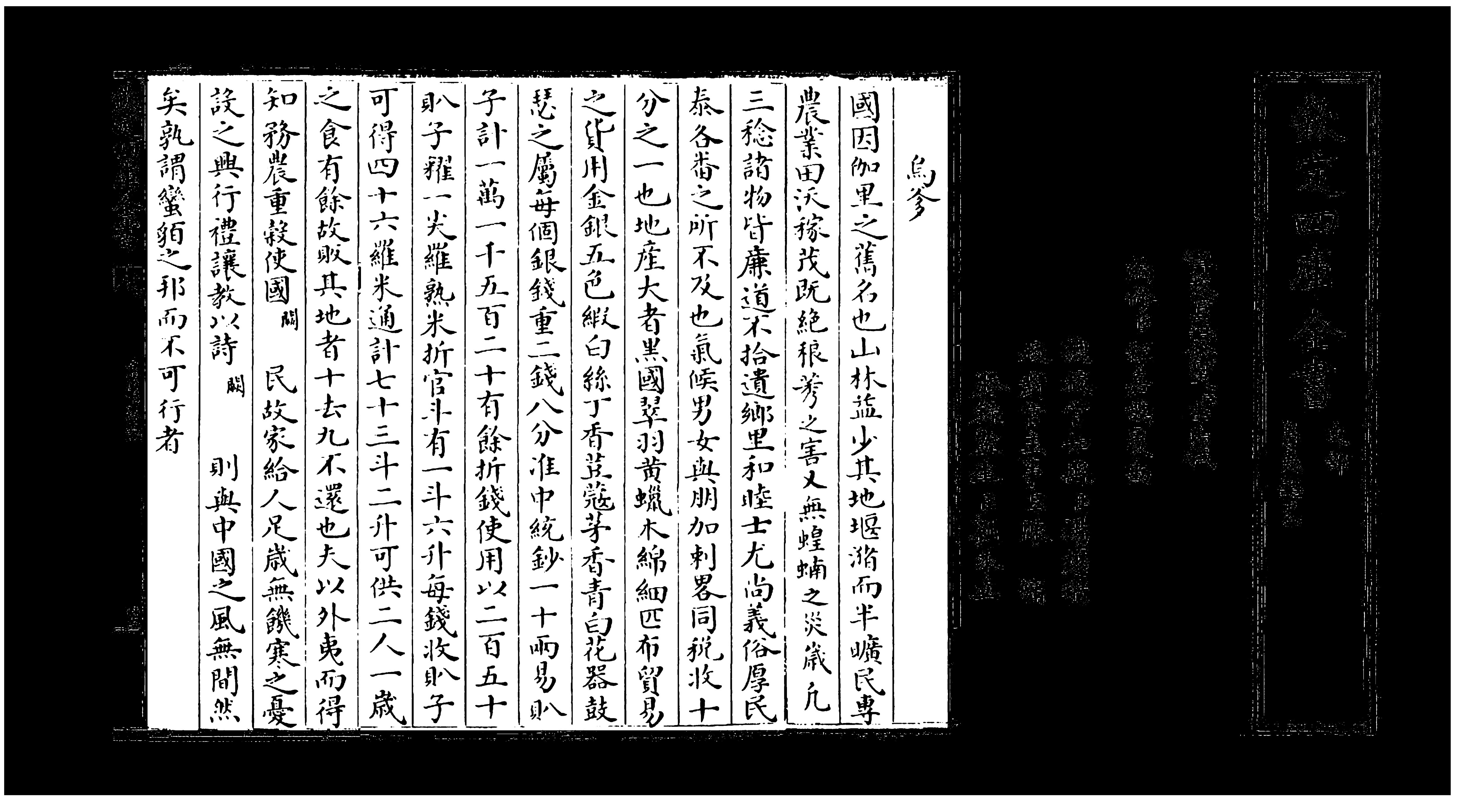
更有意思的是，在元朝時緬甸烏爹等商業發達地區，因各國貨幣流通之盛，匯率制度已經相當成熟，成為南海國際貿易繁榮的寫照。元朝當時有一種紙幣叫作「中統元寶交鈔」，簡稱中統鈔，在緬甸當地可以直接流通。

元代汪大淵在《島夷志略》「烏爹」條中記錄到：

每個銀錢重二錢八分，準中統鈔一十兩，易蚆子計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有餘，折錢使用。以二百五十蚆子糴一尖籮熟米，折官斗有一斗六升。每錢收蚆子，可得四十六籮米，通計七十三斗二升，可供二人一歲之食有餘。故販其地者，十去九不還也。

汪大淵所說的「蚆子」，是當時在蒲甘、暹羅、羅斛使用的一種貝殼貨幣。這段文字一方面記錄了當時在緬甸一些地區的貨幣匯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元朝的中統鈔在當地十分堅挺，可以比在中國換出更多的糧食。這種貿易貨幣不僅在當地使用，同樣傳入了雲南一帶。《馬可．波羅遊記》記載，海貝貨幣單位不是十進位，而採用了一種奇特的「四四五」進位：「以一分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後漢書．西南夷》中也有相關記載。從雲南出土的墓葬中，海貝有穿孔，以「索」為單位。

汪大淵在書中感嘆，當地人因為貿易繁榮而衣食無憂，如果再加強看書學習，就和中國沒有什麼差異。


欽定四庫全書

烏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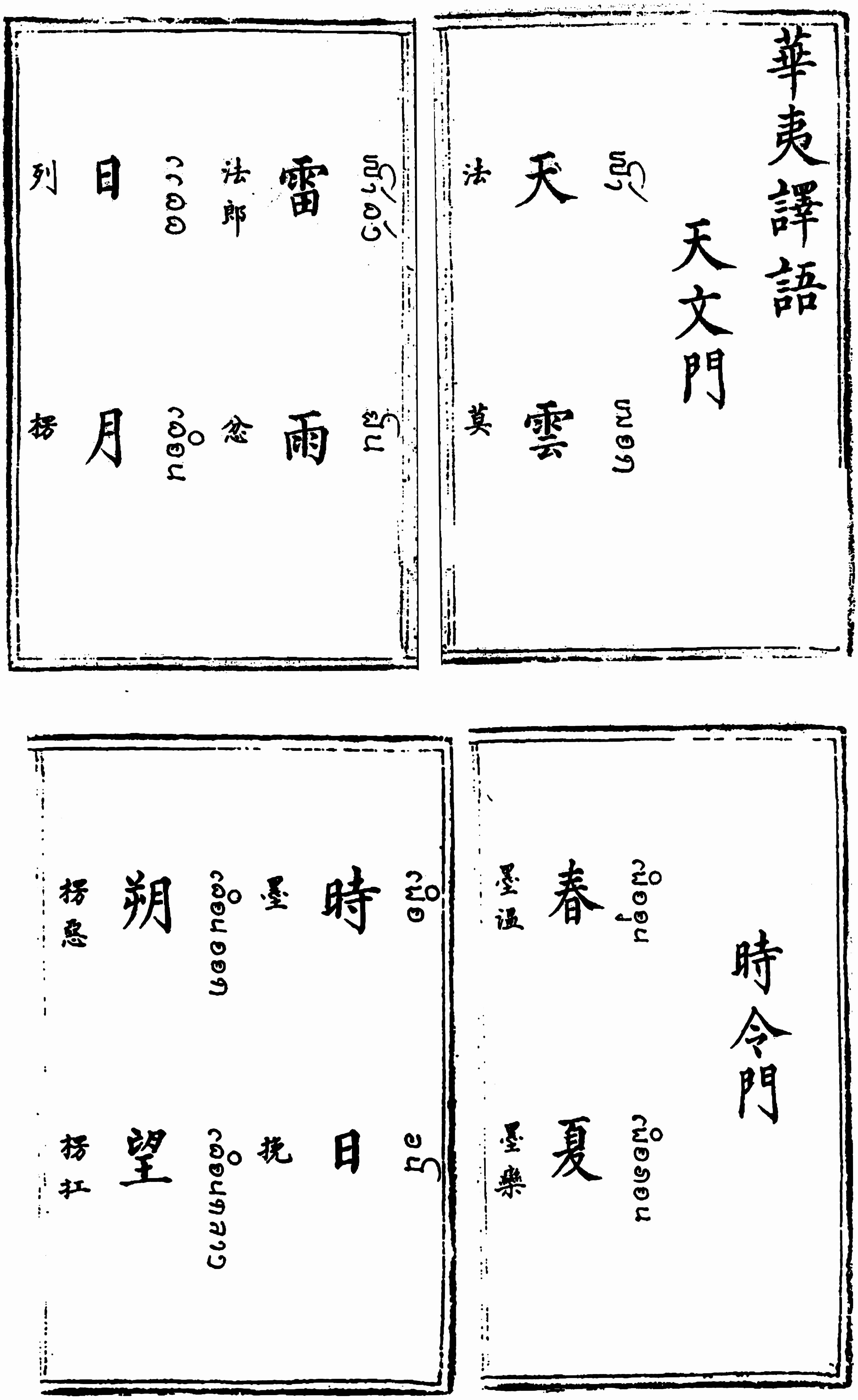
國因伽里之舊名也山林益少其地堰瀦而半曠民專農業田沃稼茂既絕稂莠之害又無蝗蝻之災歲凡三稔諸物皆廉道不拾遺鄉里和睦士尤尚義俗厚民泰各番之所不及也氣候男女與朋加剌畧同稅收十分之一也地産大者黒國翠羽黄蠟木綿細匹布貿易之貨用金銀五色緞白絲丁香荳蔻茅香青白花器鼓瑟之屬每個銀錢重二錢八分准中統鈔一十兩易𧴩子計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有餘折錢使用以二百五十𧴩子糴一尖籮熟米折官斗有一斗六升每錢收𧴩子可得四十六籮米通計七十三斗二升可供二人一歲之食有餘故販其地者十去九不還也夫以外夷而得知務農重穀使國闕 民故家給人足歲無饑寒之憂設之興行禮讓教以詩闕 則與中國之風無間然矣孰謂蠻貊之邦而不可行者

《島夷志略》中的烏爹條。

不少中國人留居當地，與當地人通婚繁衍，融合產生了新的語言與文化。至今，緬文中有許多漢語外來詞。如：筷子、豆腐、油炸鬼（油條）、荔枝、唐舡（帆船）、艙舷……

華人越來越多，中緬雙方的官方交往也越來越多。

在緬甸的不少華人在緬甸擔任官方翻譯。例如，1504年，緬王遣使來華，就由旅居緬甸的華人李瓚擔任通事，即翻譯官。



圖為《華夷譯語》中的暹羅語互譯。

明永樂年間，因南海諸國到訪使團很多，明朝廷意識到外語人才的短缺，便開設四夷館，相當於「外國語學院」，專司外語教學。四夷館首批專業就包含緬文，其他語種還包括韃靼、女直（即女真）、西番、回回、百夷和高昌等。

明正統年間，緬甸訪華使團中的當丙、雲清等6人還留在四夷館任教。這也是中國聘請緬籍教師來華的開始。他們為中國培養了不少翻譯人才，後來在中國去世。

在明朝四夷館中緬甸館任教的緬人教師，前後有29人。緬甸館還有「父死子繼」的慣例。如緬甸教師夏鳳朝病故，他的兒子夏繼恩獲批成為緬甸館的繼業生。據記載，有名有姓的繼業生先後有10人。

入館學習的學生分班由教師帶領學習。由於明朝廷設立四夷館主要是為了「習譯夷字以通朝貢」，因此，學生的專業課也主要圍繞這一目標進行。三門主要課程分別是譯寫來文、回答敕諭和翻譯雜字。在老師教學和學生學

習過程中，三門課程各出現《譯語》、《來文》、《雜字》三個系列的多語種教科書，合稱為《華夷譯語》，並一直延續到清朝。其中，《華夷譯語》第二編「緬甸譯語」是最早的一部漢緬翻譯辭典類工具書。

互為影響的佛教文化

商貿增進了往來，語言促進了溝通，宗教文化則隨之交會融合。很多人認為，佛教自古印度而來，自西向東傳播。但事實上，有很多中國僧人在赴印度求取真經後，也向南海周邊諸國傳播佛教，使得佛教文化在南海區域文明中不斷碰撞、融合與演進。

史籍記載，1世紀時，印度著名高僧攝摩騰（又譯「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取道驃國，溯伊洛瓦底江而上來到中國。《高僧傳》認為，這可能是印度僧侶首次進入中國。他們在中國翻譯5部佛經，其中，目前僅存的《四十二章經》被認為是漢譯佛典中最早的一部。有學者認為，中國最早的佛教傳播就是始於「蜀—身毒道」。四川彭山、樂山的三處東漢崖墓裡發現的有佛像特徵的雕塑作品，許多具有印度西北部犍陀羅早期佛像的特徵。

魏晉南北朝時期，沿海路、陸路進入中國的古印度僧人就更多了。不少僧人從獅子國（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和印度，通過緬甸，來中國弘法。如5世紀中葉，著名高僧佛音從獅子國到下緬甸，即緬南孟人地區傳教。他在緬甸常駐後，派弟子跋羅前往中國弘法。6世紀中葉，印度著名的高僧拘那羅陀（漢名「真諦」）也是經過下緬甸的德林達依來到中國。緬甸考古學家杜生浩認為，在11世紀前，訪問中國的印度僧侶和訪問印度的中國僧侶大多途經緬甸，往往經過勃生和八莫。

唐代高僧義淨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記載，在印度笈多王朝時，曾有中國僧侶20多人，沿西南絲綢之路經緬甸到達印度，印度國王為此還建造了一個支那寺，供中國僧侶停歇。

另據史料記載，唐代高僧智岸、義輝和義朗等人曾航行南海，途徑下緬甸的郎迦戍（即狼牙修國）學經，受到當地國王的禮遇。最後，智岸和義輝一直留在當地直至圓寂。

佛教傳入中國後，在中原經歷中華文化的碰撞、變化，又向周邊發散。特別是大乘佛教，從中國傳回蒲甘王朝並留下不少遺跡。蒲甘寺廟中有大量的大乘佛教的文殊、普賢和觀音像，另外，大乘佛教「普度眾生」的說法也被蒲甘王朝的國王所接受，1084年至1113年統治緬甸的江喜陀就自稱為「要拯救芸芸眾生的菩薩」。

有緬甸學者認為，在緬甸的歷史上，曾出現過這樣的畫面：中國僧侶在緬甸用中文講經布道，與此同時，印度僧侶用梵文傳播佛教。由於中國王朝對緬甸的影響力更大，所以當時中國僧侶更有優勢，他們的傳教相對印度僧侶更成功。

大乘佛教之所以後來在緬甸沒有廣泛傳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885年，英國佔領全緬甸，次年英國把緬甸劃歸為英屬印度的一個邦來統治。在殖民統治期間，英國人有意淡化了緬甸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聯繫。也正是因為殖民因素，使南海文明發展到近現代，出現了一個相對原生文明較為割裂的形態。

04 渤泥，南海南緣的南大門

渤泥國，是古代南海諸國中一個並不起眼的小國。漢代時，幾乎沒有船隻在渤泥停泊的記載。甚至可以說，在唐朝之前，中國文獻中幾乎沒有關於渤泥的記載。

但渤泥，之於唐宋之後的南海文明，卻發揮著極為重要作用和影響。研究渤泥的歷史，一方面，可以精確發現古代南海航海的重要支點，以及由這種支點功能帶來的技術革新走勢、宗教傳播路線和移民流動方向；另一方面，從渤泥與爪哇（今爪哇島）、婆羅（今蘇門答臘島北部）、蘇祿（今菲律賓南部諸島）等國以及中國的外交事件中，不僅可以發現當時南海文明中的國際關係、外交技巧與政治智慧，更可以聯想到今天東南亞國家擅用的「大國平衡術」。

文明傳承中最深一層，莫過於此。

南海最南的島嶼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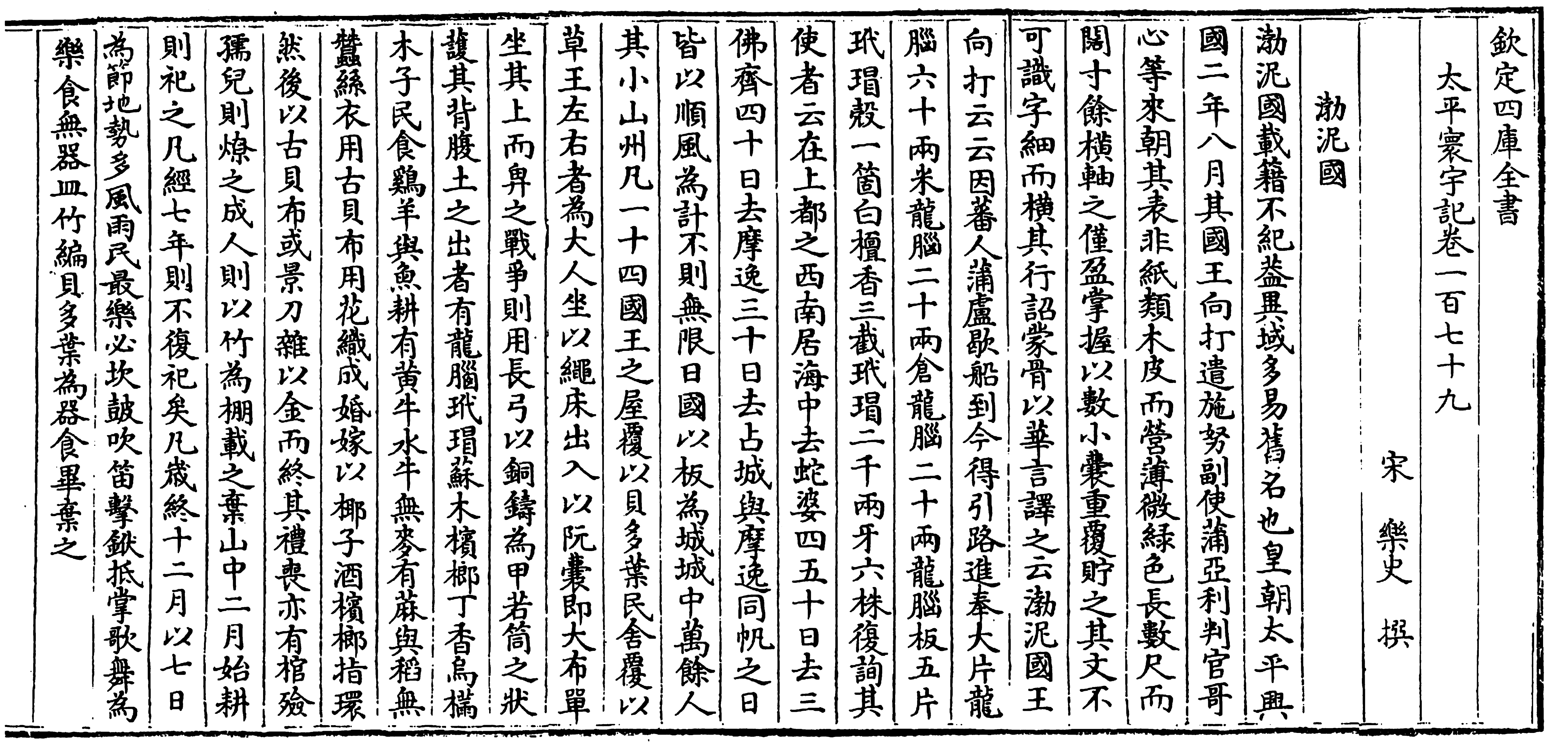
渤泥國是在古籍中頻繁出現的一個東南亞古國名，又作勃泥、浡泥、渤黎，一般認為在今天的加里曼丹島。如果再細緻地進行地理定位，就會出現至少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Brunei的譯音，專指加里曼丹島北部汶萊一帶；一種認為是Bornei的譯音，即加里曼丹島的舊稱婆羅洲。明代《東西洋考》等書把渤泥混同於另一個東南亞古國大泥，明顯存在誤解。後人已考證大泥實為今天泰國南部北大年（Pattani）一帶。

中國人對渤泥有著最早和最為明晰的地理方位表述。北宋時期《太平寰宇記》第一百七十九卷單獨闢出《渤泥國》一篇，記述了由南海諸國前往渤泥的路線圖：

其（指渤泥國）使者云，在上都之西南，居海中，去蛇婆（一作闍婆，今印尼爪哇島）四五十日，去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四十日，去摩逸（今菲律賓呂宋島或民都洛島）三十日，去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與摩逸同帆之日，皆以順風為計，不則無限日。

這段文字給出了關於宋朝時南海相關情況的大量資訊。

首先，關於渤泥的方位是由渤泥國的來使述說的，說明在宋朝以前就有渤泥使臣訪華。其次，這段文字把渤泥與周邊幾個重要古國的距離以順風時的航程時間表達出來，可推斷渤泥位於今天的爪哇、蘇門答臘、越南和菲律賓之間，其中，渤泥與越南中南部以及菲律賓呂宋島或民都洛島之間基本等距且較近，距蘇門答臘略遠三分之一航程，距爪哇最遠。由此，可推斷出渤泥的大致方位位於今天的加里曼丹島北部地方。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十九
宋 樂史 撰
渤泥國
渤泥國載籍不紀葢異域多易舊名也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八月其國王向打遣施努副使蒲亞利判官哥心等來朝其表非紙類木皮而薄瑩微綠色長數尺而闊寸餘横軸之僅盈掌握以數小囊重覆貯之其文不可識字細而横其行詔蒙骨以華言譯之云渤泥國王向打云云因蕃人蒲盧歇船到今得引路進奉大片龍腦六十兩米龍腦二十兩倉龍腦二十兩龍腦板五片玳瑁殻一箇白檀香三截玳瑁二千兩牙六株復詢其使者云在上都之西南居海中去蛇婆四五十日去三佛齊四十日去摩逸三十日去占城與摩逸同帆之日皆以順風為計不則無限日國以板為城城中萬餘人其小山州凡一十四國王之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王左右者為大人坐以繩床出入以阮囊即大布單坐其上而舁之戰爭則用長弓以銅鑄為甲若筒之狀護其背腹土之出者有龍腦玳瑁蘇木檳榔丁香烏樠木子民食鷄羊與魚耕有黄牛水牛無麥有蔴與稻無蠶絲衣用古貝布用花織成婚嫁以椰子酒檳榔指環然後以古貝布或景刀雜以金而終其禮喪亦有棺殮孺兒則燎之成人則以竹為棚載之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凡經七年則不復祀矣凡歲終十二月以七日為節地勢多風雨民最樂必坎鼓吹笛擊鈸抵掌歌舞為樂食無器皿竹編貝多葉為器食畢棄之

《太平寰宇記》中的渤泥國條。

再有，關於耗費時日的記述，基本可推斷，在那個時代，遠洋帆船順風時的航速可達日行40公里至50公里。最後，「皆以順風為計，不則無限日」說明，那時的南海航行，辨風航行至關重要，否則可能永遠到不了目的地。從另一個角度也說明，雖然中國史書記載，早在三國時期中國就有了可逆風行船的帆船技術，唐朝時更是有了可逆風行駛的帆船設計圖，但至少在宋朝以前的南海上，逆風行船技術還沒有普及。

需要澄清的是，雖然渤泥常被人注解為汶萊，但在宋朝時，它的領土面積要遠遠比今天的汶萊廣闊。到了16世紀，也就是渤泥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它不僅囊括了加里曼丹島的大部分地區，而且還控制了今天菲律賓南部的部分島嶼。

不管怎樣，《太平寰宇記》中這區區幾十個字已明確了渤泥國的地理定位——它正是位於南海南緣的那片土地，與中國的海南島隔海相望。同時，渤泥又地處爪哇島、蘇門答臘島、馬來半島、菲律賓群島之間的中央位置。因此，渤泥可謂是南海之南、東南亞島群的中心。

這一地理位置，使渤泥成為南海的南方要衝，成為貫穿南海南北航線的南方登陸第一站，成為南海文明的南方重要門戶。這一特性，深刻影響了渤泥國的政治、經濟、宗教等多方位演化與演進。

一塊墓碑與南海人口大流動

1972年，汶萊博物館在一片馬來人的墳山中發現了一塊古代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

蒲公是誰？為何在汶萊出現了他的墓？墓碑為何又會立在馬來人的墳山中？

十個漢字，觸發了大範圍、大縱深的考證和考據，揭開了一段有關南海文明大交會的歷史片段。

從字面上看，這位蒲公是宋代泉州的一名判院。

泉州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點之一，是海外客商旅居中國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蒲姓，是泉州歷史上最為常見的阿拉伯人的姓，例如，宋朝時泉州最有名的阿拉伯商人蒲開宗、蒲壽晟、蒲壽庚等，都是在地方誌中有明確記載的人物。蒲氏的先世是阿拉伯（色目）商人，信仰伊斯蘭教，為開展香料船舶貿易，曾寓居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宋代時大批來華，多居住在廣州和泉州。

但在汶萊發現的墓碑上的「蒲公」，已經被很多學者用排除法排除了是蒲開宗、蒲壽晟、蒲壽庚等人。不過，很多學者的考證認為，墓主人一定是旅居泉州的阿拉伯人，而且為回教徒。墓主生前官職是泉州判官，而有墓在汶萊，可見此人或其祖上一定兼營海舶，子孫則在汶萊。從墓碑上沒有名諱這一點來看，墓主人可能死在泉州，墓碑是由後來留居渤泥的後人所立，以垂紀念。有學者推斷，墓主人可能是大食國人（古代指阿拉伯、波斯人）。

這就說明，宋朝時的南海上，阿拉伯、渤泥、中國之間的航海舶運相當頻繁。這種交通往來，不僅促進了商業貿易，而且推動了宗教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同時，人員的流動形成了早期的南海移民。一個常識是，在南海歷史上，中國人移居南海諸國的情況十分普遍，而這塊墓碑的出現則表明，早期移民的種群成分非常複雜。

事實上，自宋代以來，有很多海外客商選擇定居中國，他們很多人改為漢姓，在泉州，蒲姓眾多。其中一些巨賈還與趙宋皇室結秦晉之好。時至今日，在泉州仍有不少阿拉伯後裔居住。在宋朝時，泉州的蒲姓人大多經營海上貿易，有些人自己揚帆遠航，有些人則坐擁船運商號。

宋朝人周密的《癸辛雜識》記載了這樣一位泉州人，他是「泉南巨賈……蒲氏之婿，其家富甚」，不僅有遠洋商船80艘，而且還被人發現他藏有珍珠130擔。這個故事一方面反映了蒲氏家族在泉州之盛，另一方面則讓人看到當時的海運之發達，僅泉州一地的一個商人，就擁有遠洋商船80艘，南海貿易之發達可見一斑。

南海、渤泥與青花瓷

青花瓷，已經是聞名世界的中國符號。青花瓷的價格，自古不菲。要想甄別元代與明代的極品青花，最重要的就是看青花的花色，如呈色靛藍、絢麗濃豔、清晰通透，則是極品中的極品。花色差之毫釐，價值可相去千里。

那麼，青花瓷與南海上的渤泥又有什麼關係呢？

簡單地說，假使沒有南海航行的發達，沒有南海商業的多樣化和細緻化，沒有南海遠洋技術的普及，後人就見不到青花瓷。可以說，青花瓷，見證了南海文明最絢爛的一面。

青花瓷的「青」，是在瓷器燒製前在胎上畫上一種礦物原料——鈷料，然後罩上高溫透明釉。而鈷料產地的不同，決定了花色的差異。元明清時期，最被官窯認可的兩種鈷料，分別叫作蘇麻離青和蘇渤泥青。

極品青花均產自景德鎮官窯，大多使用蘇麻離青。歷史上，景德鎮使用蘇麻離青主要有三個時期：一是元代晚期，二是明洪武時期，三是明永樂、宣德時期。元代晚期，南海遠洋航海業的發達，使得很多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把蘇麻離青帶入中國。關於蘇麻離青中「蘇麻離」三個字的來歷，有人認為是索馬里，因為明代之後，鄭和自第四次下西洋後每次都到索馬里，並帶回鈷料。但也有人認為，蘇麻離青產自今天的伊拉克、伊朗一帶，有專家甚至把蘇麻離青的產地精確到今天伊拉克的奧曼和黑加北部，因為那裡有著豐富的鈷礦，鈷礦在當地陶器中的使用早在阿拔斯王朝（758—1258年，中國史籍中稱「黑衣大食」）就已經很普遍。

蘇麻離青到底產自哪裡已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每一克珍貴的蘇麻離青都是經南海漂洋過海而來。而且，從景德鎮使用蘇麻離青的三個斷續時期來看，其中的斷層，剛好與明朝實施的海禁密切吻合。洪武時期仍可使用元朝儲留下來的蘇麻離青料，但洪武初年施行的海禁不可避免地導致蘇麻離青大量短缺。從洪武後期到永樂早期，景德鎮的青花瓷產量明顯下降，釉裡紅大量取代青花。而到了永樂初年，鄭和開始頻繁下西洋，又使蘇麻離青重回景德鎮。有人甚至認為，鄭和多次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尋找明朝君王深愛的「那種藍」。

而蘇渤泥青又是從哪裡來？與蘇麻離青又有什麼關係呢？

一些學者認為，蘇渤泥青就是蘇麻離青，因為二者發音類似，特別是在景德鎮方言中，「泥」和「離」的發音幾乎沒有區別。而且，明朝的一些記述製瓷技術的書籍也把蘇渤泥青和蘇麻離青混用。還有學者認為，蘇麻離青的「蘇麻離」是原始產地，而蘇渤泥青中的「蘇渤泥」，是蘇門答臘和渤泥的合稱，實際上是以蘇麻離青經蘇門答剌國（今蘇門答臘島一帶）和渤泥國中轉到中國的「中轉地」命名。

從南海貿易角度看，明朝初年的東南亞面臨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轉折期。一方面，蘇門答臘島、加里曼丹島的許多港口已經是南海貿易中最發達的海上支點，彙集了大批來自阿拉伯地區和中國的商人；另一方面，大批西方殖民者的到來，逐步擠壓傳統南海商人的貿易航線、管道和市場。因此，一些阿拉伯商人和中國商人為了避免「走私蘇麻離青」之嫌，乾脆就自稱這種青料是產自蘇門答剌國或渤泥國的本地貨。對於中國而言，既然是從蘇門答剌和渤泥買到的青料，不管原始產地是哪裡，乾脆就叫「蘇渤泥青」吧。在南海貿易中，以買到商品的地方名稱來命名商品並不罕見，例如，一些西方人就把在廣州買到的景德鎮瓷稱作是「廣州瓷」。

不管蘇渤泥青是不是蘇麻離青，也不管兩種鈷料產自哪裡，它都在反映歷史客觀，那就是古代南海不僅是追逐商業利潤的商場，更孕育了許多像青花瓷那樣的藝術文化，更有意思的是，明廷禁海令的嚴厲與寬鬆直接成為阻礙或推動這種藝術文化發展的一種牽引力。

宣德年間，多年來積攢的蘇麻離青與蘇渤泥青基本用罄，成化時已「無青可用」。乃至於明代《廣志繹》一書感歎：「宣德之青，真蘇渤泥青也，成（化）窯皆用盡，故成（化）窯不及宣（德）。」

雖然《宋史》在《渤泥傳》中明確提到，在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渤泥王遣使宋廷之前，「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但大量史料證明，在宋代之前的唐代，渤泥與中國的民間交往就已經很頻繁。

一方面，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對渤泥的瞭解就細緻入微；另一方面，史料記載，渤泥對中國的唐文化心嚮往之，說明在唐朝時就有頻繁往來與文化交流。元代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中說，渤泥人尤其「敬愛唐人」，喜歡唐朝的風俗文化，在街上遇到到訪渤泥的唐人喝醉酒了，就會主動把他們攙扶到住處。明朝人費信在《星槎勝覽》後集中也記載說，渤泥人遇到醉酒的唐朝人會把他們帶回自己的住處，如遇故交，奉若上賓。

宋人對渤泥的瞭解就更多了。《太平寰宇記》「渤泥國」詞條記載了渤泥政治、經濟、民風、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渤泥國用石板築城，城市中大約有上萬人。渤泥國統領十四個州。國王住所的建築物屋頂覆蓋著一種抄寫佛經用的貝葉，而普通老百姓家只能用草來做屋頂。國王出行時，會有人抬著一種用繩子編成的大床，床上鋪有大布單，國王就坐在布單上。打仗的時候，渤泥人用一種長刀，並且身穿一種用銅鑄成的桶狀盔甲護住前胸後背。渤泥物產豐富，主要有龍腦香、玳瑁、蘇木、檳榔、丁香等。老百姓一般吃雞、羊、魚肉。用黃牛、水牛耕地。不產麥子，產稻米和麻。不養蠶製絲，用一種木棉織布製衣。婚嫁的時候喝椰子酒、吃檳榔、戴指環，嫁妝有布匹或刀具，甚至有金器。人死後也用棺材入殮，未成年死者入殮後直接火化，成年人則用竹子抬到山中丟棄。渤泥天氣炎熱，風雨多。當地百姓喜歡載歌載舞，擊鼓吹笛。吃飯時不用器皿，而用一種竹子編成的容器，吃完就丟棄。

977年，渤泥王遣使宋朝，這是渤泥與中國的最早官方交往記錄。雖然在唐朝時也有人從加里曼丹來使，但當時來使的國名並非渤泥。按《宋史》等書的記載，977年遣使宋朝的渤泥國王名叫向打。當時，一位叫作蒲盧歇的阿拉伯商人途經渤泥，向渤泥王介紹了中國。蒲盧歇顯然是一位經常在阿拉伯與中國之間做遠洋貿易的商人。渤泥王聽取蒲盧歇的建議後，派了三位使臣在蒲盧歇的指引下來訪，分別是，使臣施弩、副使蒲亞利和判官哥心。他們帶了大片龍腦60兩、米龍腦20兩、蒼龍腦20兩、龍腦板5片、玳瑁殼100個、玳瑁兩千兩、檀香三截、象牙六根。有意思的是，史書對渤泥帶來的貢品只不過列了個清單，卻對渤泥王表奏所用的書寫載體進行了詳細記述。《太平寰宇記》記載，渤泥國表奏用的不是紙張，而是一種微綠色、類似薄木皮那樣的材料，數尺長，一寸多寬，用軸連在一起，剛好一個手掌可以握住，用很多個小袋子套了一層又一層。上面的文字看不懂，字體很細，而且是橫著寫的，後來專門請人翻譯成了漢字。





明代仇英所作《職貢圖》中描繪的渤泥國來使場景。

自那以後，渤泥與中國歷朝都有官方往來，而且越來越頻繁。值得一提的是，宋元豐五年（1082年），渤泥國王錫理麻喏又遣使來宋，使者專門提到，返程時希望能從泉州坐海船返回。從這一請求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先前渤泥使者從南海上登陸中國的港口並不是泉州，二是宋朝時泉州與渤泥的海上往來已經比其他港口城市更加成熟。

明朝初年，渤泥來使中斷，朱元璋因此把渤泥列為「不征之國」。1370年，朱元璋派出監察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前往渤泥，10月從泉州出發，次年3月抵達闍婆（今印尼爪哇島），4月抵達渤泥，顯然是走錯了路，繞了遠道。兩位明使在渤泥一開始受到冷遇，渤泥王避而不見，後來雖然見面，又以多種托辭委婉表達不再打算遣使明朝的想法。此時，在爪哇的闍婆國聽說明朝來使訪問渤泥，特地派人前往遊說渤泥王，勸渤泥斷絕與中國的聯繫。闍婆國還獻計渤泥王，讓他告訴中國使臣，是蘇祿國（今菲律賓）經常來犯渤泥，致使渤泥無法朝貢。實際上，闍婆國時有吞併渤泥的野心，此計可能是為了挑起渤泥與中國的矛盾以及蘇祿與中國的矛盾，希望中國因此派兵攻打渤泥或蘇祿，闍婆可坐收漁翁之利。沈秩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通過渤泥的大臣向渤泥王陳情，告訴渤泥王，闍婆國本身年年遣使中國，並無中斷。渤泥王后來與大臣們商議決定，恢復與中國的官方交往，並遣使與兩位中國使臣一同返回明朝。臨行時，渤泥王賜給沈秩一些財物，卻被沈秩「毅然辭之」，渤泥王深受感動，大讚中國使臣的廉潔。1371年，兩國使臣一同抵達南京，朱元璋見到渤泥使臣後以厚禮相贈，兩國中斷的交往再次恢復。

這段歷史恐怕是古代南海上一段非常複雜的外交風波，反映了南海古國間紛紛擾擾的明爭暗鬥，以及試圖利用大國來施壓別國的計謀。事實上，闍婆、渤泥、蘇祿之間，你攻我守、你守我攻了幾百年，渤泥強盛時曾吞併過蘇祿的領土，而蘇祿強盛時也蠶食過渤泥的土地。倒是沈秩在渤泥理智克制情緒、妥善處理問題、不收受渤泥王恩賜的故事，顯現了大國使臣的外交睿智和廉潔作風。

南海上的「元首外交」

在渤泥與中國上千年的古代交往史中，高潮迭起，但高潮中的高潮，莫過於明朝永樂年間的一段元首外交。

那段元首外交與永樂皇帝朱棣登基的歷史大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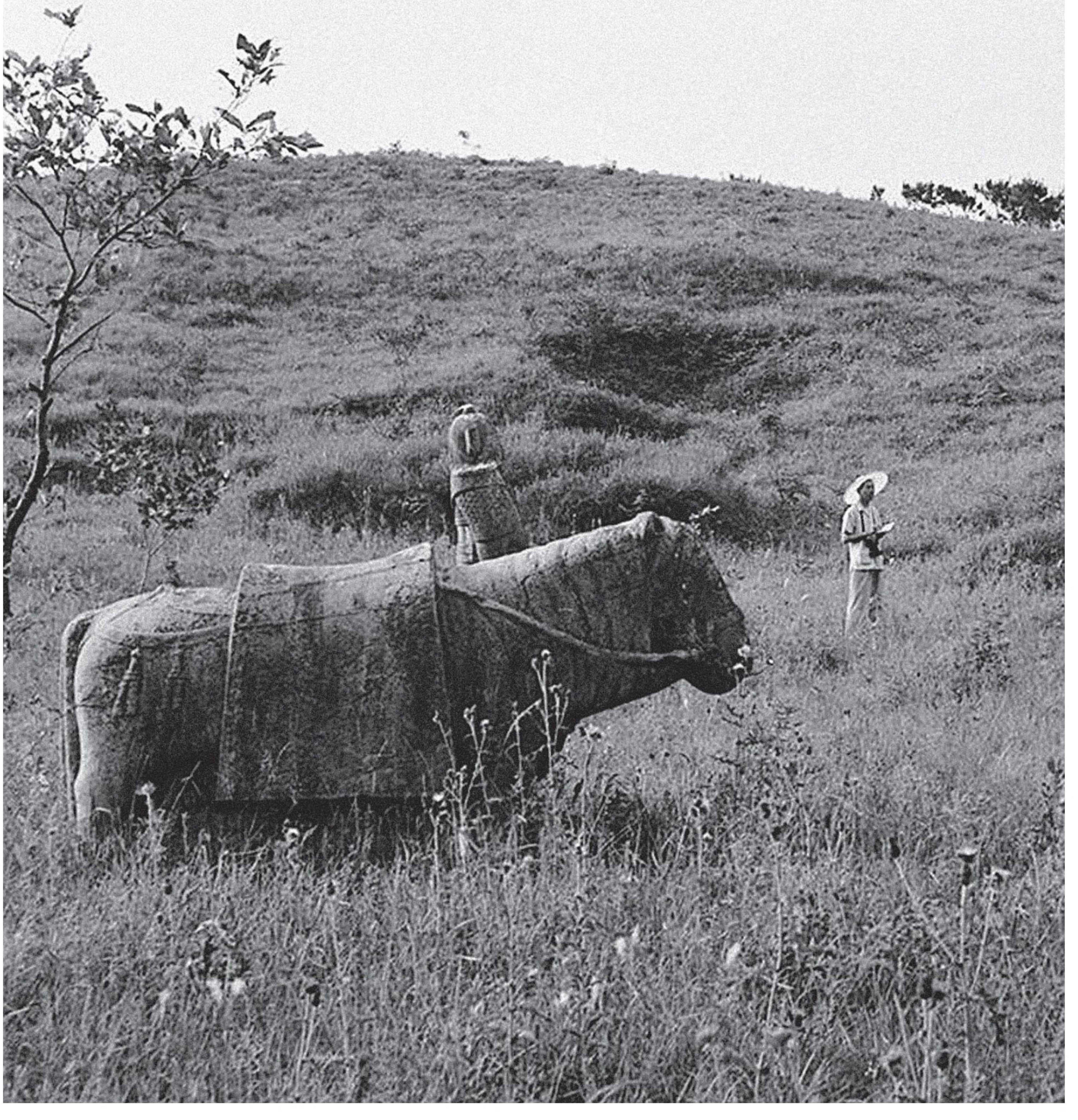
燕王朱棣以「靖難」之名，最後攻下國都應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宮，不知所蹤。明成祖朱棣繼位稱帝，改年號為永樂，但對於建文帝的失蹤及其遺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掛懷。明朝歷史文獻裡，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沒有被燒死而逃亡海外的傳言。所以朱棣在登基第一年就派宦官侯顯出使西域，派宦官馬彬出使爪哇、蘇門答臘，派宦官李興出使暹羅（今泰國），派宦官尹慶出使滿剌加（今麻六甲一帶）、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欽一帶），四處尋找建文帝的下落。四支隊伍中的三支，走的是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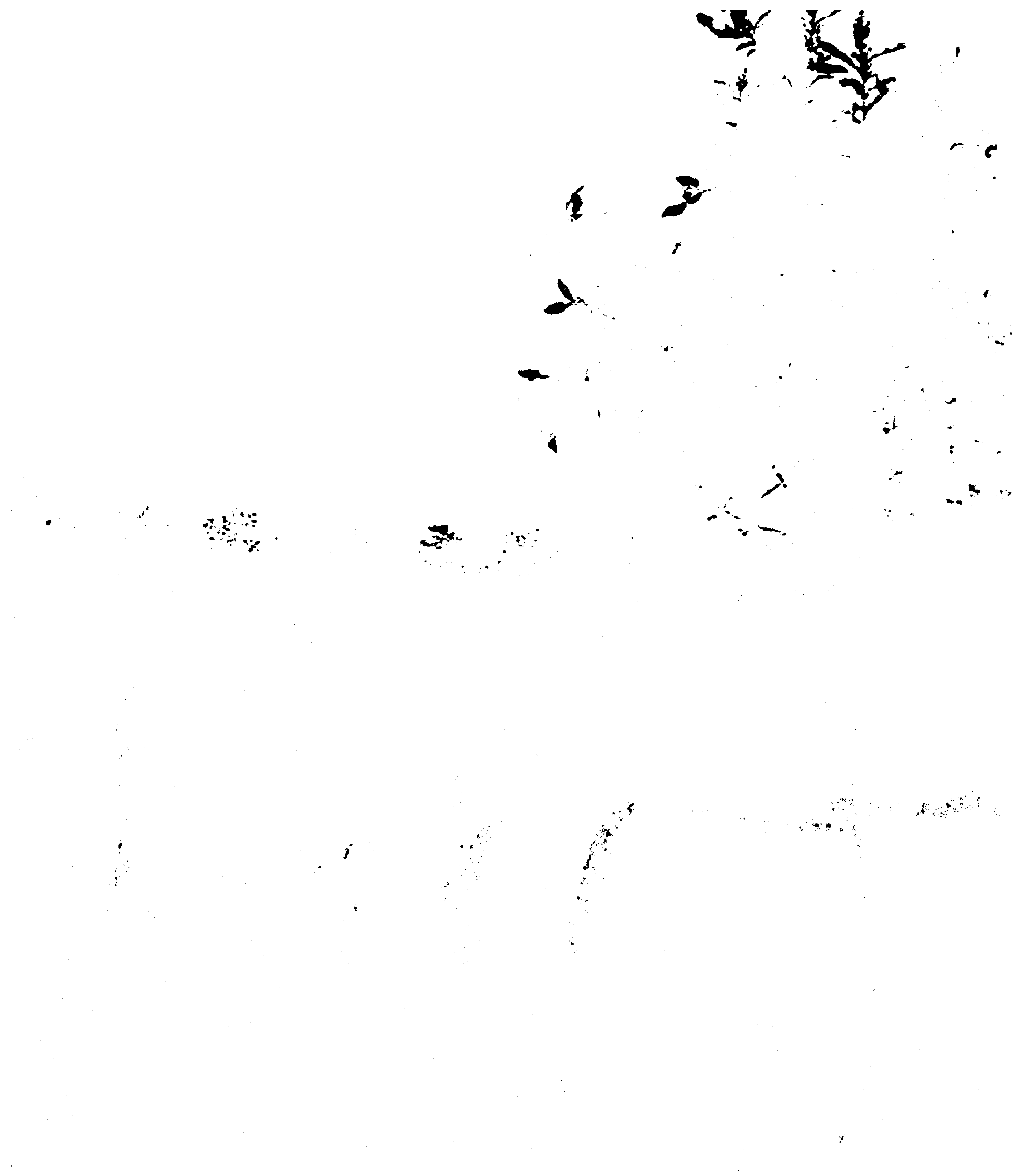
後來有一說，朱棣在登基第三年派鄭和下西洋，實際上也懷揣著尋找建文帝的秘密政治任務。是否屬實，今天已難以考證，但有一點，在永樂三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他在南海諸國每到一處，就敕封當地國王，為剛剛登基不久的朱棣建立海外威信、聯絡南海周邊國家的感情、鞏固篡權得來的帝位發揮了重要作用。

1405年農曆六月，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農曆十一月，渤泥來使。一個月後，朱棣遣使前往渤泥，敕封渤泥王麻那惹加那為渤泥國王，並贈送大批禮物。

有人常用朝貢關係來描述古代南海諸國與中國的關係，包括朱棣敕封渤泥王為國王一事。但如果從南海古國的角度看，與中國交往，往往可以換回政治安定和心理上的安全庇護，這是一直到今天都很普遍的國際關係客觀存在。在今天的東南亞學術界，很多學者認為，古代東南亞國家朝貢中國往往是為了在政治上獲得庇護，在經濟上獲得更多利益。因為在他們看來，所謂的朝貢就是一種官方貿易，古代南海諸國常常用一些珍奇物品換回火藥軍需等能夠給他們帶來安全感的重要物資。當時的南海諸國常常在中國與印度之間搞平衡，這種大國平衡術一直延續到今天。







1958年，考古工作人員在南京市郊發現渤泥國王墓時的場景。（新華社資料圖片）

渤泥國王獲得朱棣敕封時，正處於渤泥國外患緊迫的歷史時期。當時，蘇門答臘島的婆羅國對渤泥虎視眈眈。相比婆羅國對渤泥國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勒索，明朝對渤泥的態度簡直就有天壤之別。而當時，婆羅國也與明朝有著固定的官方交往，因此，年輕的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決定，加緊與明朝搞外交，要獲得比婆羅國更多的來自明朝的支持。而各種外交方式中，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元首外交。

1408年農曆八月，28歲的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帶著王后、王妃、子嗣、近臣等150人，乘坐遠洋大船，浩浩蕩蕩，經南海抵達福建。朱棣念其路途遙遠、行程辛勞，派專員前往福建迎接，並下令沿途各地官員盛情接待。渤泥王到達南京後，朱棣在奉天門設宴款待，渤泥王奉上鶴頂、犀角、龍腦、片腦等，朱棣立即賞賜渤泥國王儀仗、交椅、綢緞等大批對象，渤泥王后、王妃、子嗣等也分別獲得金銀等大批賞賜。總之，朱棣給予了渤泥王「國禮」待遇，後者極為感動，盛讚明朝對渤泥的厚待。他還告訴朱棣，中國聖人的德行教化在渤泥廣受尊崇與學習。

可能是因為旅途勞頓加上水土不服，渤泥王在抵達南京後不到一個月就身患重病，臥床不起。在此期間，朱棣高度重視，他不僅安排貼身太醫為渤泥王醫治疾病，還一度因渤泥國王病情有所好轉而喜形於色，這些細節都記載在了史書中。

同年農曆十月，渤泥王麻那惹加那到訪南京不到兩月，病卒。臨終前，渤泥王留遺言說，死而無憾，要將遺體安葬中華，「受天子之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朱棣大哀，下令三日輟朝，即三天不上朝。朱棣特別派人安慰渤泥王后，並以高規格葬禮將麻那惹加那厚葬在南京安德門外向花村烏龜山，樹碑立祠，安排守墳人。

渤泥王死後，朱棣敕封渤泥王的隨行太子遐旺襲其王位，由麻那惹加那的三個弟弟輔政。遐旺回國前，擔心爪哇、婆羅等周邊國家因渤泥王位交迭而生歹意，特別請求明朝廷能夠護送他回國並「鎮守一年」。遐旺同時希望朱棣能從中斡旋，免除渤泥每年對爪哇、婆羅的進貢。朱棣一一應允，派張謙、周航護送遐旺返回並留鎮一年，並賜一百兩黃金、三千兩白銀等一批財物。朱棣還親自撰寫一篇文章紀念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後來刻成碑文立於渤泥國。在這篇記錄在《明成祖實錄》中的悼文中，朱棣稱麻那惹加那國王是南海諸國中最賢能的一位。

新國王遐旺返回渤泥後，一直與明朝保持聯絡，多次遣使。1412年農曆9月，遐旺帶著母親、叔父等一批人再次訪問明朝。朱棣再次在奉天門高規格接待。這一次來訪，遐旺在南京逗留了將近半年，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向朱棣辭行。

僅在永樂年間，渤泥遣使明朝6次。雙方互贈禮物，互相瞭解，增進了兩國友誼，也促進了兩國的技術交流。在明朝歷史上，外國國王來訪，渤泥王麻那惹加那是第一人。後來，南海諸國有多個國王也效仿渤泥王親訪明朝。

值得一提的是，一國國王在臨終前立遺囑，下令安葬他國，這也表明了渤泥與中國當時那種深厚感情與彼此尊重。後來，在永樂年間，又有兩位南海古國的國王在訪問明朝時病逝，一位是蘇祿（今菲律賓蘇祿島一帶）國的東王，一位是古麻剌朗（今菲律賓棉蘭老島一帶）國王，前者葬於山東德州，後者葬於福建福州。三位國王，在南海的歷史上，留下了元首外交中最濃重一筆。

05 交趾與占城，南海上的絲路驛站

在海洋文化活躍的中國閩粵地區，交趾和占城，是民間航海口訣、針經中離不開的熱門地理名詞。

在明代匯總中國古代漁民航海經驗的海路針經《順風相送》中，專有一章詳述從福建通往交趾的針路。湯顯祖在謫貶海南徐聞期間也提及這段海路：「占城（越南中部）十日過交欄（印尼的格蘭島），十二帆飛看溜還。」

中國人在南海探索的積澱與經驗，為南海周邊諸國乃至域外國家提供了便利。外商「遠涉重洋、咸駛來華」時，交趾與占城，充當了遠洋沿岸航行重要的補給點和貨物中轉站，多種文化得以在此融合與發散，史籍上關於交趾與占城留下諸多值得咀嚼的片段。

交趾位於今天的越南北部，占城位於今天的越南中部。


諸蕃志卷上　宋　趙汝适　撰
志國
交趾國
交趾古交州東南薄海接占城西通白衣蠻北抵欽州
歷代置守不絕賦入至薄守禦甚勞皇朝重武愛人不
欲宿兵瘴癘之區以守無用之土因其獻款從而羈縻
之王係唐姓服色飲食畧與中國同但男女皆跣足差
異耳每歲正月四日椎牛饗其屬以七月十五日為大
節家相問遺官寮以生口獻其酋十六日開宴酬之歲
時供佛不祭先病不服藥夜不燃燈樂以蚺蛇皮為前
列案此句未詳疑有誤字不能造紙筆求之省地案省地二字亦未詳土產
沉香蓮萊香生金銀鐵朱砂珠貝犀象翠羽車渠鹽漆
木綿吉貝之屬歲有進貢其國不通商以此首題言自
近者始也舟行約十餘程抵占城國
占城國
占城東海路通廣州西接雲南南至真臘北抵交趾通
邕州自泉州至本國順風舟行二十餘程其地東西七
百里南北三千里國都號新州有縣鎮之名甃塼為城
護以石塔王出入乘象或乘軟布兜四人舁之案宋史外國列
傳云王出近則乘軟布兜遠則乘象或乘一木杠四人舁之據此則布兜下當脫或乘一木杠五字頭戴
金帽身披瓔珞王每出朝坐輪使女三十人持劍盾或
捧檳榔從官屬謁見膜拜一而止白事畢膜拜一而退
婦人拜揖與男子同男女犯姦皆殺盜有斬指斷趾之
欽定四庫全書　諸蕃志卷上　二

宋代趙汝适《諸蕃志》中的交趾和占城條。

交趾籍紫禁城設計師

南海往來交流中，奇巧之物眾多，奇人高人也不少。

紫禁城是明清兩代天子皇宮，工程宏偉浩繁。而明朝史料關於這「明初第一工程」浩瀚的文字記載中，眾多交趾人留下了身影。

按今天的話來講，明朝永樂年間引入一大批交趾籍「工程師、設計師」，活躍在首都建設第一線。

明人顧起元的《客座贅語》記載，明朝皇帝朱棣奪位後決定遷都北京，當時這一新都缺人口，更缺人才，尤其是大量技術精湛的工匠一時難以找尋。《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五年（1407年），朱棣曾兩次下諭延請交趾能工巧匠速赴北京：「其境內才德賢知之人及有一善可陳、一事可用者，廣為詢問，悉以禮遣送北京。」

此後6年，大約1.6萬名交趾工匠及其家眷遠涉重洋，北上建設北京城。其中工匠有專長、有手藝，會製磚、製香等。

到達北京後，不少交趾人不適應北方氣候飲食，患水土不服之症，朱棣不忘給衣給藥悉心照料。史料載，「上念南土遠來不耐寒，命工部悉給錦衣」，「上以冬月氣寒，南荒之人不耐，命工部遣官以綿衣靴襪即途中賜之」，「命所司給鈔米衣服居室，病與醫藥」。

隨大批工程師、設計師入京的還有不少孩童，朱棣還不忘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學習的主要內容是中國經史。後來不少幼童入宮後，進入內廷各監司做事，成為皇家工程師。內官監屬明代宦官的十二監之一，掌管木、石、瓦、土等十作，負責營造宮室等事。

在明朝史料中，有一位交趾人頗有名氣，叫阮安。阮安以其出眾的工作能力與清廉的工作作風，當上紫禁城的「副總工程師」。

「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這是取自《明史．宦者傳》的描述，記述了燕王朱棣遷都北京後，仿照南京皇宮興建紫禁城的一個片段。阮安構思巧妙，奉明成祖朱棣的命令營造北京城池、宮殿和各級官府的官署，他只需要實地觀測和構思，設計的建築方案就可以達到各方面的標準，工部只需要按圖建造就可以了。

正統元年（1436年），明英宗決定完成北京九門城樓建設，一開始選用設計師蔡信的設計。不過蔡信提出的建設方案耗資太大，所需工力眾多，後改由阮安負責。阮安接手之前，北京城牆上所開九門，只有門洞，沒有甕城、城樓，官軍值班所用鋪舍也未建。

阮安取京師訓練軍卒為主要施工人員，共計1萬多人，停止他們的軍事操練，增加工資，安排班次。史料記載當時工人的「漲薪幅度」：每人每月增加糧一斗、鹽一斤。阮安使用的建築材料也是閒置建材，使用大量官府積存的材料，永樂年間營建北京城剩餘的大量建築材料，均被派上用場。

今天北京人耳熟能詳的幾個城門樓子都是彼時所建。阮安承包的工程包括門樓、城濠、橋閘三部分，具體為：正陽門正樓一座，月城樓（箭樓）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陽、阜成、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八門各正樓一座，月城樓一座。城牆四角各立角樓一座。

中國古代工程採料、建設、用工、用匠環節繁多，支出巨大，而其中可撈的「油水」也不少。阮安為人勤儉樸素、清廉正直，屢次受命督建幾項大型工程，明朝皇帝也賞賜頗多。不過，這位交趾人對身外之物並不看重，他把賞賜的錢物全部上交國庫，死時「囊無十金」。阮安的幾項工程也被時人記錄傳頌，如王直《抑庵文集營建紀成詩序》、李時勉《古廉文集營建紀成記》、韓雍《襄毅文集營建紀成陳都堂命為阮太監題》、岳正《類博稿營建紀成詩》等。

交趾人參與營建紫禁城的，絕非阮安一人，未能在史料中留名的恐怕是大多數。史料中寥寥幾語提到了另外幾位交趾人，修建紫禁城的阮白、阮浪，以及後來官至工部侍郎的黎澄。

占城稻米與「馬爾薩斯陷阱」

交趾輸出人才，占城輸出的則是農業科技。一些高產作物以占城為軸心向外輻射，隨商賈傳播，遍及南海周邊。

史料記載，占城五穀，以稻為首。位於今柬埔寨的真臘國普遍種植占城稻。「厥土沃壤，田中畛域，視力所及而耕種之，米穀廉平。」

中國人吃米的歷史不短。不過，古人吃米並沒有什麼選擇餘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有達官貴人才能吃上精米、白米。魏晉時，有一種「新城粳稻米」尤為著名，甚至成為一種被追求的「風尚」，但因當時產量不足，普通人家不能常吃。

直到宋代，情況才有所改變，白米飯才在百姓中普及開來。北宋初年，占城的優質米種大規模引入中國，占城稻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這種改觀，正是得益於南海物流的便利。

引入占城稻，可謂是雪中送炭。北宋初，天下承平，人口由4000萬陡增至1億，人多糧少，糧荒緊迫。正是在要緊關頭，占城稻種傳入中原。據史學家考證，占城稻可能先由海路傳入福建，而後在宋真宗推廣下廣泛種植。占城稻由於高產、耐旱，填補了人口爆棚引發的糧食缺口。一些史學家認為，若非占城稻的救急，宋朝可能會因為人口暴漲而落入「馬爾薩斯陷阱」。

占城稻屬旱稻，「山中往往旱荒，乞得旱稻種……耐旱而繁實，且可久蓄高原種之，歲歲足食」。占城稻的種植方法也較為簡單，種法大致與種麥一致，「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於三，即秀矣。」宋代《湘山野錄》記載：「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宋代1石相當於120宋斤，約為152現代斤；20石約相當於現代1520公斤。

宋真宗引入的這批稻穀並未用作糧食消費，而是作種子。史料記載，取得占城稻種後，除引導民眾種植外，宋真宗還在皇宮後苑中種植，秋收後請身邊的侍臣品嘗新稻米做出的飯。「帝與近臣同觀」，「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宋史．食貨志上一》載：「帝（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

引入占城稻，可以說是南海內生貿易發展的結果。廈門大學歷史學者鄭學檬在《宋代福建沿海對外貿易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一文中指出，「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閩商往返占城、安南（交趾）有關。」閩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前往海南島、安南、占城等地貿易的傳統。「因為舉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真臘貿易，就會出現移居問題，占城稻極有可能是這些賈販者、移居者（早期華僑）們攜至泉州的。」占城稻的傳入和沿海對外貿易密不可分，似無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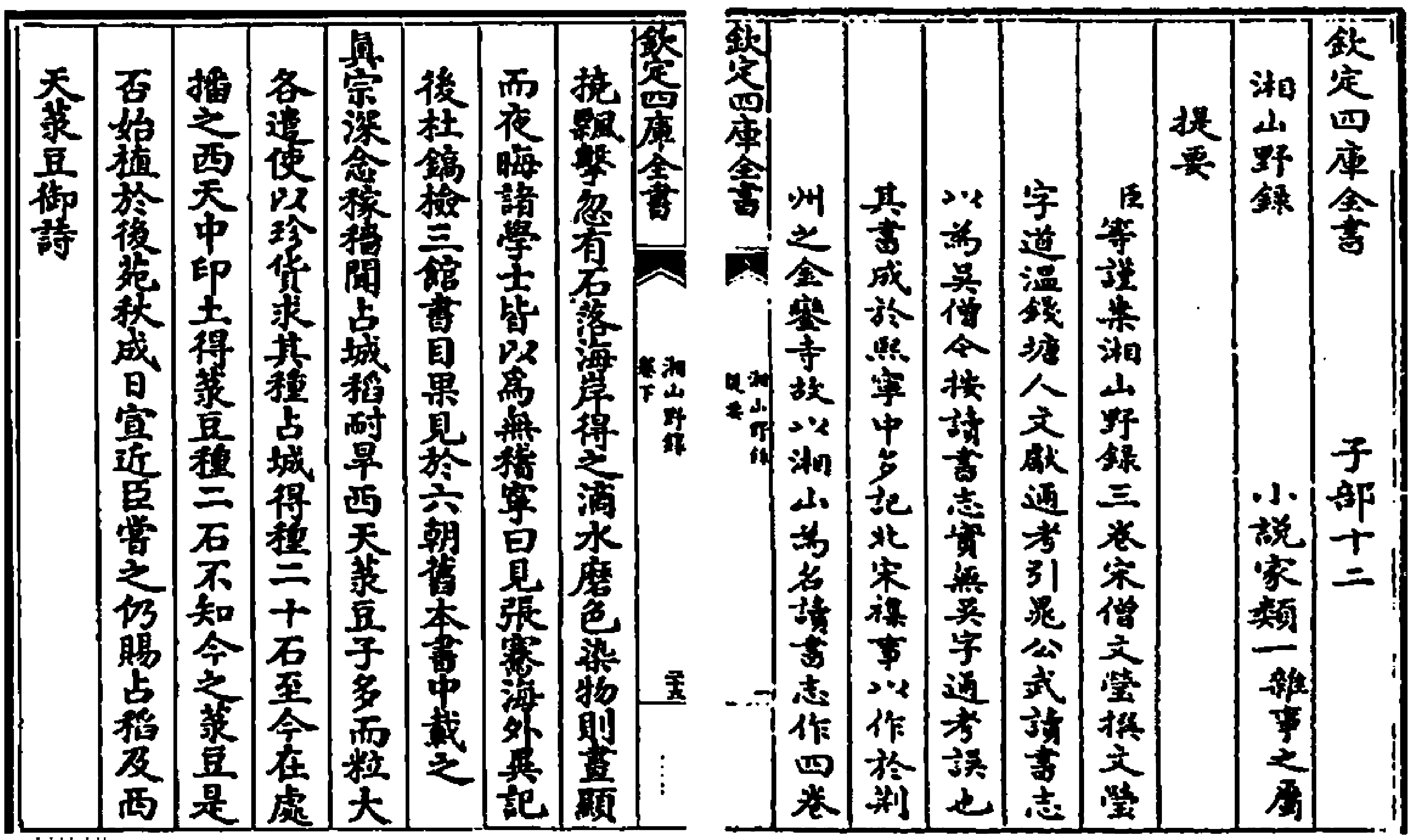
歷史學家推測，宋真宗引入占城稻作種大約在1012年，不少農學家還稱之為「中國推廣進口耐旱水稻的元年」。

多元文化交融的國際化大都會

在西方殖民東南亞前的南海上，除了中國「戎克」大帆船外，阿拉伯海船、爪哇的叭喇唬船等都在穿梭航行。中國，由於商品交換利潤豐厚，是大多數海船的最終目的地。而占城，是各國商船經南海前往中國的最後停駐補給大站，各國商賈不斷聚集棲居占城，使多種宗教文化在那裡交融匯聚，促使其成為當時的國際化大都會。

從歷史上看，占城先是融合了印度教、婆羅門教和大乘佛教的影響，而後不少人皈依伊斯蘭教，再後又有不少占城穆斯林泛舟前往中國海南，接受中華文明薰陶，形成了獨特的文化。

占城建國早期，有「印度教化王國」之稱，不少地名以梵語命名，如「占婆補羅」，占婆是占的梵語名，補羅是城的意思。占城人原有其本土信奉的神靈，例如南部的古笪地區信奉釋利摩落陀古笪羅，這是占城的「舊神」。隨著印度文化東漸，占城舊神都被婆羅門教諸神所代替，例如女神楊浦那竭羅便被婆羅門教裡的大自在天王之妻婆伽底所取代。


欽定四庫全書
湘山野錄　子部十二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湘山野錄三卷宋僧文瑩撰文瑩
字道溫錢塘人文獻通考引晁公武讀書志
以為吳僧今按讀書志實無吳字通考誤也
其書成於熙寧中多記北宋雜事以作於荊
州之金鑾寺故以湘山為名讀書志作四卷

欽定四庫全書　湘山野錄 卷下
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
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
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
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
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菉豆種二石不知今之菉豆是
否始植於後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
天菉豆御詩

宋代《湘山野錄》中記載的占城稻。

政治方面，占城引用印度教神化王權制度，並按照印度模式組建占城的國家機構，定立典章制度。在社會方面，印度文化的傳入使占城國上層社會仿照印度的種姓制形成婆羅門和剎帝利等級。宗教方面，印度教寺院廣建，供奉印度教神靈，濕婆神地位突出。占城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吃牛肉，寡婦不再嫁人，占城貴女賤男的舊俗隨著印度文化而轉變。經濟方面，由於占城的領土狹促，東西向的河流對長山山脈的切割作用，致使地形支離破碎，缺乏大規模發展農業的條件，這也促使占城人轉向南海求生計。在海外貿易中，占城主要出口樟腦、檀香木、糖、鉛和錫等。

9世紀以來，阿拉伯等國商船東來，不少商船選擇在占城中轉，一些商人留駐當地，同時也把伊斯蘭教傳入占城。9世紀末，占城南部已存在一個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區。一些人從占城再出海，順風時半個月即可抵達廣州。宋廷十分重視這類來自南海的貿易。史書記載：「大賈自占城、真臘、三佛齊、闍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柁。」

中國商人也往來於占城，帶去中國文化。一些中國商人在那裡成為巨賈，在當地通婚永居。最著名的當屬「占城王婿」王元懋。南宋著名學者洪邁在《夷堅志》中記載，泉州海商王元懋從翻譯做起，取得占城國王信賴，當上了國王的女婿。「（元懋）嘗隨海舶詣占城國，國王嘉其兼通蕃漢書，延為館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歸，所蓄奩具百萬緡。」

占城有不少外國人，也有不少占城人和他們的後裔移居外國。占城人出洋後，有些留在南海諸國，有些則到了中國。在今天的海南，生活著一支回族，據說是當年占城穆斯林的後裔。他們被「發掘」出來，是因為這些穆斯林講一種特殊的方言，與海南島上漢、黎、苗各族語言差異很大，引發了語言學家注意。

語言學家將他們的語言定名為「回輝話」。從語言學角度講，屬於相距遙遠的南島語系，與南海一些島國的方言相近，而最接近今天仍然存在於越南中部的占語。譬如「魚」，在馬來語、拉德語（越南本地語言的一種）、回輝話中分別讀作ikan、akan、kaan；數字「五」則分別為lima、ema、ma。

從時間上推理，也印證這些穆斯林正是占城移民。《瓊州府志》記載，回輝話是大約在宋元期間從外國遷來的居民使用而流傳下來的語言，當時漢人稱之為「番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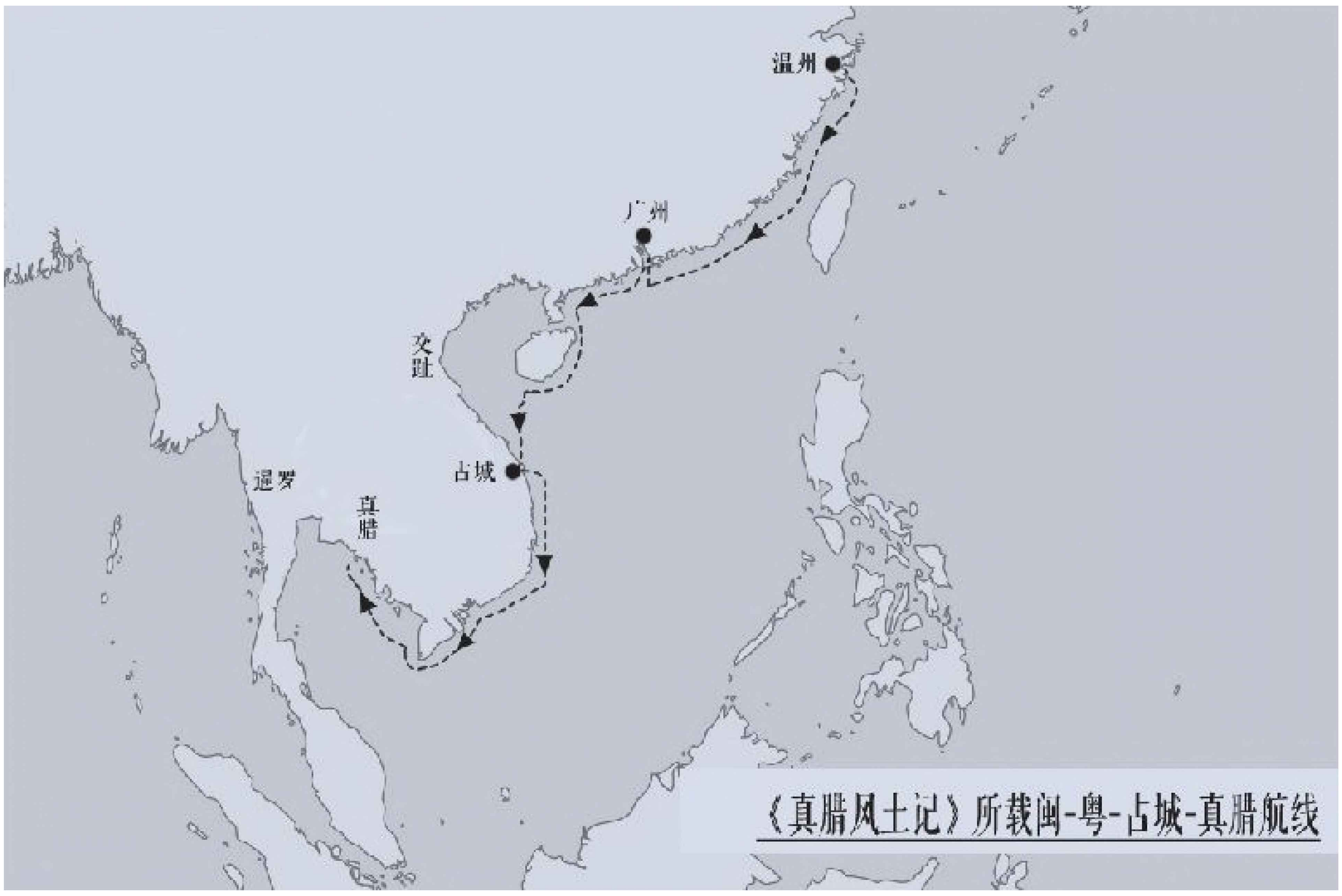
15世紀中葉，這些居民繁衍生息人口增加較多，居住集中在三亞鎮附近。占語本是一種無聲調多音節的語言，不過，通過學習漢語，回輝語慢慢產生了聲調，而原來的多音節詞，由於失去了詞頭而變成單音節的詞。從類型上看，它已從原來的語言變成近似於漢藏語系同一類型的語言了。

現在，使用回輝語的人口大約6000人，主要分布在三亞市附近回輝、回新2個村，白沙縣、萬寧市也有少數居民使用。

海南之外，廣東、廣西、海南、福建等地也能找到占城人的遺蹤。在這些沿海省份中不少蒲姓或是浦姓居民據信是占城穆斯林的後裔。也有說法認為他們是客居占城的阿拉伯人後裔，「浦」和「蒲」音取自阿拉伯語常用名阿布（Abu）。

宋元史料記載，「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於中國者多矣」。《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則記載：回族中的「蒲氏為唐宋時回教商人常用之姓」。

史料中可證的一段故事是，占城的蒲氏曾在廣州建造燈塔，便利商船往來。《蒲氏初四世太祖太中大夫公傳》記載蒲氏二世祖「瑪哈珠、瑪哈嗅二公倡築羊城光塔。俾晝則懸旗，夜則舉火，以便市舶之往來也」。一些史學家考證認為此光塔即現存廣州懷聖寺內的光塔，亦即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海獠》文中的光塔。岳珂所記建光塔的蒲姓穆斯林富商號白番人，就是來自占城。



《真臘風土記》中記載的從福建、廣東到占城和真臘的沿岸航線。

06 爪哇，南海桃花源

人們常把忘記辦一件事形容為「忘到了爪哇國」，彷彿那個在人們印象中的爪哇國，是那般地莫須有，就像陶淵明筆下那個找不到的桃花源。
但在歷史上，爪哇不僅真實存在，而且一度昌盛繁榮至極。那裡倉廩殷實，文化絢爛，思想先進，信仰豐富，是一片揚帆可至的桃花源。

倉廩殷實與印度匠心

闍婆國、斯調國、栗國、呵羅單、滿者伯夷……中文古籍對爪哇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記憶。和中南半島上的早期文明一樣，爪哇的早期文明生髮於海上商業貿易和以水稻為主要作物的農業。爪哇島東部和中部地區的耕地富含火山灰，土壤肥沃，稻米產量充盈，足以養育大量人口並用作商品交易。

倉廩殷實，讓爪哇人有更多時間去吸納海上傳來的文化與思想，甚至昇華為信仰。從爪哇人的宗教信仰可以看到，南海浮桴，不止於貿易。一艘艘從中國駛來的「戎克」船、爪哇的叭喇唬船、印度中轉的阿拉伯帆船，承載著貨物，也承載著科技、文化與思想，在這裡交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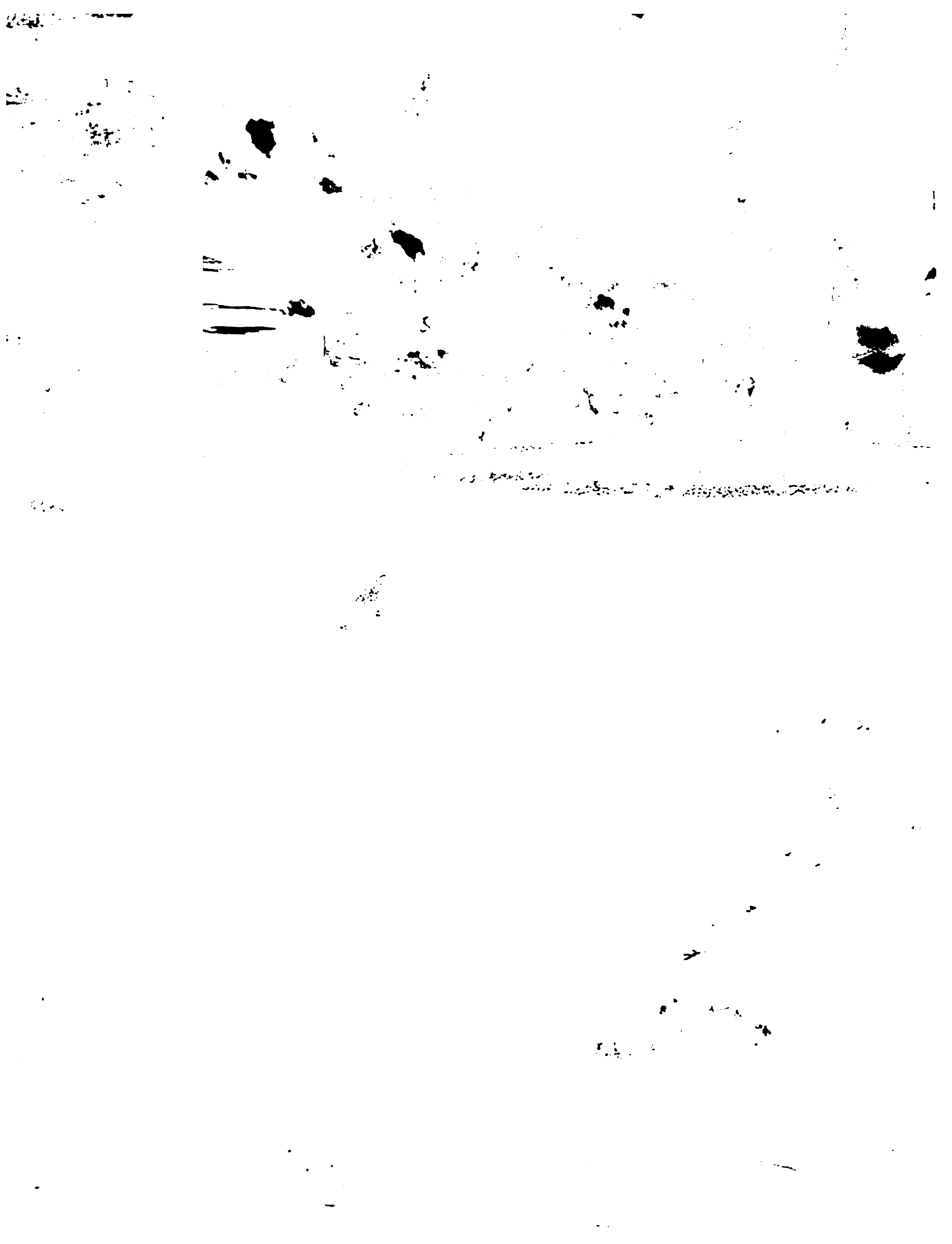
貿易與商人將諸多文化帶入爪哇，當時在爪哇活躍的商人來自包括蘇門答臘、馬來半島、扶南，距離遙遠的有中國、印度。考古發現，爪哇早期文明的文字記載主要刻在石頭或銅器上，還有一些刻在棕櫚葉上，主要有梵文、古馬來文、古爪哇文、古巴厘文以及古巽他文。

南海周邊諸國留存的航行記錄中，爪哇是重要一站。從航海記錄隻言片語的記載看出，爪哇始信印度婆羅門教，後來受外來文化影響，改信佛教。

中國史料記載，早在東漢時期中國與爪哇就有往來。三國時期東吳遣康泰、朱應出使扶南，所撰《吳時外國傳》中載有「斯調國」名，據信在爪哇島東部。

東晉時中國高僧法顯求法印度，回國時選擇南海海路，經過爪哇。法顯在其《佛國記》中寫道，「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有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東北行，趣廣州。」據考證，法顯提到的耶婆提，即梵文Yavadvipa的音譯，即當時的爪哇國。





建於夏蓮特拉王國時期的婆羅浮屠。

8世紀，爪哇島中部崛起了夏蓮特拉王國。夏蓮特拉王國農業發達，人們在富含火山灰的土地上耕種，獲得了好的收成，大量富餘稻米換成了財富，財富又被用來建設宏大的佛教工程，如宮殿、寺廟、佛教靜修院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婆羅浮屠。

婆羅浮屠的建造大約花費近50年時間。整個建築由火山岩建造而成，建造在山丘之上，以佛教傳說中的須彌山為藍本，浮屠的九層象徵佛陀修行之前的九個前世。婆羅浮屠共有超過2000個雕塑，400個不同型態的佛像。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建築風格與雕塑的形態與印度笈多王朝時期相近。

歷史學家推測，不少印度工匠在爪哇這項工程中扮演了外籍「設計師」抑或是「工程師」的角色。許多爪哇本地人也參與了這項工程，包括王子、工匠、農民等各個階層，參與者最終都被銘刻在浮屠上。

伴隨著印度工匠到達爪哇的還有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爪哇不少皮影戲以兩大史詩中的故事為題材，至今仍深受爪哇人的喜愛。

鄭和捎去「中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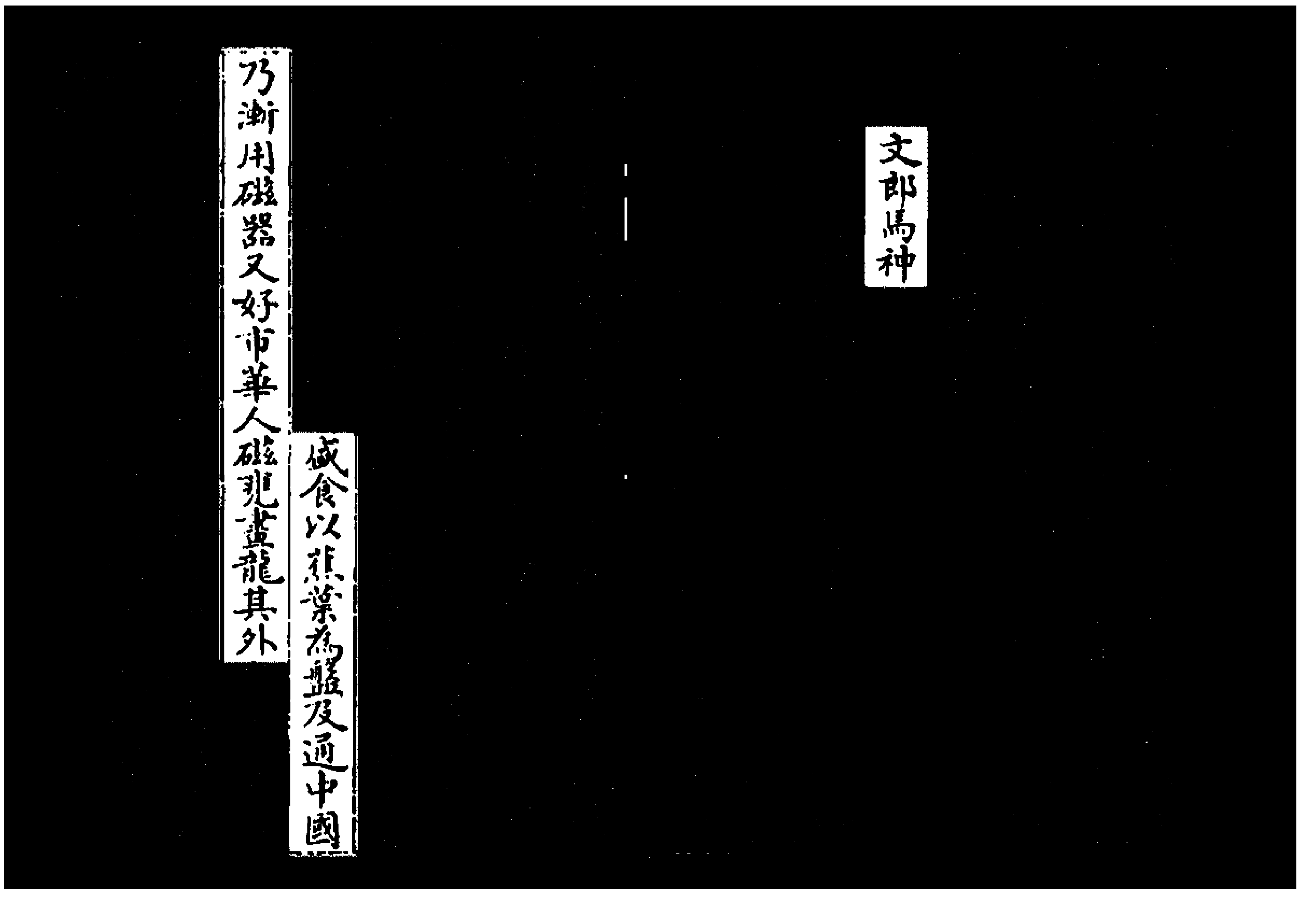
7世紀，唐帝國與阿拉伯帝國的繁榮，極大促進了東西方貿易的發展。爪哇、蘇門答臘等地成為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從印度洋進入南海再前往中國貿易的中轉補給站。彼時，亞洲和非洲之間已經開拓了一條比較受航海者歡迎的貿易航線，從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經葉門亞丁到印度甘瑟逸（今古吉拉特港口），再由蘇門答臘和爪哇經占城最終抵達中國的泉州和廣州。

不少阿拉伯人留駐爪哇，帶去了伊斯蘭教。一些史學家認為，10世紀中葉以前，伊斯蘭教已經在當地小範圍傳播。到了13世紀末滿者伯夷統一爪哇島時，伊斯蘭教已在爪哇生根。

一些史學家分析，當時爪哇作為東西方貿易通道上的支點，印度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較之當地信奉印度教、佛教或爪哇原始宗教的居民文化水準更高，因此伊斯蘭教被上流社會所追捧。當地居民也深深地被伊斯蘭教教義及其神秘主義色彩所吸引。

阿拉伯人把伊斯蘭教捎給了爪哇人，而中國的鄭和則在爪哇擴大了伊斯蘭教的影響。

鄭和下西洋前，爪哇一些相對落後的地區還信仰原始宗教。鄭和及隨行人員記載，爪哇一些山民崇信惡鬼，吃蛇、螞蟻和蚯蚓，甚至保留女性陪葬的習俗。「出殯之日，木塔高插，下垛柴堆，縱火焚棺，候焰盛之際」，婢妾「滿頭帶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跳號哭，良久，攛下火內，同主屍焚化，此為殯葬之禮」。因風俗不同，不少地區的民眾還常與穆斯林商人發生衝突。


文郎馬神
咸食以蕉葉為盤及通中國
乃漸用磁器又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

明代《東西洋考》中記載的文郎馬神國。

在爪哇東部，鄭和船隊還觀摩了一場以命搏利的「竹槍會」。兩名爪哇男子隨鼓聲韻律搏鬥，雙方的妻子和女奴則緊侍一旁。若有人被刺死，得勝方會給死者的家人一枚金幣，然後帶走其孀婦或女奴作為獎品。

明朝《東西洋考》還記載，爪哇中一個叫作文郎馬神國的地方，那裡的人用蕉葉為食器，把菜湯澆入米飯，用手搓食。與中國人接觸與貿易後，逐漸改用陶瓷食器。文郎馬神國，位於今天印尼加里曼丹島南部班格爾馬辛一帶，在明代時與中國商船往來貿易密切。

另外，爪哇人「最喜中國青花瓷器」。福建的茶葉種植也傳入爪哇，茶葉「味頗不惡」。豆芽、豆腐、甜醬、豆醬等吃食的製作方法，也在那一時期從中國傳入爪哇並深受當地人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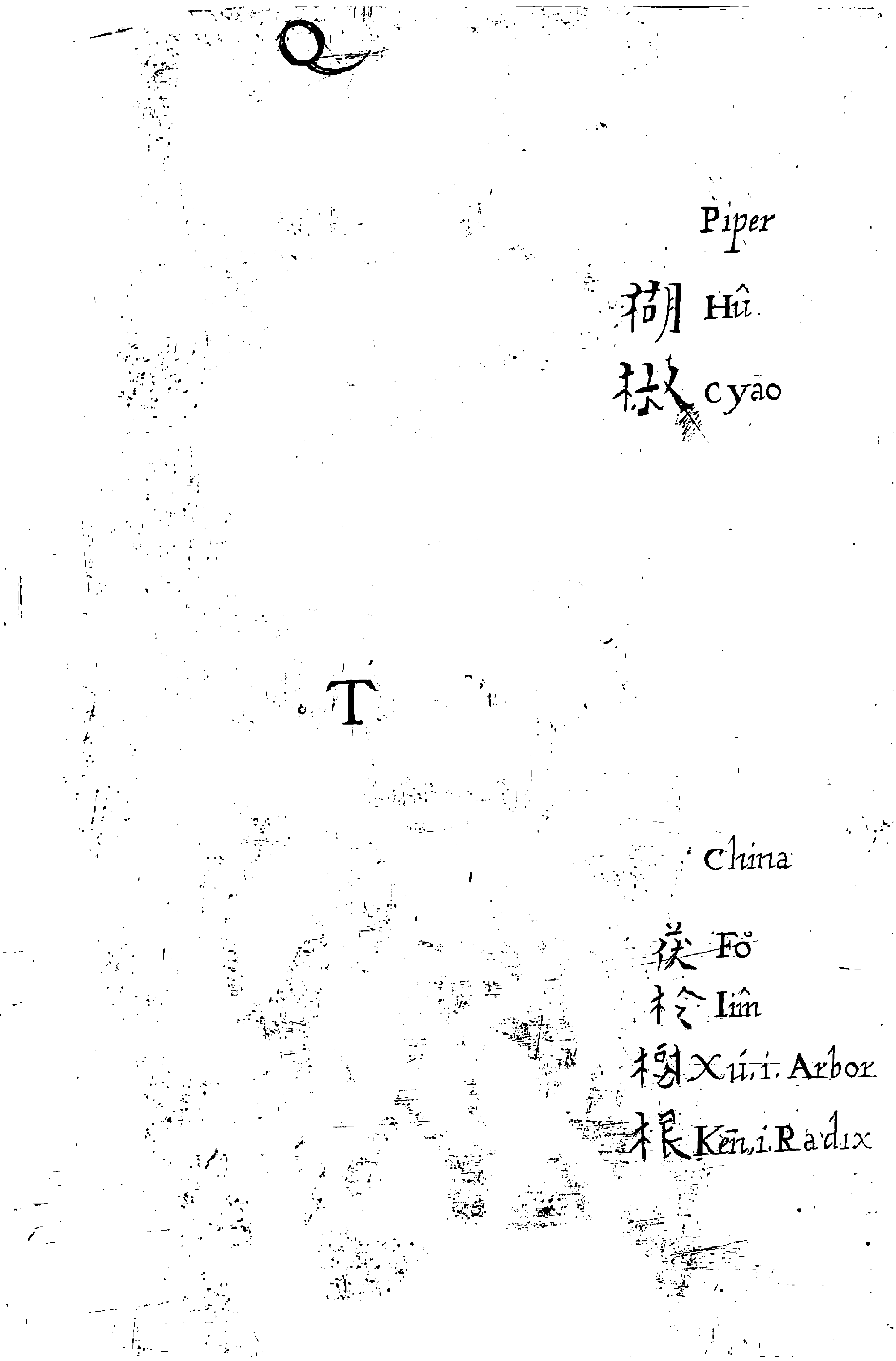
鄭和信仰伊斯蘭教，他率領的船員中不少是穆斯林，隨船的還有不少穆斯林學者。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於1406年到達爪哇島。上島後，鄭和及其船隊成員在安哥（今雅加達）、井里汶、杜板（今圖班）、錦石、惹班等地興建清真寺，通過傳播伊斯蘭教「導以禮義，變其夷習」。那時的清真寺並不只是宗教場所，同時還兼具學校、醫院、集會場所等功能，因此，許多當地人逐漸信仰了伊斯蘭教，同時不少華人也「投禮回回教門」。

在建築風格上，鄭和所建清真寺具有鮮明的「中國塔式風格」，與傳統的阿拉伯清真寺存在明顯差別。由鄭和帶入爪哇的這種「中國風」後來甚至影響了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清真寺風格。

鄭和推動了伊斯蘭教在爪哇的傳播，更把一種文明生活方式帶到了當地。

爪哇「名片」胡椒和糖

鄭和下西洋時代，明廷雖有海禁，但仍有大批華人移居爪哇，對爪哇的海港開發建設和國際貿易發揮了很大作用。《瀛涯勝覽》記載，爪哇每個港口幾乎都有華人居住，杜板港人口「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為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泉州人……於杜板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革兒昔（即錦石），原係沙灘之地，因是中國之人來此創居，遂名新村。至今新村村主廣東人也……行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即泗水），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餘家，其中亦有中國人。」


Q

Piper
胡 Hû
椒 cyao

T

China
茯 Fô
苓 lîn
樹 Xú,i. Arbor
根 Kēn,i. Radix

AROMATICÆ ARBORES.

Q

PIPER.

A Sinis Hu cyao. Dicitur, & æſtimatur, in Junnan & ſubjectis Inſulis illorum Imperio naſcitur, & præcipuè in Iava, & Borneo Malabarûmque ſylvis, ſerpit inſtar ſarmenti, & nodos ſicut vitis habet, ex quibus ſingulis producit folia, & à parte interiore obſcura, & à parte exteriore viridia. Si maſticentur, mordicant linguam; ferunt ſexum in pipere reperiri: folia quæ diſtantes fibras in ordine æquali habent, fæminam repræſentant, quæ verò in ordine inæquali maſculum. Differentiam prædictam ſexus & foliorum diverſitatem in vno eodemque ſarmento ſpectare licet. In ſylvis aliud, aliud in hortis naſcitur, & cinere fimoque boum impinguatum, in tantùm excreſcit, in quantùm & arbor cui innititur. Radix Piperis exigua in terræ ſuperficie hæret, ex quolibet folio ejicit vnum racemum, maximus continet quinquaginta grana, minimus triginta. Viride dulce eſt, nam interiùs melleo liquore illitum eſt. Incolæ necdum maturum, ſale & aceto conditum comedunt. Longum Piper oculorum morbis, & contra venena inſervit. Nigrum ab albo differt, quod folium teneriùs, meliorisque ſaporis habeat, verumtamen nigri piperis folia, dolores colicos, & ventris frigidos morbos ſi applicentur cum oleo decocto abigere poſſunt. Semper Piperis racemi in ſarmento virent, Decembre vel medio Ianuario matureſcunt, collectique in Sole denigrantur. Si aliquis Piper immaturum colligat, citiùs corrumpitur. Grana racemorum, ſimillima ſunt Iuniperi granis. Piper eſt calidum, provocat vrinam, digerit, reſolvit, clarificat viſum, morſibus ferarum medetur, extirpat mortuum fætum, cum Iulepe ſumptum tuſſim ſedat, cum melle ſquinatiam; cum folijs lauri torſiones ventris tollit, cum aceto autem apoſtema & duritiem Lienis, & ſi ſumatur cum uvis paſſis, ſuaviter purgat capitis phlegma. *Deſcriptionem radicis Chinæ, vide ſub littera I Columna 3.*

H 2 C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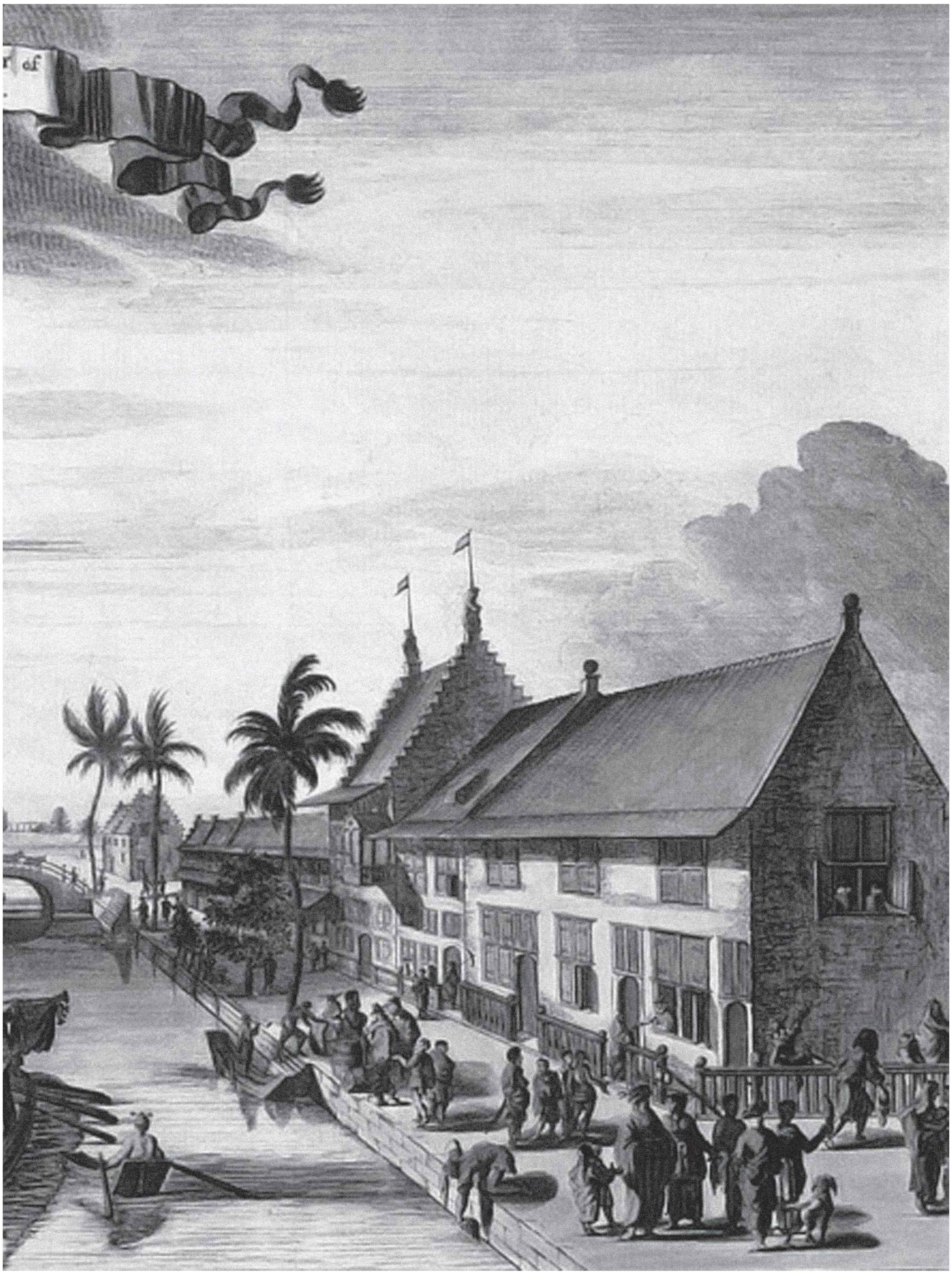
17世紀波蘭傳教士邁克．伯姆（卜彌格）所著《中國植物志》中的胡椒等植物。這本書是把中國及東南亞動植物以繪圖方式介紹給西方的早期作品之一。

這些中國移民在爪哇國得到不錯的待遇，不少華人在當地擔任公職。《明實錄》記載，華人在爪哇任職者有通事（即翻譯）良殷、南文旦、林旋、陳惟達、宗敬等等，華人官員主管與分管的領域均與明朝貢舶貿易相關。

對於當時全球商人來說，最搶手的爪哇貨，一是胡椒，二是糖。澳大利亞人傑克．特納在《香料傳奇》一書中寫道，西方人的艦隊浩浩蕩蕩地駛向東方，在南海周邊停留，採購胡椒等香料滿載而歸，再通過亞歷山大港轉運地中海各地。西方人對香料的癡迷，僅從英文「spice」（香料）這個詞就可以看出。「spice」源於拉丁語「species」，指貴重的小物品。

當然，香料也是中國古人追尋的重要商品。宋代《諸蕃志》記載，為了購買爪哇的胡椒，中國曾有一段時間流失大量銅錢。《瀛涯勝覽》則記載，爪哇的胡椒市場上，胡椒每斤三貫銅錢，人們摩肩接踵，商品山積，交易使用中國銅錢。一直到明朝，爪哇的胡椒市場依舊火熱。洪武十五年（1382年），爪哇一次進貢「胡椒七萬五千斤」。葡萄牙商人法蘭西斯科．德．薩記錄下1527年中國商船在萬丹、雅加達等港口採購胡椒的情況。「每年自漳州有帆船20艘駛來，共裝載3萬奎塔爾的胡椒。」1奎塔爾約合59公斤，也就是說，當年每年漳州船要從爪哇進口胡椒大約177萬公斤之多。中國人不僅僅從爪哇進口胡椒，還在栽培技術上對爪哇人進行指導，進而逐漸參與到當地胡椒的生產和推廣層面，成為爪哇胡椒種植業的推動者。

史料記載，中國人在爪哇傳授給當地人一種胡椒插樁種植法，即設法使胡椒藤蔓纏繞在木樁上而不讓它纏繞在胡椒樹幹上。新的種植法可以使胡椒植株得到更多陽光照射和養分補給，使胡椒更易於密植，提高產量。





荷蘭畫家約翰．約荷夫1732年繪製的巴達維亞港。

除了胡椒，爪哇的糖也聞名世界。大量歷史資料證明，爪哇製糖業的首創者和推廣者都是華人。一本記述雅加達港見聞的荷蘭史書《古巴達維亞》指出：「早在17世紀，華人已在巴達維亞創辦蔗糖廠，用中國的榨糖方法煉製蔗糖，用水力轉磨，壓榨甘蔗，取汁煉糖。」日本學者福田省三在《荷屬東印度的華僑》一書中則考證出，18世紀初，巴達維亞附近的130家製糖廠中，有125家為中國人經營，雇工總數達2.5萬人。

爪哇的軍火出口

爪哇的胡椒和糖一度是南海周邊貿易中的「拳頭產品」。同時，經濟的活躍也帶動爪哇國各方面的發展，例如科學技術。

爪哇的造船技術在當時的東南亞國家中堪稱一流，爪哇叭喇唬船名揚四海。這種船是單帆船，在船艙中部設有船櫓。特殊的結構使其輕快靈便，航速非常快，易於轉向，行動自如。爪哇商人用這種船穿行各方海岸之間，載貨貿易。葡萄牙人到達爪哇後，很快就發現了這種快船的方便性，開始使用叭喇唬船用於貨物運輸。

在歷史上，曾有不少南海周邊古國從中國進口或者通過朝貢貿易的方式獲得一些軍需火器。但殊不知，中國也從周邊國家進口一些先進的武器裝備。



中國古籍中繪製的叭喇唬船。



印尼古代石刻中的古代船隻。

叭喇唬船在明朝時流入中國，並在中國實現了「國產化」。但卻主要用於水師戰船，服役於浙江和福建水師。史料記載，明朝水師將這種快船作為哨船使用，在抗擊倭寇時發揮了一定作用。

除了裝備叭喇唬船以外，明朝軍隊還裝備了爪哇產的火器，稱為爪哇銃。這種火銃與爪哇船一樣，也以小巧靈活著名，射擊精度高，可用於打鳥。當時中國進口並裝備軍隊的外國銃不僅來自爪哇，還有佛郎機，即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之下，「佛郎機銃大、爪哇銃小」，但前者精準度不如後者。《海國廣記》記載，爪哇「甲兵火銃為東洋諸蕃之冠」。《廣東通志》描繪：「爪哇銃小，（爪哇）國人用之甚精，小者可擊雀。中國人用之，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一掌一臂。」

華人反殖民之役

從16世紀初開始，無論是南海、蘇拉威西海還是爪哇海，都漂蕩著西方殖民者貪婪的影子，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與英國爭相侵占商業利潤。

葡萄牙、西班牙開始在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附近海域展開商業競爭。到了16世紀末，荷蘭擺脫西班牙統治，崛起為「海上馬車夫」，開始把觸角延伸到爪哇。荷蘭人看中的就是爪哇以胡椒為支柱的香料貿易。

荷蘭殖民者打破原有的利益共用和諧共處的貿易秩序，企圖獨佔壟斷。荷蘭將分布在爪哇的各個公司合併組成荷蘭東印度公司。這個公司名為企業，實質上為荷蘭政府代理殖民事務。荷蘭國會不僅允許它招募軍隊、建築炮臺、發行紙幣、任免官吏，甚至委派它代表荷蘭國會與殖民地政府締結條約。有此「職能」，它開始有恃無恐地欺壓甚至屠殺爪哇商人及百姓。例如，在安汶島和班達島，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給出的香料收購價低到無法接受，當地人暗中將豆蔻等香料賣給他國商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得知後，便把班達島上1.5萬居民殺戮殆盡，安汶島人口也在屠殺中從15萬驟降至5萬。此外，明代中國的多本著作提到，荷蘭人還在爪哇大搞奴隸貿易，兜售「昆侖黑奴」。「昆侖」是中國古代對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等島嶼地區的統稱。

18世紀，爪哇各地抵抗殖民者的運動可謂風起雲湧，其中比較著名的是爪哇的「紅河之役」，也稱為「紅溪之戰」。

1740年，爪哇的華人聯合當地人製定了周密計畫，打算兵分兩路，一路從丁加蘭拔掉荷蘭人的據點文登墟炮臺，一路再從望加寺端掉荷蘭兵營，若得手，兩路合兵進入雅加達，抓捕殖民頭目。不過，由於叛徒洩密，這一計畫被荷蘭殖民者提前知曉，起義事發。攻擊荷蘭兵營的部隊遭受重大傷亡，攻擊炮臺的隊伍也久攻不下，部隊轉而直接進擊雅加達，在雅加達周邊苦戰7日，最終以失敗告終。荷蘭殖民者為報復，殺死雅加達所有被捕的華人，炮擊華人聚居區，洗劫華人商鋪。史料記載，屠殺後，雅加達河河水變成了紅色。據傳，正是在那之後，雅加達河更名為紅河，這次由華人聯合當地人一起共同反對殖民者的起義也被稱作是「紅河之役」。

「紅河之役」雖然告敗，卻激發了爪哇全島的反殖民浪潮。殖民主義打破了和諧互利的爪哇商業秩序，也在南海文明中打下了貪婪、血腥的楔子。一片美好的爪哇桃花源也就此被淹沒在數百年的殖民史中。

07 麻六甲，南海的寶瓶口

如果說南海是多元文化寶庫，那麼麻六甲海峽就是這個寶庫的寶瓶口。

通過這個寶瓶口，當南海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或者說當文明發展到有外溢需求的時候，南海周邊的人們就開始穿越這個寶瓶口去探尋新的需求市場；通過這個寶瓶口，中國的古人們與南海周邊國家共同摸索出聚合了商業、文化、政治、宗教等各種觀念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同樣是通過這個寶瓶口，波斯文明、印度文明這些外來文明也向南海伸出探索的觸角，並向這一區域輸入新的文化與宗教；當然，也是從這個寶瓶口開始，西方殖民者打開了南海的大門，開啟了歷時300多年的大殖民時期。

近現代各種勢力在麻六甲的爭奪，以及直至今天都被很多國家納入戰略考量的麻六甲的戰略地位，其實只不過是古代麻六甲傳說的延續。麻六甲的地緣地位，是地殼運動賜予的恩惠，而麻六甲所經歷的磨難，則反映了人類活動對自然恩惠的覬覦。在整個南海文明中，麻六甲時而是商業繁榮的縮影，時而是萬國雲集的都會，時而是明爭暗鬥的沙場，時而又是野心家和貪婪者刀俎下的魚肉。天賜的恩惠，讓麻六甲在南海文明中是那樣的不同。



歐洲人1750年繪製的荷蘭殖民下的麻六甲。

7世紀，唐朝伊始。位於中南半島的扶南國如山崩一般衰落，而同一時期，位於麻六甲南方蘇門答臘島上一個名叫室利佛逝的王國迅速崛起，很快從扶南手中接管了麻六甲海峽的控制權。

這兩件大事，互為因果，互有關聯，乃至於兩者共同演進為南海文明史中的一件大事：東南亞早期文明的中心從陸地轉向島嶼，從中南半島腹地轉向南海寶瓶口——麻六甲海峽。

扶南在鼎盛時期曾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其勢力範圍往南一直延伸到整個馬來半島，掌握了麻六甲海峽的控制權。只不過，1世紀至6世紀的古代南海交通史上，海運中心集中在馬來半島的中北部區域，即今天半島上緬、泰兩國毗連地帶。當時，那一片區域有一個叫作頓遜的古國，向扶南稱臣。7世紀前，在頓遜國及其周邊狼牙修國等國興起一大片沿南海暹羅灣和印度洋安達曼海而生的港口群，正是這些港口群，扮演著南海與印度洋之間的大通道。受當時航海技術的限制，麻六甲海峽並不是跨洋航運的主通道；受當時軍事能力的限制，麻六甲海峽的戰略地位也尚未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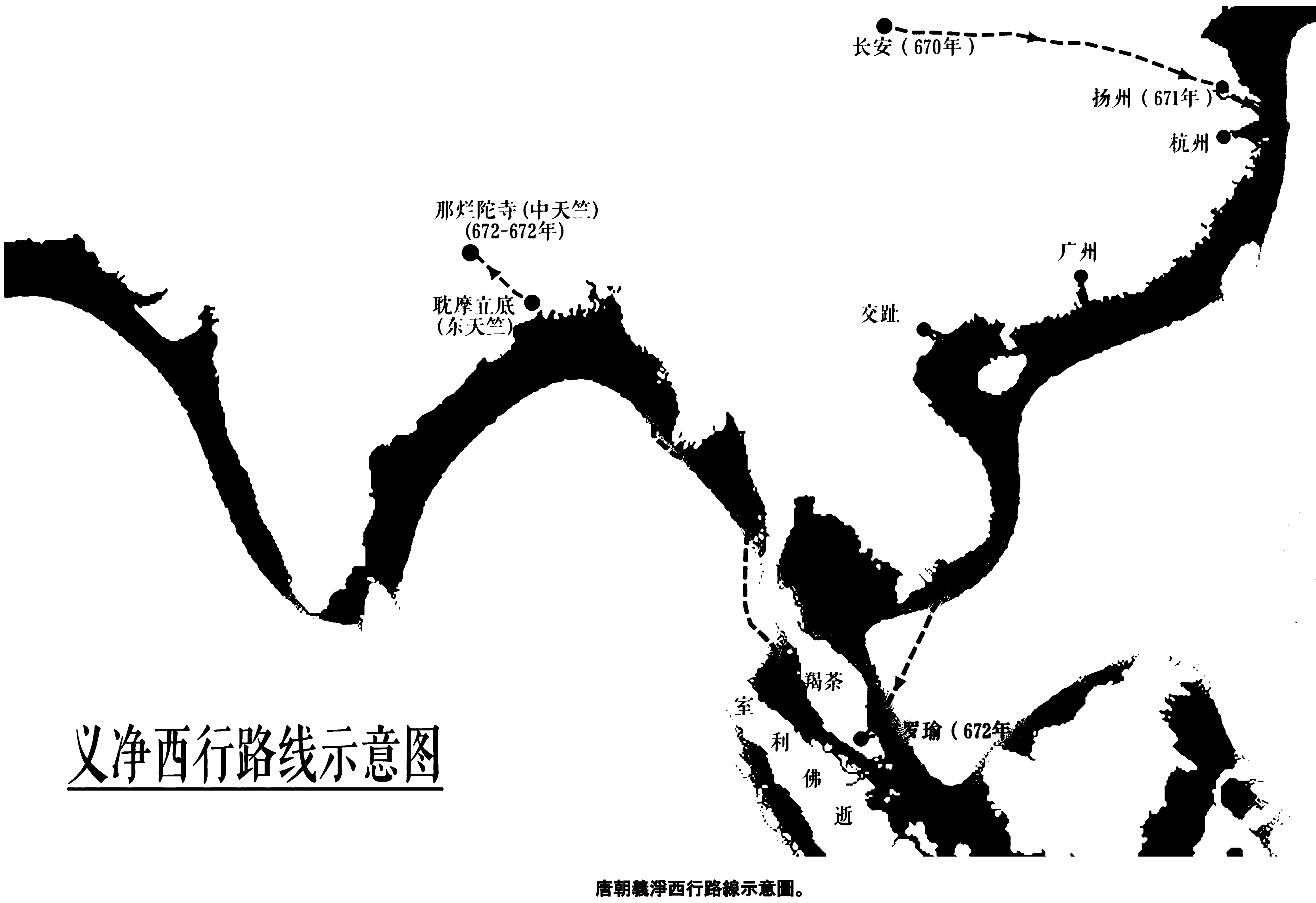
5世紀末，強大的扶南進入了跋摩王朝中期，出現內憂外患。內憂是跋摩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越來越激烈，使得集權統治變得越來越鬆散和低效；外患是北方屬國真臘不斷壯大，時有南侵，致使扶南疲於應戰而逐漸失去了對其他屬國的控制力。其實，在扶南歷史中，扶南主要憑藉政治外交技巧和地緣貿易體量稱雄一方，而非窮兵黷武或四處征戰。這一點，中國古人在《南齊書》中用五個字就精闢概括了：「（扶南人）性善，不便戰。」因此，當7世紀中葉真臘重兵來襲時，扶南在節節敗退和被迫遷都之後不久，就土崩瓦解了。

伴隨扶南的衰亡，馬來半島上的一些小國又進入一個沒有大國依仗的時期，麻六甲海峽變成一片「無主」海域。而此時的室利佛逝，已經走向繁榮，取代扶南成為東南亞新霸主的時機成熟了。

如果不從扶南自身的原因出發，而從南海文明發展的角度看，扶南的衰敗以及室利佛逝的取而代之，是歷史軌道上的必然。6世紀前後，航海技術大發展，遠洋航行越來越通達，成本越來越經濟，航海經驗的累積使得航海風險也大幅降低，原先經由暹羅灣登陸、陸路跨越馬來半島地峽、再由半島西岸港口群重新啟航的跨洋交流路線變得不再那麼方便，麻六甲海峽、巽他海峽航線越來越成熟，這些因素共同促成南海與印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東西方通道徹底變軌。如果說，在中國漢代，馬來半島地峽在東方人海路探索西方過程中還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那麼到了隋朝後期，半島地峽的不可替代性已經幾乎喪失殆盡，到了7世紀，麻六甲海峽已經完全替代了半島地峽，成為文明交會的主通道。通道的轉換和優勢的喪失，削弱了扶南的實力，為室利佛逝的強大創造了重要機遇。

唐代中國古籍中有兩份材料充分證明了麻六甲海峽當時已是東西方交流航線的不二選擇。一是地理學家賈耽所著文章《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錄了唐朝南海航線的走位：從廣州出發，過海南島東南，沿南海的印度支那半島東岸而行，過暹羅灣，順馬來半島南下，至蘇門答臘島東南部，航抵爪哇島。再西出麻六甲海峽，經尼科巴群島，橫渡孟加拉灣至斯里蘭卡，再沿印度半島西岸行，過阿拉伯海，經霍爾木茲海峽抵達波斯灣，溯幼發拉底河至巴士拉，又西北陸行到底格里斯河畔的阿拉伯帝國都城巴格達。繼續西行，除陸上通往地中海外，還可由波斯灣再出霍爾木茲海峽，沿阿拉伯半島南岸西航經阿曼、葉門至紅海海口的曼德海峽，南下至東非沿海各港。

第二份材料是唐朝義淨和尚印度取經的路線圖。671年，義淨從廣州乘波斯商船，經南海抵達馬來半島最南端的末羅瑜國，而後穿行麻六甲海峽，途經位於今天馬來半島西南側吉打地區的羯荼國，抵達印度。他還記錄到，這條航線上不僅有波斯船隻，還有很多國家的官船，證明當時的麻六甲海峽已經成為東西方海上往來的主要通道。從航行的時間看，義淨從廣州到室利佛逝只用了大約20天時間，從羯荼國到東天竺也只花費了半個月時間，如果他一路不停歇地海上航行，他用不了三個月時間就可以到達印度。相比之下，玄奘取經歸來時，馬不停蹄地花了兩年時間才返回長安。再對比《漢書．地理志》中的記述，漢代時，如果從廣東坐船出發到暹羅灣、步行穿過馬來半島、再上船西行到達印度，大約需要一年時間。由此推斷，唐朝時的航行技術已經有了很大改觀，航速大幅增加，這使得繞行麻六甲前往西方在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上都遠遠優於陸地線路和地峽通道。事實證明，與義淨同一時期西行印度的數十名唐代求法僧中，大多數都選擇了麻六甲航線。



唐朝義淨西行路線示意圖。

麻六甲地位的快速攀升，也與當時唐王朝開闢的市舶制度不無關聯。618年，唐朝確立統治地位後隨即大開國際貿易和對外開放之門，重視南方外貿樞紐地位，一方面允許中國商人遠渡重洋經營貿易，另一方面給外國客商種種優待和鼓勵，使得對外貿易和手工業形成供需關係的大發展，絲織品就是其中的代表。藉助絲織品和海上絲綢之路，唐朝與波斯、阿拉伯建立起緊密的貿易關係，催生出廣州等南方貿易大港，也使得很多波斯、大食的商人定居中國南方。那時的廣州已經是「千舶萬艘、交互往還」，更不用說麻六甲海峽百舸爭流的盛況了。

由此可見，麻六甲的易主，東南亞中心的南遷，以及室利佛逝的興起，是南海文明歷史發展階段的必經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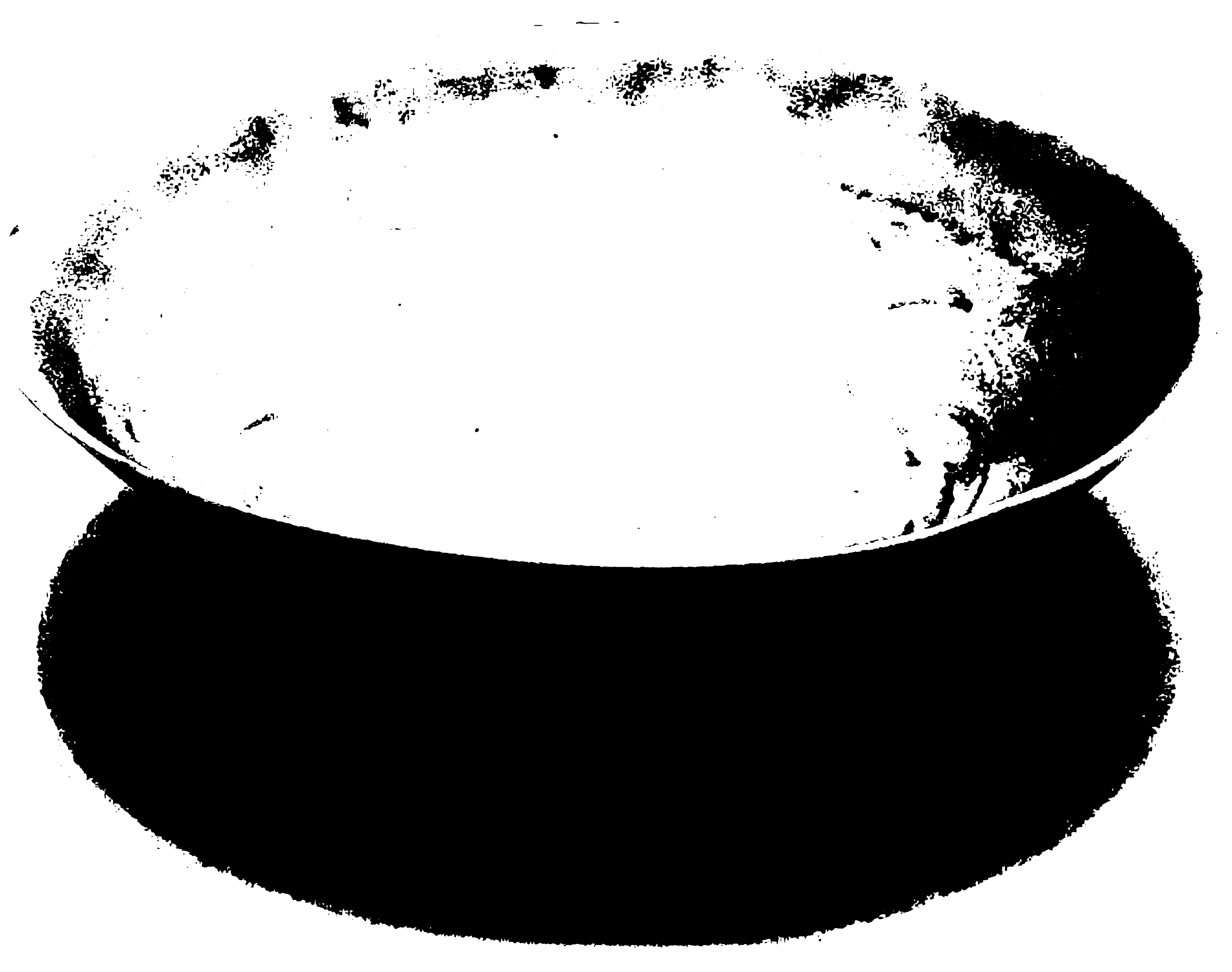
靠海峽發家的室利佛逝

東南亞古代文明，之所以難以復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很多古國並沒有史官記載歷史。即便少數國家有這樣的文字記錄，但因為文字的載體大多為貝葉等易於腐爛的材料，使得這些被記錄下來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遺失得只剩下隻字片語。

但有一種記錄形式留存至今，成為今人窺探古代歷史不可多得的憑證，那就是碑銘。例如，1833年，泰國古都素可泰出土了一塊13世紀碑銘，涉及素可泰王朝早期的原始法律、政治經濟、歷史宗教等各個方面，並且明確記載了泰文為蘭甘亨國王所創造，在此碑銘之前沒有泰文，這為研究泰國古代史填補了重要空白。

室利佛逝不同於素可泰，素可泰至少把民族、宗教、語言、文字和很多文化內涵一直傳承到今天的泰國，而室利佛逝，則把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都留在了歷史中，幾乎沒有成體系地繼承。今人瞭解室利佛逝它那將近700年的歷史，幾乎完全靠兩種文字材料和一種實物材料。兩種材料分別是，迄今發現的6塊7世紀末室利佛逝碑銘以及中國古代史籍關於室利佛逝的記載；實物材料是，歷朝歷代在南海中發現的古代沉船。在復原南海文明時，沉船往往扮演著非常獨特的講述者，沉船的時間、地點、人物、貨品等每一個細節，都是「品相最好」的塵封歷史。

6塊碑銘中，一塊刻於683年的碑銘記載了一位名叫希昂的大首領，為了獲得神通，率領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從海陸兩路出發四處探尋，最終獲得一塊土地，因此在土地上興建一城，命名為室利佛逝。這使得作為一個國家的室利佛逝找到了自己的原點。第二塊碑銘刻於684年，它記錄了首領下令在蘇門答臘的巴領旁建造佛園，敬奉佛家三寶，即佛、法、僧。這表明室利佛逝已定都巴領旁，並從建國之初就信奉大乘佛教。另兩塊發現於其他地方的、刻於686年的碑銘記載了室利佛逝當年已獲得更大的土地，並且正準備攻打爪哇，控制麻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建國後的第四個年頭，室利佛逝已經把控制兩大海峽作為國家目標。





圖為南海一號沉船出水的南宋青白釉瓷器。

室利佛逝很快如願以償了。到7世紀末、8世紀初，室利佛逝已經掌控了蘇門答臘全境、馬來半島南部和中部地區。到8世紀末、9世紀初，很多阿拉伯古籍和中國古籍都記載到，室利佛逝已經成為南海中的大國，不僅控制了馬來半島全境和蘇門答臘島，甚至還把勢力範圍延伸至印度南端。那時的南海周邊，北有中國，中南半島是真臘，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是室利佛逝，爪哇島有闍婆。到了中國的宋朝時，室利佛逝已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南海段的重要商品集散地。趙汝適在《諸蕃志》多篇文章中提及室利佛逝的海上貿易中轉地位。這些文章說到，當時北非和阿拉伯地區的很多珍貴香料，如乳香、金顏香等，都需要從室利佛逝獲得。「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遠，

番舶艱於直達……本國（大食）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中國古籍自10世紀起改稱室利佛逝為三佛齊）貿易，賈轉販於中國。」貿易中轉使室利佛逝迅速成為南海中的國際商業中心，使其陡然而富。



明代仇英所作《職貢圖》中描繪的三佛齊國來使場景。

室利佛逝的鼎盛時期在8世紀至11世紀，很難估算在那300多年間室利佛逝財富增長的速度。但通過中國和阿拉伯史籍的記載，可以從側面反映出當時作為國際商都的室利佛逝、或三佛齊有多少財富。

903年，阿拉伯商人盧思德提到，室利佛逝的國王是南海和印度洋諸國中的「諸王之王，印度諸王無如其大，居住島中，收入甚多，富強無比」。另有阿拉伯商人阿布．賽義德．哈桑描述說，室利佛逝國王每天清晨都要看著總管把一塊金磚投入池水中，以此作樂。還有其他商人說，室利佛逝國王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取樂，而是一種儲藏財富的方式。中國南方也有廟碑記載，去三佛齊經商，往返不到一年，但可「獲利百倍」。

室利佛逝勢力的迅速膨脹，與其掌控麻六甲海峽有著密切聯繫。所謂掌控，有三層含義。一是室利佛逝在地理上控制水道要衝，用《諸蕃志》的原文說，就是三佛齊「國在海中，扼諸蕃舟車往來之咽喉」。其二，室利佛逝對麻六甲海峽實施武力壟斷。宋代地理書《嶺外代答》記載，室利佛逝沒什麼土產，但人人習武，精通水陸戰鬥。有別國船隻過境時，必須登岸，否則就動武全部殺死。其三，室利佛逝積極參與國際貿易，不僅充當中國、印度、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貿易中轉站，而且還主動與中國及印度進行官方和民間貿易，使中國和印度、中國和阿拉伯之間的直接貿易減少，經由室利佛逝進行的中轉貿易增加。在三個層面的措施，使得室利佛逝從7世紀到11世紀末，一直可以挾麻六甲以令一方。

麻六甲海峽這棵搖錢樹，在讓室利佛逝富到流油的同時，也讓周邊一些國家饞到眼紅。

11世紀的室利佛逝，在它最鼎盛的時候，開始受到了挑釁。一是位於它東側的東爪哇馬打蘭王國不斷海上擴張，並與室利佛逝發生正面衝突。最終，馬打蘭王國的國王被室利佛逝所殺。二是位於室利佛逝西側的南印度注輦王朝向室利佛逝發動了大規模海上進攻，殺死了室利佛逝的國王之後退兵。這兩次衝突大大削弱了室利佛逝的國力，致使室利佛逝對其屬國的控制力大幅削弱。到了11世紀中後期，室利佛逝為了集中精力對付西側的注輦王朝，與東側的馬打蘭王國聯姻求和，並且離開巴領旁，向北遷都至占碑。到了12世紀後期，東爪哇不斷強盛，使室利佛逝反過來向爪哇稱臣。

進入13世紀，南海區域又發生了幾個大事件，直接將室利佛逝推向滅亡的邊緣。一是麻六甲海峽區域的海盜猖獗起來，劫掠各路船隻，致使很多商船改道巽他海峽，麻六甲的現實地位一落千丈；二是，在中南半島興起的素可泰王朝打敗了真臘，逐漸強大並向南擴張，從室利佛逝手中奪取了包括狼牙修等國在內的大多數馬來半島中北部國家的控制權；三是爪哇馬打蘭王國中分裂出的另一個王國新柯沙里王國迅速強大，四處攻城掠地，先後征服巴厘王、巽他王，並對室利佛逝發起了長達十多年的遠征。1286年，新柯沙里攻入室利佛逝都城，標誌著室利佛逝完全喪失了大國地位，此時，麻六甲和巽他兩個海峽都已經落入爪哇人之手。

室利佛逝並未就此滅亡。此時的爪哇內部權力爭鬥愈演愈烈，新柯沙里王國危機四伏。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因遣往新柯沙里的使臣反遭黥面之辱而出兵征討新柯沙里。元軍未到，新柯沙里的一位王族將領就起兵造反，殺死了國王格爾塔納加拉。不久後，元軍抵達爪哇，格爾塔納加拉的女婿利用元軍的力量打敗造反的叛軍，建立起一個新的王國，麻喏巴歇王國，即大名鼎鼎的滿者伯夷王國。

14世紀，滿者伯夷王國在加強中央集權並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一系列改革之後，開始了大規模擴張，向東征服了峇里島，向北控制了婆羅洲和菲律賓群島的一部分，向西征服了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南部地區，正式給室利佛逝和三佛齊的歷史畫上句號。滿者伯夷成為東南亞的新霸主。在坐上頭把交椅之後，滿者伯夷首先就在麻六甲海峽設立據點，控制貿易航路，把南海的寶瓶口緊緊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從11世紀到14世紀，麻六甲海峽的控制權幾度易手。歷史也證明，南海中的這條黃金水道，在商業上是香餑餑，但在政治上卻是一個不太好接手的燙手山芋。



室利佛逝鼎盛時期的核心範圍及勢力輻射示意圖。

南海地緣政治中的外交

作為地緣政治爭奪的焦點，自室利佛逝之後，麻六甲歷史中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主人能像室利佛逝或三佛齊那樣控制它數百年的時間。滿者伯夷王國接管麻六甲後沒幾年就衰亡了。15世紀初年，一個以麻六甲為中心的新興國家麻六甲王國（中文古籍中稱之為滿剌加王國）出現了。

麻六甲王國崛起的全過程，與南海的地緣政治緊密關聯，特別是與鄭和下西洋這一南海歷史中的重大事件直接掛鈎。

依據《馬來紀年》、《暹羅古代史》、《瀛涯勝覽》、《明史》等古籍對麻六甲王國早年的記述，基本上可以還原出這個15世紀新興國家的建國史。在室利佛逝被滿者伯夷所滅之前，有一位室利佛逝的王子叫作拜里米蘇剌，帶著自己的三千隨從親信流亡到了馬來半島小國單馬錫王國（即淡馬錫王國，今天的新加坡），因為那裡的國王是拜里米蘇剌的親家（一說為岳父）。但就在拜里米蘇剌到達單馬錫第八天，單馬錫國王突遭刺殺。此時，中南半島上興起不久的阿瑜陀耶王國（今泰國）一口咬定是拜里米蘇剌刺殺了單馬錫國王，並隨即起兵趁機侵佔單馬錫，把新加坡城夷為平地。拜里米蘇剌不得不越過柔佛海峽，逃到馬來半島上一個小村莊藏身。拜里米蘇剌在這個原本海盜聚集的村子裡經營了幾年，修築城池，在1400年前後創立了麻六甲王國。

拜里米蘇剌在建國之初，甚至是在還沒有建國時，就很明白自己的發展道路：依附大國而生。他派遣使者前往明朝，名為覲見，實為求援，因為來自阿瑜陀耶王國的威脅尚未解除。《明史》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遣使前往麻六甲，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拜里米蘇剌大喜，派使者與明朝使者一同返回。1405年，明成祖正式封拜里米蘇剌為麻六甲國王，使周邊國家不敢侵犯。1411年，拜里米蘇剌帶著妻兒與陪臣540餘人親往南京，受到明成祖隆重接待和賞賜。從此，麻六甲王國與明朝的友好關係建立起來。在拜里米蘇剌之後，麻六甲王朝連續兩位國王都受封於明廷，其中二世王於1414年前往南京，三世王西里麻哈剌於1425年和1433年兩次訪問明朝。西里麻哈剌在位（1424—1444年）的20年是麻六甲王國最為繁榮昌盛的時期。那時的麻六甲王國不僅控制海峽，其勢力範圍還延伸至馬來半島北部以及蘇門答臘地區。史料記載，那一時期的麻六甲已經從村莊變成了國際商貿大都市，船帆林立，商旅繁榮，在市面上能聽到的各種外語多達80種。

麻六甲王國與明朝的交好，使得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六次在麻六甲停靠。

1405年，鄭和率舟師首次下西洋，次年抵達麻六甲。拜里米蘇剌國王親率王公大臣到麻六甲港迎接，舉行盛大隆重的歡迎儀式。

1408年，鄭和二下西洋。《瀛涯勝覽》記載，麻六甲王國這一次專門為鄭和的寶船建造柵欄和水寨，用以保護，並設專人日夜看守，實際上打造了一個鄭和水軍在麻六甲的海軍基地。此後，鄭和4次經停麻六甲，船隊受到了極高的禮遇。

在那時的南海政治舞臺上，麻六甲與明朝的親密令別國羨慕，因為這種親密關係，在無形中可以化解很多危機。在鄭和第三次下西洋（1413年）駐紮麻六甲期間，麻六甲王國與爪哇國因單馬錫和蘇門答臘歸屬問題劍拔弩張。鄭和見狀，說服雙方偃旗息鼓，充分展示了止戈為武的大國能力。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期間，還於1432年專門前往阿瑜陀耶王國，解除了麻六甲王國與阿瑜陀耶王國的臣屬關係。此前，麻六甲王國使者前往明朝廷，稱阿瑜陀耶意欲侵犯麻六甲。鄭和到達阿瑜陀耶王國後受到禮遇，阿瑜陀耶國王承諾暫停發兵麻六甲，並且免去麻六甲年貢4000兩黃金的慣例。

1433年，鄭和病死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返航途中。當船隊經停麻六甲時，三世王西里麻哈剌決定隨船隊北上來朝。西里麻哈剌到達南京時已是冬天，明宣宗考慮到南人禁不起天寒，便讓西里麻哈剌等人先住南京，待次年春和日暖再朝北京。宣宗在此期間還命令船舶司專門為西里麻哈剌三世建造九桅廣船一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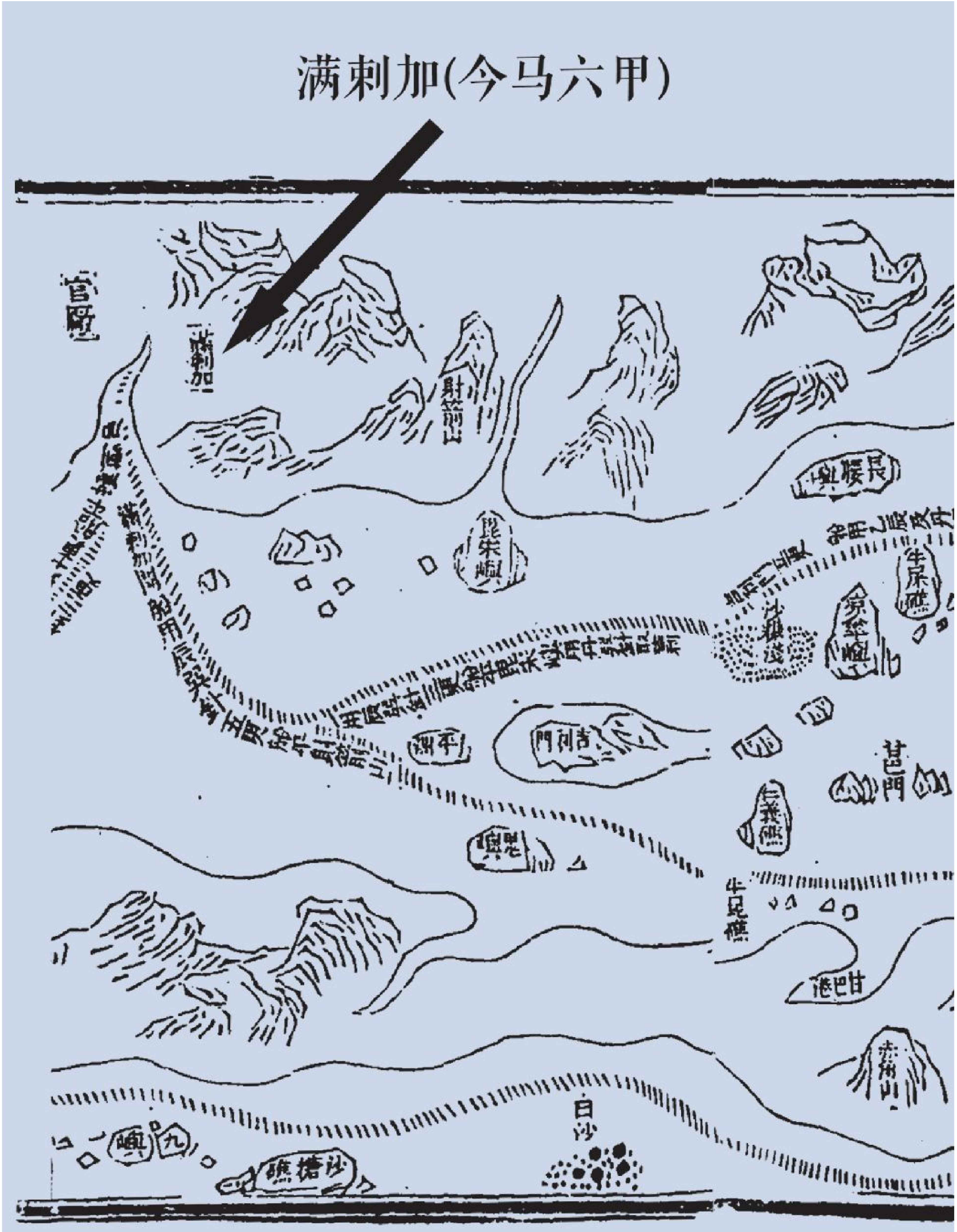
事實上，在麻六甲王國興起的短短幾十年間，麻六甲成為中國歷史上技術輸出最多的南海古國。鄭和在多次造訪麻六甲期間給麻六甲帶去了大量人才和技術，他不僅讓隨行船工幫助麻六甲打造大船，還專門為麻六甲捎去鑄幣技工，使麻六甲王國有了通用貨幣。鄭和在麻六甲督工築路修橋、鑿井取水，教當地人飼養耕牛、播種水稻，在當地培育泥瓦工，幫助當地人圍獵氾濫的鱷魚並用鱷魚皮製作鞋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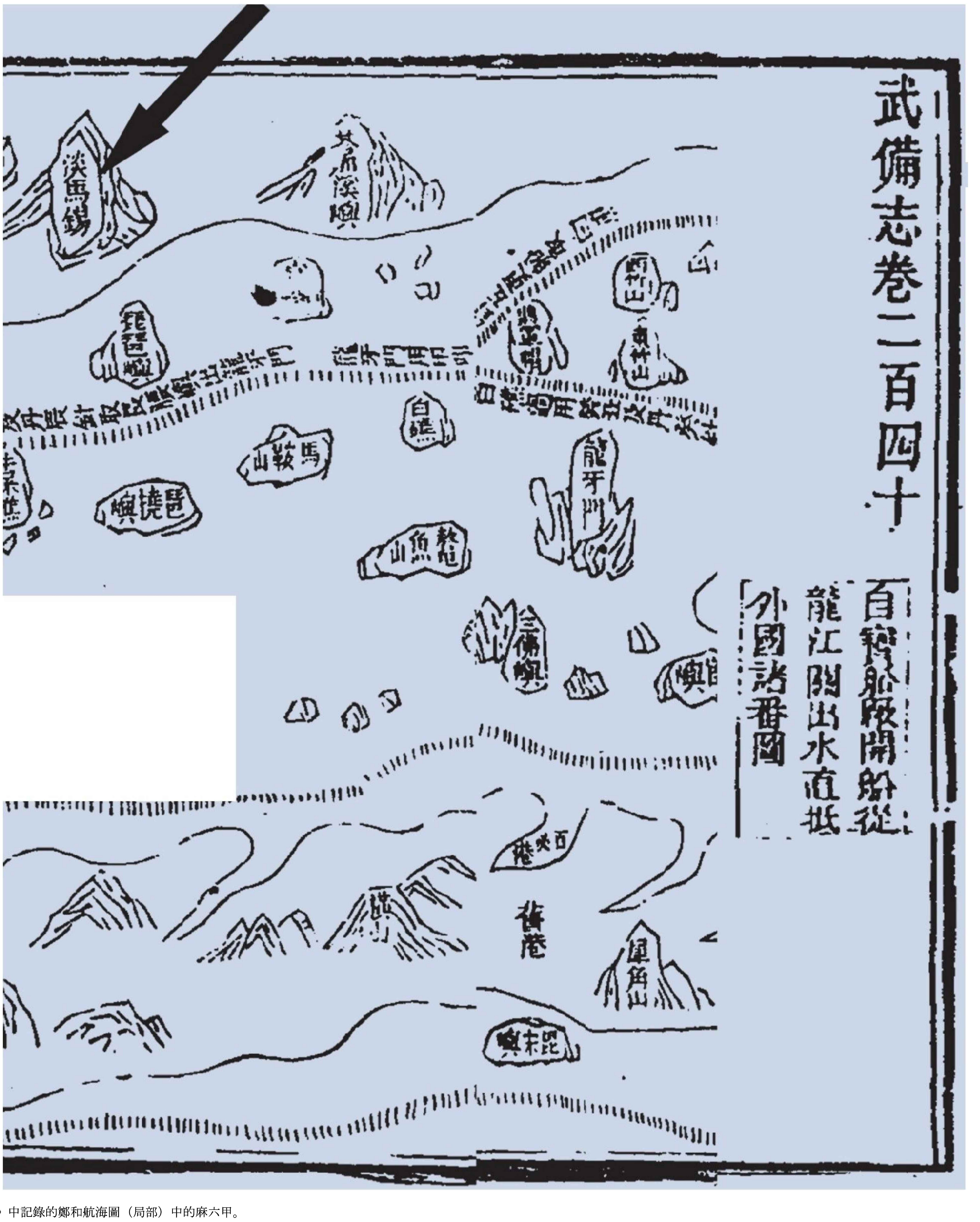
在南海漫長的歷史中，麻六甲王國把與明朝的友好外交貫穿始終，成為其重要國策。這一方面有效幫助了初創基業的麻六甲王國免除了來自暹羅、爪哇的威脅，使它得以全身心發展依託於麻六甲海峽的經濟。另一方面也強化了中國與麻六甲之間的商貿往來，使之能在中國龐大的貿易需求中得到經濟支撐。與此同時，中國的技術援助也使麻六甲在各方面獲得突飛猛進地發展捷徑。

當然，麻六甲王國興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一世王拜里米蘇剌在迎娶了一位信奉伊斯蘭教的女子後由佛教改信伊斯蘭教，這使得麻六甲王國成為很多阿拉伯商人青睞的目的地，進一步促進了麻六甲經濟貿易的多元化。

麻六甲經濟的繁榮，使它迅速取代蘇門答臘和爪哇成為東南亞新的轉口貿易中心。在麻六甲王國興盛的15世紀，南海上形成了以麻六甲為中心的東西兩大貿易弧。西弧從中國廣東、海南一帶出發、經越南、柬埔寨、暹羅灣、馬來半島直到麻六甲；東弧從中國東南沿海經臺灣、菲律賓群島、婆羅洲、巽他海峽、爪哇、蘇門答臘直到麻六甲。兩條弧線閉合形成一個圍繞南海的貿易圈。這個貿易圈的出現，不僅使溝通東西方的中介貿易空前高漲，而且使整個南海地區內部經濟交換和聯繫大大加強。

淡均愓（今新加坡）


满剌加(今马六甲)
射箭山
白沙



明代《武備志》中記錄的鄭和航海圖（局部）中的麻六甲。

麻六甲王國的興起，看不到太多軍事征服的記錄。它憑藉自身對麻六甲海峽的控制，打造出一個有完善運作機制的東西方貿易支點，形成了東西方百貨集散的中心，把麻六甲海峽的經濟寶瓶口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同時，它用技巧性極強的外交手法與政治智慧，巧妙利用了明朝在南海周邊的政治威信，多次將抵近軍事威脅與政治脅迫化於無形，可謂是南海史中一種新興崛起模式，也打造出南海歷史中不多見的戰略同盟關係。

只不過，奉行開放的麻六甲王國沒能在15世紀通行於海峽中的大量西方商船和探險船中嗅察到掠奪者和侵略者的貪婪氣味。到了16世紀初，葡萄牙人用堅兵炮利衝破了曾經固若金湯的麻六甲城。

從那一刻起，寶瓶口不再是寶瓶之口，而成了殖民禍水的決口。此後的東南亞，歷經數百年磨難，許多南海古國在西方殖民者的摧殘與蹂躪中不復存在。殖民者用最不文明的方式，把所謂的西方文明帶入這一地區，把有序傳承一千多年的南海文明腐蝕出一道人為製造的斷層。

麻六甲，也隨之淪為西方人手中的玩物，長達數百年。

08 呂宋與蘇祿，南海貿易盛衰的親歷者

呂宋和蘇祿是在南海文明史上存在於今天菲律賓群島上的兩個群島國家，一北一南。兩國居於南海東側，土地膏腴、物產豐富。得益於優越的地理位置，呂宋和蘇祿成為南海貿易流轉、技術傳播、文化傳承的受益者，呂宋和蘇祿文明也是南海文明繁榮的見證者、參與者、貢獻者。

在地理大發現後的初期，呂宋和蘇祿一度扮演著聯通南海與太平洋國際貿易中轉站的角色。只是，在幾百年殖民史中，殖民者的貪婪成性破壞了這裡的繁華和固有秩序。他們通過蠶食、侵略、壓榨的統治本質將呂宋和蘇祿「改造」成一個以西班牙王儲菲力浦的名字命名的國家——菲律賓。

致富經裡的「貓里務」

明朝時，在中國東南沿海海洋文化興盛的地方，流行著這樣一句「致富經」：「要想富，須往貓里務」。

關於貓里務具體是指哪裡，各種考證說法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貓里務位於今菲律賓群島南部某島，同時可以說明，當時那裡或商業發達、或商機很多。

依照史料文字記載，早在周朝、漢朝時代，中國貿易者與航海者率先經南海到達菲律賓群島。6世紀後，中國人在南海航行累積了足夠經驗，形成到達呂宋、蘇祿的固定航線。但那時的航線並非是最短距離的直航，也不是從臺灣島南下直抵菲律賓群島的呂宋，而是走西線：從中國東南沿海航抵海南島，再到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穿過暹羅灣灣口，沿馬來半島南下，途徑加里曼丹島的渤泥，再從渤泥北上，抵達蘇祿群島和棉蘭老島附近。到了宋朝時，這條航線上已經有了定期航班。宋朝廷先後在廣州、杭州、明州（今寧波）置市舶司，負責與麻逸等國的通商貿易。

早期探索者並不只有中國人。馬來半島上的先人們也駕舟南海、沿著馬來半島和各群島向東南方向漂流，直至今天的菲律賓南部。當地人稱馬來來客的船隻為「巴朗蓋」，同時上岸後也將馬來人建立的居留地稱為巴朗蓋。這些人繁衍生息形成了菲律賓群島上的一些早期國家形態。據中國史籍記載，10世紀前，在麻逸島（今民都洛島）上出現一個麻逸國。



宋代時基本固定下來的從中國到菲律賓群島的航線示意圖。

早期貿易大多是以物易物，互通有無，交換土產，因此交易貨物的種類繁多。《諸蕃志》記載，中國「商人用瓷器、貨金、鐵鼎、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等」，與當地人交易「土產黃蠟、吉貝、真珠、玳瑁、檳榔」等貨物。《島夷志略》稱，麻逸與中國商船交易，「貨用銅鼎、鐵塊、牙錠之屬。蠻賈議價，領去博易土貨，然後准價」。當時博易的土貨有木棉、黃蠟、檳榔、花布等。

當時的貿易並不是單純地點對點的貿易，而是「穿梭織網」。南海諸國商人，往往以「瓷器、鐵器、炊具、紡織品、樂器」等從中國出發，行至呂宋、蘇祿，獲得麻逸布、象牙、胡椒、樟腦等貨品，再繼續漂洋到南海的另一些貿易點再次交換。

中國福建籍商人留諸史料記載最多。有史料寫道，呂宋「去漳為近，故賈舶多往」。《明史》云：「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島夷志略》則記載，中國商人交易時講究信用，「舶商守信，始終不爽約」。

不止是中國人的史書如此記載，19世紀美國著名學者艾馬．布雷爾和詹姆斯．羅伯特森合著的《菲島史料》也提到一段故事。

1626年，在今天菲律賓巴丹半島的埃爾莫薩地區，一位名叫弗雷．路易士．穆羅的天主教神甫把中國商船的到來納入每天的祈禱內容。埃爾莫薩與馬尼拉近在咫尺，但弗雷．路易士並不指望馬尼拉能運送足夠物資緩解當地遭遇的嚴重糧荒。當六艘滿載穀米的中國商船按每年約定的時令從南海駛入馬尼拉灣埃爾莫薩港時，這位神甫大呼「這是上帝的恩賜」。

這段被描述為「上帝恩賜」的故事，在中國古籍中已無法考證，或許因為，在那個由中國先人主導的大航海時代裡，這六艘中國商船太過渺小，太過尋常，雖然六船穀米客觀上拯救了大批饑民，緩解了饑荒。

對中國商客感激的不僅僅只在埃爾莫薩地區。呂宋及周邊島嶼的當地人對中國來的商船也常懷感恩，在今天，菲律賓民都洛島仍有紀念唐代商人首次登陸麻逸國的節日。每年5月，當地人會重演唐朝商人與當地人歃血結盟的場景，表達感恩之情。

客死山東的蘇祿東王

民間往來繁多，催生官方交往的需要。呂宋、蘇祿以及菲律賓群島的諸多國家都曾遣使中國，增進瞭解、促進貿易、尋求庇護。政治上互訪，其實也是官方貿易的一種形式。明太祖朱元璋稱之為：「雖云修貢，實則慕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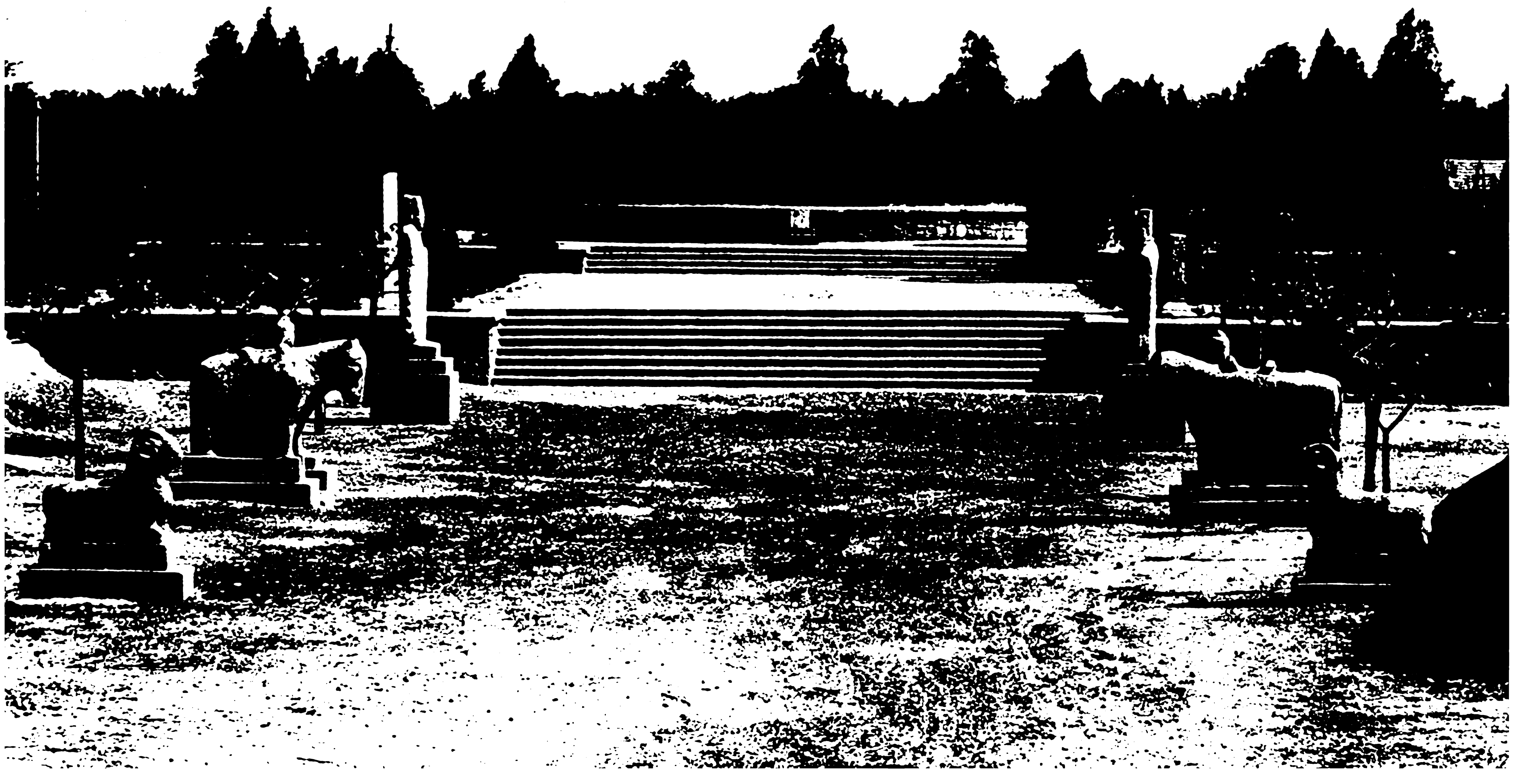
史料記載，蘇祿與呂宋兩國思忖朝貢益處，爭相前往朝貢，形成一種「朝貢競賽」。這導致明王朝不堪兩國之尊禮，只得對它們實行額度攤派，並告訴兩國：念兩國懸於海外舟途勞頓，一年朝貢不得超過幾次云云。

在南海諸國外交史上，蘇祿國王拜謁明廷的史料最為詳細。

明朝永樂年間，國力逐漸強盛，中國造船、航海技術已居於世界先進行列。明成祖朱棣遵明太祖遺訓，遣使出訪南洋十五國。永樂十五年（1417年），蘇祿國三位國王東王、西王和峒王親自率團回訪。

《東西洋考》記載，這次蘇祿使團可謂掏空家底傾盡人員，「空國來歸，鱗次闕下」。這批友好使團包含家眷、官員共340多人，以東王巴都葛．叭哈剌為尊，「梯山航海，效貢中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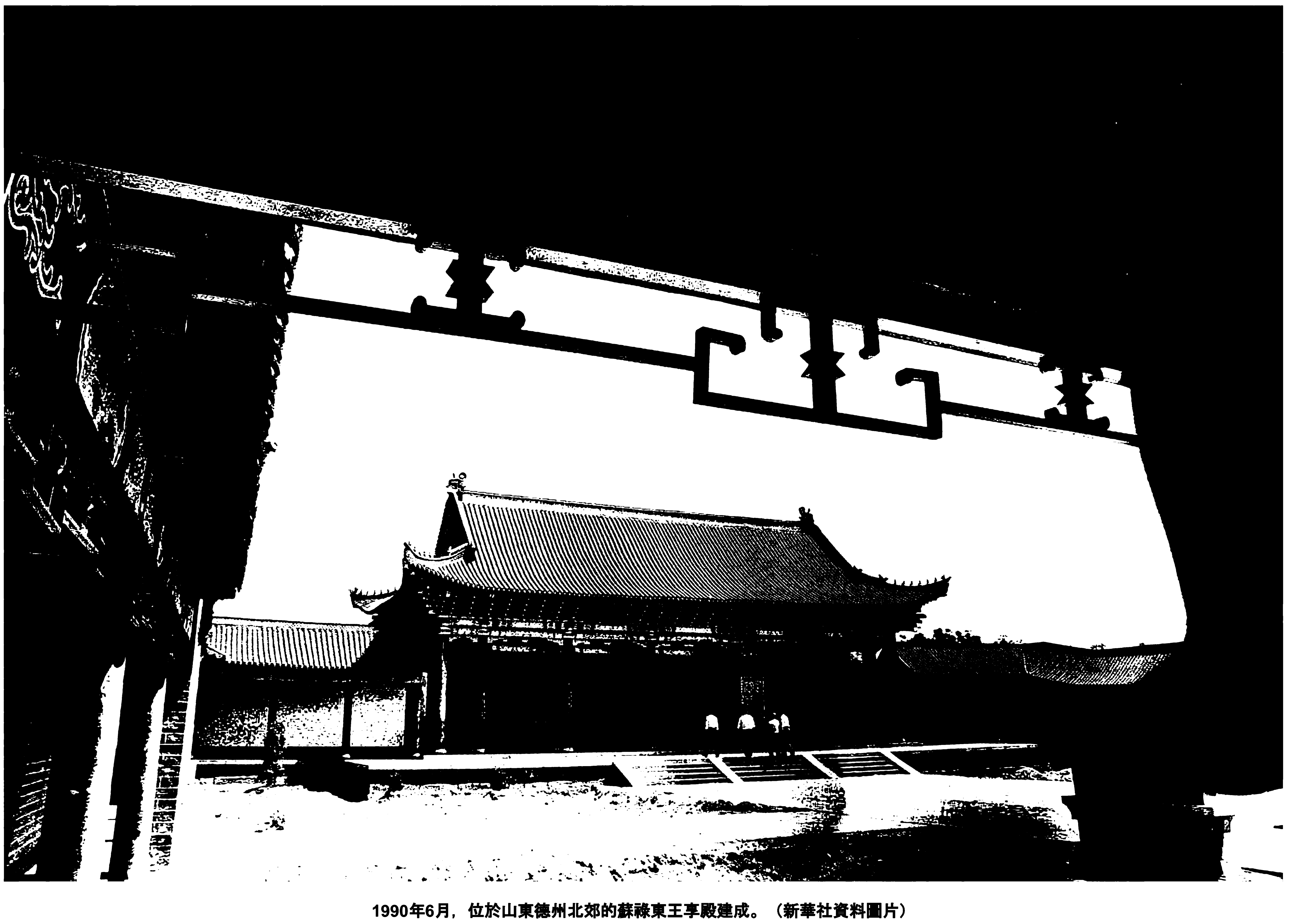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時的南海，東路航線已經開通。蘇祿三王的使團經南海「東洋針路」從福建泉州登岸，經蘇州、杭州沿京杭大運河至北京。一路上，地方政府遵明廷令，以「視滿剌加（馬六甲）國王」一樣的國賓禮遇接待。



位於山東省德州市北郊北營村的蘇祿東王墓。圖片拍攝於1980年。（新華社資料圖片）

到北京後，《明史》記載，蘇祿三王攜帶了本國許多珍奇特產，向明帝「進金縷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朱棣見東王「恭順特達，聰明溫厚」，以賓禮隆重接待。東王感激，請受章服。成祖「封為國王。賜印誥、襲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其從者亦賜冠帶有差」。

使團在北京逗留了27天後踏上歸途。



1990年6月，位於山東德州北郊的蘇祿東王享殿建成。（新華社資料圖片）

行到山東德州時，東王巴都葛．叭哈剌突患急症，不幸病逝。明朝廷極為重視此事，命以「王禮」厚葬之，派禮部郎中陳世啟赴德州，為東王舉行隆重葬禮，擬謚號曰：恭定。並為其在德州城北十二連城九江營的西南部擇址建陵，朱棣親自撰寫悼文。在祭文中，朱棣讚譽東王「聰明特達，賦性溫厚」，「賢德芳名流播後世，與天地相悠久，雖死猶生」。

朱棣隨後讓東王的長子都馬含繼承王位，因為「爾以嫡長，為國人所屬，宜即繼承，用綏蕃服，今特封爾為蘇祿東王，以繼爾父之志」。朱棣還按中國習俗，允許東王的王妃葛木寧、次子安都魯、三子溫哈喇以及侍從10人留居德州守墓3年。

為照顧守墓王妃、王子的生活，明廷特意從曆城（今濟南）往德州遷去三戶回民，命三戶人家「永遠相兼看守王墓，供給王裔役使，耕種祭田，供王祀事，全戶豁免雜泛差徭」。

為什麼特意遷來三戶回民為蘇祿王後裔服務呢？原因是蘇祿國當時已經信奉伊斯蘭教，朝廷特派習俗相近的回民以供差遣。馮翥《德州鄉土志．人類》寫道，蘇祿國王的親屬當時因言語不通，與漢民相接，「皆回民導之」。後來，東王的親屬並未返回蘇祿，他們的後裔在當地回族幫助和引導下，逐步適應了在德州的生活，並與當地回族通婚，在德州北營村及附近村莊繁衍生息。清朝雍正年間，蘇祿王後裔正式「以溫、安為姓入籍德州」，成為清朝編戶齊民。清朝德州詩人田霡訪謁蘇祿王墓時曾記錄下北營村「白帽相迎餘裔在，松門北是九江營」的畫面。

美洲土產跨洋進南海

1565年，明朝嘉靖末期，西班牙入侵菲律賓群島後，隨即被群島上的貿易盛況所吸引。中國船、中國貨琳琅滿目，讓西班牙人動起了腦筋。那個時期，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正癡迷於地理大發現和對洋流的認知，而充斥菲律賓群島的各路貨物讓他們頓生橫渡太平洋的想法。就在入侵菲律賓群島後兩個月，西班牙人派「聖．巴布洛」號大帆船滿載亞洲的香料，從馬尼拉啟航，前往墨西哥南海岸的阿卡普爾科。此後，這條航線漸漸固定下來，並且延續了整整250年，史稱「大帆船貿易」。



「馬尼拉大帆船」貿易路線示意圖。

大帆船貿易對整個南海區域的物流、貿易方式、貿易結構等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通過大運載量的帆船加快了南海周邊的貿易頻率，加快了大量中國商品的流動速度，開闢了南海區域與南美洲之間的貿易往來、物種互通、技術傳播和人文認知。到了後來，從某種程度上說，「馬尼拉大帆船」就是中國商品和美洲商品的運輸船。美國歷史學家威廉·L·舒爾茨在《馬尼拉大帆船》一書中指出：

中國往往是大帆船貿易貨物的主要來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廣大地區）的人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當無拘無束地談論菲律賓的時候，有如談及中華帝國的一個省那樣。

中國商品無論是對西班牙人還是對呂宋、蘇祿的當地人都是搶手貨。中國的絲綢、瓷器以及南海沿岸各國所產的香料為西方貿易者，特別是西班牙人喜愛。

在墨西哥港口阿卡普爾科，承載中國貨物的船隻被拉丁美洲人民稱之為「絲船」或「中國船」。西班牙人用墨西哥鑄造的銀圓購買這些商品，轉運回墨西哥。中國商人所賺來的「外匯」墨西哥銀圓，因為成色足、鑄造精，被中國人稱作呂宋銀、佛銀，在中國沿岸省份廣泛流通。

大帆船貿易的貨源大多來自福建沿海。正是因為新貿易形式的興起，大批福建商人在那個年代移居馬尼拉，從事貿易中介等行業。18世紀末，呂宋島東岸的商港馬尼拉的人口普查顯示，馬尼拉人口達4.2萬，其中華人就有1.5萬。

伴隨大帆船貿易，南美洲高產的糧食作物如玉米、番薯等物種在西方掀起一場農業變革。這場變革同樣影響了中國的農業。這些遠涉太平洋進入南海周邊區域的作物，如今談起來似乎是稀鬆平常，但在那個年代卻是可以救命的高產口糧，例如番薯。

《閩書》記載，番薯傳入中國在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最早是由旅居呂宋的福建華人引入福建，後廣泛種植南方各地。番薯耐寒、耐澇、耐鹼，在中國並沒有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史書記載，明朝時番薯種植的畝產量遠高於水稻，對增加人口、應付天災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番薯以外，拉丁美洲的一些經濟作物也經由菲律賓傳入中國，如煙草、鳳梨、西葫蘆等。特別是南美的煙草，在呂宋種植後遠銷中國，被中國粵、閩一帶的商人稱之為「呂宋煙」。明代張公賓所著《景岳全書》中說：「此物自古未聞也。近自我明萬歷時始出於閩廣之間，自後吳楚間皆有種植矣。」清初《物理小識》記載，煙草從明萬曆末年傳入漳洲、泉州，當時稱之為「淡肉果」（源自西文Tabaco的音譯）。然後傳播到多地種植。書中還記載，吸煙會有暈、醉的感覺。

在明朝時，中國人就已發現吸煙對健康的危害，「曝乾以火酒炒之，曰金絲煙。可以祛濕發散，久服則肺焦。諸藥多不效，其症令人忽吐黃水而死」，「凡患咳嗽喉癰一切諸毒肺病皆忌之」。

蘇祿、呂宋的覆滅

西班牙人從事的跨太平洋貿易利潤巨大，很快，觸發了殖民者擴張和掠奪的野心。他們試圖打破中國和南海諸國千餘年來靠海上交流確立的價值觀念、信仰取向、貿易規則和人文融合，讓呂宋、蘇祿徹底淪為殖民者的僕從和附庸。

鮮有人知，菲律賓的國名是來自西班牙國王的名稱。1565年，西班牙開始殖民、侵佔菲律賓，西班牙人用當時西班牙王儲菲力浦的名字將這個群島命名為「菲律賓」。

西班牙的侵略步驟是按梯次展開，先後發動三輪大規模攻勢。1571年，西班牙軍隊發起第一輪攻擊，先擊敗了呂宋蘇萊曼國王，佔據了群島北邊的呂宋島。明代史書《呂宋傳》對西班牙人的侵略行徑有詳細記載。《呂宋傳》寫道，佛郎機（指西班牙）人與呂宋開通貿易後，發現其國弱可欺，就賄賂當地國王，乞求贈予牛皮大小的地面建造房屋居住。國王允諾後，西班牙人把牛皮撕碎，連成數千丈土地，然後築城添列火器。「為窺伺計，已竟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這種手法，與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毀滅印加帝國的手法如出一轍。

以呂宋為基地，西班牙人不斷攻擊、騷擾蘇祿國。史料記載，蘇祿人也並不好惹，「自幼習慣於作戰，精於使用矛、圓盾和劍」，並把戰死沙場視作榮耀。在水戰中，蘇祿人使用快船，時常快速貼近西班牙帆船並登船肉搏，讓西班牙炮艦發揮不了火器的威力。陸戰中，蘇祿人使用一種帶毒的竹箭，一發5枚，見血封喉，殺傷力頗大。西班牙人碰上了難啃的硬骨頭，只得暫時退卻。

18世紀，西班牙人捲土重來，再發攻勢。西班牙軍隊1751年登陸和樂島（今霍洛島），使用火炮連續轟擊。史料記載「忽用火炮，其大如碗，內藏鐵釘、火藥，高至十餘丈……如是三夜」。在這一輪攻勢中，蘇祿以慘重的代價擊退了西班牙士兵。

經此一番折騰，蘇祿國力已經衰微，蘇祿蘇丹此時想到的求助對象是千百年來在南海地區維持和平秩序的中國。乾隆十八年（1753年），蘇祿國貢使向乾隆請求，「願以疆土、人民、戶口編入中國圖籍」。換句話說，蘇祿請求內附中國，希冀藉助中國力量趕走殖民者。不過，此後不久，清朝也國力漸衰，無力顧及海外事務。

西班牙殖民者對蘇祿的第三輪進攻發生在19世紀5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向英國購買先進的汽輪充實海軍，大約四千名士兵分乘3艘汽輪，在3艘炮艦和20多艘武裝帆船的掩護下擊敗蘇祿水軍。

蘇祿蘇丹被迫在1851年4月30日簽訂了城下之盟，承認西班牙的「宗主權」。

侵佔呂宋與蘇祿領土後，殖民者變本加厲地想要獨佔、壟斷南海貿易，殘酷對待當地華人。西班牙殖民者出臺管制華僑的種種嚴苛條款，包括限制行動自由、組織集體搬遷、禁止華人在馬尼拉過夜等。1603年、1639年、1662年、1686年、1762年和1820年，西班牙殖民者先後6次大規模屠殺在菲華僑。

蘇祿在殖民者的壓榨、欺凌下變得支離破碎。英國殖民者隨後也趁火打劫，迫使蘇祿轉讓了婆羅洲上的領土沙巴。到了20世紀初，美國迫使蘇祿簽訂條約，規定蘇丹放棄一切政治權利，無保留地承認美國主權。蘇祿作為一個獨立王國的歷史，就此終結。

第三部分　南海文明與世界文明

引子

西元1000年前後，阿拉伯人航海遊記《印度珍異志》寫道：「在室利佛逝，當地總督向一名來自阿曼的猶太商人徵收了兩萬第納爾金幣作為過境稅，只有這樣才允許他繼續其航程前往中國。」

室利佛逝是7世紀至13世紀活躍在蘇門答臘島等地的東南亞古國，崇信佛教。《印度珍異志》中簡簡單單的一句話，繪製出南海文明中阿拉伯、東南亞、中國、猶太人在一千年前互動的景象。

南海文明，絕非孤立、封閉、靜態的存在。相反，通過與域外文明的交通、交流、交會，它在互動、開放、動態中發展與完善。

根據歷史上文明交流的頻度、密度和相互影響程度，南海文明的地理外緣大致可劃出琉球、日本、印度、中東、歐洲五大塊。它們與南海文明的交流時期、管道、特徵各異，對南海文明的塑造有著不同的功能。

琉球是南海文明外緣的獨特存在。由於其獨有的地理位置以及與中國的歷史關係，琉球與南海文明若即若離。琉球文化受到中原大陸文化的深刻影響，但它本身對大陸文化和南海文明的反向文化影響力非常有限。琉球作為「萬國津梁」的地理存在，在南海文明的外緣更多地扮演了通往東亞和東北亞的貿易中轉站和往來貨物倉庫的角色。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琉球受到中日關係的影響更大。日本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北亞貿易體系的侵蝕，正是始於17世紀初對琉球的逐漸入侵和壓制。

日本雖然在地理上距南海文明的東南亞部分較遠，但卻在多個層面深受南海文明的影響。16世紀歐洲殖民者入侵東南亞之前，日本的主要對外關係只有中國、朝鮮、琉球。歐洲殖民者發現「東方」後，日本與東南亞的雙向交往驟然上升。通過「南蠻貿易」，日本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直接通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接觸到以東南亞為據點的歐洲傳教士，這對後來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而通過「朱印船貿易」，日本商人、武士、浪人陸續湧入東南亞。在中國明朝實施海禁、日本幕府奉行鎖國政策之際，這些活躍於東南亞的日本人雖然一定程度促進了南海文明的貿易繁盛，但也釀出大量商業和外交糾紛，其行為動機和投機模式的殘留至今仍見諸於日本對東南亞的政治、外交、貿易等政策中。

印度無疑是與南海文明的互動中最有影響力的外緣存在，是塑造南海文明不可或缺的物質和文化基因。無論是時間緯度、空間跨度，還是影響的深入程度都無與倫比。發源於古印度的佛教對南海文明的巨大影響自不待言，在南海文明各地域的語言、文字、建築、文化、服飾、音樂、習俗等方面均留下深刻印記。到了近代，印度成為歐洲殖民者眼中的巨大誘惑，也是西方航海大發現的動力誘因。歐洲殖民者以印度為據點向東推進，使得南海文明迎來了極盛後的黃昏，被殖民者踐踏與蹂躪。

阿拉伯文明和波斯文明，給南海文明注入瑰麗的異域色彩和先進的科學文化。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賈，不僅是南海中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的路人甲乙丙丁，他們也促進了東西方物產的互通有無，他們還把天文、曆法、數字、醫藥等阿拉伯文明的精華傳播到南海文明內。對後世影響更大的，是阿拉伯人把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化傳入南海地區。13世紀後，中東的穆斯林商人將伊斯蘭教帶入南海文明的幾大主要貿易中心，通過與商業力量的密切結合，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地區走出一條不同於藉助武力擴張的傳播途徑，至今仍是東南亞的主要宗教存在。

歐洲本是南海文明的受益者，但在近代卻依賴遠洋航行能力和槍炮，最終成為南海文明發展歷程中的最大的毀壞者。歐洲殖民者破壞了南海文明的多數固定規範，改變了相當一部分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重繪了東南亞權力版圖，甚至將一些興盛百年的區域文明就此終結。因為西方殖民者，南海文明出現了一個延續幾百年的大斷層。直至今天，西方殖民者留下的種種話語體系和統治心理陰影仍普遍存在於東南亞地區。

01 南海上的《一千零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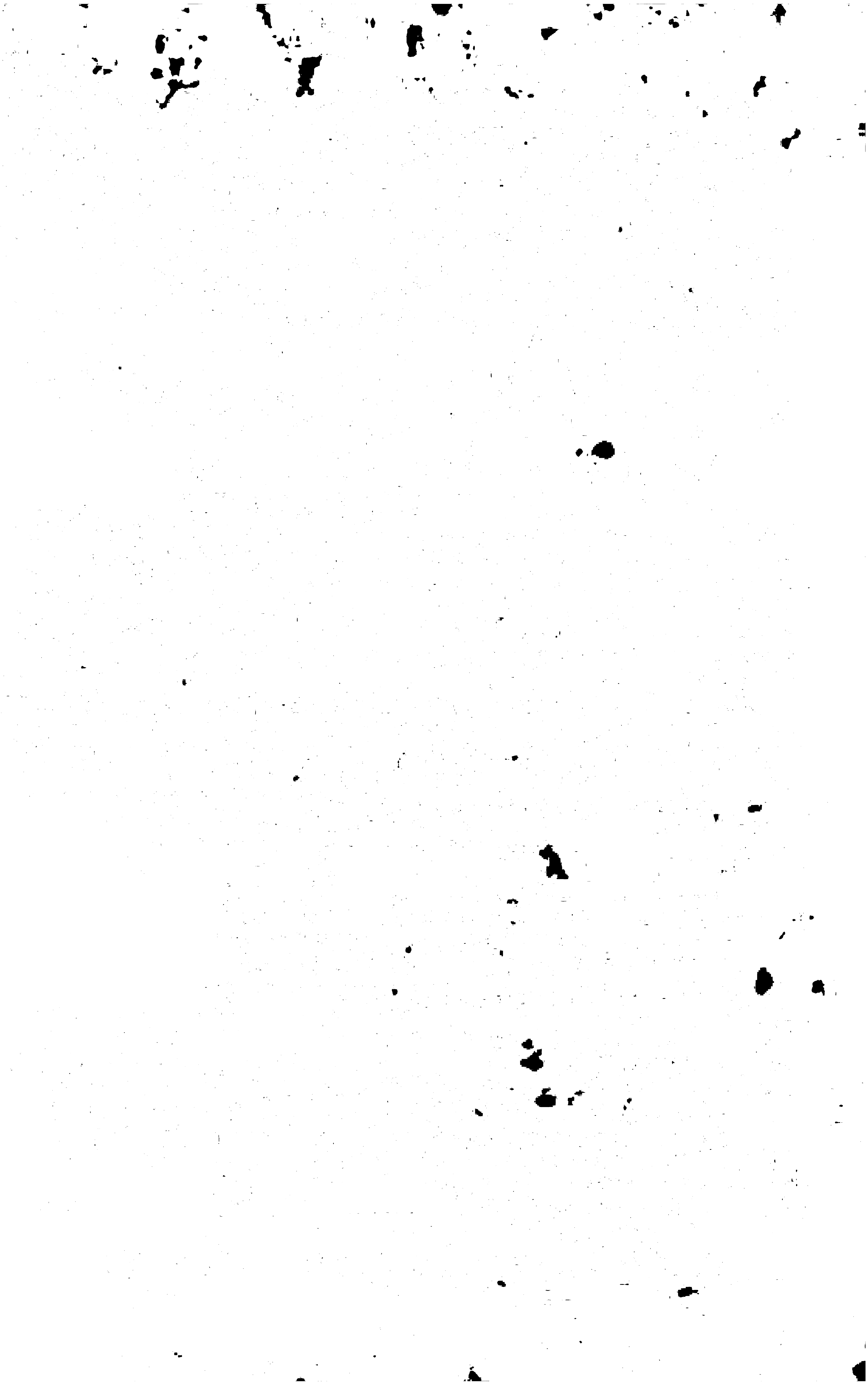
「相傳古時候，在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海島上，有一個薩桑王國，國王名叫山努亞……」

《一千零一夜》的開篇第一句話就提到中國。也許，這部阿拉伯名著是想告訴讀者，書裡很多故事都與中國那個遙遠的國家有關。

而那些故事，絕非憑空想像。在古代阿拉伯與中國之間，有一片海叫南海，那裡不僅是貿易的天堂，更是資訊的海洋。正是在那片廣闊的海上媒介中，交會著各種音符和絃曲，讓人在不經意間，在口口相傳的資訊鏈中，瞭解世界，瞭解不同文明。

中國是個「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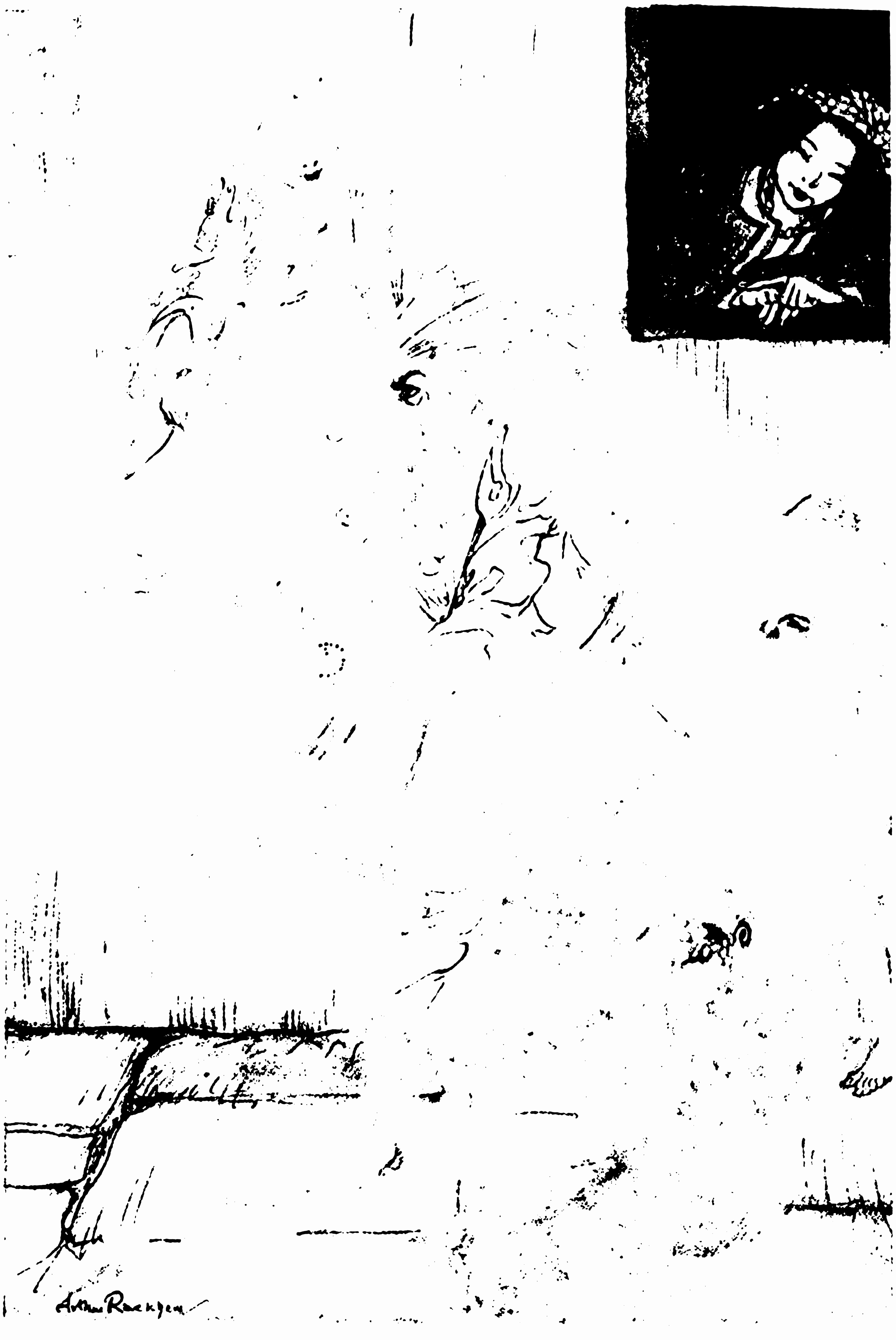
《一千零一夜》被認為是阿拉伯民間故事集，其針對的讀者群是阿拉伯普通民眾。一般來說，民間故事中所提到的地名，往往都是本地大多數民眾耳熟能詳、雖對其情況一無所知卻又非常嚮往的地方，而中國恰好就是這樣一個地方。所以這本阿拉伯名著要把故事發生地放在印度和中國之間一個海島上，以便故事人物時不時到中國冒趟險，或者娶個漂亮的中國公主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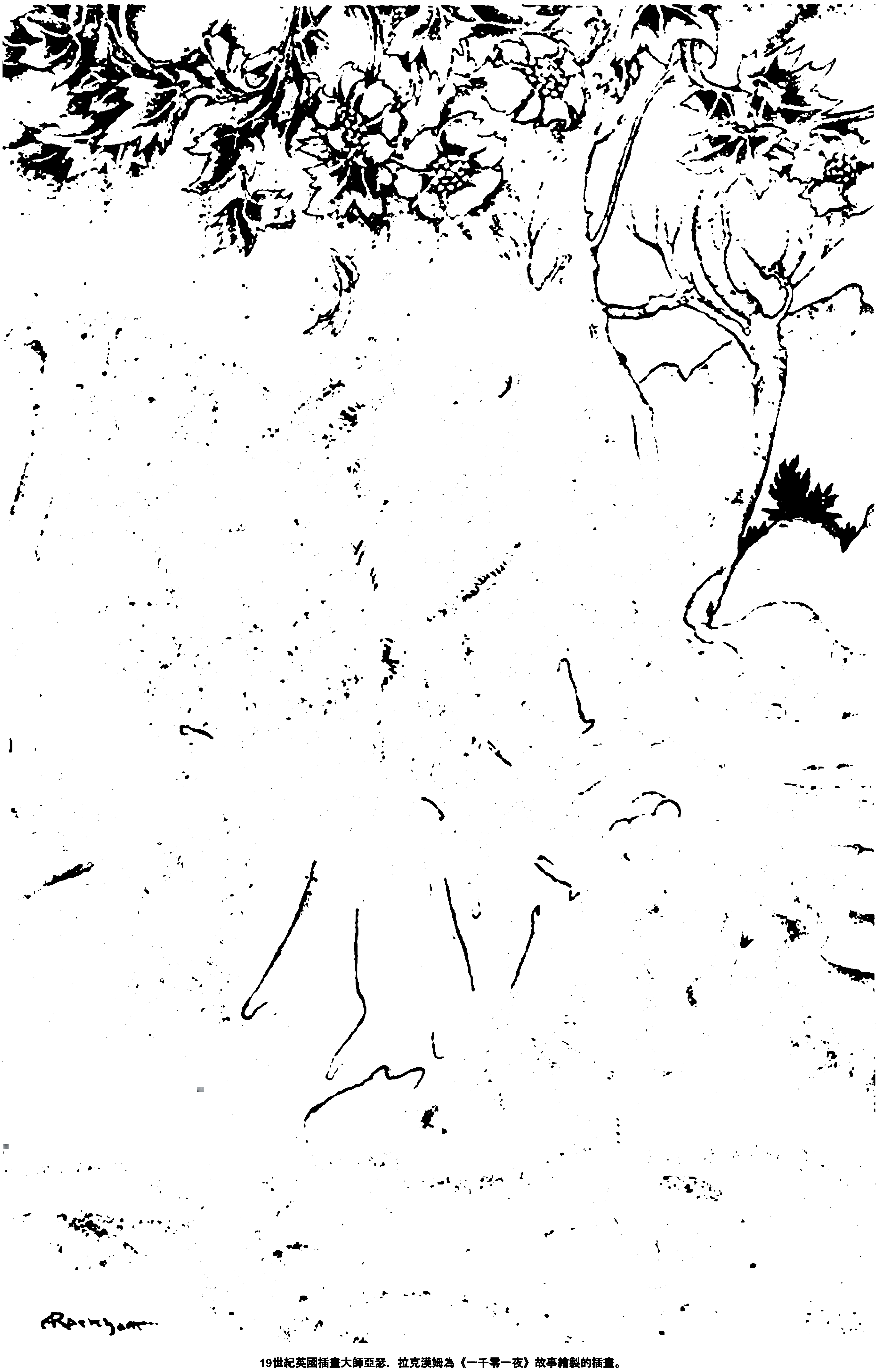



الليلة الثالثة وثلاثون من حديث ألف ليلة وليلة

最古老版本的阿拉伯文《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故事基本都是虛構的，但文學中的虛構往往具有生活中的原型。只有貼近生活才能引起讀者興趣。例如，在《一千零一夜》中，任何一位故事人物前往中國都是航海去的，而且到達中國一般需要一年，走陸路則需要三倍時間。看來，去中國走海路要比陸路節省三分之二時間，這早在古代已成為阿拉伯人的常識。


Arthur Rackham



19世紀英國插畫大師亞瑟．拉克漢姆為《一千零一夜》故事繪製的插畫。

那麼，古代阿拉伯人去中國幹什麼呢？《一千零一夜》也給出了答案：經商。其中一個故事講到：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內）有一個窮困潦倒的懶漢，其母拿出5個銀幣，叫他隨長者到中國去經營生意，「買五塊錢的中國貨帶回來，憑著安拉的恩賞，也許咱們能賺幾個錢糊口」。

根據研究，《一千零一夜》中的早期故事在6世紀開始流傳，而整部作品則到15世紀末、16世初才基本定型，經過了將近一千年時間，大致相當於從唐朝到明朝。在這期間，中國與中東地區的經濟、文化交往一直沒有間斷，廣州、泉州、杭州等都是著名貿易港口。包括中東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內的大量外國人都曾經來中國從事貿易或者定居。

關於中國，《一千零一夜》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地方。中國在書中多次被描述成一個海島，且是位於印度以東的眾多海島之一。一些研究者認為，這是以訛傳訛。但是，關於中國是一個「海島」的說法卻被保存了下來，這肯定是有原因的，恐怕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並誤認為那就是印度的情況很相似。哥倫布抵達美洲後認為到了印度，後人也一直將錯就錯，把新大陸原住民稱為「印第安人」。

《一千零一夜》關於中國的誤讀很可能也是如此：早期的一些阿拉伯人航海到達印度以東某個海島之後，誤以為那就是「中國」，而當地的「中國人」也樂得被「誤解」，因為這樣一來，這些阿拉伯人就會與他們進行貿易而不會繼續航行前往真正的中國了。可以推測，這個被誤認為是「中國」的海島，應該是東南亞某個古國。也不排除當時與阿拉伯商人貿易的那些商人就是旅居東南亞中國商人的可能性，因為在古代，有很多中國商人確實在長期航海貿易後最終定居在了南海周邊的古國。文獻記載，自漢代以來，就有一些中國人集體遷移到南海周邊古國定居，有些古國甚至主體群體就是中國人，如都元國（注：關於都元國具體方位學界尚無定論。一說在今天馬來半島，一說在蘇門答臘島）。

也或者，對於部分阿拉伯旅行者來說，到了南海周邊古國，就等於到了中國。鑑於當時航海歷程的艱辛，既然在中途就可以得到中國商品，那又何必非要到中國不可呢？許多專家指出，《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國」，是一個籠統概念，所指的就是中國以及當時諸多南海古國。

無論是對於古代中國還是古代南海諸國，中東阿拉伯和波斯都是他們的最主要交往和貿易對象。但是，在與中東進行交往的漫長歷程中，南海周邊古國主要扮演著中轉站的角色。從這個角度看，南海周邊古國與中國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整體，相互依存度非常高。

南海上的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

從中國出發途經南海抵達中東的海上絲綢之路，由於以南海為中心，所以也被稱為南海絲綢之路。《一千零一夜》中所描述的到中國的海上航線，顯然就是海上絲綢之路。除了絲綢外，這條航線還運送其他貨物，南海絲綢之路因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之稱。

南海周邊古國在中國與中東地區的海上交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不僅是因為南海周邊古國是中國與中東地區進行海路貿易的重要中轉站，而且還是文化、宗教從海陸傳播的必經之路。正是通過這條通道，中國的絲綢、瓷器、漆器、貨幣等大量流向中東，而中東商人則帶來了香料、珠寶、銅器等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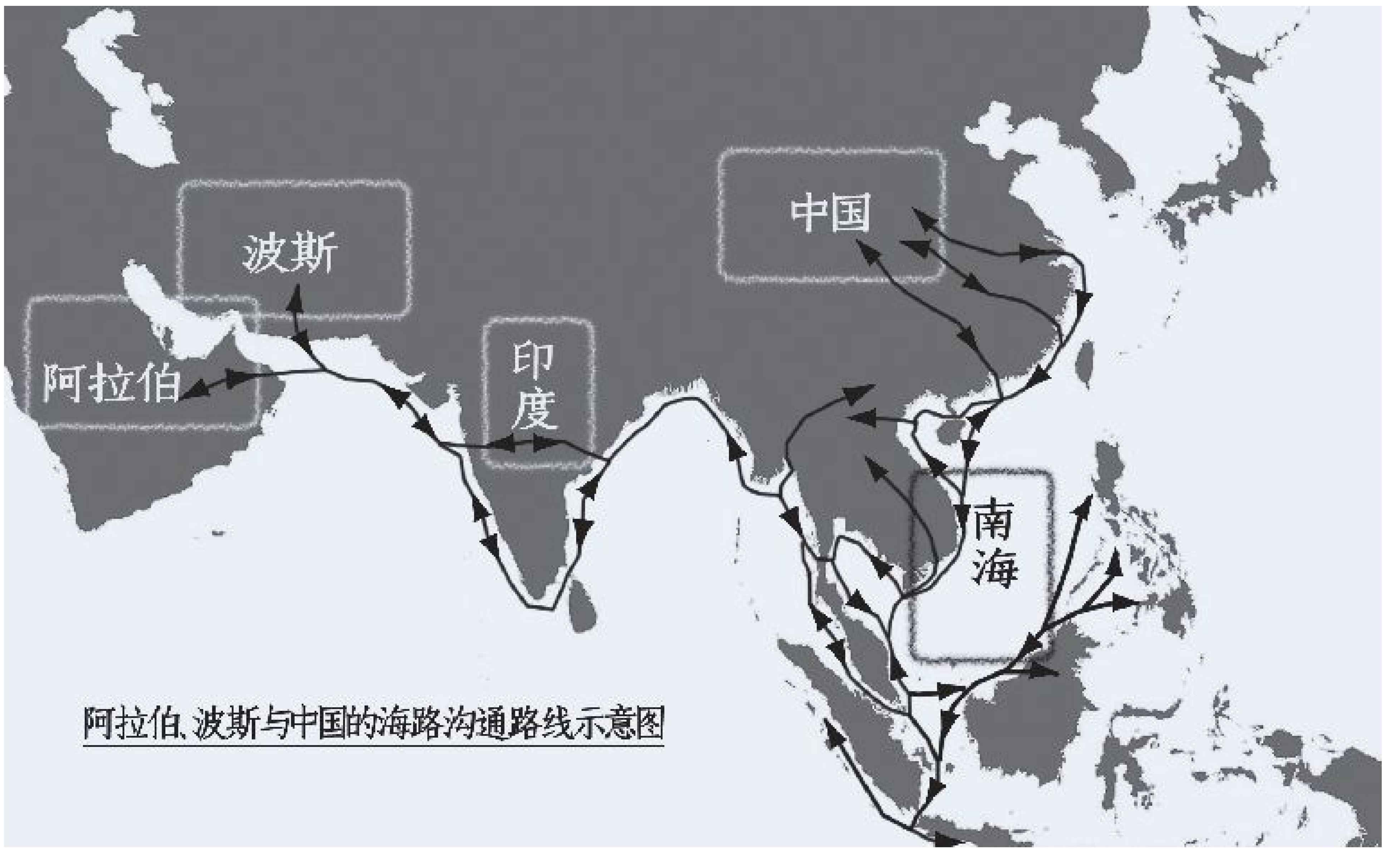
南海航線的通達，使得古代中國人對阿拉伯的瞭解相當充分。

《史記》把阿拉伯稱為「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西元97年，東漢西域都護班超派遣甘英出使西域，抵達西亞古國安息，並帶回更多關於條枝的知識。到了唐代，阿拉伯與中國的往來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到中國的阿拉伯和波斯人主要是商人，此外還有使節、旅行家和匠人。其中一些人在中國定居，與中國人通婚，在長安以及廣州、泉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形成聚居區，並使伊斯蘭教在中國逐漸傳播。

唐代把阿拉伯稱為「大食」。大食源自波斯語，原為古代波斯人對阿拉伯一部族的稱謂，後來成為中國唐、宋時期對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國的專稱和對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的泛稱。他們又因為民族服裝的不同而被稱為白衣、黑衣和綠衣大食。《舊唐書．大食傳》記載，大食於「永徽二年（651年）始派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啖密莫末膩。」「啖密莫末膩」是「埃米爾．穆民」（意為「信士們的長官」）的訛音，指的是阿拉伯帝國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他派使節到唐都長安，見唐高宗，介紹哈里發國家建國始末、國內習俗和伊斯蘭教情況。這是有記載的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首次外交接觸。根據中國史書記載，自651到798年的148年中，阿拉伯來唐使節達39次之多。其中有些走陸路，有些則走海路。

中國與中東地區通過相互交往，還把各自的工藝和技術傳授給對方，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國人發明的造紙術通過阿拉伯帝國傳播到歐洲和世界各地。造紙術傳到波斯後，波斯仿效中國印製紙幣，並在紙幣上使用了中國的「鈔」字。包括造紙術在內的中國四大發明，都是經過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的，而對此發揮最大貢獻的據認為就是阿拉伯商人。

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屐痕遍及阿拉伯、東南亞和中國。1304年，白圖泰出生於摩洛哥坦吉爾的一個柏柏爾人家庭。20歲左右時，他出發前往位於沙特半島西部的伊斯蘭教聖地麥加朝聖，從此踏上了前往東方的旅程，歷經各種艱難坎坷。他首先從陸路取道土耳其、里海、阿富汗，抵達印度，然後乘船從馬爾代夫出發，穿越麻六甲海峽進入南海，終於在1347年前後抵達元朝時中國南方主要港口泉州，並遊歷了泉州、廣州、鄱陽、杭州等地，留下了美好印象。白圖泰回到坦吉爾之後，摩洛哥蘇丹派遣一位學者訪問他。這位學者記錄下了白圖泰的敘述，將其命名為《伊本．白圖泰遊記》，記述了他在印度、馬爾代夫和中國的經歷，其驚險曲折程度絲毫不亞於《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



阿拉伯、波斯與中國的海路溝通路線示意圖。

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印度洋貿易和南海貿易中十分活躍。根據古代敘利亞文獻的記載，波斯商人的足跡早在薩珊王朝（205年至651年）時期就已達南海海域。當時，扶南國有個大型港口城市叫作哥俄厄（位於今天越南南部的東部海岸），是與阿拉伯諸國以及羅馬帝國貿易的主要支點。後來在哥俄厄遺址確實出土了不少薩珊王朝的小件物品以及同時期薩珊王朝控制下的古希臘與羅馬風格物品。此外，英國東南亞歷史學家O. W.沃特斯在研究早期印尼群島貿易的著作中指出，早在6世紀上半葉，就有來自南海周邊古國的水手將來自西亞波斯的奢侈品輸送到中國市場。

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多元傳播

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被冠以「絲綢」之名，實際上都是在強調這兩條道路的商業性質，同時把中國作為起點，把中東作為終點。但是，如果從宗教文化角度看，這兩條道路同時也是伊斯蘭教向東方傳播之路，其起點在中東，終點則在中國。絲綢之路把中國的商品帶到了中東，繼而經過中東抵達歐洲；而伊斯蘭教向東方傳播之路則使得陸上和海上的沿線國家的許多國民信奉了伊斯蘭教。絲綢之路和伊斯蘭教向東方傳播之路相向而行，對沿線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有些國家，伊斯蘭教已經成為國教。在海上，這樣的國家包括今天的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印尼被認為是現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陸上，這樣的國家包括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等中亞諸國。

長期以來，關於伊斯蘭教對外傳播的流行說法是，來自沙特半島的穆斯林武士一手拿著《古蘭經》，一手拿著寶劍，在對外征戰的過程中推廣了伊斯蘭教，只要阿拉伯軍團走到哪裡，就會把伊斯蘭教帶到哪裡。但是，從伊斯蘭教向東方傳播路徑特別是其中的海上傳播路徑來看，這種說法顯然是失之偏頗的。眾所周知，阿拉伯帝國在其鼎盛時期，其東部邊界最遠並沒有越過高加索山脈、裏海、蔥嶺和印度河。顯然，伊斯蘭教在這條「疆界」以東地區的傳播並不完全是阿拉伯軍團和穆斯林武士的功勞，在這些地區活動的商人、傳教士和不斷遷徙的遊牧部落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戰爭與征服與伊斯蘭教在中亞的傳播有一定關係，但並非完全如此；而伊斯蘭教沿海路向東方傳播，則幾乎與戰爭無關。海上傳播路徑的沿線國家，沒有一個曾經被阿拉伯帝國佔領過，甚至從來沒有與阿拉伯帝國或者任何外來穆斯林軍隊打過仗。東南亞一些國家伊斯蘭化程度之高主要是通過經商、傳教、通婚、移民等和平手段實現的。伊斯蘭教傳播到東南亞之後，又進一步沿海陸北上，最終抵達中國。

關於伊斯蘭教何時被帶入古代南海周邊國家，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但一般認為，最早把伊斯蘭教帶到南海周邊地區的，是從中東前往中國的阿拉伯商人。從7世紀初開始，阿拉伯的貿易船開始經由南海海域前往中國貿易，而這也是伊斯蘭教在中東地區興起的時候。622年，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出現後，迅速發展和擴張。8世紀以後，海路的重要性逐漸取代了陸路。在海上貿易中，阿拉伯人取代猶太人、波斯人、印度人而取得海上優勢，並把這個優勢一直保持到15世紀末葡萄牙人東來時為止。

商業利益是伊斯蘭教在南海周邊古國立足和傳播的主要動因。對於來自中東的阿拉伯商人來說，他們的最終目的地和最有利可圖的市場是中國而不是南海周邊古國，但恰恰是因為他們的商業活動，才導致了伊斯蘭教在南海一些島國的生根開花和枝繁葉茂，也算是一種「無心插柳柳成蔭」。在伊斯蘭教傳入南海周邊古國之前，當地人主要信奉佛教和印度教。往來於中東和中國之間的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商人，經常停留於北蘇門答臘的港口，等待信風。據馬來和印度史料記載，6世紀至13世紀之間，在蘇門答臘沿海地區已經有大批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商人定居。後來為了商業的便利，一些外來的穆斯林商人開始在沿海港口與當地婦女通婚，逐步形成早期的穆斯林社團。

到13世紀，伊斯蘭教已經廣泛傳播於北蘇門答臘西北部和北部沿海地區。1291年，馬可．波羅自中國歸國途中經過蘇門答臘，發現當地商業中心霹靂是一座穆斯林城。1345至1346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途經蘇門答臘到中國旅行時，發現蘇門答臘統治者是個伊斯蘭教沙斐儀教法的信徒。曾經三次隨同鄭和下西洋並擔任阿拉伯語翻譯官的中國明代回族通事馬歡，在《瀛崖勝覽》中記述了鄭和下西洋時在蘇門答臘的見聞，據說當時在蘇門答臘東北沿海的巴領旁、西部的蘇門答臘城、西北部亞齊地區的南浡里、那孤兒、黎代等地，「國王國人皆是回回人」。

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的麻六甲海峽是南洋交通的要衝，也是中國和南海諸國同印度、中東乃至非洲海上貿易的必經之路。最初伊斯蘭教就是沿著這條商道自印度和阿拉伯半島傳入蘇門答臘的。到13世紀末，麻六甲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了伊斯蘭化過程。在馬來半島東北部丁加奴地區發掘出土的一塊不完整的法律文告石刻表明，約在14世紀下半葉，該地區已經開始引進伊斯蘭教法。

16世紀初，葡萄牙覬覦亞洲香料貿易中的豐厚利潤，試圖將亞洲香料貿易從中東穆斯林商人手中據為己有。鑑於麻六甲的地理和貿易中心地位，葡萄牙殖民者將矛頭率先對準麻六甲。1511年，葡萄牙遠征軍在阿爾布克爾克的率領下攻陷麻六甲，殖民者強迫居民改信基督教，被迫出走的穆斯林商人和烏里瑪階層將伊斯蘭教從東南亞沿海帶到了腹地，出現了印尼的亞齊、婆羅洲的渤泥（汶萊）、爪哇的淡目王國等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中心。

02 南海上的印度梵音

在吳承恩的《西遊記》中，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保護唐僧歷經八十一難，一路降妖除魔、歷盡艱險，終於抵達西天取得真經。

在這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西天取經」故事中，「西天」便是現在的印度。古時交通不發達，人們地理概念模糊有限，以為到了中國西邊的天竺（印度）就是到了「天的盡頭」。唐僧的原型是唐代玄奘法師，但「西天取經」並非玄奘的專利，在與玄奘取經的同一時期，其實還有70多位中國僧人到「西天」求取「真經」，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經由南海，駕船西行。

如果說，古代南海上往來繁忙的商船、貨船在中國與阿拉伯、中國與歐洲之間架設起一條商品大通道的話，那麼，往來於古代印度與中國之間的那些舟船們，則更多承載著一種精神領域和信仰層面的財富。古代中國和古印度不僅途經南海實現了商品上的互通有無，它們在文化藝術層面的交流更甚。頻繁的宗教傳播和僧侶往來不僅加深了彼此瞭解與學習，更對古代南海周邊諸多文化構成深遠影響，成為南海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

跨越千年的南海古航道

雖然通常認為「印度」的出現是以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羅笈多在西元前324年開啟孔雀王朝為標誌，但印度文明有著漫長淵源卻是不爭的事實。在孔雀王朝之前，古印度人早已開始了對東方世界的探索。

早在西元前幾世紀，古印度南方各國就開通了通往東方的海路。孔雀王朝時期，南方的注輦（今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境內）、雞羅（今孟加拉沿海）和潘地亞（今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境內）獨立於孔雀王朝，對外通商。阿育王即位後，孔雀王朝逐漸強盛起來，他對南方發動了一系列的戰爭，掌握了各大港口，控制了對東方的貿易，進一步推動古印度與東方的聯繫。

通過對古籍文獻的梳理，古代印度前往南海區域的航線主要有三條，一條是沿孟加拉灣海岸到達緬甸，而後沿著陸地南下航行。在三條航線裡，這條航線最早開闢和使用。第二條航線是自印度東海岸出港，橫渡孟加拉灣，到達中南半島或馬來半島北部西岸。第三條航線是自印度東南部，經錫蘭、尼科巴群島，前往蘇門答臘和爪哇。這三條航線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國際貿易變化而發生調整和變化，是印度和南海周邊古國進行貿易活動的三大海路軌跡。



古印度前往南海諸國的三條航線示意圖。

古代中國與古印度的交往，可追溯到漢武帝時期與地處印度次大陸東北的罽賓（今喀什米爾）的官方往來。同一時期，漢朝與地處印度次大陸東南海岸的黃支國（今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馬德拉斯附近的康契普臘姆）則通過海路交往。黃支國曾多次遣使漢朝。漢朝官員和商人也赴黃支，以黃金、雜繒（絲綢）去交換當地出產的明珠、璧琉璃等奇石異物。

從那時起，南海成為漢朝與古印度一些國家交往的紐帶。因此，《漢書．地理志》詳細記載了去往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沿岸一帶）的路線：自徐聞（今雷州半島徐聞縣）合浦（今雷州半島以西）出發，船行5個月至都元國（今地有二說：一說馬來半島，一說蘇門答臘東北岸）。又船行4個月到邑盧沒國（今一般認為在緬甸的勃生、勃固至薩爾溫江下游一帶，也有認為在泰國曼谷灣附近），又船行20日到諶離國（有認為在泰國西岸，也有認為在緬甸東南西岸，還有認為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區）。由此國步行10餘日，至夫甘都盧國（今一般認為在緬甸西南部一帶）。再從此出發，船行兩個月，即到黃支國。從黃支國返回的航海路線是：自黃支國啟程南航，經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船行8個月到皮宗（今地說法數種：指馬來半島西南岸的皮散島，或指馬來西亞柔佛及新加坡一帶，或指泰國北大年一帶，也有認為在印尼蘇門答臘東岸英得臘其利河口外）。由此再船行兩個月，到漢朝最南部邊疆日南、象林（約今越南廣南—峴港沿海一帶）。

這段往返路程的詳細記述比較清楚地告訴後人，漢代時中印航線並非是貫穿始終的海路，其中需要在馬來半島某地登陸，穿過馬來半島狹長的陸地到達印度洋沿岸，而後登船續航。這說明，在大約兩千年前，穿越麻六甲的跨洋航線還並未被廣泛使用。

隨著中國與古印度各國交往的日趨頻繁，海上交通不斷發展和完善。印度僧侶和商人能夠往來於印度次大陸和中國之間，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印度的地理優勢和發達的帆船業。首先，印度三面環海，擁有6000公里長的海岸線和優質港口，同時可以很好地利用季風進行航行。其次，印度帆船質地上乘，載重量較大，設計精良、巧妙，而該地區豐富的鐵力木資源為造船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

到了玄奘法師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去西天拜佛求經的唐代，前往古代印度南方各國的海上交通已然十分發達。大體路線如下：由廣州出發，沿南海的印度支那半島東岸航行，順馬來半島東岸南下，航行到蘇門答臘島，再駛達爪哇島，而後由新加坡附近折向西北行，穿過麻六甲海峽，橫越孟加拉灣，抵達印度半島南端。這條航線可延伸至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南岸、紅海口，直至東非海岸。

到了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兩下東西洋，特別是第一次下印度洋，抵達孟加拉灣的恆河口和阿拉伯海的印度河口，他充分瞭解途經地區的地理、物產、民風，所撰《島夷志略》一書，是14世紀初期印度半島沿岸國家人民真實的生活記錄。

明代大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堪稱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和溝通的一次高潮。鄭和船隊途經30多個國家，其中位於印度半島的有古里（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柯枝（今印度西南部的柯欽一帶）、甘巴里（今印度南端科摩林角）、小葛蘭（今印度半島西海岸之奎隆）等國。

黃金、香料和奇珍異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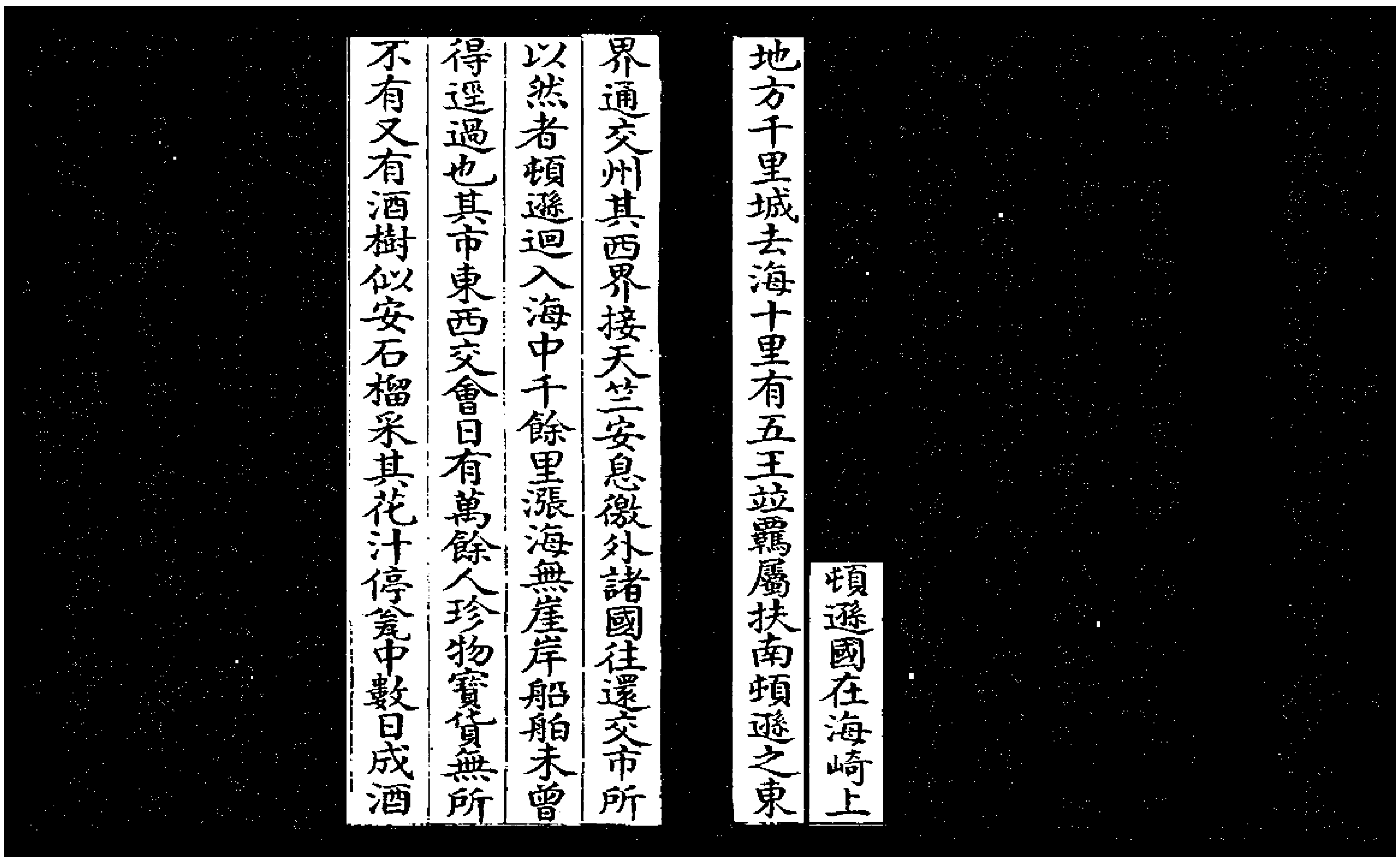
今天的東南亞，仍然保留著不少印度文明的印記。這種印記的形成，一方面源於古代印度國家一度對部分東南亞地區的征服，另一方面也源於密切的貿易往來。因此，古印度對古代南海周邊的影響，既波及上層社會，也關聯民間群體；既包括精神層面，也包括物質層面；既有貿易所引發的文化融合的自然屬性，也有侵略造成的文化擴張的強加特徵。

自孔雀王朝以來，開國君王旃陀羅笈多，其子賓頭沙羅、其孫阿育王四處征戰，幾乎佔領了印度次大陸的全部土地，這使得各個小國四處逃散，一些王族逃到了東南亞另謀發展。

於是，這些王族成了東南亞的客籍封建主，創建不少頗為「印度化」的國家。例如，緬甸的《琉璃宮史》記載，印度十六國時期迦毗羅衛等國與般遮羅國交戰兵敗，迦毗羅衛王放棄了中天竺，親率大軍來到了緬甸創立了太公國。再比如，《晉書》記載了一個故事，扶南國的開國國王是族人頭領柳葉，她嫁給了從印度而來的混填。後來，實際上是混填在治理扶南，開創了中南半島強盛的扶南時期。

這些故事已經能夠解釋，為何很多南海周邊古國都是採用了印度的國家制度和禮儀制度，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南海周邊古國很多君王的尊銜或稱號都是用梵文或巴厘文命名。實際上，直至今天，許多東南亞國家，特別是中南半島國家的語言中，都仍然包括大量的巴厘文和梵文詞語和文法。

在有關古印度與南海周邊古國貿易的文獻中，香料與黃金是最常見的商品和物資。古印度是佛教發源地，對香料有著很大需求，


頓遜國在海崎上
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竝羈屬扶南頓遜之東
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
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
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
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梁書》在扶南國詞條下描述了頓遜國「東西交會」的地位。

而東南亞香料無論從產量還是品質上講都對印度有著極強的吸引力。印度文獻也有記載，來自遠方的島嶼、滿載香料的船隻停泊在印度羯陵伽各港口。古印度也對從東南亞獲得黃金等貴金屬有著強烈的渴望。甚至於，印度人將孟加拉灣東岸的一部分地區稱為「金地」，而將馬來半島或印尼群島的一些島嶼成為「金州」，有時稱馬來半島為「黃金半島」。

古印度與南海周邊古國之間貿易的興起，一定程度上推動南海地區形成了幾個貿易中心。例如，位於馬來半島北部的小國頓遜（今緬甸丹那沙林），地跨東西兩岸，是印度和中國商旅經常經過的要地，彙集了來自印度、中國和南海周邊古國的商品。《梁書》記載：「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回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經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

逐漸地，印度向東方探索的航線延伸至了中國。特別是一些奇珍異寶，不僅成為當時中國帝王將相的玩物，從某種程度上也對經濟和技術產生了影響。

《瀛涯勝覽．古里國》中記載，鄭和抵達古里國（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澤科德一帶）後，授予古里國王明廷的國書和銀印，後來古里國派遣使臣入明，送來寶石、金繫腰、珊瑚珠、琉璃瓶、寶鐵刀、蘇合油、龍涎、梔子花、木香、乳香、錫、胡椒等。《西夷朝貢典錄》記載，1438年，明正統三年，榜葛剌（今孟加拉）派遣使節，向明廷贈送麒麟（長頸鹿），轟動朝野。此外，隨麒麟一起入明的還有馬、馬鞍、金銀子物、琉璃器皿、青花白瓷、撒哈剌（中亞地區的一種毛織品）、兜羅綿、糖霜、鶴頂、犀角、翠毛、鳥香、胡椒等。

印度與南海周邊古國之間的關聯，除貿易往來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佛教傳播。佛教在南海周邊古國的盛行，正是印度文化對於這一地區影響的力證。

當印度商船揚帆出海、向東航行時，船上除了商人還有傳道者，船舶在哪裡收帆，傳教者就在哪裡下船傳教。很多印度商人也是佛教徒，他們一邊經商，一邊傳教，將古印度統治階層的理念以及佛教理念一同捎到南海周邊。例如，信奉佛教的印度商人同古代緬甸建立穩定的貿易關係後，阿育王專門派出宗教使團，使貿易活動和傳教活動相得益彰。

西元前3世紀，阿育王統治時期，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開始傳入錫蘭（今斯里蘭卡）。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和鞏固，後來成為巴厘語系佛教的中心。中國僧人法顯赴印度求法，曾乘船到錫蘭住了兩年，參拜大寺、無畏山寺、佛牙寺等，學習佛法，求取佛經。

隨著古印度東南部海港與緬甸的通航，以及錫蘭與緬甸航路的發展，到6世紀時，上座部佛教已在緬甸流行。1044年，阿奴律陀建立蒲甘王朝，統一了緬甸。1056年，印度佛教僧人信阿羅漢來到蒲甘，促使國王定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尊信阿羅漢長老為國師。

根據當地出土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遺址判斷，早在西元前，上座部佛教已經傳入今天的泰國。在封建君主的護持下，逐漸形成獨特的「僧王制度」，佛教僧團首領由國王任命，管理全國的僧務。後來，佛教幾乎成為泰國歷史上的全民信仰，對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產生重大影響，至今泰國仍在使用佛曆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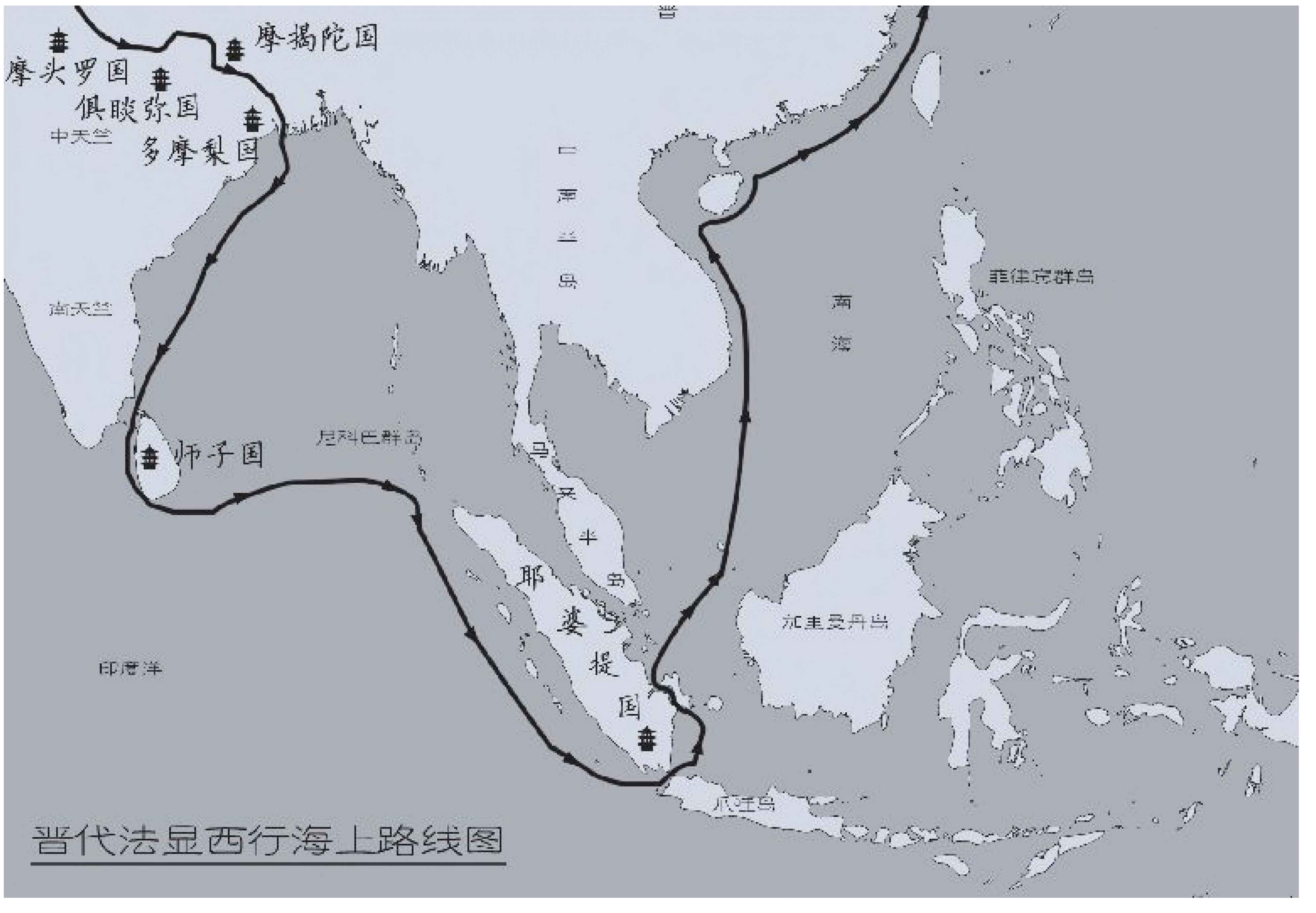
佛教也是古代中國和古印度溝通的重要橋樑。佛教於西曆紀元前後由古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落地生根，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佛教。曾被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稱為「偉大的學者」的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首任院長譚雲山，將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比喻為印度嫁女、中國娶親，中國迎娶佛教這個新娘，而佛教也變成了好媳婦，在中國生兒育女、繁榮昌盛。

印度佛教在中國的繁榮演變，得益於印度高僧乘風破浪來到中國傳教，以及中國高僧不辭艱辛到印度取經。在這一過程中大乘佛教的引入，無疑是中印佛教交往的重要一環。對於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小說《西遊記》有闡述：小乘可以度人，大乘可度眾生。從某種意義說，佛教在古代中國的發展與普及，與其說是人們對一種來自異域的宗教的狂熱，不如說是對精神世外桃源、社會安定、和平的追求與嚮往。

在中國與古印度的交往中，僧人的活動占了很大的比例，可以說是古代中印往來的一條重要線索。印度來中國弘法的高僧和中國赴印度求法的高僧數不勝數，而南海是他們往來、交流的必經通道。

耆域是有記載的第一位由海道來中國的天竺僧人。西晉光熙元年（306年），他從天竺進入印度洋，抵達馬來半島的扶南，橫穿馬來半島後，經交州、廣州、襄陽，抵達洛陽。在洛陽，耆域懸壺濟世，口碑甚好。衡陽太守滕永文患腳攣屈症，多年行走不便，經他診治，恢復如常。

東晉名僧法顯曾於399年至412年與慧景、道正、慧應、慧嵬等人從長安出發，赴天竺求法，於402年抵烏萇國（今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406年抵藍毗尼和迦毗羅衛城（今尼泊爾和印度交界地區），409年末抵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在師子國居住兩年後，法顯於412年循海道經耶婆提國（今印尼蘇門答臘島）返回祖國。前後共14年，先後遊歷了北、中、西、東天竺。歸來後，他根據旅途見聞撰寫了《佛國記》。



法顯西行回國時的海上路線示意圖。

南朝梁武帝時期，印度高僧寶掌放棄皇宮中的優厚款待，去當時很不發達的四川修廟、傳道，人稱「千歲寶掌」。直到今天，遊人登上峨眉山，還能看到「寶掌峰」，而「寶掌峰」正是寶掌和尚當年傳教的地方。

《西遊記》中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師早年出家，研究各家學說，發現有很多矛盾之處，便發誓願赴印度求法。貞觀元年（627年），玄奘法師啟程從陸路西行，曆十七年遍學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各種學說。玄奘歸國前，在中天竺求佛論道。臨行前，中天竺戒日王問他從哪條道回去，如取道南海，當派使者相送。雖然當時從海上返回耗時更短，風險更小，但玄奘為了兌現取經途中向高昌國國王許下的在高昌講經弘法的承諾，選擇了原路返回的陸路選項。

這種佛教交流還帶動了跨地區彼此之間政治、文化、經濟等各層面的認知。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當玄奘法師遊歷到中天竺時，戒日王問他，聽說中國有《秦王破陣樂》，不知秦王是誰，又有什麼功德，得到人們如此頌揚？玄奘說，秦王（李世民）是當今的天子，沒有登位之前，受封為秦王。當時天下動亂，百姓無主，秦王身為帝子，出任天策上將，振奮軍威，翦滅群雄，杖鉞揮戈，平定海內，重安社稷，再現天日，天下懷恩，所以有這首頌歌。

戒日王聽後，大喜，說：「我當東面朝之。」

佛教進入中國後，為印度寺廟文化在中國繁榮奠定了基礎，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古代文人階層的生活方式。如，古諺有云，「世上好言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杜牧的《江南春》寫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李白的《巡山僧不遇作》有云，「香雲徧山起，花雨從天來」；張繼的《楓橋夜泊》描述，「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在印度佛教中，有一本重要的文獻叫作《維摩詰經》，主人公維摩詰超越佛教「禁戒」模式，宣傳在世俗生活中也能修煉成佛。

《維摩詰經》是由被後秦奉為國師的鳩摩羅什法師翻譯而成，它後來成為對中國佛教發展影響最大的佛經之一，成為中國禪宗的根本經典。唐代大詩人王維（字摩詰）就是崇拜維摩詰的典型人物。

《舊唐書．王維傳》對他的描寫是：「晚年長齋……彈琴賦詩，嘯吟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只不過，王維的名字「維」和他的字「摩詰」，在梵文中的意思並不太好。維摩詰本是印度的一位高僧，「維」是「沒有」的意思，「摩」是「污垢」的意思，「詰」是「名稱」的意思，維摩詰整體就是「淨名」、「無垢稱」、「不惹塵埃的名稱」的意思，而王維把「維」與「摩詰」分而用之，有些「斷章取義」的味道。大詩人李白自稱青蓮居士，而「青蓮」也出自《維摩詰經》。他在《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有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縱觀南海周邊古國史，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對其影響的痕跡。相比之下，中國對南海周邊古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衣食住行、科技文化等方面，例如稻作文化，以至於今天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習俗和中國東南、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相同或相近。而印度對南海周邊古國的精神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佛教在今天東南亞的盛行正是印度文化對於這一地區影響的力證。

而古代中國與古印度的交往，則奠定了南海文明可持續性多元文化形態的基石。

03 南海上的東瀛浪人

義大利大旅行家馬可．波羅沒有到過日本，但在其名著《馬可．波羅遊記》中，卻有一段他道聽途說得來的關於日本的描述：

日本島是東洋的一個海島，位於大陸或蠻子海岸相距約2400公里的海上。這個島面積很大，居民的面目清秀、體格健康、態度文明……根據曾經到過這裡的人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的王宮富麗堂皇，蔚為奇觀。王宮的整個屋頂用金色的鐵皮覆蓋著……宮殿的天花板也是同樣的貴重金屬做成的；許多房間內，有很厚的純金小桌，窗戶也用黃金裝飾。這種宮殿富麗的程度，實在難以用語言來表達。

在當時的中國宮廷看來，馬可．波羅筆下鋪陳的「日本」王宮之富麗堂皇不足道耳。但在《馬可．波羅遊記》的主要讀者——歐洲人，特別是在後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殖民探險家心目中，日本列島儼然是遙遠東方的又一個「黃金島」。

東亞貿易圈的「局外人」時代

古代日本與南海周邊古國的交流絕大多數與中國息息相關。那個時期，與東南亞有交集的最著名的日本人，大概是進入中國歷史教材的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753年，阿倍仲麻呂在從中國回日本途中遇到風暴，漂流到了安南的驩洲沿岸。或與這段遭遇有關，766年，在唐朝為官的阿倍仲麻呂被任命為安南節度使。

而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早期東亞貿易圈中，16世紀歐洲殖民者入侵東南亞之前，日本列島在東亞貿易圈中是名副其實的「偏居一隅」。以14至16世紀的日本重要港埠堺市（今大阪地區）為例，它在大多數時期的繁榮主要得益於與中國、朝鮮以及琉球王國的貿易往來。尤其是位於東海、南海、台海交會處的琉球，時稱「萬國津梁」，在日本的對外貿易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法國地理經濟學家弗朗索瓦．吉普魯在《亞洲的地中海》一書中寫道，「（向明朝和日本九州薩摩藩雙重效忠的）琉球主要是東南亞產品的貿易倉庫，包括暹羅、北大年、麻六甲、巴領旁、爪哇、蘇門答臘、越南和巽他群島的產品，如象牙、錫、寶石、胡椒和其他香料，大部分出口到中國、日本、朝鮮。如果被運到日本，就用來交換刀劍、金子、海參、魚翅、鮑魚、海菜、墨魚乾，這些產品又從長崎出口到琉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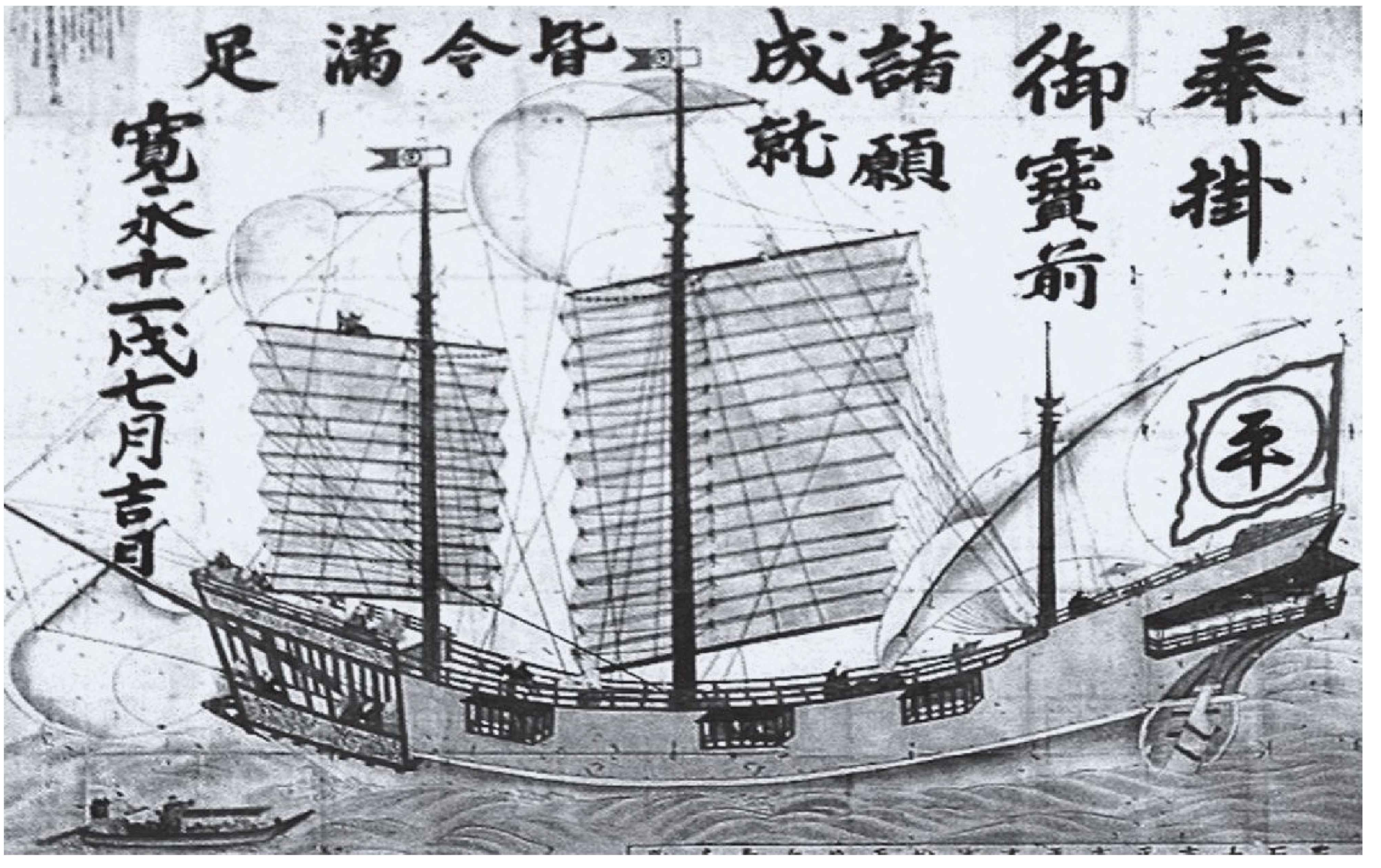
根據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研究，14世紀末到16世紀中葉，日本九州地區的博多（今福岡境內）、坊津（今鹿兒島境內）等港埠運往東南亞的貨物，主要經中國東南港口城市、琉球群島、臺灣，方能運抵安南、巴領旁、蘇門答臘、麻六甲等南海周邊地區。

這一時期東亞貿易「黃金時代」的基本特徵仍是所謂朝貢體系。進入16世紀，一方面隨著明朝海禁措施越來越嚴，「倭寇」等海盜集團在中國沿海日益猖獗；另一方面隨著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先是葡萄牙人，再後來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等向東方推進，東亞貿易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琉球國王尚元王（1557至1572年在位）時期，來自琉球的船隻不再駛向東南亞，而是著重於與中國、日本、朝鮮的貿易。琉球船隻最後一次駛往暹羅是在1570年。此後，琉球完成從東南亞的撤離。

不久之後，日本的薩摩藩於1609年將琉球王國置於支配之下，並通過強化對琉球的實質控制，不停地從內部抵制和侵蝕中國主導的朝貢體系。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勢力東漸和北上，日本不再依靠琉球的中轉作用，與歐洲人和東南亞的直接貿易接觸也越來越密集，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形式便是「南蠻貿易」和「朱印船貿易」。

南蠻貿易和朱印船貿易

所謂「南蠻貿易」，指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初，日本人與「南蠻人」（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貿易。



日本博物館收藏的一幅繪製於1634年的日本朱印船作品。

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是最早溯南海、東海抵航日本的西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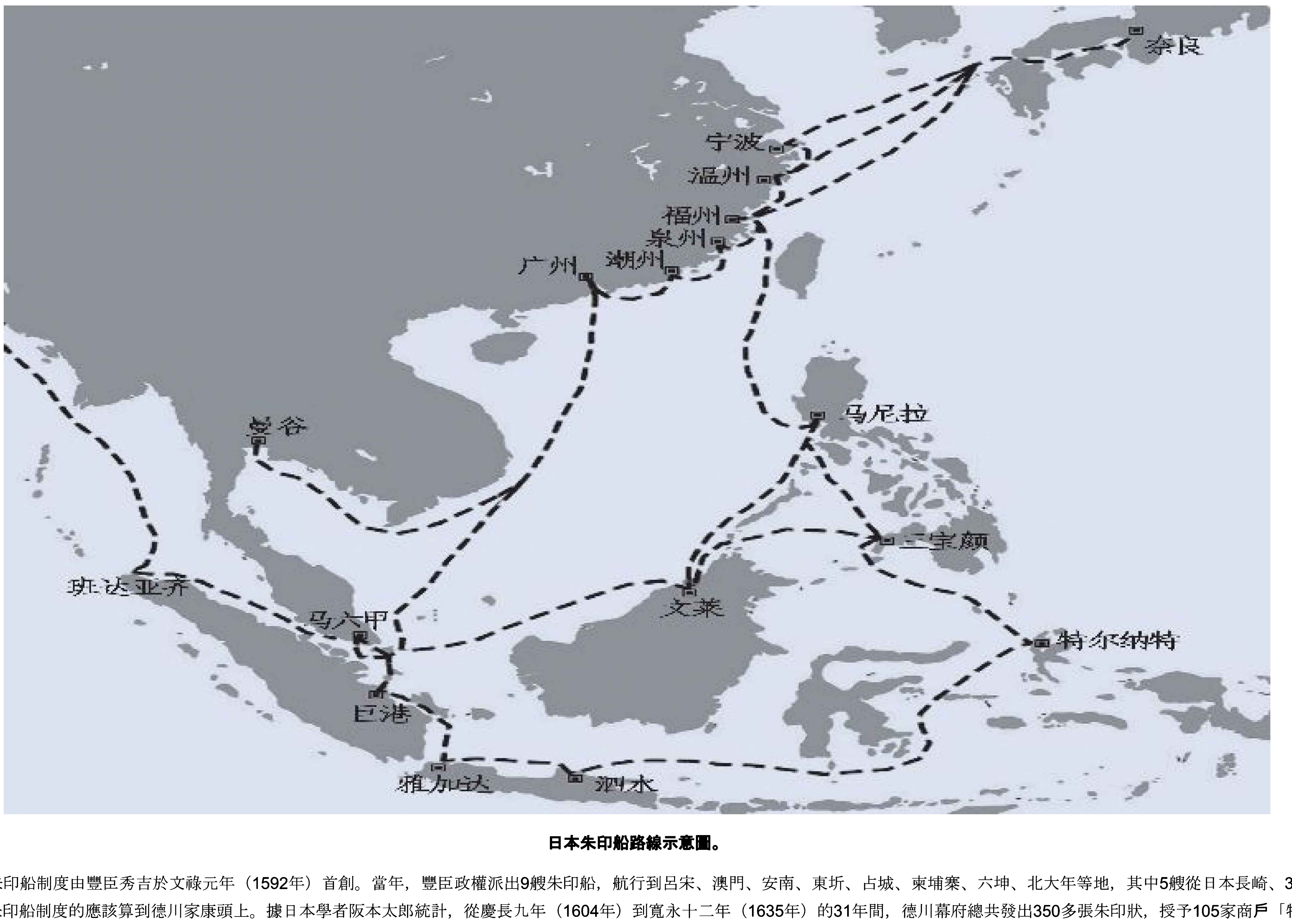
1543年，葡萄牙船到達鹿兒島以南的種子島。此前一年，葡萄牙船到了琉球王國，但琉球人已經知道葡萄牙人攻佔麻六甲的惡行，拒絕與這些「紅毛人」進行貿易。而在日本，以島津藩主為首的九州地區大名們急於開拓南洋貿易，對葡萄牙人的商船抵港表示歡迎。

1557年，葡萄牙人佔據澳門後，以澳門為據點，與日本和明朝展開更為積極的貿易。日本戰國霸主織田信長及其繼承人、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基本認可「南蠻貿易」。再後來，西班牙人經非洲大陸開拓了太平洋航路後，以呂宋島的馬尼拉為據點，也派船前往日本通商。

江戶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願意與「南蠻人」展開貿易。然而，隨著西班牙傳教士們隨商船不斷深入日本腹地布教，幕府開始限制海外貿易，將與歐洲人的交易場所限定在平戶港（長崎縣平戶市）和長崎港。1624年，幕府全面禁止了西班牙船隻進港，只對葡萄牙商人暫時網開一面——因為日本需要葡萄牙人從澳門帶來的中國生絲，因此容許其留在長崎的一個名為「出島」的人造島。1638年，在九州的島原半島和天草諸島，發生了日本天主教徒的動亂，幕府於是宣布徹底禁教。1639年，幕府頒布第5次鎖國令，禁止葡萄牙船隻來航。「南蠻貿易」終結。1641年，從平戶遷到出島的荷蘭商館成為日本對西洋人的唯一貿易視窗，直至1859年。

「南蠻貿易」是日本與以東南亞為基地的歐洲人之間的貿易，與之相比，其後的「朱印船貿易」雖然持續時間更短，但因為直接將日本人帶到了東南亞，對日本與東南亞帶來的歷史影響更為深遠。

一般來說，朱印船是指持有日本幕府頒發的朱印狀到南洋各地經商的船隻。朱印狀是蓋有紅色官印的文件或證件，類似執照，由幕府頒發，上面標注了朱印船航行的目的地、從事貿易的人員等。幕府希望朱印船經停王國保其安全、准其貿易。朱印船貿易業構成了東亞貿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朱印船航抵的諸多港口中，東南亞港口占了絕大多數。



日本朱印船路線示意圖。

據日本文獻記載，朱印船制度由豐臣秀吉於文祿元年（1592年）首創。當年，豐臣政權派出9艘朱印船，航行到呂宋、澳門、安南、東圻、占城、柬埔寨、六坤、北大年等地，其中5艘從日本長崎、3艘從京都、1艘從堺港出發。但是，正式建立朱印船制度的應該算到德川家康頭上。據日本學者阪本太郎統計，從慶長九年（1604年）到寛永十二年（1635年）的31年間，德川幕府總共發出350多張朱印狀，授予105家商戶「特許權」，其中包括10家中國商戶。例如，旅日華僑黃廷曾於1603年受德川家康之托，攜五百兩銀子和朱印狀到柬埔寨做生意。朱印船每年10月到次年4月間乘東北季風出航，翌年5月至9月乘西南季風返航，平均載貨量300噸。輸入日本的商品以生絲和絲織品為最大宗，其次是鹿皮、鯊魚皮、鉛、錫、蘇木、香料、棉織品、黃金、砂糖等；日本輸往海外的則以白銀為主，其次是銅、鐵、硫黃、樟腦、漆器等產品，鍋、水壺等鐵器，扇、傘等紙製品，以及大麥和麵粉等糧食作物。

馬尼拉是朱印船最主要的目標港之一。日本船運至馬尼拉的貨物大多是供當地市場消費的商品，如麵粉、鹹肉、鹹魚、水果。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安東尼奧．摩加曾列出日本產品清單一張：「日本人帶來了五顏六色的紡絲、優質漂亮的屏風，精心鍛造的刀劍、鎧甲、矛槍等武器裝備，漆得很精緻的寫字盒和小木箱等」。日本人運送回國的則有「中國生絲、黃金、鹿皮、做染料用的蘇木、蜂蜜、加工過的蜂蠟、棕櫚油、卡斯蒂利安的葡萄酒、

大茶缸、玻璃、布和其他西班牙古玩」。

當時，明朝因倭寇猖獗，不勝其擾，禁止商船赴日貿易。但日本藉助朱印船貿易，無需依靠西方殖民者，便獲得了大量國內極為暢銷的中國絲貨或其替代品，極大緩解了日本對中國貨品的急切需求。特別是在1526年，日本在島根的石見銀山發現大型銀礦後，日本白銀大量出口海外，也促進了與東南亞貿易的迅猛發展。

朱印船貿易從開始到衰退，前後不到半個世紀，卻帶動了日本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的迅速發展。朱印船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活躍了當地市場，同時也促進了日本和東南亞的交往，移居東南亞的日本人也為當地社會做出了程度不等的貢獻。根據日本歷史學者岩生成一的研究，朱印船在其巔峰期（1615年至1625年）的貿易量相當於甚或超過了與日本通商的葡萄牙、荷蘭和中國商船的總貿易量。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試圖壟斷東南亞奇珍異物貿易的荷蘭人和英國人一再企圖阻止朱印船貿易，也因此引起了不少商業和外交糾紛。

商人、傭兵、天主教徒

17世紀的東南亞貿易中，荷蘭、葡萄牙、中國以及從事朱印船貿易的日本商人間，競爭激烈。日本人尤其在生絲貿易中的商業手法兇悍。朱印船在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的貿易據點曾一度壟斷當地的生絲貿易。同樣，在越南北部的東圻，日本人帶著銀兩，大量購入生絲和絲織品。

西方文獻中著名的朱印船貿易商人，包括定居暹羅、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打交道的與右衛門，定居馬尼拉、精通西班牙語的西類子，以及被荷蘭人稱為「將軍購物袋」的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等。

海外交通和貿易的發展，也推動著日本人移居國外。據估算，當時乘坐朱印船前往海外的日本人超過了7萬人次。在不到百年時間裡，大約有1萬名日本人移居臺灣、呂宋、安南、柬埔寨、暹羅、馬來亞、爪哇等。他們在菲律賓的馬尼拉、越南的會安和沱瀼、柬埔寨的金邊、暹羅的阿瑜陀耶等地建造日本町（注：日本人街），其繁榮程度不亞於當地的唐人街。日本町一般居住有數百人至數千人不等，如阿瑜陀耶的日本町有1500多名日本人，馬尼拉郊外聖．米格爾日本町的人數最多時號稱超過3000人。

在古代東南亞，無論是王朝時代還是殖民時代，日本雇傭兵也鼎鼎有名。

早在日本戰國時期，就有葡萄牙人將日本奴僕等帶到了南海周邊國家從事勞役和兵役。1590年，豐臣秀吉政權頒布禁止人身買賣令、海盜禁令、刀劍禁令後，日本浪人們等紛紛出海。1595年，在西班牙領有的馬尼拉，聚集有上千日本人。當時，荷蘭人也到東印度地區，為爭奪香料群島（今馬魯古群島）等地，不時與葡萄牙人發生衝突。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以及後來的英國人的殖民地爭奪中，日本傭兵被視為貴重戰鬥力。

葡萄牙人佔據麻六甲前，就有日本人在麻六甲、暹羅等地通商和居住。從中國沿岸被驅逐的倭寇逃到此地的也不在少數。明嘉靖末期，暹羅已有日本傭兵。暹羅書籍中，關於日本人的最早記錄提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暹羅被當時的緬甸和瀾滄（今老撾）等國所侵，因防衛得宜而獲勝，相傳暹羅軍中有500名日本傭兵助陣。1608年至1612年間，在大泥（馬來半島的北大年王國）的英國人弗洛西斯也記錄下日本傭兵的活動。1628年，在暹羅的荷蘭人稱，日本人參與了暹羅政亂。

馬尼拉也有不少日本人被西班牙人雇為傭兵。史料記載，1606年，西班牙人殺了一名日本人，引起馬尼拉的日本人群起，打算「訴諸干戈」，西班牙人遂以此為藉口，將馬尼拉的日本人遣返。在東南亞，最著名的日本傭兵隊長是定居暹羅的山田長政。山田長政（1590—1630年）曾是沼津藩主大久保忠佐的隨從。1612年，他乘坐朱印船從長崎經臺灣抵暹羅。之後，加入以津田又左右衛門為首的日本人傭兵隊，嶄露頭角，最終成為阿瑜陀耶日本町的頭領。

據說，山田率兵兩次擊退西班牙艦隊的入侵，受到阿瑜陀耶國王頌湯的賞識。當時阿瑜陀耶王國的基本法典《三印法典》中，對日本傭兵隊的政治地位有明確規定，設有「日本人義勇兵局」，負責人官居二等爵位「披耶」，山田長政即擁有「披耶」官職。

隨著山田長政在商業和軍事方面的勢力坐大，他開始干涉阿瑜陀耶國的王位繼承。1629年，巴薩通國王繼位後，在王位未穩之際，他首先拿日本人「開刀」。當時，阿瑜陀耶王朝把國都建在湄南河的一個沙島上，島上獲准居住的外國族群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日本人。由於日本人手中控制有一定兵權，而且，山田與巴薩通國王的政敵關係密切，因此，巴薩通為了牽制日本人的勢力，找藉口將山田貶黜到沙島之外。1630年，山田長政在率兵與南方大泥王國交戰時負傷，隨後毒發身亡。也有人說他是被巴薩通國王派人毒殺的。山田死後，他發跡的阿瑜陀耶日本町也被以「謀反」為名遭屠村。此後，在暹羅的日本人紛紛逃出暹羅，乃至日本後來出臺報復性政令，禁止所有暹羅商人赴日經商。至此，阿瑜陀耶王朝與日本的蜜月結束，兩國外交陷入長達百年的中斷。

另一方面，南海周邊國家在天主教傳入日本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中介作用。

天主教進入日本的關鍵人物是耶穌會創始人之一聖方濟各．沙勿略和一名犯下殺人罪的鹿兒島商人彌次郎，後者犯事後在日本的葡萄牙商人幫助下逃到麻六甲，在那裡遇到了沙勿略。沙勿略在瞭解到去日本傳教極有希望後，便將彌次郎送到葡萄牙人1510年佔領的印度果阿接受天主教教育，彌次郎後來受洗，教名保羅，是有記載的日本最早的天主教徒。1549年，彌次郎作為翻譯跟隨葡萄牙宣教團回到日本傳教。

幕府後來與歐洲傳教士發生了一系列衝突，直至發生日本基督教徒的暴亂，直接導致了幕府採取徹底的禁教和鎖國政策，深刻影響了日本近代發展軌跡。

日本人在東南亞的口碑

無論是商人，還是雇傭兵，日本人當年在東南亞的口碑褒貶不一。聯想到近現代日本人在東南亞的所作所為，讓人不禁感慨日本人在海外的行動方式和角色扮演的歷史基因一脈相承。

例如，當時歐洲人對壟斷部分貨品的日本朱印船商人愛恨交加。荷蘭東印度公司記載有被日本商人偽劣貨品等坑害的記錄。「鹿皮的供貨如果只交給日本人的話，荷蘭人只能拿到有損傷的鹿皮……暹羅的商館長要注意，防止日本人的欺詐行為。」原因是，雨季活捉的鹿皮品質高，旱季弓箭獵捕的鹿皮品質低，日本人將旱季的鹿皮交給荷蘭人，自己則留下雨季的優質鹿皮。

馬尼拉總督莫爾加在《菲島史料》中提到，「馬尼拉常有若干日本人居住……此等日本人為日本商船所遺留者，其數固不若中國人之眾多……彼等係活潑之民，性善氣勇……其處於非常時，則斷然決絕。」這段話的語氣可謂敬畏有加。

在日本平戶的荷蘭商館館長亞科斯．斯賓克斯1620年曾這樣評價日本傭兵，「這些人一旦走出國門，統領他們是危險的。他們可能不聽命，如果對他們不好，他們很快會下定決心（反抗）。」

近代日本史地學家藤田豐八在《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歐勢東漸之初在海外之日本人」一文中總結說，當時日本人在異族人眼中的形象，有長處三：活潑而勇敢，寡言而守信，重禮義廉恥、舉止高雅；也有短處三：勇敢好事、令人興恐怖之感，不欲久居異地，規模小、依人作嫁。

翻閱日本人在東南亞留下的歷史痕跡，撫今追昔，頗讓人覺得古人誠不我欺。



今天位於泰國阿瑜陀耶的泰國「日本人村」遺址。

04 南海造就的萬國津梁

在南海文明的演進過程中，位於南海北緣之外的琉球國，扮演著重要角色。琉球國雖然在地理方位上並不在南海範圍內，但由於它位於南海、東海的交界處，因此在南海貿易與東北亞貿易中一度發揮起中轉站的橋樑作用。伴隨商品貿易的繁榮，各種地域文化密碼在琉球交融和傳播，萬國津梁的美名由此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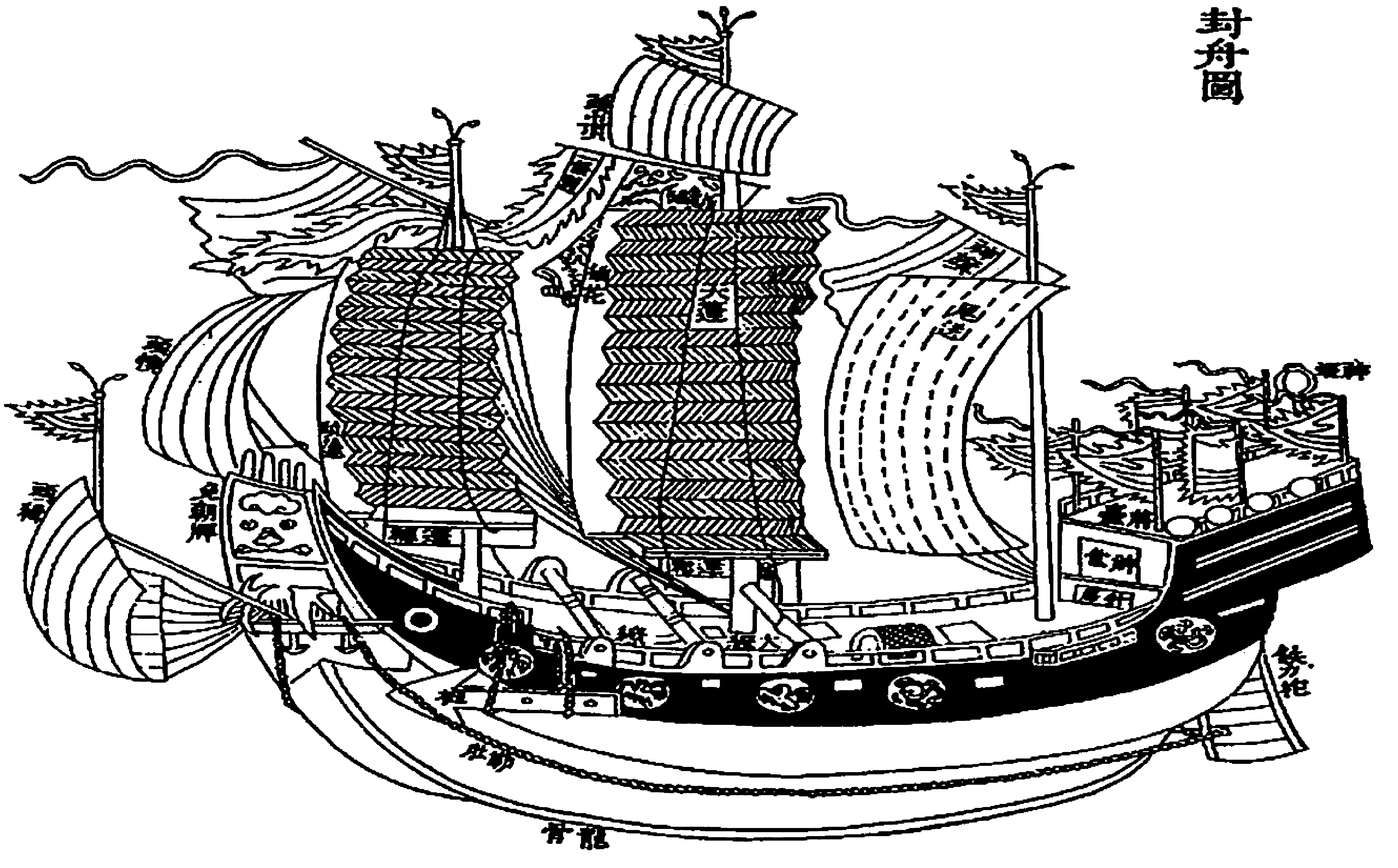
早期的「公派技術移民」

琉球國位於東海、臺灣島和日本九州之間的琉球群島上。琉球王國的都城在首里，位於今天日本沖繩縣那霸市的東郊。關於琉球古史，成書於1650年的琉球國第一部漢語國史《中山世鑑》有所記載：「蓋我朝開闢，天神阿摩美久築之。當初，未（有）琉球之名。數萬年後，隋煬帝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此國地界。萬濤間遠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這部琉球官方國史書中明確提到，琉球的國名是由隋朝使臣朱寬命名的。

中國歷朝都很清楚琉球對海上絲綢之路所發揮的中轉作用。明朝時，琉球處於「三山分立」時期，即分作山北、中山、山南三股勢力。其中，中山王與明廷交往最為積極和密切。為了幫助中山方便往來，明洪武帝朱元璋正式向琉球派遣了一批技術移民，以造船的「舟工」為主，史稱「閩人三十六姓」。這些早期的公派技術移民抵達今天那霸港附近島嶼後，建立了一個獨立村落，被當地人稱作是「唐營」，後改名為「久米村」。中山的統治者還按照這些技術移民的各自特長，委以各種官職，專司不同事務，有人負責造船，有人負責航海，有人負責翻譯，有人負責往來之貨品。

在古代海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受天塹阻隔，新技術傳播速度緩慢，不同地域的技術水準往往表現出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差異。類似明朝向中山輸出技術人才的做法並不常見，效果也極為突出。

「閩人三十六姓」在中山不僅帶動了當地技術發展，而且還把許多中國的制度、風俗、文化、禮儀、音樂等傳播到了彼國，使中山王的勢力迅速崛起，如願以償地在「閩人三十六姓」抵達中山的30多年後吞併了山北與山南兩個割據勢力，實現了琉球群島的統一。琉球三部官修的編年史之一的《球陽》記載到，「閩人三十六姓」到中山之後，琉球才開始「節音樂，制禮法，改變番俗，致文教同風之盛，太祖稱為禮儀之邦」。



明朝出使琉球的「封舟」示意圖。

明廷的公派技術移民，讓占盡地利之便的琉球，具備了遠涉南海以求奇珍異物的技術能力。幾乎在同一時期，一個歷史性「天時」的出現，真正把琉球推向極盛。

特許經營造就「天時」

琉球統一之時，迎來了一個關乎南海貿易與東海貿易的特殊時刻，即明廷開始厲行嚴苛的海禁政策。一切形式的民間海上貿易都被禁止，只有朝廷的朝貢貿易成為唯一合法的貿易通道。

所謂朝貢，實為貿易的一種形式。明朝廷向海外諸國頒發「貢舶勘合」，即朝貢船舶執照，只有獲得執照的船隻才能帶著貢品進入中國諸港。所謂貢品，實際上也不是無償供奉給朝廷，通常朝廷會以賞賜的名義給予數倍於貢品價值的酬償。而且，貢船一般會順帶捎來一批貨品在民間市場「互市」，實現貿易。在明朝海禁時期，貢船貿易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對外貿易管道。



琉球王宮主殿舊影。

在這種大機制下，不同國家與明朝廷的親疏遠近，直接關係到貿易體量和頻次。由於琉球與明朝廷的交好，使得琉球的進貢最為頻繁。《明史》記載道，與明朝親近的朝鮮與安南都是三年一貢，只有琉球是兩年一貢。就次數上計算，明朝時，琉球官方朝貢多達170多次，是安南的兩倍、爪哇的五倍、朝鮮的六倍、日本的八倍。不僅如此，明朝廷還依照關係的親疏，對朝貢的貢品給出不同的「收購價格」。同樣是胡椒，如果由南海周邊古國的貢船入貢，明朝廷可能以十倍於當地市價的價格收購，但如果是由琉球進貢，則以三十倍市價的價格給予賞賜。琉球，實際上從明朝廷獲得了「最惠國待遇」。

轉口貿易依仗「地利」

巨額利潤催生巨大動力，促使琉球人遠赴南洋尋找物品，同時也促使南海周邊古國紛紛北上，將貨品主動賣予琉球。15世紀至16世紀，琉球的那霸已經成為東亞地區最耀眼的商港。琉球商人頻繁往來於那霸與福建之間，商業輻射向北一直到日本和朝鮮，向南可到安南、呂宋、暹羅、爪哇、麻六甲等。依託連接三地、縱跨兩洋的有利地理位置，彈丸之地的琉球用轉口貿易有效彌補了自身資源的匱乏，並在短短幾十年內成為名副其實的「萬國津梁」。

用今天的眼光看，琉球當時已經把多邊貿易演繹到極致，它一邊做著區域內的小貿易，例如，把日本的白銀、漆器、刀劍、屏風和扇子賣到中國並把中國出產的藥材、瓷器、絲綢、銅錢轉售到日本和朝鮮；一邊做著跨區域的大貿易，例如把東南亞、印度和阿拉伯半島出產的犀角、蘇木、香料、錫、糖、象牙、乳香、龍涎香銷售到中、日、朝三國。

由於當時福州是琉球在華貿易的最主要港口，使得海禁時期的福州彙集了世界各地的手工業品、醫藥、香料、礦產、海產、紡織品及其他珍奇貨物，成為當時中國的「海淘之都」，「代售球商之貨」。在今天的沖繩縣立博物館內，懸有琉球國鑄於1458年的一口大鐘，名為「萬國津梁鐘」，上面鑄有漢字銘文，「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剎」。有意思的是，在銘文中，還有一句「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足見當時的琉球已經把自己融入到南海的大商業文明中了。

南海文明開創「人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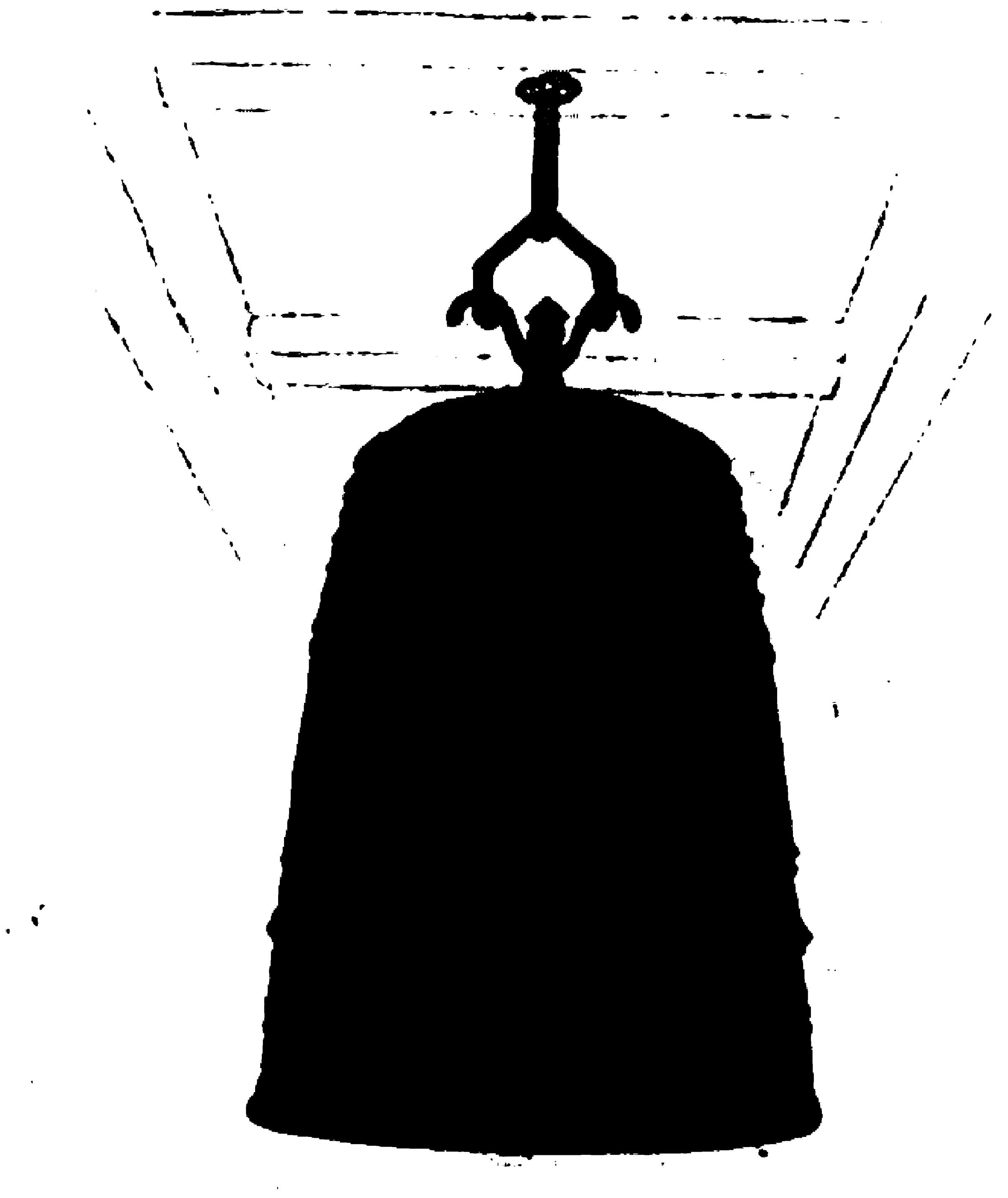
天時與地利，是琉球迎來最繁榮時期的重大歷史機遇。但還有一個外部因素，可歸納為琉球得以發展的重要外因，那就是走向巔峰之盛的南海文明。15世紀至16世紀，南海航線和航線技術都進入了成熟期，東西兩條包圍南海的航線都已成熟，使得圍繞南海形成的貿易圈和人文圈日臻健全，為琉球的技術、理念、貿易大發展提供了包容的「人和」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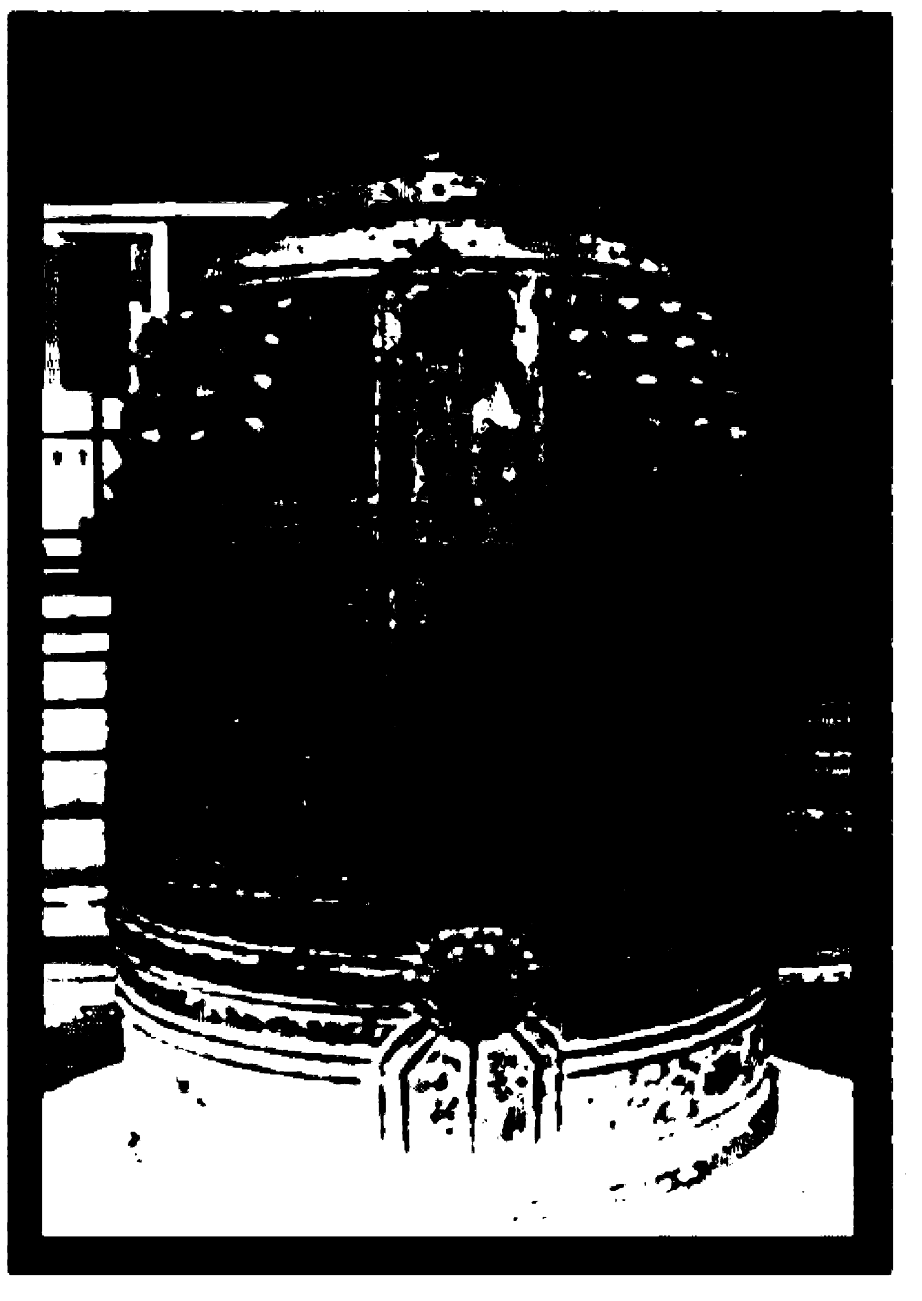
琉球有一本《歷代寶案》，本為琉球國外交文件，後經當地學者整理編纂成一本漢文文獻，詳細記錄了14世紀至17世紀期間琉球王國與中國、日本、暹羅、土耳其、麻六甲、蘇門答臘、爪哇等國的外交貿易往來書信。書中記錄有洪熙元年（1425年）至隆慶元年（1567年）這段明朝海禁期東南亞船隻前往琉球貿易的情況，足見當時南海周邊諸國的商人對琉球趨之若鶩的心態。

《歷代寶案》記載，中山王一統琉球後，久欲遣使爪哇等國，無奈國中缺乏海道之師，無法如願。後來，明王朝向琉球派遣了專門的海道針師，即航海引航員，琉球人這才南行至南海周邊。從爪哇到舊港，從蘇門答臘到呂宋，琉球一步一步開啟了與南海諸國的通商大時代。

這其中，暹羅與琉球的貿易交往尤為密切。《歷代寶案》記載，1419年至1570年間，琉球派遣船隻出使暹羅合計48次，是琉球交往最頻繁的東南亞國家。琉球最看重暹羅的「羅斛香」，因為這種香料「焚極清遠」。暹羅國出產的蘇木量多價廉，則是琉球進貢明朝的主要貢品。另外，琉球還從暹羅進口犀角、象牙、翠毛、黃蠟、大風子油等商品。

除暹羅之外，麻六甲王國也是琉球在東南亞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15世紀，麻六甲王國在明王朝的政治支持下成為東西海上交通總匯，國際化貿易港。因此，琉球與麻六甲貿易，追求的並不是產自東南亞的產品，而是大量採購來自印度、阿拉伯甚至歐洲的物品。1463年至1511年的48年間，琉球官派船隻前往麻六甲18次。





萬國津梁鐘示意圖及實物。

但此後，由於麻六甲王國被葡萄牙殖民者終結，琉球與麻六甲的官方往來自16世紀30年代中斷，兩個古代王國的貿易往來就此畫上了絕筆。

琉球不僅與東南亞通商，還幫助朝鮮等國建立起與東南亞的通商關係。朝鮮《海東諸國記》稱琉球「地窄人多，以海舶行商為業，西通南蠻、中國，東通日本、中國，日本、南蠻商舶亦集其國都海浦，國人為置肆，浦邊互市」。事實上，朝鮮正是通過琉球打通了與東南亞的貿易通道，使朝鮮宮廷得以從南洋採購藥物、香料、珍珠、玳瑁、珊瑚等奢侈品。

16世紀後期，西方殖民者廣泛進入東南亞，逐漸蠶食當地商業，琉球與南海諸國的貿易越來越不好做。同時，琉球人的暴富開始讓日本垂涎。17世紀初，江戶時代的日本藩屬薩摩藩入侵琉球，干涉、掌控琉球內政，琉球開始被迫向薩摩藩、江戶幕府朝貢。琉球萬國津梁的地位漸漸遠去。此後兩百多年，日本逐漸排斥琉球政治核心圈中的琉球人，直至1876年日本在琉球設立司法機構，事實性地將琉球置於其統治之下。



現日本沖繩琉球王宮正殿懸掛「中山世土」匾額的原物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冊封琉球王尚真王時所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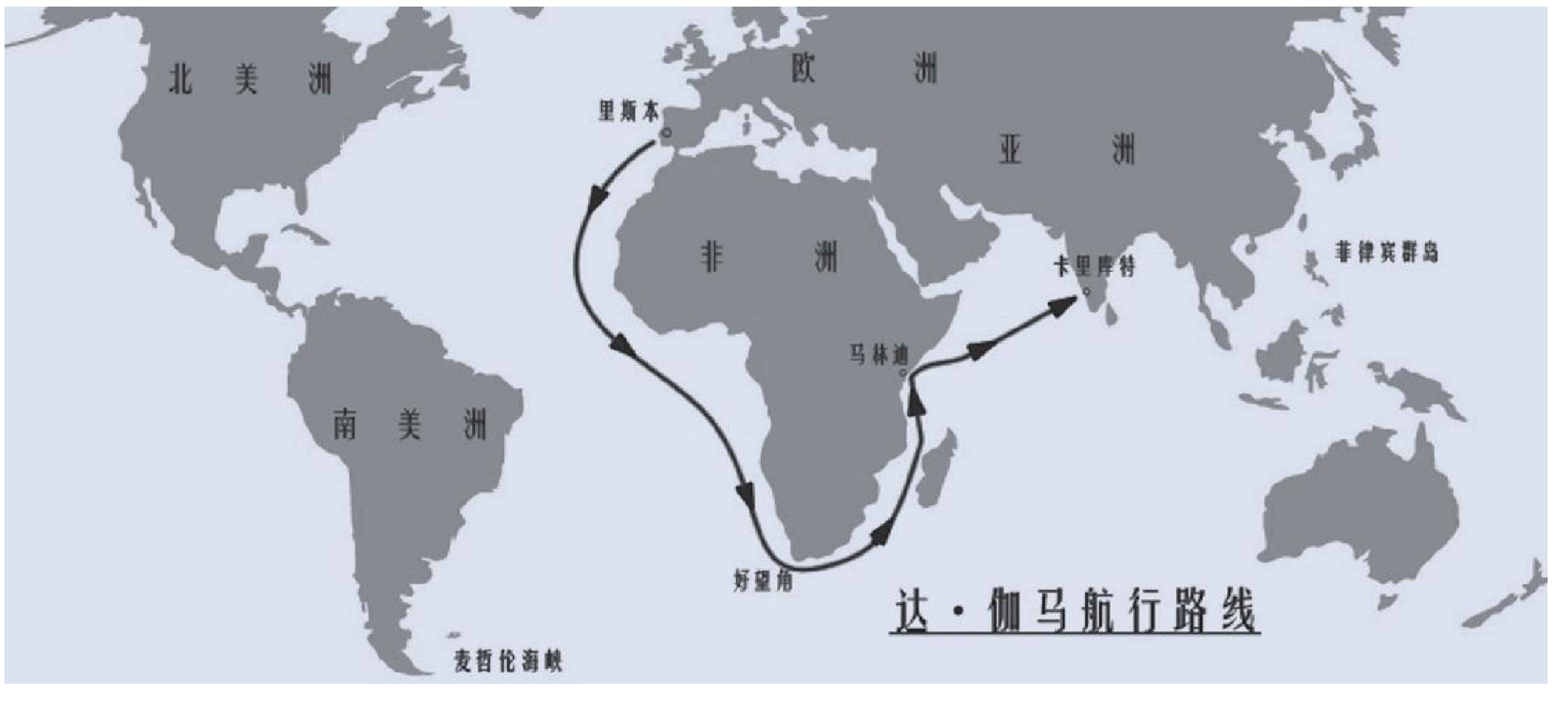
05 南海上的文明碰撞

1511年，葡萄牙一支遠征艦隊從印度果阿起航，穿越孟加拉灣後駛入麻六甲海峽。歷史上，這裡一直是南海文明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要衝，明朝初年鄭和艦隊下西洋時曾把麻六甲當作中途候風轉行的基地。

但與宣揚和平的鄭和艦隊不同，這支由18艘船、約1200名士兵組成的葡萄牙艦隊用大炮轟開了麻六甲王國的大門，佔領和血洗了麻六甲港。這是歐洲文明依仗航海和軍事技術首次入侵南海文明。兩大文明就此發生了歷史的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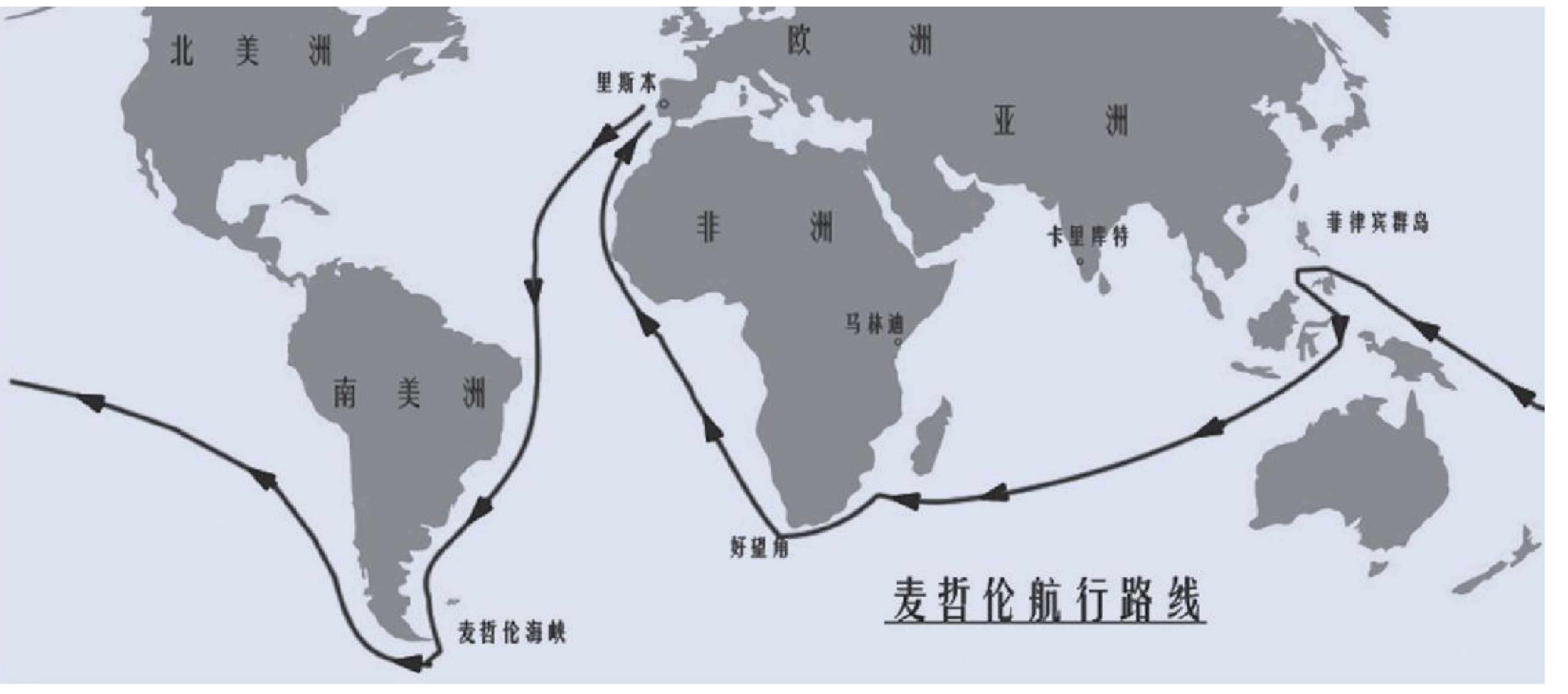
因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蓬勃興起，15世紀的歐洲文明充滿生機和慾望。對財富的極度渴望促使大批所謂的探險家遠涉重洋，所謂的尋找新大陸無非是掠奪觸角的延伸。15世紀末，迪亞士、哥倫布、達．伽馬先後發現了好望角、美洲和印度，16世紀初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這讓航海技術和火藥軍事技術都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歐洲人開啟了全球擴張模式。當他們打開麻六甲的大門，南海商業的高度發達以及南海文明的奇異光彩讓貪婪的歐洲殖民者紛至遝來。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航行路線圖。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航行路線圖。

麻六甲陷落後數十年，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許多歐洲國家把自己的商船裝備上堅槍利炮，駛入南海。它們自詡為所謂先進文明的傳播者，但攫取東方財富才是它們不斷向南海擴張的最大動力。為此，它們攻城掠地、修建據點、武裝劫掠、掌控海權、壟斷貿易，把海盜邏輯引入南海，破壞了原有的互惠互利的海上貿易規則。更為甚者，歐洲殖民者改變了南海周邊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乃至掩蓋和篡改原有的歷史，從而構建符合自身利益的話語體系與統治秩序。

當歷史記憶被徹底抹殺，當統治體系構建完工，存續上千年之久的南海文明遭到排斥、割裂和遺忘，歸於湮滅。直至今日，雖然殖民統治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昔日南海周邊國家很大程度上依然處在由西方國家建立和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往往難以從中獲得公平、合理的待遇。

一手是帳冊一手是刀劍

16世紀以前，歐洲人對於南海文明的瞭解大多來自馬可．波羅等少數西方遊歷者的描述以及阿拉伯人傳遞的二手消息，內容不乏可疑或誇大之處。在當時歐洲人的認知與想像中，遙遠的南海諸國遍地黃金，這裡是香料的產地，「樹上長的都是金錢」。



1545年，葡萄牙人若奧．卡斯楚率領船隊向東進發。圖為繪畫作品中的卡斯楚船隊。

這裡所說的香料主要是胡椒、肉桂、丁香和肉豆蔻等，它們當年在歐洲全都屬於奢侈品，價格昂貴。一是因為香料不僅可以調味，而且歐洲人相信香料是「落入凡間的天堂碎片」，具有種種神奇功效；二是因為香料產地——從印度馬拉巴爾海岸的叢林到印尼「香料群島」（馬魯古群島）都是歐洲人難以涉足的地區，香料貿易被阿拉伯商人所壟斷。香料從原產地到達歐洲時，價格經層層翻倍已是天文數字。

對於香料財富的渴望，加上對所謂異教徒的憎恨，最終促使歐洲人鋌而走險，決定尋找一條通往香料之國的航道。由此，歐洲在15世紀末開啟大航海時代，歐洲文明闖入南海文明，麻六甲港成為首個目的地，這一地區維持多年的安寧與秩序隨之被打破。

歐洲人到來之前，麻六甲港聚集著古吉拉特人、阿拉伯人和中國人的商船，是所有東方香料運往西方的咽喉要地。美國歷史學家肯尼士．R．霍爾認為，「1511年，葡萄牙人進入麻六甲海峽後，東南亞海上貿易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葡萄牙和其他接踵而至的歐洲殖民者，企圖直接控制商品來源地，排斥本土中間商，進而控制東南亞的海上貿易」。

可以說，正是葡萄牙人最早把當時盛行於地中海的海盜邏輯帶入南海，改變了之前互惠互利原則和非武裝交易的共識。葡萄牙人既沒有受歡迎的交易品，也沒有真金白銀，只好露出了野蠻人的本色，開始動用武力，依照叢林法則建立一套「商業模式」，即以壟斷和封鎖為基礎，由全副武裝的艦隊來執行貨物的收集和運輸任務。這一「商業模式」又被後來的歐洲國家所借鑑，其中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典型代表。

成立於1602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左手拿著帳冊，右手拿著刀劍」，曾擁有150艘武裝商船、40艘戰船以及1萬名士兵。它憑藉強大武力攻佔了葡萄牙人控制的「香料群島」，並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上空升起自己的旗幟，建立荷屬東印度群島殖民地，很大程度上壟斷了東方香料貿易。荷蘭東印度公司經常發動戰爭，對象既有南海國家，也有其他歐洲國家，而開戰理由無關民族、信仰、正義，只有利益而已。荷印總督揚．彼得斯．庫恩對此毫不諱言：武力是亞洲貿易的保障，貿易的利潤支撐著武力，沒有戰爭就沒有貿易。

到17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基本控制了菲律賓海域、馬魯古海域、爪哇海、巽他海峽、麻六甲海峽等，掌控南海關鍵海域的制海權，企圖擠進或壟斷關鍵商品的貿易，特別是嚴禁他人染指香料貿易。

歐洲人在所控制的海域經常騷擾和劫掠其他國家的商船，阻斷以往正常的貿易航行。《東西洋考》卷四記載：「（麻六甲）既為佛郎機（指葡萄牙人）所據，殘破之，後售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酢，屢肆輷張，故賈船希往者。直詣蘇門答剌必道經彼國。佛郎機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於海門，掠其貨以歸。數年以來，波路斷絕。」

通過野蠻和強權行徑，歐洲國家從南海商業中撈到巨大財富，或用於國內發展，或用於揮霍消費。例如，葡萄牙依靠利潤極高的香料貿易迅速從一個歐洲三流國家一躍成為世界霸主。16世紀8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丁香的平均價格是每磅3.34荷蘭盾，約為麻六甲當地價格的10倍。作為香料卸貨地，首都里斯本郊外的貝倫區也從一個無名的港口變成全歐洲最富裕城市。當地兩個著名景點——傑羅尼莫斯修道院和貝倫塔都是用販賣香料的錢修建而成，不惜重金，極盡奢華，大量採用細膩繁複的裝飾物來炫耀突如其來的財富。

為了掠奪的規則之戰

對於西方國家來說，貿易往往是殖民統治的先導，商路也就是對外擴張之路。英國歷史學家布萊恩．哈里森在《東南亞簡史》一書中寫到，歐洲國家殖民亞洲的三個步驟依次為遠洋航海、建立貿易站和設立要塞。而要塞正是殖民者統治的象徵，不僅相當於其本國領土的延伸，還實行同樣的行政、市政、宗教和社會制度。

在佔領麻六甲後，葡萄牙人立即修建城堡。他們拆毀了蘇丹王宮、清真寺和歷代麻六甲國王的陵墓，依山傍海用石塊搭建起塔樓和防禦城牆。

「他們在要塞建成後配置大炮，駐紮禁衛軍，使馬來人產生一種十分恐怖和驚奇的感覺，並使這種感覺永遠存在下去，以保持葡萄牙國王崇高的威望和尊嚴。」英國人溫斯泰德所著的《馬來亞史》如是說。此外，在西班牙佔領的馬尼拉、荷蘭佔領的巴達維亞，也幾乎都完全移植了歐洲城市模式。

歐洲國家入侵南海後，通過軍事力量建立一套全新的貿易規則和統治體系，歸根到底是為了自身利益。但這一建立過程充滿了陰謀、血腥和戰爭，南海諸國由此戰火紛飛，其中既有歐洲國家的侵略戰爭，也有歐洲國家之間的爭霸戰爭，而一些南海周邊國家經常被裹挾其中。比如，亞齊、柔佛和葡萄牙麻六甲之間曾經進行長達百年的「三角戰爭」；荷蘭曾經幫助馬魯古群島中的希圖島反對葡萄牙人，從而獲得收復該島香料的專屬權等。

在此過程中，南海上傳統的海商力量持續遭到打壓和限制，包括東南亞本地人、中國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在爪哇海、麻六甲海峽，人們要領取荷蘭殖民者發給的通行證才能出海。在馬魯古群島的丁香、肉豆蔻等貿易中，中國海商沒有任何發言權；在胡椒貿易中，華商也要看歐洲殖民者的臉色行事。在菲律賓，西班牙殖民者通常只准華商在馬尼拉貿易，而荷蘭人為發展巴達維亞，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不許華商到北大年、萬丹等地貿易。

對許多向來以海上貿易立身的東南亞國家來說，一旦失去貿易自主權、重要港口、香料等資源產地，只能意味著國運衰敗。隨著歐洲國家在南海區域大肆擴張勢力，內生文明遭到攻擊和擠壓，其中有一些甚至逐步走向消亡，比如麻六甲王國、柔佛、亞齊，還有爪哇的馬打蘭、萬丹等。

然而，南海文明存在和發展上千年，其內生力量和抗壓韌性絕非歐洲國家可以輕易撕裂和泯滅。

1565年，西班牙人黎牙實比率領一支遠征軍登陸菲律賓宿務，並於6年後攻佔了北部的馬尼拉城。但菲律賓既無香料，也沒有金銀，想讓新殖民地不致借債度日，西班牙必須另尋出路。



撒母耳．沃（1814—1885）創作的這幅《紐約港灣》描繪了1847年中國「耆英」號大帆船抵達紐約時的場面。作品現藏於紐約市立博物館。

黎牙實比剛到菲律賓之初，就聽說每年都有中國商船來到菲律賓，以生絲和金屬製品換回黃金和珍珠。由此，西班牙開通了馬尼拉和殖民地墨西哥港口阿卡普爾科之間的大帆船貿易。而中國貨物正是大帆船貿易的主要內容。

美國歷史學家威廉．L．舒爾茨在《馬尼拉大帆船》一書中提到：「中國一直是大帆船載運貨物的主要來源。對西班牙人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或中國大帆船，而馬尼拉不過就是中國和墨西哥的中轉站。」正因如此，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竟然稀里糊塗地認為菲律賓是中華帝國的一個省。



1848年4月1日《倫敦新聞畫報》關於「耆英」號抵達倫敦的報導。

大帆船從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給馬尼拉帶來銀圓和純金，用以購買中國的絲綢、天鵝絨、瓷器、青銅製品和玉石，由此墨西哥銀圓從菲律賓大量單向流入中國，中國成為最大的「銀錠吸入泵」。史料記載，「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帶，即有貨亦無幾」。

事實上，在南海區域文明內，由於中國長期在商品、航運技術等方面的優勢，早期歐洲殖民國家難以完全獲得主導地位。為此，荷蘭東印度公司曾考慮利用半公開的武裝私掠、搶劫滿載白銀、絲綢與陶瓷的中國商船。直到

1820年前後，東南亞海面上活躍的中國帆船依舊接近300艘，總運載量超過8萬噸。

此外，逐漸在暹羅、馬來亞等地落戶的中國華僑，還將相對成熟先進的造船方式帶到了東南亞，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名職員曾於1775年向倫敦總部報告，加里曼丹的華僑造船廠僅用兩個月，僅耗資4250個西班牙銀幣就建造了一艘580噸的帆船。殖民地史學家克勞福德曾在《印度半島史》中寫道，華人質優價廉的造船業，以及他們在當地民眾中平和、無野心的性格，嚴格限制了歐洲商業與殖民在當地的開展與盈利。

殖民湮滅「南海文明」

進入19世紀，英、法等歐洲國家相繼完成工業革命，擁有巨大的技術和軍事優勢，進一步加大對南海諸國的殖民統治。因歐洲工業革命而誕生的蒸汽機動力船開始出現在南海的海面上，用蒸汽與黑煙宣告了新的全球貿易時代的到來，而在南海上辛勤了上千年的中國帆船，逐漸成為遠去的剪影。

與早期的貿易壟斷和掠奪相比，歐洲殖民者在這一時期更加貪婪地擴張領土，勢力開始從海邊深入腹地，不僅是海島區域被霸占，中南半島上的王國也深受其害。1824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爆發。1886年，緬甸淪為英國殖民地。

到20世紀初期，西方殖民國家基本上將整個東南亞瓜分完畢。除暹羅外，當時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淪為西方殖民地或保護國。英國佔有緬甸、馬來亞、沙撈越、沙巴、汶萊和新加坡；法國佔有越南、老撾、柬埔寨，建立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荷蘭佔有印尼群島，建立荷屬東印度；葡萄牙佔有東帝汶；美國取代西班牙，占有菲律賓群島等。

至此，亙古的南海文明被塞入西方殖民體系中，成為西方殖民列強的商業市場、原料產地，南海諸國在遭凌辱和被盤剝中日益喪失獨立和主權。正如英國歷史學家霍爾在《東南亞史》中所說：

「1900年開始了一個開發殖民地的新階段，它比以前更緊密地把東方同西方的生產體系聯繫在一起……這時，不僅歐洲的工業愈來愈依賴於東南亞的豐富物產，如石油、橡膠和各種金屬，而且，日益增長的歐洲人口對於這個地區的大米、咖啡、茶和糖的需要也空前增大了。」

長期殖民統治下，歐洲文明不斷擠壓和侵蝕南海文明，一些南海國家的內生文明無力抵禦宗主國的影響，被迫接受宗主國的語言、歷史、價值觀念與宗教信仰，原有的社會形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以及精神面貌都被迫改變。

以宗教傳播為例，葡萄牙殖民者佔領麻六甲後即著手推行天主教，先後建立了5座教堂，創立天主教學校。17世紀初，麻六甲的天主教徒只有7400人，而到了17世紀中葉，基督徒人數超過了兩萬。

更有甚者，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南海文明的歷史被改寫甚至徹底抹殺。在一些西方人的描述中，是歐洲人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文化和文明，給當地帶來了「福祉與繁榮」。但大量事實清楚地表明，南海文明圈中的內生文明從不蒼白，例如中世紀的爪哇人、緬甸人在藝術和建築方面的成就舉世聞名。

恰恰是歐洲人為了自身利益野蠻地干涉、毀壞了南海文明，用所謂西方的規則，改寫了南海中原有的那套維繫和平、推動交流、促進發展的內生制度體系。

時至今日，殖民統治體制早已宣告崩潰，但歐美等西方國家依然壟斷著當今的世界秩序。一些國家又把目光瞄向南海，高喊著「重返亞太」的口號，企圖用「重建規則」這一陳詞濫調重蹈歷史的覆轍。對於這些人，該去讀一讀南海的歷史。誠然，幾百年的西方殖民，讓南海文明被炮火湮滅，讓南海文明被歷史遺忘。但南海文明的基因，從未消逝，也不會消逝。

尾聲

在巨著《地中海與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中，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回顧自己的寫作動機時寫到，「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還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命運和自己的強大生命」。

如果把這位年鑑學派代表人物筆下的「地中海」置換成「南海」，同樣的寫作理由是否站得住腳？

答案是肯定的。

地中海面積約251萬平方公里，南海面積約350萬平方公里；今天的地中海周邊分布有大約20個國家和地區，南海周邊則分布有10多個國家和地區，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在近現代，環地中海和環南海區域一直人口稠密；地中海沿岸歷史上產生過古埃及文明、兩河文明、伊斯蘭文明，也是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南海周邊則是中華文明、印度文明的發源地，南海區域也是這些文明密集碰撞的交流區。

更重要的是，南海文明在數千年的發展和交流中，明顯具有自己的發展能力、自塑能力、創新能力以及強大的歷史基因延續能力。與地中海世界類似，貿易和航海技術作為主要動力，不斷推動和塑造著南海文明的內涵和外延；但與地中海世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貿易的開拓和航海技術的發展，在南海更多帶來的是和平與繁榮，而非地中海世界歷史上反覆上演的征伐和擄掠。

區域內文明傳播的差異也非常明顯。於地中海世界，文明的消長或易幟，主要源於鐵騎和征服，各種宗教的命運與征服者的命運密不可分，其興也快，其亡也速。而於南海，文明的進出多隨商人行止，文明的交會融合如涓涓細流匯成大江大河，溫和、包容而富有持久生命力。

季羨林先生曾為世界文化厘定四個主要體系，即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以及希臘、羅馬至今日歐美的文化體系。在南海文明中，中國、印度、伊斯蘭文化以和平方式相互借鑑和匯融的特徵非常明顯，打碎這種歷史基因樹的恰恰是從16世紀以來從地中海方向攜槍炮而來的西方「文明」。

或許與大多數讀者想像中的不同，歷史上的南海世界並不是一個由單一文明主導的區域文明。我們習慣認為的「中華文明」，其典章制度和文字流儀的輻射力主要集中在以朝鮮半島、日本、琉球為主的東北亞以及現在的越南北部地方。在更廣大的南海世界，中國的影響力主要通過貿易和技術傳播來實現。相互的貿易需求推動技術發展，技術更新引發航線探索，開闢航線帶動人文交流與貿易交往，頻繁交往又促成外交關係的建立，而所有這一切又推動出更深層次、更大規模的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

貿易交往同時催生出了交通、流通、倉儲、互通貨幣等各種需求。例如，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在遠航多國時就曾發現，在中南半島的幾個貿易大港，當地貨幣與中國銀票乃至其他國家的銀圓之間已經形成固定匯率和兌換信用。類似文獻資料實際上是對當時南海貿易的規則、規模、信用度、商品價差、市場需求等方面最原始的定量研究。

另一不容忽視的是，在南海世界，通過各種官方和民間管道的持續交流，中國的「禮儀」理念同樣影響深遠。即便在受印度文化影響較深的中南半島，在非宗教層面的社會價值觀和倫理觀中，「禮儀」也深入人心。

和平的交往，才會有平等的文明交流和互鑑。這是南海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對現代人的重要啟示。由此出發，在討論南海文明時，我們至少可以與兩種一直以來的看法拉開一定距離。一是要對近現代西方學者「發明」的所謂朝貢貿易和宗藩制度保持清醒認識。正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院長莊國土先生在《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一文中所言，朝貢僅是貿易的外衣，更多時候是中國朝廷的一廂情願。「古代中國的所謂『屬國』，基本上都是中國的鄰國，與中國的關係十分複雜，有的是戰爭後的一種和約，有的是雙方往來的交往名義，有的是為通商目的而建立的關係形式。大體而言，中國與絕大多數周邊國家（朝鮮、越南以外）的所謂宗藩關係，並不是一種國際監護，而是平等的雙邊關係。」

一度，西方學者同樣「發明」了東南亞歷史的「印度中心論」或「印度化」學說。這背後同樣潛伏著西方固有的「歐洲中心論」和「歐洲優越論」的學術心理習慣。鑑於西方殖民者進入南海文明的橋頭堡便是印度，抬高已淪為殖民地的印度文化，顯然讓西方自感對東南亞文明尤其具有心理上的優越感，對一個「落後文化」的掠奪和征服也更能顯得心安理得。

與一些西方學者的成見相反，美國塔夫茨大學的東南亞史學者林達．謝弗通過研究各種文獻和考古證據提出，「西元1年到1500年，東南亞地區是全球的經濟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活躍的意識形態中心和宗教中心」。[5] 歷史上，東南亞地區也將自身取得的文化和技術進步通過南海和印度洋向外傳播，包括印度次大陸、中國、中東、非洲等地都曾是受益者。

南海也是一部活的教科書。她有自己的體系、品格、話風和思維方式。她在歷史上形成的商業、科技、貿易、文化、宗教、民族、政治、外交等歷史基因，至今仍如雪泥鴻爪，不時在當代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綻現。13世紀，蒲甘王朝覆滅，許多歷史學家歸因為大興佛教後造成的國家財力傾頹和宗教勢力尾大不掉，但後來《劍橋東南亞史》指出，「在分析蒲甘瓦解的原因時，或許應該把民族衝突問題放在與土地控制問題同等重要的位置」。聯想到當前緬甸社會轉型面臨的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不由不讓人產生似曾相識之感。

同理，當前南海地區的大國博弈、外交互動的形態，也不由不讓人聯繫到歷史上大陸國家、半島國家、海島國家之間的折衝樽俎……

展望未來，南海的地理空間、地形位置無疑將繼續主導塑造著圍繞它生存、繁衍、發展的約20億人口，而有關南海大時代的歷史記憶、文明基因、文化特質的種種細節，在揭開歷史塵封的蓋子後，噴湧而出，從而引領起新的歷史大潮。

「一部以遼闊水域為中心的歷史論著誠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終將走出歷史塵封，像任何新事物一樣，會冒種種風險。」

無論如何，這是有必要嘗試的一種冒險。

跋:《南海文明圖譜》讀後絮語

在長期從事對南海周邊國家的外交工作中，我總感覺這個地區有一個久遠的文明。今天，這裡的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活動中，時時濡透著那個文明中蘊含的那種自強、相容、開放的特質。人們熟知的吳哥窟、婆羅浮屠、蒲甘佛塔群等古代文明遺跡雖已殘破，但仍能喚起人們對輝煌過去的無限遐想。無疑，這片土地上產生過的文明曾是人類文明寶庫中不可或缺的價值內涵。在同東南亞各國接觸中，我又注意到他們對本國的古代史鮮有文字記載，很多歷史的復原只能依賴中國古籍或西方學者論著，而大多數西方論著還得從中國古籍中尋找依據。於是，我曾希望近水樓臺的中國學人能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典籍集腋成裘地整理出那個被歷史煙塵埋沒了的南海文明。

令人高興的是，凌朔等多位新華社記者率先開始了這項偉大的工程。他們在完成南海新聞報導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研究、編撰了《南海文明圖譜》一書，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為我們勾畫出一幅生動的圖景。這個地區在西元前就有人類的生存、生產和生活。先後出現上百個王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數扶南、暹羅、蒲甘、交趾和占城、室利佛逝和麻六甲、爪哇、渤尼、蘇祿和呂宋，堪稱八大文明亮點。整個地區文明的形成經歷了從海灣文明到半島文明再到群島文明的過程。中國作為南海地區最重要的大國以其先進的航海技術先後開闢了南海上的「西弧」和「東弧」航線，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明，也促進了各國之間的往來互利，有力推動了南海文明的進一步發展。隨著海上絲路的形成和延伸，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等也對該區域文明產生了積極影響。幾千年的歷史演進，讓南海文明締造出一種既兼收並蓄又獨樹一幟的品質與風格。只是到了16世紀，西方的炮艦攻破麻六甲以後，殖民主義的蹂躪才使南海文明支離破碎而被忽略。

《南海文明圖譜》的作者們吹開歷史的塵埃，揭示出南海文明的瑰麗輪廓，實在是做了一件大好事。這從一個側面再次告訴我們，中國和南海各國之間不僅有著謀和平、求發展的現實利益交融和對更加美好未來的共同憧憬，而且有著共同創造的、源遠流長的歷史文明作為堅實支撐，今天南海區域存在的一些爭端與之相比實在是小事一樁，完全可以在攜手並進中逐步解決。《南海文明圖譜》開了一個好頭，希望有更多的學人參與到這項研究中來，最終把一個更加扎實豐厚、多姿多彩的南海文明呈現在世人面前。

2017年7月30日
張九桓，外交部亞洲司前司長，
曾任中國駐尼泊爾、新加坡、泰國特命全權大使

後記

「南海文明」萌芽於我們對南海相關新聞事件的調研報導過程中，隨調研推進，這一概念逐漸清晰化。

歷史上，存不存在「南海文明」？「南海文明」如何生成、如何湮滅？通過歷史典籍和檔案，能否復原「南海文明」的本來面貌和發展脈絡？

帶著這些問題，以凌朔為主，新華社國際部地區報導中心多名記者在前後半年多時間裡，梳理古今中外的各類檔案材料，經歷了從混沌到清晰的探索過程。可以說，「南海文明」的點點滴滴就散佚在大量的歷史文本和實物證據中，我們所做的無非是吹拂去歷史的塵埃，將蒙塵的歷史明珠分揀出來，並用時間、空間的經緯線串起了這些明珠。這不是一本關於南海歷史的學術著述。構建如此宏大的歷史主題，嚴謹的學術著述恐怕要窮數年甚至數十年之功，不是幾名記者編輯能畢其功於一役的，但它為可能的學術探討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這也不是一本媒體工作者的拈來之作，它的背後是參與南海報導的記者編輯們思考南海問題的苦心孤詣和深刻感悟，在新聞越來越碎片化的時代，新聞工作者的歷史擔當並沒有碎片化。

換言之，這本書介乎學術著述的漫長週期要求與新聞報導的倏忽消逝現實之間。作者們在幹一件溝通調和學術界和傳媒界的「傳播型學術工作」或者說是「學術型傳播工作」，總之二者皆具。

《南海文明圖譜：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一書，是在新華社領導和同事們的關心與呵護下誕生的。在社領導的直接關心下，新華社專門就「南海文明」概念和議題舉行研討會，從不同角度提出意見和建議。

我們致敬本書主編、新華社國際部主任嚴文斌同志。「南海文明」能最終成書付梓，與他對業務創新和機制創新的高度重視密不可分，與他對國際傳播、國際話語體系建設的高度敏銳密不可分。

正是有了新華出版社的慧眼識珠，「南海文明」這一概念才得以順利與廣大讀者見面。在此，我們也對此書的責任編輯江文軍表示感謝，他的細緻溝通和精心編輯很好提升了本書的品質。

我要特別向凌朔等眾位執筆者表示敬意和祝賀。凌朔是《南海文明圖譜：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的主要作者，承擔了本書大部分寫作內容，也是最勤奮的策劃者、採寫者和編纂者。

私下探討時，我們甚至敝帚自珍地認為，某種程度而言，此書也是南海報導的下半場——因為圍繞南海的各種歷史和現實紛爭遠未結束。

最後，我們希望，這本小書能吸引更多海內外學者和媒體界人士參與到「南海文明」的探討和傳播中；也希望能為「南海文明」內外的官方和民間人士搭建一個可供友好交流和文明互鑑的討論平臺，共同把「南海文明」的歷史基因延續下去。

是為後記。

2017年8月3日

謝榮

主要參考文獻

陳暉、熊韜、聶雯.《泰國概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4

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 1986

D. G. 霍爾 [英].《東南亞史》.商務印書館. 1982

戴爾．布朗 [美].《東南亞：重新找回的歷史》.華夏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1

費琅 [法] .《昆侖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及蘇門答臘古國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費爾南．布羅代爾 [法].《地中海與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商務印書館. 2014

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商務印書館. 2011

弗朗索瓦．吉普魯 [法] .《亞洲的地中海——13—21世紀中國、日本、東南亞商埠與貿易圈》.廣東省出版集團新世紀出版社. 2014

古小松.《東南亞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金宜久.《伊斯蘭教教史》.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金宜久.《伊斯蘭教文化150問》.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東方出版社. 2006

梁英明.《東南亞史》.人民出版社. 2010

梁志明.《古代東南亞歷史與文化研究》.昆侖出版社. 2006

欒文華.《泰國文學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8

馬麗蓉.《「一帶一路」軟環境建設與中國中東人文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譚中 [印]、耿引曾 [中] .《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蕩》.商務印書館. 2006

藤田豐八 [日].《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 1935

張旭東.《東南亞的中國形象》.人民出版社. 2010

張一平.《南海區域歷史文化探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2

章培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選譯》.鳳凰出版社. 2011

趙世汝.《諸蕃志校釋及職方外紀校釋》.中華書局. 2000

作者簡介

謝棠

新華社高級編輯，俄羅斯、中亞問題專家，曾任新華社亞歐總分社黨組成員、莫斯科分社首席記者。

馮武勇

新華社高級編輯，國際部地區報導中心主任，日本問題、東北亞問題專家，曾任新華社東京分社記者。

凌朔

新華社高級編輯，東南亞問題、南海問題專家，曾任新華社曼谷分社記者。

邵傑

新華社主任記者，駐外20多年，先後擔任新華社駐約旦、黎巴嫩記者，駐開羅、伊拉克、蘇丹首席記者，足跡踏遍所有阿拉伯國家。專注中東形勢研究。

張遠

新華社記者，先後任新華社的黎波里分社、柏林分社記者，曾深度報導利比亞戰爭。專注北非、北歐、南海形勢研究。

張偉

新華社主任記者，曾任新華社巴格達分社、歐洲總分社記者，長期從事歐洲問題研究。

孫晶

新華社記者，曾任新華社東京分社、亞太總分社記者，長期從事日本問題研究。

劉莉莉

新華社記者，曾任新華社拉美總分社記者，長期從事國際文化、社會、拉美問題研究。

1. ［唐］義淨原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
2. 梁志明等主編：《東南亞古代史》緒論，第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3. 陳佳榮、謝方、陸峻嶺撰：《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
4. ［新加坡］邱新民：《風帆時代亞澳地中海文化》前言，新加坡青年書局，1990年。↑
5. ［美］戴爾．布朗編，王同寬譯：《東南亞：重新找回的歷史》，華夏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如是文化
YH0012

目錄

- 封面
- 版權頁
- 序一
- 序二 一部頗有創意的新作
- 前言
- 目錄
- 第一部分 南海文明基因圖譜
    - 引子
    - 01 南海文明的早期基因
        - 文明之沉浮：始於扁舟，毀於戰船
        - 文明之啟蒙：冒險探索，雛形初現
    - 02 南海文明的「兩弧」序列
        - 文明之定型：千帆競渡，系統海航
        - 文明之昌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03 南海文明的遺傳特質
        - 文明之引擎：中國分享，技術傳播
        - 文明之品質：物質交換，精神交流
    - 04 南海文明的複製演進
        - 文明之胸懷：兼收並蓄，吐故納新
        - 文明之根本：文明反哺，共建共贏
    - 05 南海文明的干預突變
        - 文明之劫難：殖民排擠，文化清洗
        - 文明之規則：恪守平等，抵制掠奪
    - 06 南海文明的基質再生
        - 文明之保障：中國管轄，共同維護
        - 文明之本質：自由和平，合作繁榮
- 第二部分 南海文明的內生文明
    - 引子
    - 01 暹羅灣，不止是南海文明一隅
        - 兩航線推演歷史三階段
        - 古人眼中的金鄰大灣
        - 連接兩洋的戰略要衝
        - 狼牙修，古籍中的古國
        - 「暹羅」是個外來詞
    - 02 扶南，南海文明早期大通道
        - 一個女人開創的扶南史
        - 南海上的兩洋三國外交
        - 兼具早期南海文明興盛多要素
        - 大航海時代跌宕起伏的真臘
        - 用8500字復原的文明
    - 03 驃國和蒲甘，南海邊的陸海通衢
        - 羅馬雜耍進洛陽
        - 南海古代匯市的縮影
        - 緬語專業的緣起
        - 互為影響的佛教文化
    - 04 渤泥，南海南緣的南大門
        - 南海最南的島嶼中心
        - 一塊墓碑與南海人口大流動
        - 南海、渤泥與青花瓷
        - 遠隔南海的外交風雲
        - 南海上的「元首外交」
    - 05 交趾與占城，南海上的絲路驛站
        - 交趾籍紫禁城設計師
        - 占城稻米與「馬爾薩斯陷阱」
        - 多元文化交融的國際化大都會
        - 穿越時空的跨海尋蹤
    - 06 爪哇，南海桃花源
        - 倉廩殷實與印度匠心
        - 鄭和捎去「中國風」
        - 爪哇「名片」胡椒和糖
        - 爪哇的軍火出口
        - 華人反殖民之役
    - 07 麻六甲，南海的寶瓶口
        - 天賜之峽與歷史必然
        - 靠海峽發家的室利佛逝
        -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 南海地緣政治中的外交
    - 08 呂宋與蘇祿，南海貿易盛衰的親歷者
        - 致富經裡的「貓里務」
        - 客死山東的蘇祿東王
        - 美洲土產跨洋進南海
        - 蘇祿、呂宋的覆滅
- 第三部分 南海文明與世界文明
    - 引子
    - 01 南海上的《一千零一夜》
        - 中國是個「島」
        - 南海上的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
        - 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多元傳播
    - 02 南海上的印度梵音
        - 跨越千年的南海古航道
        - 黃金、香料和奇珍異貨
        - 梵音的魅力
    - 03 南海上的東瀛浪人
        - 東亞貿易圈的「局外人」時代
        - 南蠻貿易和朱印船貿易
        - 商人、傭兵、天主教徒
        - 日本人在東南亞的口碑
    - 04 南海造就的萬國津梁
        - 早期的「公派技術移民」
        - 特許經營造就「天時」
        - 轉口貿易依仗「地利」
        - 南海文明開創「人和」
    - 05 南海上的文明碰撞
        - 一手是帳冊一手是刀劍
        - 為了掠奪的規則之戰
        - 殖民湮滅「南海文明」
- 尾聲
- 跋：《南海文明圖譜》讀後絮語
- 後記
- 主要參考文獻
- 作者簡介
- 封底